



JINLINGNÜZIDAXUEXIAOSHI

张连红 主编

金陵女子大学校史

金女大定“厚生”(Abundant Life)为校训，它取材于《圣经·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中“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我来不是要人服侍我，而是要服侍人的。”德本康夫人曾对此进行过专门诠释：“‘厚生’就是在各方面得到至善至美的发展。在多项发展中，学生人格的塑造，基督生命的培育至为重要。获取丰盛生命的学生才懂得为人类社会多作贡献。”而吴贻芳在谈到学校的这一校训时也曾说：“当时学校用‘厚生’作为校训，涵义为：人生的目的，不光是为了自己活着，而是要用自己的智慧和能力来帮助他人和社会，这样不但有益于别人，自己的生命也因之而更丰满。学校用这个为目标来教导学生，并通过学校生活的各方面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引导学生向这个方向努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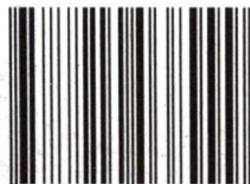
校训“厚生”成为金陵人精神的源泉。

江苏人民出版社

金女大定“厚生”(Abundant Life)为校训，它取材于《圣经·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中“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我来不是要人服侍我，而是要服侍人的。”德本康夫人曾对此进行过专门诠释：“‘厚生’就是在各方面得到至善至美的发展。在多项发展中，学生人格的塑造，基督生命的培育至为重要。获取丰盛生命的学生才懂得为人类社会多作贡献。”而吴贻芳在谈到学校的这一校训时也曾说：“当时学校用‘厚生’作为校训，涵义为：人生的目的，不光是为了自己活着，而是要用自己的智慧和能力来帮助他人和社会，这样不但有益于别人，自己的生命也因之而更丰满。学校用这个为目标来教导学生，并通过学校生活的各方面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引导学生向这个方向努力。”

校训“厚生”成为金陵人精神的源泉。

责任编辑 戴宁宁
装帧设计 刘葶葶



ISBN 7-214-03899-4
G·1598 定价:26.00 元

金女大校友会组编

张连红 主编

金陵女子大学校史

JINLINGNÜZIDAXUEXIAOSHI

主编 张连红

作者（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卫星 严海建 张连红 沈 岚

经盛鸿 虞亚梅 管尔东

江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金陵女子大学校史/张连红主编.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

ISBN 7-214-03899-4

Ⅰ. 金… Ⅱ. 张… Ⅲ. 金陵女子大学-校史 Ⅳ. G77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08617 号

书　　名	金陵女子大学校史
主　　编	张连红
责任编辑	戴宁宁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中央路 165 号　210009)
网　　址	http：//www.book-wind.com
集团地址	江苏出版集团(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照　　排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 者	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960×1304 毫米　1/32
印　　张	11.875
字　　数	370 千字
版　　次	2005 年 10 月第 1 版　200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214-03899-4/G·1598
定　　价	26.00 元

前　言

本书主编张连红教授在百忙之中组织专家，写成了这本我们久已期盼的《金陵女子大学校史》。此书收集的资料极为丰富，除了取材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第一手资料外，还博览了前人所写有关金女大的研究成果。从第一章至第五章写的是金女大建校及其发展过程，史料翔实，将有利于读者了解金女大的始创人德本康夫人等在民国初年创办女子高等教育的艰辛。

1928 年，吴贻芳博士掌管学校后，她顺应时代潮流，对学校教育进行了大胆改革。首先是优化师资，几乎所有的系主任都是来自英美著名大学的博士。同时，她还积极调整课程设置，并完善校内各种规章制度。在抗日战争八年期间，有五所教会大学汇集在成都华西坝。五所大学资源共享，友好合作，学术交流活动非常活跃。办学质量不仅未因战乱而倒退，反而因集思广益、切磋探讨而提高。金女大师生在这个时期的抗日救亡活动也非常活跃，成立了战地救护队、火警团等，让不少师生掌握了战地救护伤员的知识和技能；组织了抗日宣传团、新疆慰问团，激发了师生的爱国热情。

抗战时期，在南京金女大校本部，美籍教授华群（明妮·魏特琳）自告奋勇，承担了留守护卫校园的任务。日军占领南京后，疯狂地残杀我同胞。华群教授不顾自身安危，挺身而出，拯救了成千上万妇孺难民。在校园内，她还办起了女子实验中学，传承着金女大的优良校风。华群教授对中国人民和金女大的深情厚谊，让我们永远感激和怀念。

本书还论述了金女大特有的教学模式：如学分制，积点记分制，

主、辅修兼顾，选课文理渗透等。学生在大一时预选专业，到大二时进行基础考试后，根据学生的学习情况、爱好和能力来确定学习方向。不论学生选哪个专业，学校都非常重视能力的培养，尤其重视理科的实验和文科的社会实践。无论在战前、战时或战后，金女大在哪里办学，哪里就有“金女大社会服务处”。下去蹲点的不仅有学生，还有资深的指导教师。她们在乡村过着点油灯、吃粗茶淡饭的俭朴生活。乡村社会服务的主要工作有：教农民识字、学文化；教妇女们纺织、做手工活，并替她们将成品寄到外国出售；还给当地的儿童理发、治皮肤病等。

第六章中列举了金女大培养的许多专家、学者、精英及其事迹，说明金女大的教学质量高，善于开发学生的思维能力，激发她们的潜能。还有一大批毕业生在各类学校的平凡工作岗位上，作出了不平凡的业绩。一些接触过金女大学生的社会人士，都给予她们很高的评价：金女大毕业生事业心、责任感强，忠于职守，勇于进取，一专多能，择业适应性较强。此外，金女大用校训“厚生”对学生进行人格教育，也取得了非常好的实效。

金女大在教书育人方面，采取了西方国家大学的模式：重因材施教、启发式教学和能力的培养。因为是女子大学，学校还从多方面提高学生的自尊、自强、自立、自信的意识。不少毕业生走上工作岗位后，她们敢想、敢干，有克服困难的勇气和基本功。此外，学生在金女大全方位的素质教育下，一般都注意文明礼貌，仪表风度比较好；尊师爱生、乐于助人，师生间、同学间的凝聚力强。

北美的金女大校友会，每两年轮换在美国和加拿大举行，今年10月将举行第26届双年会。十几年以前，当校友们知道吴贻芳校长的遗愿是重建金陵女子学院，即开展募捐活动，为设立吴贻芳基金出钱出力。1987年，江苏省政府正式批准在南京师范大学内建立金陵女子学院，也就是在金女大的旧址上重新创办金女院，延续老校长的教育事业和办学理念。国内外的老校友对金女院的发展都非常关注，国外的校友们更是鼎力相助，捐款捐物，充分说明了她们对母校的热爱之情。

金女院领导大力支持《金陵女子大学校史》这本书的出版，也是希望从本书中吸取金女大办学经验，光大金女大的优良传统，让金女院在传承吴贻芳校长的教育思想的基础上，越办越好。

金女大南京校友会名誉会长
梅若兰
2005年9月

目　录

第一章　金陵女子大学的创建

第一节　晚清以来西方教会教育中的女学

一、新式女子教育观点的传播

自鸦片战争之后，清朝面对西方列强的侵略，割地赔款，节节败退。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大批传教士在《北京条约》的保护下开始涌来中国传播基督福音。但是，在儒家文化深厚的中国，传播基督教并不如西方的船坚利炮那样容易征服中国。经过一段时间摸索总结之后，传教士们体认到创办新式教育，培养传教精英人才是传播上帝福音的最佳途径。而此时，晚清有识之士在自强运动和维新改革等苦苦寻求强国之路的过程中，也已达成兴办西学的共识。在这一特定时期，西方教会的传教和兴学成为不可分割的部分，而宣传新式女子教育更成为传教士传教工作中的一大特色。

中国传统文化中一向重男轻女，认为读书是男人的事，而"女子无才便是德"则是教养女子千古不变的训条。为改变传统以男子为中心和接受女子教育的观点，传教士一方面以"上帝造人男女并重，乃自然之正理"来相号召，另一方面他们为了顺应中国追求富强的需求，以中国传统"贤妻良母"的解释来强调女学对家庭和国家的贡献。狄考文在《振兴学校论》中说："有读书之母，(子)更可因母而益聪明，况引孩提入学问之途，莫善于母。"还有作者撰文指出："夫女子一生，始女继夫终母，诚培植于为女之时。妇贤天下之为夫者亦义，母贤天下之为子者亦

孝,孝子贤孙,接踵而起,一家如此,一国如此,天下如此,是其为治。"①林乐知认为:"国人之中,女人恒居半数,家人之中,子女常遵母训。女人之学与不学,其系关于国家天下者,不綦重哉!"②林乐知还将女学同国家兴盛关系阐述得更为密切,他认为"女学为兴国第一要事也"。他在《全地五大洲女俗考》一文中指出:"国本在家,家本在女。欲观国中教化之盛衰,必以家中女人之贤愚为定格……凡贫弱之国类,比发源于薄待女人,若不从根本上施治,而释放女人,造就女人,决不能望其能转贫为富,化弱为强矣!"③传教士大力宣扬女学对家庭、国家的助益,目的是为了提高社会对女学的重视,在他们的观点影响下,维新人士也开始大力著文宣扬振兴女学,整个社会逐渐认识到倡兴女学、创办女校的重要性。

传教士宣传女学、创办女校也同他们宣传信教的目的相一致,他们认为通过妇女,可以影响整个家庭成员信教:"家庭风气皆赖为母、为妻、为女者成之……若夫儿童教育,乃最要之基督教育,而以家庭为中心点"④。另外,传教士也希望通过创办女学,培养一批有领导能力的教徒,"给入教的学生以智慧和道德的训练,使学生能成为社会上和教会里有势力的人物,成为一般人民的导师和领袖。"⑤从而提高基督教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地位,扩大教会的社会影响力。

在西方来华传教士中,还有一个十分显著的特点是女传教士所占的比例越来越高。据资料显示,1876 年来华传教士总人数为 817 人,其中女传教士就有 407 人;到了 1889 年,1 296 名来华传教士中,女传教士人数超过男传教士,已达到 707 人;1905 年时,女传教士几占传教

① 华立熙:《女学兴国记》,《万国公报》,第十三卷第七期。
② 林乐知:《论女俗为教化之标志》,《万国公报》,第十五卷第四期。
③ 林乐知:《全地五大洲女俗通考》,《万国公报》,第十五卷第八期。
④ 麦女士:《基督教女子教育》,《中华基督教会年鉴》,第一期。
⑤ C. W. Msster, *How may Educational Work be Made most to Advance the Cause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pp. 456—476. 转引自曾芳苗著,吴振汉指导《民国教会女子教育——"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个案研究(1915—1951)》,"国立中央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未刊稿),第 36 页,1986。(以下引用该论文皆为此版本)

士人数的五分之三，已达到 2 002 人，而男传教士只有 1 443 人。[①] 美以美会来华的传教士中，其女传教士人数一直占总数的三分之二。这些英美女传教士早期受过西方近代教育，深知教育对女子的重要性。[②] 当这些女传教士来中国后，发现中国是一个以男子为中心的社会，男尊女卑，妇女社会地位十分低下。而且，在晚清中国严守“男女之防”的风气下，如此众多的女传教士很自然地将中国妇女作为她们重点传教的对象。“遍劝好善之女教士，分诣中国，普教妇女，咸使之读书，俾共合泰西各国救世教之良法美意。”因此，开办教会女学，培养女传教士信徒，提升妇女社会家庭地位成为来华女传教士最为热心的工作。随着西方势力的发展，教会女学在各通商口岸及其他城市陆续开办，在女传教士的努力下，中国出现了“教会所至，女塾接规”的现象。[③]

晚清以来，传教士们通过对中国社会的认识、适应，最后他们将兴教办学和传播近代文明相结合，“将女子教育、基督教福音和近代文明三者等而视之。他（她）们一方面利用女子教育来达到传教目的，另一方面也深信缺乏女子教育是妨碍中国文明开化的一大原因”[④]。西方传教士提倡女学的宣传与身体力行，极大地“冲击了中国‘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传统思想，在中国封建教育制度中打开了一个缺口”。[⑤] 这对中国近代教育制度的现代化，特别是女子教育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

二、教会女学的兴起与发展

实际上，西方教会在中国开办最早的较正规的学校就是女校。据

---

① 吕美颐：《基督教在中国近代妇女中的传播及其影响》，载李小江等主编《性别与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

② 朱峰：《基督教与近代中国女子高等教育——金陵女大与华南女大比较研究》，第 43 页，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以下引用该书皆为此版本）

③ 梁启超：《倡设女学堂》，载《饮冰室文集》第二册，中华书局，1926。

④ 朱峰：《基督教与近代中国女子高等教育——金陵女大与华南女大比较研究》，第 64 页。

⑤ 张建仁、张建民：《中国近代女子教育发展述评》，《河北师范大学学报》，1989 年第 3 期。

史料记载,教会在中国创办最早的女校是1834年传教士郭士立(Gutzlaff)夫妇在澳门筹办的学堂。澳门女塾最初宗旨只收女童,后兼收男童。次年正式招生开课,计有女生12人、男生2人。学校系小学水平,三年学制,课程包括诵读、英文、中文。第一年兼习地理、历史和写作,第二年习读本和写作,第三年只习读本。① 学校实行免费寄宿制。但这所女学寿命也不长,1939年中英关系因鸦片问题紧张,英人郭士立被逐出澳门,学校也因此被迫停办。

一般学者将1844—1860年当作教会女校发展的第一阶段。1844年英国伦敦"东方女子教育会"派遣爱尔德赛前来中国传教,他来到宁波后,很快创办了宁波女校,1845年该校有学生15人,1852年学生人数已达40人。其后,在五个通商口岸陆续创办了许多女校,如1851年美国圣公会在上海开办"文纪女塾",1859年美以美会在福州创办"毓英女校",1860年英国长老会在鼓浪屿创办"仁女学"。据统计,到1860年时,五口通商口岸上有12所教会女子学校。② 这一阶段的女校只是集中在五口通商口岸,还没有得到社会认可,校舍条件也极为简陋,学生大都以教会子女、乞丐和孤儿为主。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通商口岸迅速增加到15个,教会到中国内地传教获得了合法身份,另外,社会舆论对教会女校的偏见逐渐减少,教会女子教育也因此进入迅速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同前一阶段相比,1860年之后的教会女学在生源、校舍条件和教学质量等方面都出现了很多变化。首先,教会女校不再仅仅免费招收穷苦孩子,而是开始以买办及其他富有家庭的子女为主,办学已由原来的慈善行为变为经营行为。到了19世纪90年代,教会女校几乎全部自费读书。从劝学到求学,从免费到收费的变化发展,说明了教会女校已得到了中国社会各界的认可。其次,由于实行收费教育后,教会女校在软硬条件上也都得到了迅速改观。第三,教会女校的教学质量也日益提升。仅从课程开设

① 郭卫东:《基督新教与中国近代女子教育》,《历史档案》,2001年第4期。一般著作将1844年的宁波女塾当作第一所教会女校。

② 同上。

的变化便可十分清楚，早期教会女校大都只能开设宗教课目，到了19世纪80年代，绝大多数教会女校已能开出道学、国文、世界史地和数学四门，少数学校还能增加一门英文。而到了1900年，有人对华南、华中、华北和华东的五所教会女校做了一次调查，发现五所学校都开设了国文、道学、世界史、地理和算术五门，其中有四所学校开设了音乐、生理、体操和天文等课，有两所学校开设了天文、物理和英文，有一所学校还开设化学、卫生学、代数、动物学和植物学等课程。另外还开有缝纫、烹饪等辅修科目。①

表1　光绪三十三年(1907)全国女子学堂分布表②

所在地区	学堂处数	学堂职员人数	学堂教员人数	学生人数
京　师	12	22	59	661
直　隶	121	127	168	2 523
奉　天	12	17	60	694
吉　林	0			
黑龙江	2	1	4	90
山　东	1	5	6	54
山　西	5	7	15	149
陕　西	10	10	20	154
河　南	3	4	4	84
江　宁	24	61	99	803
江　苏	72	197	545	3 395
安　徽	2	8	12	86
浙　江	32	64	138	995

① 褚季能：《女学先声》，《东方杂志》，第(妇)23—27页，第三十一卷第七号。

② 雷良波、陈阳风、熊贤军：《中国女子教育史》，第248页，武汉出版社，1993。(以下引用该书皆为此版本)此表出自光绪三十三年(1907)学部第一次教育统计图表，表中数字明显有误，如直隶的统计与《直隶教育杂志》第三年第十七期统计不同，只为97所。

续 表

所在地区	学堂处数	学堂职员人数	学堂教员人数	学生人数
江　西	6	15	13	155
湖　北	?	12	21	477
湖　南	7	13	36	412
四　川	70	?	157	2 246
广　东	6	22	39	391
广　西	17	9	26	589
云　南	18	19	34	1 027
贵　州	5	5	24	267
福　建	3	4	21	244
甘　肃	0			
新　疆	0			

统计数字最能反映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教会女学发展的实况。1869年时全国教会(不包括天主教会)女学生有 576 人,到 1877 年增至 2 064 人。[①] 到 1902 年已增至 4 373 人。据清朝学部统计(参见表 1),在 1907 年,全国除吉林、新疆和甘肃等地外,几乎每个省都建立了女子学堂,全国各地建立的女子学堂总数达到 428 所,在校学生达到 15 496 人(非教会女校人数只有 1 500 余人,只占总数的 10%左右),其中江苏、四川等地学堂数在全国各省中的数量遥遥领先。到了 1909 年,教会女校的女生人数则已超过 65 000 人,两年时间人数净增50 000余人,由此可见教会女学的发展速度。

三、教会女子高等教育的开办

到了 19 世纪末期,教会女校由小学到中学的教育体系日趋完备,

① 褚季能:《女学先声》,《东方杂志》,第(妇)23—27 页,第三十一卷第七号。

各地教会已开始考虑筹建独立的女子大学。1905 年 5 月 18 日,25 位美以美会传教士在上海召开中国基督教教育会议,会议决定要在中国的华北、华中、华西、华南各建立 1 所女子大学。①

实际上,在这次会议之前,福州的传教士早已开始进行筹建女子大学的准备工作了。福州是近代中国历史上开放较早的一个地区,而且基督教影响力相当大,仅福州、莆田等地女子中学就有 6 所。19 世纪 80 年代,福州毓英女中的教师们已开始梦想为女性建立一所大学。1884 年,刚到校任教的星小姐在福州年议会妇女会中演讲时说:“我们应该给我们的女孩子们多少教育呢?假如给男孩子中学教育,那么我们就应该给女孩子们有中学教育。假如我们有大学程度的男子教育,那么我们应该让女生同样有大学程度的女子教育。”她提出了要为福州女生建立一所女子大学的愿望。1899 年,女布道会还曾试图利用当地士绅家庭子女想学英文的机会创办女子大学。1904 年 5 月,后来担任华南女大第一任校长的程吕底亚(Lydia A. Trimble)在洛杉矶举行的美以美会总会议上,正式提出了在华南建立女子大学的设想,获得大会一致同意,并在会后立即成立了女子大学的建校委员会。1907 年,学校建校委员会从美国商人派莱(Mr. J. D. Payne)处筹集到 15 000 美元。1908 年初,该校校董会在上海成立,学校名称为华英女子学堂,任命程吕底亚为校长。1914 年,开始试招两年大学课程的学生。1916 年该学校正式取名华南女子大学。1917 年,学校正式开办 4 年制的大学课程,并招收首届学生 5 人。②

但是,中国最早成立的教会女子大学却不是华南女子大学,而是在北京成立的华北协和女子大学,它比华南女子大学的成立早了近十年时间。1904 年,在基督教华北教育联合会和西方各妇女传教士协会的支持下,以裨治文(Mrs. Bridgeman)1864 年创办的贝满女校为基础,开始筹办华北地区的女子大学。贝满女校最初成立时只是一个女子初等学校,但

---

① 华惠德:《初创时期的福建华南女子大学》,游捷译,《教育评论》,1990 年第 1 期。

② 关于华南女子大学建校的有关历史,参见朱峰著《基督教与近代中国女子高等教育——金陵女大与华南女大比较研究》,第 54、69—78 页。

1895 年时开始设置高中课程，具备了建立女子大学的一定基础，加上 1905 年清朝政府宣布废除科举，提倡新学，在 1905 年这特殊的一年中，华北协和女子大学乘势正式成立。不过，华北协和女子大学后来未能独立生存下去。1920 年，华北协和女子大学并入燕京大学。

除了上述两所女子大学外，全国各地还相继建立了许多专科学院，如 1899 年由美国长老会创办的"广东女子医学堂"。1905 年，美国传教士夏葛为该校捐建多所校舍，该学堂遂易名为"夏葛医学院"，学校设有基本学和临床学两系，学制四年，后定为七年。

第二节　晚清民初中国本土女学的兴起

一、晚清女学堂的蓬勃发展

以晚清戊戌维新运动为契机，中国女子教育开始走向全新的里程。维新派人士在大力宣传政治变革重要的同时，十分强调兴办女学的重要性。梁启超在《论女学》一文中指出："吾推极天下积弱之本，则必自不学始"。他论证说：首先是占人口半数的中国女子缺乏教育，形成妇女困于家庭有待养之苦，而男子疲于奔命，有不能不养之苦。将占人口半数以上的妇女从家庭中解放出来，作为社会劳动力，则"富国富民"；其次，让妇女走出闺阁步入社会，接受教育，不但有利家庭和睦，也有利于社会进步；再次，比较东西方，"西人分教学童之事为百课，而母教者居七十焉"。梁启超认为建男子学校，只能是完成了任务的一半，只有办女学，才能使另一半也聪明起来，而另一半地位更为重要。因为"男子之半，其导源亦出于妇人"。① 梁启超在文中还特别强调女学的兴衰是衡量一个国家是否强硬的重要标志。"欲强国必由女学始。"除梁启超外，林纾的《兴女学》、经元善的《劝女子读书说》和康同薇的《女学利

① 梁启超：《变法通议·论女学》，载朱有瓛主编的《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下册，第 870—872 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

弊考》等在当时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维新人士不仅宣传兴办女学的重要，而且他们还身体力行创办女校。1897 年 11 月 5 日，经元善、施子英、康广仁、汪康年、严筱舫以及西方传教士林乐知等 48 人聚会，讨论创办中国女学堂事宜。1898 年 5 月 31 日，中国人自己创办的第一所女学堂——经正女学堂正式成立并开学，它位于上海城南高昌乡桂墅里的一座二层楼内。该校初办时，招收了 20 余名 8—15 岁的学生。后在城内还增收一所分校，学生最多时达到 70 余人。这所女学堂的课程设置中文、西文各半，为同外国传教士所办教会女学相区别，曾改名为"中国女学堂"。两年后，经正女学堂创办人经元善因通电反对废黜光绪皇帝遭通缉，不久经正女学堂亦被取缔，但经正女学是中国人自办女学的先声。此后，社会各界要求兴办女学堂的呼声日益高涨。

1900 年，庚子事变后，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各省官员深感革新富国的重要性，纷纷上奏要求兴办女学，一些社会名流也纷纷创办女校。如 1902 年严复于天津创办严氏女塾，上海吴馨先创办务本女塾，蔡元培和蒋观云创办爱国女学，杜清池在广东创立移风女校，顾实等人在常州成立争存女子学堂。1903 年，杨白民在上海设立城东女学，黄德润等创办了四川铜梁县女学堂。另外，诸如苏州兰陵女学、福州陶淑女学堂等也均成立较早。1905 年，清政府宣布实行"新政"，设置学部；次年定官制，开始将女学列入学部掌管。1907 年 3 月 8 日，学部奏颁了《女子小学堂章程》和《女子师范学堂章程》，正式将女子教育纳入学制系统。晚清兴办女学也得到了慈禧太后的大力支持。1904 年她批准在中南海内创设女学，学习中西文。1906 年，慈禧太后又"面谕学部，振兴女学"。[1] 慈禧太后支持兴办女学的言行，对发展女学也是一大推动。据中华教育改进社的统计，除去教会学校女生，中国自办女子学校学生人数在 1906 年为 306 名，1907 年为 1 853 名，1908 年为 2 679 人，而到了 1909 年则已达到 12 164 名，其增长速度相当快。[2] 总之，到了

① 陈学恂：《中国近代教育大事记》，第 156 页，上海教育出版社，1981。

② 陈祖怀：《中国近代女子教育述论》，《史林》，1996 年第 1 期。

20 世纪初，创办女子学堂已形成一股不可阻挡的社会潮流。

二、民国初年女子教育的进一步发展

1912 年 1 月 1 日，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蔡元培出任第一任民国教育总长。在临时政府中，上至大总统孙中山，下至同盟会的骨干，无不提倡教育，尤其注意发展女子教育。新政权诞生不久，教育部便颁发了一系列有利于发展女子教育的法令。法规明确规定："一、初等小学可以男女同校；二、小学废止读经科；三、课堂标准女子不另行规定。"法令还规定，小学教育分为两种，即初等小学和高等小学，并明确规定初等小学四年制，男女同校。在教育部发布上述法令的同时还发布了《师范教育令》，明确主张在办男女师范和男女高等师范的同时，主张办女子师范学校，改清朝的女子师范学堂为女子师范学校，以省立为原则，学制为五年。女子师范学校的目的，同男校相同，都以培养小学教师为目的。[①] 同女子小学相比，虽然清末设立的学制已使女子小学教育有了地位，那时的女子小学是能够独立的，而女子中学直到民国元年，在学制系统上才开始承认其存在的合法性。据统计，从清末到民初，政府设立的女子中学计 9 所，学生 622 人。[②]

由于革命党人的积极倡导，民初女学的发展有了新的气象。1912 年 2 月，上海女子法政学堂开学，招收女生 80 名。同年 3 月，上海女子护士学校创立，有学生 60 名。7 月，陈澄溪创建的上海女子工业学校的女生规模已达 300 人。同晚清相比，民国初年的女子教育不仅在数量规模上得到了扩张，更重要的是许多女学已经逐渐突破"贤妻良母主义"思想的束缚，开始培养新型的女性知识分子和政治家了。

据统计，民国元年（1912），全国女子学校（包括职业学校）共有 2 389所，女生人数为 14 余万人；民国二年（1913）女校增加到 3 123 所，女生为 166 964 人；民国三年（1914）女校增加到 3 632 所，女生为

① 雷良波、陈阳凤、熊贤军：《中国女子教育史》，第 289 页。
② 同上书，第 284 页。

177 237人；民国四年（1915）女校有 3 766 所，女生数为 180 949 人；民国五年（1916）女校有3 461所，女生为 172 724 人。[①] 全国各地的女学堂发展迅猛，女子学堂师资的培养日益迫切。

第三节　金女大的筹建与创立

一、长江流域各大教会兴办女校的倡议

民初女学的蓬勃发展，以及华北协和女子大学、华南女子大学的创办，都在促进长江流域女子大学的兴建。1907 年，中国传教士百年会议敦促宣教会本部在战略要地合作创办一些女子大学和师范学校。为了了解各地教会女校对建立女子大学的态度，1909 年基督教女校的负责人作了一次问卷调查，以便了解兴办女子大学的可能性。调查结果显示，各地教会的女校负责人都一致认为目前急需女子高等教育。其主要理由归纳起来有如下几条：

首先，长江流域没有一所女子大学，男女在享受高等教育的待遇上不平等。"在广阔的长江流域，从海边溯江而上，直到四川边界，没有一个地方的女子获得像男孩子那样，能够获得在十所教会大学之一的学习机会，虽然男女合校接受教育已被政府批准，但很少有人参与。"[②]

其次，长江中下游教会女校十分集中，仅江苏省境内较有影响的教会女校就有十余所（参见表 2），这些教会女校一方面急需受过训练的女教师，"虽然高中学生可以在小学里做不少事，但高中教育应该有大学毕业的老师"[③]。另外一方面，这些女校的毕业生也需要有进一步深

---

① 雷良波、陈阳凤、熊贤军：《中国女子教育史》，第 291 页。

② 德本康夫人、蔡路得：《金陵女子大学》，杨天宏译，第 3 页，珠海出版社，1999。（以下引用该书皆为此版本）

③ 朱峰：《基督教与近代中国女子高等教育——金陵女大与华南女大比较研究》，第 60 页。

造的机会。

表2 江苏省基督教会女校设立一览表(1849—1905)①

学校名称	创立时间	地点	所属教会
裨文女学	1849	上海	?
清心女中	1861	上海	长老会
圣玛利亚女书院	1881	上海	圣公会
镇江女学	1884	镇江	美以美会
明德女学	1884	南京	长老会
汇文女校	1886	南京	美以美会
中西女塾	1892	上海	监理会
培珍女学堂	1897	南京	贵格会
晏摩氏女学	1897	上海	南浸信会
毓秀女学	1900	上海	圣公会
景海女校	1902	苏州	监理会
浸信女学	1905	扬州	南浸信会
慧灵女学堂	1905	苏州	南浸信会
道显女学堂	1907	苏州	圣公会
麦伦女学堂	1908	上海	伦敦会
苏州浸信女学	1905	苏州	南浸信会

第三，清末长江中下游中国本土女学兴起后，女传教士们希望她们的办学成为中国本土女学的示范。“几个相对集中且仔细选择课程以满足中国需要的本地大学，将能够极大地加强女子教育的工作。这些大学向基督教女校、士绅女校和政府女校提供训练有素的教师，统一初等学校的课程，提供音乐、家政学、医疗等专业的学习机会，为渴望服务

① 曾芳苗著，吴振汉指导：《民国教会女子教育——“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个案研究(1915—1951)》，第38页。

家庭生活的女性提供多方面的通识文化”，[1]从而提高基督教的社会地位与影响。

第四，20世纪初由于清政府的推动，女子中学有了一定的发展，注册人数有了较大幅度的增加，但在中学之外便没有程度更高的女子学校。因此，有抱负的学生只得到国外去留学。[2] 德本康夫人在后来撰写的《金陵女子大校》一书中写道，人们希望在中国设立女子大学，这样教会中学毕业的女孩子们不用跑到遥远的国外，就可以得到进一步深造的机会了。“也就不至于经年累月地把她们同自己的祖国及其日新月异的社会发展状况割裂开来，也不会使她们离开自己的家庭，以致当必须居住在中国时，她们会对其生活感到不满意。”[3]

为了讨论在中国中部及长江流域建立一所女子联合大学，各地教会组织于1911—1912年间在上海举行了一系列会议。在会议期间，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六位女传教士还以Committee on the Proposed Union Women's College名义发出一份倡议书，呼吁各地教会支持建立一所女子大学。这六位传教士分别是苏州监理会玛萨·E. 比勒小姐（Miss Martha E. Pyle）、杭州美南长老会温尼·J. 李博士（Dr. Venie J. Lee）[4]、南京美以美会诺拉·E. 怀特小姐（Miss Laura E. White）、上海美国长老会玛丽·E. 科格多尔小姐（Miss Mary E. Cogdal）、苏州美南浸信会的索菲·兰尼欧小姐（Miss Sophie S. Lanneau）、南京基督会埃玛·A. 里恩小姐（ Miss Emma A. Lyon）。这份题为“Appeal for a Union Women's College for Central China”的倡议书发出后，很快得到了长江中下游地区各教会的广泛响应，其中南北美浸礼会（Baptist, North and South）、监理会（Methodidist Episcopal）、基督教友会（Disciples）、南北美以美会（Methodist, North and South）以及北美长老会

---

① Margaret E. Burton, “The Education of women in China”, New York: Fleming H. revell Company, p. 248, 1911. 转引朱峰著《基督教与近代中国女子高等教育——金陵女大与华南女大比较研究》，第60—61页。

② 德本康夫人、蔡路得：《金陵女子大学》，杨天宏译，第1—2页。

③ 同上书，第5页。

④ 一说是江阴而不是杭州。

(Presbyterian, North)等五个教会很快决定参加这一建校的计划，并承诺提供经济上的资助。

1911 年 10 月 10 日，辛亥革命在长江中游城市武昌爆发。1912 年 1 月 1 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长江下游城市南京成立。辛亥革命前后，长江流域连续不断的战争影响了各地教会筹建第一所女子大学的进程。

二、第一任校长人选的确定

1913 年 9 月，黄兴等革命党人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失败，袁世凯逐渐控制长江流域，局势稍定。1913 年 10 月 6 日，北美长老会、浸礼会、监理会、北美以美会和基督教友会决定组建女子大学的筹委会，并定于 6 日在苏州召开第一次筹委会。在这次会议上，筹委会决定成立校董会，校董会成员由上述五个教会各派两人组成；另外，在这次会议上，对即将成立的女子大学的地点也有讨论，南京被认为是长江流域最为适合的地点。为了全方位考察南京是否真正适合建立女子大学，在这次会议上还决定下次筹委会在南京召开，同时决定由在南京明德女中任教的长老会代表德本康夫人负责准备。

德本康夫人(Mrs. Lawrence Thurston)其实已被北美长老会看中，认为她是即将成立的女子大学校长的最佳人选。德本康夫人，1875 年 5 月 16 日出生于美国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郡(Hartford, Conn.)。她本名为马提拉·柯(Matila S. Calder)，父亲是早年移民美国的苏格兰人，一名虔诚的清教徒，母亲则具有苏格兰-爱尔兰血统。受家庭影响，她 13 岁便受洗入教，“很小时，就喜欢玩开学校的游戏；未进学校时，已渴望能做一个小学教员。”中学阶段她接受了自由派



德本康夫人

神学观点，[①]她 17 岁从哈特福德郡公立高中毕业后，进入马萨诸塞州的蒙特霍利女子大学(Mt. Holyoke College)学习。蒙大学生多以传教为己任，但那时柯小姐对海外传教并不感兴趣，而是热衷于天文学。毕业那年(1896)，她决定履行去别国传教的使命，向教会提出海外传教的要求。在新泽西州 Middletown 的高中教了四年书后，教会派她到土耳其 Marash 学院任教。临行前她结识了耶鲁大学学生劳伦斯·德本康(Reverend Lawrence Thurston)，德本康是自愿海外传教运动的成员，雅礼差会主要创始人之一。1902 年 9 月，马提拉·柯结束在海外的传教工作回到美国，并同德本康完婚。10 月，夫妇俩又受雅礼差会派遣一道来华传教，在中国雅礼传教团(Yale-in-China Mission)任职，成为该团最早的成员。但是，不幸的是 1903 年暑假，德本康不幸患上肺痨，并于次年在加州去世。德本康夫人为了忘记丧夫之痛，更加努力地工作。在 1904—1906 年间，德本康夫人一直担任外国教会学生自愿海外传教运动秘书，这期间她与美国东部 14 个州的 40 多个学院建立了广泛联系。1906—1911 年她又被派到中国湖南长沙的湘雅医学院教书，并协助医院工作。1911 年，德本康夫人回国，她本以为自己肯定没有机会再来中国了。但是，长江流域酝酿成立的女子大学很快改变了她的生活。

由于德本康夫人具有良好的大学背景、丰富的生活阅历，特别是同美国教会大学密切而又广泛的关系，北美长老会外国差会部经研究决定派遣她到中国南京，参加筹备建校的工作。1913 年 9 月 20 日，德本康夫人抵达南京后，一边学习中国话，一边在长老会的明德女校上课，同时还参加女子大学的筹划工作。11 月 12 日，筹委会成员汇聚南京，德本康夫人亲自到下关码头迎接。在开会前几天，筹委会成员还在南京城郊的紫金山和鼓楼一带进行了实地考察，寻觅今后可能的校址。在 14 日召开的筹委会上，与会代表经过讨论，一致同意北美长老会的推荐，确定任命德本康夫人为即将建立的女子大学校长。

---

① 华群：《德校长传》，《金陵女子大学校刊》，第 2 页，1928 年 6 月。

三、金陵女子大学的诞生

11 月 14 日,在金陵女子大学校史上是一个具有十分重要的纪念日,因为在这天的筹委会上,女子大学的筹建工作正式启动。后来金陵女子大学将此日定为"创立人日"(Founder's Day),亦即"校庆日",在每年的这一天都要举行庆祝活动纪念。在这次会议上,除了任命新校长外,大会还做出了下面三项决定:第一,成立学校组织管理委员会;第二,女子大学的校址定在南京;第三,成立学校章程、文书和地基三个委员会推动建校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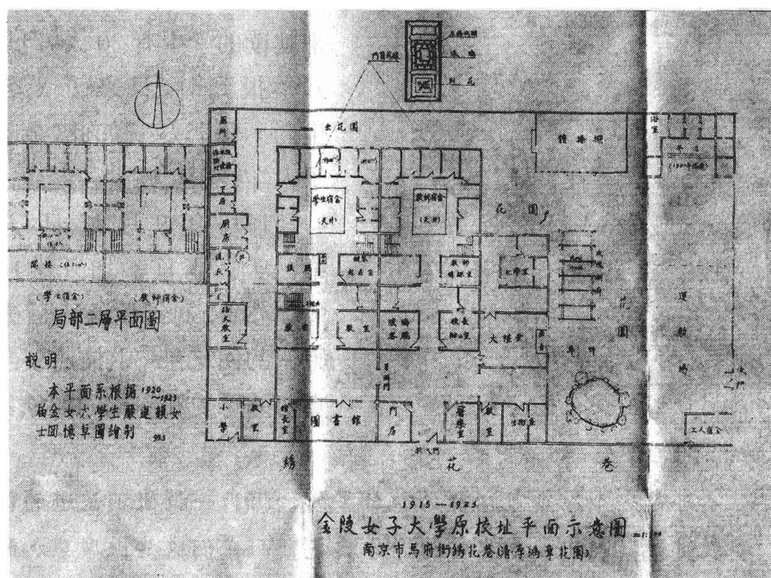
管理委员会是筹建大学的具体执行机构,它由每个合作教会选出三名成员组成。其主要责任是监督学校、管理学校的财产,包括起草年度预算,报请美国的校董会批准,以及核定适当薪资等。此外,学校的教学安排,包括招生与入学考试、聘任学校的行政人员和中国教职员,批准所设课程等事项,也都由管理委员会负责。在苏州会议上成立的校董会附属在金陵大学董事会(设在美国)之下,主要责任是筹募建校经费。

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新的校名逐渐确立下来。最初这所女子大学的校名为"长江流域女子协和大学",但到了 1914 年 4 月 7 日,在执行委员会会议提交的一份报告中,第一次用"金陵女子大学"的名称取代了原先常用的"长江流域女子协和大学"的名称,而且这一名称很快得到了各教会的认可。因为她们认为"长江流域女子协和大学"并不像一个校名,似乎更像是在表述"一个法律和地理说明"。[①] 而且金陵女子大学同金陵大学正好也可以互相对应。另外,"金陵"这个名称听起来像是音乐符号,后来校歌中亦以"金陵"作为金陵女子大学的简称,校友们也都以"金陵女儿"自称。1914 年 11 月,校名被管理委员会正式采纳。

南京会议之后,德本康夫人投入到紧张的筹备工作之中。首先,她十分认真地制定了大学招生条件和大学课程开课计划,她认为大学新生入学的先决条件"必须完成高中的语文、英语、数学、科学、历史和宗

① 德本康夫人、蔡路得:《金陵女子大学》,杨天宏译,第 9 页。

教课程”。为了办好新的大学，德本康夫人于 1915 年春前往北京参观考察，并多次前往各地了解计划前来就读的学生情况。其次，积极寻找临时校园。学校筹建之初，南北美浸礼会、基督教友会、南北美以美会、监理会以及北美长老会的董事部分别捐助 1 万美元，用于建筑楼房、购置设备。另外，还承诺每年提供不少于 600 美元作为常年经费，用于一般开支。[①] 由于经费有限，在筹建之初，学校无力自建新校舍，经过考察，决定暂租位于南京绣花巷的李鸿章花园故址为临时校址。李鸿章花园共有 100 多个大小不等的房间，足够分成教室、宿舍、办公室、实验室、图书馆、礼堂等不同功能区，室外花园还可当运动场地。[②] 在经费并不充裕的情况下，李鸿章花园是相当理想的校舍。1915 年秋季开学之前，临时校舍基本修缮完毕。



金女大绣花巷平面图

① 华群：《德校长传》，《金陵女子大学校刊》，第 5 页，1928 年 6 月。

② 曾芳苗著，吴振汉指导：《民国教会女子教育——“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个案研究(1915—1951)》，第 77 页。

校舍确定后，对于即将开学的金女大而言，聘请师资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之中。1914 年，管理委员会先后任命了教授英文的伊丽莎白·埃·高切尔(Elizabeth E. Goucher)小姐和弗雷德里克·阿·米德(Frederica R. Mead)小姐来协助德本康夫人。1915 年初，北浸礼会将诺玛利(Mary A. Nourse)小姐从杭州弘道女中调到南京，她承担历史和地理学课程的教授任务。另外，学校还聘请了 2 位中国教师，一位是教化学和数学的李玛利，一位是教中文的 Wang, Muh-djai①。因此，到金女大正式开学的时候，包括校长德本康夫人在内，全校共有 6 位老师。

同招聘教师相比，在传统思想还较深厚的中国招收女大学生更非易事。在德本康到上海考察之时，虽然了解到计划即将前来就读的学生有 20 人，但是到开学报到时，只来了 8 名学生。② 不过，尽管如此，金陵女子大学终于正式宣告诞生了。



绣花巷化学实验

1915 年 9 月 17 日，开学第一天。当日参加开学典礼的徐亦蓁、刘剑秋等人后来在她们的回忆录③中描述了当时真切的感受和深刻的印象：

那是一个凉爽且恬静的秋日早晨，我们，一群微不足道的学生和教员聚集在小礼堂里举行开学典礼。而我们这些出席参加的人员对这礼堂的一切都感到如此的亲切和兴奋。我们第一批新生中

① 中文名不详。

② 后来又有部分同学陆续报到，吴贻芳则是 1916 年 2 月春季插班生。

③ Liu Gien-chiu, Ren En-dzi, Tang Hwei-dzin, Wu I-fang, ZeeYuh-tsung (the Class of 1919 Ginling College): *The Pineer*, Shanghai: Printed at the Presbyterian Press. (以下引用该书皆为此版本)

的三个人恭敬地鞠躬欢迎第一批新教员，她们友好地向我们还礼。那气氛，仅 8 个学生、6 名教员似乎占据了整个礼堂。青灰色砖瓦的大厅顶篷搭建得高高的；青灰砖铺设的地面有些地方被青苔所覆盖，显示出这可容纳 200 个座位的礼堂，已有一定的年份。虽然这是一个令人激动的日子，但礼堂的空旷让人有那么一丝的沉寂感。我们在教员的带领下一起唱起了赞美诗，而后，由刚从美国回来的李玛琍小姐以新教员的身份接受了我们学生的欢迎。①



绣花巷一景

金陵女子大学的创立是中国高等教育史和西方教会在华传教史上十分重要的里程碑之一。在此之前，虽然已建立了许多女子初等学校和女子中等学校，但真正的女子大学却很少。金陵女子大学的创立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女界精英，对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作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

① Liu Gien-chiu, Ren En-dzi, Tang Hwei-dzin, Wu I-fang, Zee Yuh-tsung (the Class of 1919 Ginling College), "Blazing The Trail", *The Pioneer*, pp. 1—3.

第二章　早期金女大的发展

第一节　从绣花巷到陶谷

一、“百屋房”时期的苦乐岁月

金女大最初的校园李氏故宅是一式两所并排而立的徽式古建筑，用灰色砖瓦盖成，飞檐高耸，外形极为雅致。每座宅邸为五进五开间，拥有四个铺就石径的院落，各个院落约有十间房屋，共计有百余间房，多数房间的花格木窗差不多占据了大半堵房屋外墙。院落之间有若干可透过月光的圆形门洞——月洞门相通，并有曲径回廊连接。因而人们也形象地称金女大最早的校舍为“百间屋”或“百屋房”。校舍东面靠近南门的地方是教室、小教堂、客厅和办公室，生物系和化学系实验室在内院的大屋里，教职工住在后院，她们的起居室和餐厅设在第三院落，书房和寝室则位于有一座两层楼房的第四院落内。校舍西面的布置与东面大同小异，教室和图书馆在前院，厨房、贮藏室在里院，女生宿舍在后院。①

据当时在此就读的早期校友描述：金女大校园从外面看是耸立于周围众多斜屋顶和灰色外墙之上的几堵白粉高墙，学校大门两旁各挂一块刻有“大美国金陵女子大学”字样的木制牌匾，左右下方各有一座石鼓拱卫其侧，门头墙砖上则镌刻着精美的雕饰。出于安全考虑，这道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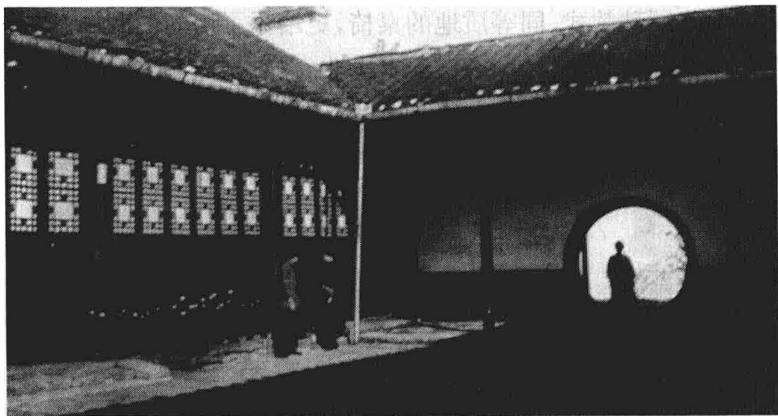
① 《金陵女子大学原校址平面示意图》，载金女大校友会编《永久的思念》，金女大校友会，1993。（以下引用该书皆为此版本）

门开得很小，里面还有第二道大门，每当其开启时转动的门轴就会轧轧作响。步入校门便是在所有庭院中拥有人造景致最多的外庭，被三道月洞门所分隔，这里有全校当时最值钱的两间屋子——小教堂和图书馆。



“大美国金陵女子大学”校牌

小教堂是整座建筑中最庄严肃穆的地方：大部分光线被高墙和斜屋顶挡住，剩下几缕透过由美丽的花格窗组成的南墙照射进来；巨大的房梁、一排排粗壮简朴的黑色立柱，以及暗褐色的家具，使得房间更显昏暗。学生们常在此聚集一堂做日常礼拜，赞美上帝的恩赐，接受基督教义对生命的激励。从小教堂出来向左拐几个弯就是图书馆，它庄重宏大，同时也阴冷昏暗。这里的木板墙



绣花巷庭院

面起初被刷成暗褐色，后来又刷上白色用来反射从天窗透过来的少量光线，以使房间显得亮堂些。墙上的大裂缝足够让外面的气流顺畅通过，

使得整个房间在冬天即使用校内最大的火炉加热也冰冷无比。只因图书馆拥有赋予人们科学、历史、宗教、社会和生物方面的知识书籍，此处便成为全体师生的珍爱之所。



绣花巷时期的图书馆

小教堂对面的中式会客室因其风格独特而颇值一提：里面的家具是纯中国式的，窗上有用漂亮的中国画组成的玻璃格板。后墙上装饰着几幅卷轴，前方摆着一张嵌有大理石的栗木桌子和几把椅子，两侧还摆放着两张同种款式、同等质地的桌椅，更增添了房间的寒气。屋子黑暗而宽敞，即使在溽暑如蒸的伏天里也非常凉爽。



金女大学生在绣花巷上课

庭院北面是两间教室，因通风性能极好，每到冬季屋内就像露天一样寒冷，甚至由于缺乏阳光而显得更冷些。顺着左边房屋后面的楼梯可登上楼顶的两间宿舍，由于房间横梁太低，天花板过于低矮、倾斜，侧边的墙只有四英尺高，以至于一些高个女孩在未养成进屋时弯腰的习惯之前经常撞到头，结果弄得鼻青脸肿。一次学生们进行灭火训练，有个女孩问："我们宿舍只有一座逼仄的楼梯，如果附近失火的话，我们该怎么办？"另一个女孩风趣地答道："那你至少可以用被褥把自己包裹起来，然后从没安玻璃的窗子滚落下去。"这些房间光线很差，白天是通过区区几扇窗户采光，晚上则是使用一两盏小油灯照明。由于学生注册人数不断增多，里面火柴匣子似地挤放着大约五六张床。房间冬天极冷，因为没有任何阳光或暖气能够进来，可一到夏天，那里又热得出奇，只消呆上一刻钟浑身上下便会衣衫湿透。住宿学生则笑称：用不着别的什么加热设备，屋里的气温就足以将鸡蛋孵成小鸡。有个女孩对让她吃足苦头的宿舍房间痛恨不已，甚至恨起每晚十点召唤她上床的铃声来。



学生在上晚自习

与之相邻的交际室既是娱乐室，又是学习室。学生们经常在此挑灯夜战，埋头钻研那些艰涩难懂的功课；在此组织自己的女青年会，并多次召开学生自治会讨论各种问题；在此举行考试，招待新生，阅读报

纸。这间屋子很大,里面存放着一架堪称校园生活亮点的钢琴,屋内还由许多玻璃门分隔成不同的空间,每当学生举办娱乐活动的时候,她们就把这些门的铰链取下来,将整个房间连为一体。因为交际室的使用频率太高,所以此处地面磨损严重,成为全校最破旧的一块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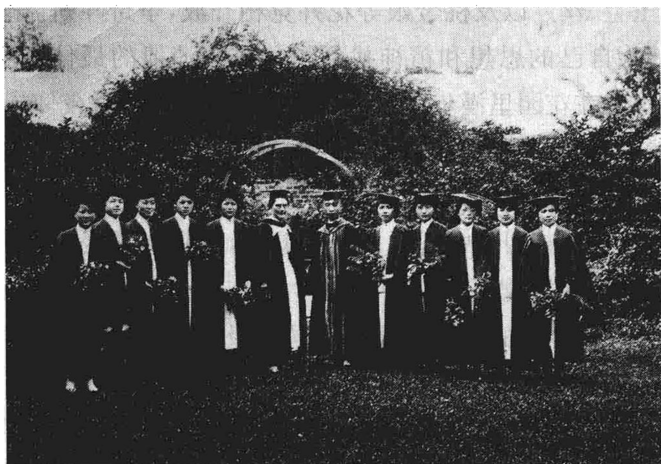


学生在庭院中做课间操

后面的庭院大约40英尺见方,被一座两层楼房包围着,学生们可以通过楼下宽阔的走廊,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而不被雨水淋到。建筑物投下的阴影、持续不断的降雨以及布满苔藓的石径,为自然界里各式各样的昆虫提供了充分养料,经常可以看到蜈蚣等虫子在苔藓和铺路石间四处爬行。这座当年作为主人退居研读之所的楼房起初没有顶篷,一遇暴风雨雪侵袭,房间床铺及每样东西上都必定落满雪水或是尘土。它经过改造后来成了学校当时最好的宿舍:每间房子约长22英尺、宽11英尺,床铺以外还配置了一个柜子、一张桌子、几张椅子,以及脸盆架、水桶、废纸篓和小书架。不过楼下地面在雨天总是很潮湿,整个冬季则一直覆盖着冰霜。教员住所就在学生宿舍旁边,两者位置上的接近赶不上师生间关系的亲密,她们分担着彼此的乡愁与困难,一种同声共气的情感日益生成。

物理实验室上方的屋顶没有伸出周围墙体很多,所以这里比其他许多房间都要明亮得多。教室无论冬夏均能保持干爽与温暖,但屋内

由于桌椅遍布而显得拥堵不堪，站在房子中间的人会感到寸步难行。化学实验室位于物理实验室的右侧，靠北墙摆有两个柜架，上面放置着该系全部的实验器具与用品。生物教师黎富思博士一次同高切尔小姐（后者当时正在选择幻灯片，以供去美国汇报时放映）开玩笑说："你在屏幕上放映化学实验室引人入胜的图片时，可以顺便指出这样一个事实——当我在显微镜下工作需要一些真菌样本时，我当场立马就能从化学实验室地面的石板上搜集到很多真菌。"冬季只要在此呆上两小时就会冻得人手脚僵肿，而当暑天来临时，系着围裙做实验的学生又觉得闷热难耐。不过，这里倒无需任何头巾或口罩防毒，因为房间裂缝太大而导致通风效果极佳。①



黎富思（左六）与1921年的毕业生

由校舍东边穿过后院长长的通道，就来到了学校后花园。花园开始时年久失修，显然已被弃置多年。"狭窄曲折的小径被枝蔓缠绕的常绿植物所荫蔽，它们遮住阳光，使得小径甚至在白天也是湿漉漉的，成了蚊蝇滋孳出没之地。这里与其说是花园，不如说是一片杂乱无章的野树林。学生们宁愿呆在房间里几近窒息，也不敢走进这样

① Liu Gien-chiu, Ren En-dzi, Tang Hwei-dzin, Wu I-fang, Zee Yuh-tsung (the Class of 1919 Ginling College), "The Finished Clearing", *The Pioneer*, pp. 12—17.

一片树林。"[1]有位新生曾经由一位老师指引着参观过这座花园，眼见到如此破败荒芜的景象，她竟然发誓说希望自己今后在校四年间永远也不要再走进这里。住在花园宿舍的学生晚自习归来总要结伴而行，因为那时还没有手电筒，夜晚要独自走过偌大一个乌黑的花园实在令人胆战心惊，所幸几年下来并未发生多少虫蛇伤人的事件。[2]

学校任命的第一位教师伊丽莎白·高切尔小姐是个有心人，课余时间常为花园修剪枝叶、栽种花木。在她的精心管理下，它很快变成一处令人赏心悦目的景点。从春夏到秋冬，花园里变幻着美丽的嫩黄、粉色、艳红及深绿等颜色。院落里还有一个池塘，塘边柳树环绕，四周种满了开紫白花的紫藤、雪球似的山荣灌木，白色山茂坚爬上了池塘西头的柳树，玉兰、丝兰以及桃金娘等花卉竞相开放，争奇斗妍。金女大师生们在此为自己的思想和精神找到了休息与消遣的最佳场所。闲暇时，她们经常在花园里漫步休息，讨论功课；在晴朗的月夜仰望星空，聆听大自然中小鸟的歌唱。能够有这样一座怡人的花园相伴，她们觉得自己"是所有学生中最为幸运的"。

学校后来在花园当中搭起了一座凉亭，为师生开展室外体操活动之用，也兼作会议和娱乐的场所。学生们在此公开接待了许多尊贵的客人，举办欢送老师的告别晚宴和不同年级的姊妹联谊会。网球场位于花园围墙内一块毗邻的空地上，部分用作操场，另一部分则占作菜园。开始的时候，学生们由于被繁重的功课牢牢束缚住而无暇光顾那里，曾经有个女孩不得不央求另一个女孩同她一起玩。但后来她们发现了运动的乐趣以及对身体健康的益处，不仅课余常去锻炼，有时还会为抢夺运动场地而发生小小的争执。[3]

民国初年，南京处于"电灯不明，电话不灵，道路不平，火车装兵"的

---

① Liu Gien-chiu, Ren En-dzi, Tang Hwei-dzin, Wu I-fang, Zee Yuh-tsung (the Class of 1919 Ginling College), "Exploring the Unknown Forest", *The Pioneer*, p. 5.

② 严莲韵：《"绣花巷时期"的金女大学生生活概况》，载金女大校友会编《永久的思念》，第 103 页。

③ Liu Gien-chiu, Ren En-dzi, Tang Hwei-dzin, Wu I-fang, Zee Yuh-tsung (the Class of 1919 Ginling College), "The Finished Clearing", *The Pioneer*, p. 18.

落后状况，金女大的创业者们更是接受了当时近乎一无所有的现实：没有电灯，用的是煤油灯；没有厕所、自来水，只能靠马桶和水壶过日子。师生生活相当清苦。[①] 正如校长德本康夫人在 1915—1916 年度报告中所指出的那样："实际的困难与理想相距太远。"[②]当第一批新生来到向往已久的校园时都觉得大失所望，因为想像中的金陵同她们眼里见到的金陵完全不同。"那儿既没有富丽堂皇的礼堂，也没有拥挤吵嚷的年轻学生。"有位新生后来回忆道："我到达学校的那天，看见一群人坐在一间既无玻璃窗，也未糊窗纸的房子里。夏天这里很凉爽，但对于即将到来的严冬来说，未免又有些风凉过头了。"随着时光流逝，学生们又发现由老式宅院改造而成的校园在学习、生活方面有诸多不便："房间分布散漫且光线昏暗，如果不点灯的话，我们不得不在下午五点钟就早早停止学习。每当夜幕降临，所有的房间里都漆黑如洞，只有两三盏黯淡的煤油灯悬挂在长长的过道上，在这里有可能走上很长一段时间也听不到一个人的声音。我们原本以为学校是个人员稠密的地方，可二十来间宿舍居然只有四个人使用。一切都像是在做梦。"[③]

金女大于绣花巷临时校址创校初期，不单屋舍陈旧、住宿条件差，教学设备也极端缺乏。1915 年学校招生时甚至没有一所小图书馆，拥有的书籍总数不超过 40 本，[④]普通化学实验室 1 间，钢琴 2 架。上课时，学生没有课本，完全靠自己找参考书和记笔记。[⑤] 面对学校如此简陋的办学条件，有些学生心里未免产生这样的疑问：难道这也算是大学吗？不过，她们是一群学习目的明确且充满求知热情的女孩子，学习自觉性很高，认为"越是条件差，越是要发奋读书，才能学到真正有用的知识"，因此她们从来不需要教师督促，考试从不作弊，也用不着监考，

---

① 李葆真：《爱母校至深至长的严莲韵》，载《金陵女儿》编写组编《金陵女儿》，第 35 页，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以下引用该书皆为此版本）

② 德本康夫人、蔡路得：《金陵女子大学》，杨天宏译，第 12 页。

③ Liu Gien-chiu, Ren En-dzi, Tang Hwei-dzin, Wu I-fang, Zee Yuh-tsung (the Class of 1919 Ginling College), "Exploring the Unknown Forest", *The Pioneer*, p. 5.

④ Ibid, p. 7.

⑤ 孙海英编：《金女大大事记》，第 2 页，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校友会，1992。（以下引用该书皆为此版本）

读书空气极为浓厚。[①] 尽管学校设施简陋，经过日常打扫与精心维护，却显得窗明几净，井然有序，早期师生们在此勤奋学习，和睦相处。

二、陶谷新校址的规划与落成

绣花巷这处宅邸对于旅游观光者来说也许是引人入胜的，它"青砖黛瓦马头墙，回廊飞檐花格窗"的古典建筑，在金陵[②]的西方朋友眼中魅力十足。当她们漫步于古宅周围，徘徊在美丽的花格窗下，走过图画一般的月洞门，在连接院落的曲径上绕进绕出时，头脑中很自然地就会产生这样的想法："你们早已占据了如此优美精致的地方，还想要什么更好的地方呢？"但对于久居其中、深以为苦的早期学生来说，那里却充满了艰辛的记忆——在她们印象中，它的教学用房是如此的拥挤，而且根本无法抵御四季的严寒与酷暑。"唯有我们才会在雨天看到屋顶的渗漏使平台变得湿漉漉的，以至于一些教员不得不离开自己的座位改坐到学生当中来；唯有我们才会时不时地听到因为看见蜈蚣爬行而发出的刺耳尖叫；唯有我们才能亲身体验到虫子在背上蠕动的感受，并遭受过它的咬噬；唯有我们才会在冬季因为不堪忍受寒风通过没安玻璃的窗户倒灌进来，而呆在室外的露天里晒太阳。""当我们天天面对那诸多事实的刺激时，我们怎能不期待在现在的金陵之外有更大的天地呢？"[③]况且随着风气渐开，学生入学人数的增加，尤其是 1918 年学校注册新生猛增为 21 人，几乎占到全校总人数的一半，现有建筑已不够使用了。

为谋求进一步发展起见，学校于招生后的 1916 年起，就在原先相中的"金陵大学附近购地约十英亩，为将来建筑校舍之用"[④]。因为金

---

① 吴贻芳：《金女大四十年》，载《吴贻芳纪念集》，第 102 页，江苏教育出版社，1987。（以下引用该书皆为此版本）

② "金陵"是金女大校友对母校的简称。

③ Liu Gien-chiu, Ren En-dzi, Tang Hwei-dzin, Wu I-fang, Zee Yuh-tsung (the Class of 1919 Ginling College), "Seeing the Vision", *The Pioneer*, pp. 37—38.

④ 麦美德：《中国基督教女子高等教育概论》，《中华基督教会年鉴》，第 133 页，1917 年第 4 期。

女大在初创时期校务由金陵大学董事会兼理，两校关系相当密切，加之金女大建校较晚，在设备与师资方面均需金陵大学的支援与配合。为了加强两校教学上的互通，避免相关师资的重复聘任，金大与金女大还合组了一个委员会，负责联络相关事宜，以便利两校学生相互选课。正是基于一方面便利两校在设备上的合作，另一方面也不至违反中国男女有别的传统社会风俗，金女大最后选定这块位于金陵大学西南方向、与之相距约 15 分钟步程的地方（即陶谷地段，相传为南朝齐梁时山中宰相陶宏景初隐之地）作为永久校址之所在。在南京城西清凉山麓的僻静市郊建立校园，非但可以有充足的土地建筑教学楼、教室以及行政大楼和宿舍，更有利于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基督教学术区。1916—1917 学年结束之际，当校长将学校已拥有地产的好消息告诉学生时，学生们立即奔走相告，无不在脑海中勾画出新校园的美丽图景。①

金女大永久建筑规划之初，有关各方对于新校舍是沿用中国传统样式，抑或采用纯粹西洋模式曾进行过认真的讨论。校长德本康夫人本人很欣赏绣花巷临时校址的古典房屋样式，认为那里的月洞门以及曲径回廊是东方建筑中最为完美的东西，所以她主张按中国古典建筑形式设计和规划校园，在未来的新校址上继续保持和体现校园原有的建筑风格。她花了大量时间与校管理委员会任用的建筑设计师茂斐（Henrry Killam Murphy）讨论建校图纸，茂斐对于将中国建筑架构应用在这所现代大学的修建上也有浓厚兴趣。他在采用中国古典宫殿形式设计建筑物外观的同时，为使之兼具美观大方的外形与经久耐用的实用性，又在内部设计上采西方布局，室内有自备的电灯、自来水和暖气等设置，适于居住及教学之用。

新的建筑样式一经确定，1919 年校庆那天，校长即向学生展示了一份融合中西方建筑风格的校舍鸟瞰图稿。学生们热切地谈论着新宿舍到底能够容纳多少女生，目前学生中又有多少人将会幸运地在那里学习，她们无不对金女大的未来充满了美好憧憬。而参与学校早期拓

① Liu Gien-chiu, Ren En-dzi, Tang Hwei-dzin, Wu I-fang, Zee Yuh-tsung (the Class of 1919 Ginling College), "Achievements", *The Pioneer*, p. 27.

荒工作的首届学生心情尤为复杂，一方面她们意识到让自己既爱又恨的旧建筑将永远停留在记忆中，另一方面她们又急切期待着开放永久校址的那天能早日到来。[①] 新校舍破土动工之前，学校曾几次组织学生到新校址访问和劳动，并在1918年4月举行了庄严的种树仪式。学生们排队来到新校园，齐声高唱植树歌，歌中最后唱道："种树时千万要谨慎小心，因为好的结果始于好的开端。"仪式主持人高切尔小姐朗诵了优美的诗歌，全校师生按班级顺序种下四片小树林。校长德本康夫人在教员们开始种树之前发表致词，她将学校的发展比喻为一棵树的成长："如同一颗采撷自其他植物的种子，我们金女大在第一年里扎下了根，第二年则长出了茎，如今又形成树冠，不久的将来便会结出果实来。"各年级所派代表也纷纷发言，表明要各自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学校作贡献。[②]

校园规划业已完善，但建筑资金尚无着落。1919年夏，德本康夫人回国休假，利用美国各教会当时正在为中国、印度、日本的七所协和女子大学筹募经费的机会，为金女大募集建立永久校址的基金。她随身携带一份新校舍的建筑计划，并代表学校向许多城市和院校的团体组织发表了多次谈话。刚开始事情进展得并不顺利，金女大仅获得5千美元的捐款，甚至不够用来支付建筑师的报酬。经过两年的努力争取，1921年德本康夫人终于筹到了一笔总额为60万美金的款项，其中三分之一从合作委员会获得，另有三分之一来自洛克菲勒纪念基金(Laura Spelman Rockefeller Memorial Fund)，其余则由特别资助者个别募集而得，包括史密斯女子学院校友会募捐的5万美金。这样，当德本康夫人返回中国时，金女大已拥有足够的建校资金。

南京城自太平天国运动后有许多良田耕地被荒废弃用，甚至转卖成坟地，而将土地租售给外国传教士却与中国传统理念相悖，因此在市内购置大片土地实属不易。学校当时不得不在购地问题上耗费巨大精力，以至需要花费很多时间用以迁移购得土地上的坟墓，并为此支付了

---

① Liu Gien-chiu, Ren En-dzi, Tang Hwei-dzin, Wu I-fang, Zee Yuh-tsung (the Class of 1919 Ginling College), "Achievements", *The Pioneer*, p. 32.

② Ibid, p. 29.

许多额外费用，承受了各种流言蜚语。金女大购置土地的工作主要依靠时任金陵神学院院长的司徒雷登(J. Leighton Stuart)，经三年接洽协调与劳苦奔波才最后完成的。这是一项总价值为1.3万美金的艰难交易，涉及了包括11个池塘、60个拐角地在内的27英亩土地的签字、盖章手续，与10个不同的土地所有者进行地契文本交换，以及上千个坟墓的迁移等一系列复杂事项。[①]

1919年6月一个异常炎热的天气里，茂斐先生和德本康夫人为新建筑打桩，划定了将建楼群的界址。1921年7月4日施工合同正式签署，上海的合同承包人开始了工程督造。为将大批物资材料和施工人员运送到工地，学校特地出资请市政当局铺设了一条简陋的公路，但不久它就被碾坏而不能使用，校方不得不又花了10倍的价钱，自己修筑了一条全城最好的路。[②] 1921年底，金女大开始在总共260亩地的陶谷地段修建新校区，尽管施工初期由于财政短缺，建筑工程一度被迫拖延，但总造价超过30万美元的校内基本建筑还是于1924年完工，其中包括三座主楼：体育馆、科学馆和文学馆，均为覆灰色筒瓦的大屋顶宫殿式建筑，全部配以雕花木格门窗。屋脊饰有鸥兽，檐下则饰仿木斗拱，黄墙红柱，气势不凡。楼房之间还有逶迤交错的走廊相连，形成了独特的校园景致。由史密斯学院所捐50 000美金建造的体育馆(因其位居中央，故又名中大楼、100号楼)，面积为1 432.78平方米，是社会与体育专业的教学楼。它的一楼有个很大的会议厅(常被用作临时小礼拜堂)，另有一个接待室和若干个供学生组织活动的房间和办公室；二楼为室内运动场、健身室和体育系办公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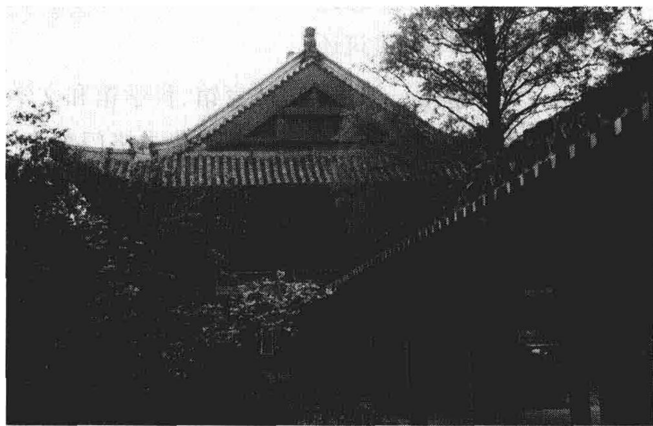
金女大陶谷校园

① 德本康夫人、蔡路得：《金陵女子大学》，杨天宏译，第27页。

② 同上书，第38页。

科学馆(即自然科学楼、200 号楼)位于中大楼南侧,面积 1 540.61 平方米,是生物、化学、物理等科系的教室和实验室,楼底还有一个可容 150 人的科学报告厅,另外图书馆和教育系的实验学校也临时设在楼内。位于中大楼北侧的文学馆(即教学兼行政楼、300 号楼)面积为1 491.75 平方米,共有 16 间教室和 1 间播放室,另有 5 间办公室和休息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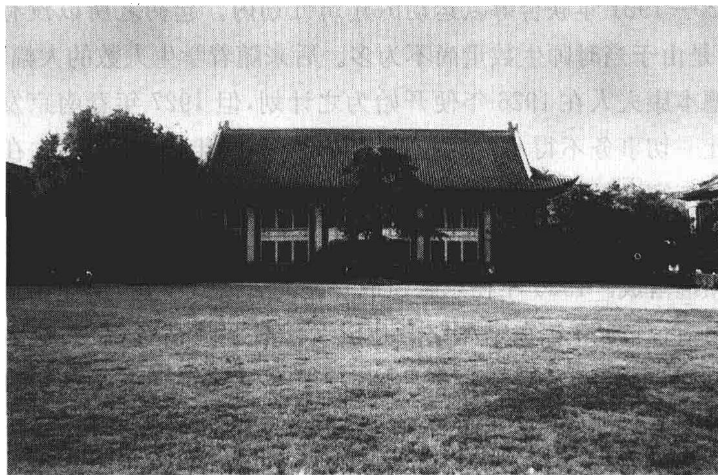
这些大楼堪称是将中式风格用于现代建筑的典范、中西方建筑艺术结合的早期范例。它们均以宽阔的大草坪为中心,呈四合院式中轴布局,正向东面的紫金山。学校周围充满了乡村气息,雕梁画栋的古建筑外观、钢筋混凝土坚固结构的楼群矗立在一片空旷的土地上,显得格外引人注目。400—700 号楼为学生宿舍(其中一幢被临时用作教职工宿舍),每栋建筑面积均为 1 150.18 平方米,都为青砖砌墙,屋顶饰小型塔柱、木格扇门窗,檐下不似主楼饰有斗拱,而是用混凝土堆砌装饰,造型风格与主楼相比更显简洁朴实。宿舍为两人合用一房(后来上下铺住四人),有书桌、桌架和大衣柜,且每幢宿舍都有一间不小的会客厅,有报刊供阅览,并设有小饭厅。楼与楼之间有长廊相连,下雨天无论是上课还是就餐,都用不着打伞。[①] 这里的居住条件比起绣花巷时期的“百间屋”显然已有很大改善。



颇具特色的金女大建筑

① 曾芳苗著,吴振汉指导:《民国教会女子教育——“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个案研究(1915—1951)》,第 80 页。

1923 年秋新校区正式交付使用,但为了完成最后的扫尾工作,学校不得不要求学生们推迟两周来校报到。有位新来的教师在一封信中描述了新校区准备开学的忙乱情景:“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一些工作业已完成。一条通往大校门的路已经铺就,发电厂的围墙一段段地筑起来。办公用具和家具被一车车运来并安置妥当,炉灶连同煮饭锅具已安装在厨房里。十来头驮运砖土的驴子排成串地来回奔跑,筐里的石头瓦片发出破裂声。男人们以 20 人为一组拖动石碾压路,门外木匠铺里的工匠们更是忙得不亦乐乎。”①学生们焦急地盼望着开学那一天的到来,甚至在开学前两天就有 15 个女孩迫不及待地带着大包小包的行李提前赶来报到。开学后仍有一些工作没有完成,如道路的修补尚未完工,起居室还没挂上窗帘和图画等,于是接下来的一周时间被确定为义务为楼房建设作贡献的“奉献周”。南京市的市政官员、各界要人以及来自市内多所大学、公立中小学的学生受邀前来参观,新校区内一时间车水马龙,人来人往,热闹非凡。行道两旁摆满了盆栽菊花,女生们在校园里值勤,为来宾们充当向导。来宾们参观了美轮美奂的新校园,享受了丰盛的晚宴和茶点,还观看了精彩的文艺演出。



金女大大草坪

① 德本康夫人、蔡路得:《金陵女子大学》,杨天宏译,第 42 页。

吴贻芳曾在其就职致辞中对陶谷新校舍作出过如是评价："本校的建筑，可以代表一种融合新旧中西的新创造。校舍宏壮的规模，精美的饰装，是要保存我国固有的文化，钢骨水泥的构造，房间户牖的分配，是取近世科学的新发明，所以既能保存中国建筑的特性，又能合乎学校的实用。"①此言至为精当。

德本康夫人也在总结其办校十余年的经验教训时特别提到："岁月教给了我们三条经验，一是信念，其二是忠诚，还有一条就是耐心——这是我们从遭遇诸多阻碍以及计划的被迫延宕中学到的。有时候计划原先并不充分，之后我们高兴地发现障碍反倒将我们从错误中拯救出来，并可能使一些事情变得更好。倘若我们早在1915年就有少许资金用来购地和兴建校舍的话，很可能以后就无法更自由地加以筹划，今天我们现有的校园和校舍也就不复存在了。因此我要传给我继任者的经验之一，就是假如在计划上出现什么延误和困难，不必丧失信心——充满希望的等待可能会比仓促计划、匆忙执行取得更多收获。"②

大规模的校园建设到1924年便告一段落。十年后方告竣工的音乐大礼堂及图书馆兼行政办公大楼最初也在校园规划范畴之列，包括在1920—1921年联合筹款运动的建筑计划内。起初之所以没有兴建它们，是由于当时师生数量尚不为多。后来随着学生人数的大幅增长，使得德本康夫人在1926年便开始为之计划，但1927年春南京发生的动乱让一切事务不得不向后拖延。20世纪30年代初，金女大在陶谷的教室与宿舍日显拥堵，增建新校舍的条件渐趋成熟，于是陆续开始了新一轮的校园建设。至抗战爆发前的十多年里，校内又有几幢附属建筑物相继落成。1929年在东院建成一座四合院式平房，用作体育简易科学生宿舍；1930年在宁海路旁建成两幢教职员宿舍，后又改为学生宿舍；1934年增建宫殿式校舍两座，与原有主建筑围绕绿草如茵的大草坪呈四方对称格局：北面是一幢面积为1 396.32平方米的新图书馆

① 吴贻芳：《就职致辞》，《金陵女子大学校刊》第11期，1929年3月。

② Mrs. Lawrence Thurston, "Address by the Retiring President", *Ginling College Magazine*, p. 7, 1929.

兼行政办公室，内部结构设置参照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南面是面积为 1 444.36 平方米的大礼堂，楼下用作音乐系办公室兼演奏厅；1936 年可容纳 60—72 人的附中宿舍及疗养院（即校医院）落成，此二楼分别由宋氏三姐妹和校友严彩韵、严莲韵姐妹捐赠；1937 年春又有专作教员宿舍的南山甲、乙两楼完工，面积分别为 337.12 平方米和 1 357.6平方米。[①] 其间师生们不断广植花木，美化校园环境。古朴典雅的校舍掩映在繁花茂树之中，别有一道风景。

第二节　创办初期学校师资状况

一、早期师资结构及其变化

1915 年 9 月 17 日学校开学时只有 9 名教职员工（专任 7 人，兼任 2 人），教师仅 6 人，其中华籍教员 2 人，美籍 4 人，除校长德本康夫人外，还有英文教师伊丽莎白・高切尔小姐（Elizabeth E. Goucher）、弗雷德里克・米德小姐（Frederica R. Mead）以及从杭州弘道女中调来的历史、地理学教师诺・玛丽小姐（Mary A. Nourse），均由学校管理委员会聘任。

创办阶段的金女大师资极其匮乏。校长德本康夫人清醒地意识到："对于一个教育机构来说，没有什么比建设一支强大的教师队伍更重要了。" 1916 年，这种师资短缺的现象特别严重，德本康夫人不得不公开承认："本年度在办学上最大的阻碍，即在于无法给予学生充足的师资，特别是理科与音乐方面的教师尤其缺乏。"[②]1917 年 1 月 19 日，她在一封致托事部的信中再次表达了对这一状况的忧虑："学校的理科如此薄弱，这着实令我难过……我不觉得前两年我们在理科教学上做

① 曾芳苗著，吴振汉指导：《民国教会女子教育——"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个案研究(1915—1951)》，第 80—81 页。

② 德本康夫人、蔡路得：《金陵女子大学》，杨天宏译，第 15—16 页。

过任何有价值的事。这些科目需要专家，如果你没有主修过化学、生物等专业，根本就不可能上好这些课程，但只受过通识教育的人却可以教历史、英文或哲学等课程，而无需主修这些专业。”①由于师资的缺乏，学校无力实现对学生的全部承诺。根据学年计划表，历史班尚有六个学分需要补上，因而急需一名教师来上历史课，否则就无法在一年内完成学习任务。化学班学生甚至都不知道会由哪位老师来教课。有个已经付了两年钢琴学费的学生竟然没上过一堂正规的钢琴课，她决定不再付钱直到有老师前来授课。为了保证学校的教学进度，连校长本人也不得不亲自讲课，充当多门功课的老师。



绣花巷时期的外教(右三为蔡路得、右四为德本康夫人、右五为黎富思)

这段时间里，校方一直在积极物色两名理科教师和一名音乐教师，对外寄发了越洋信件和电报，正在休假的教员则在寻觅新教师方面给予学校极大帮助。但迟至新学年开始之前，情况仍丝毫不容乐观：由于两名教师正在休假，一下子减少了几名教员；而学校正准备招收三个年级，学生人数翻了一倍。学生们翘首以待，却没有任何增援教师准备

① 朱峰：《基督教与近代中国女子高等教育——金陵女大与华南女大比较研究》，第114—115页。

前来的消息。结果直到开学那天，才有两位教师匆匆赶来，另两名教师数周后到达，因此 1917 年金女大在两个月内一下子迎来了四位新教师：理科有化学教师蔡路得和生物教师黎富思，文科则是英国文学、历史教师薛浦来（Mary Shipley）和音乐教师利蒂亚·布朗（Lydia B. Brown）。这些新聘来的教师扩大与充实了原有的师资力量，所开设的一些新颖课目也深受学生欢迎。学生们难以抑制自己的欣喜之情，认为"她们的到来使我们欢欣鼓舞，学习热情高涨，她们给我们带来的东西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期待。"①还有位学生在一篇《金陵新教员》的文章中说："学生们最迫切的希望是新教员永远属于金陵，她们的头衔与称谓将一直是令人尊敬的'小姐'。"②

来自奥伯林大学的音乐教师利蒂亚·布朗小姐到校受聘后，立即开始了紧张的教学工作：她每周上 44 节音乐课，5 个小时的音乐理论课，此外还得指挥合唱团，每周 2 次指导 2 个班的学生进行体育锻炼，以及担任基督教女青年会顾问。学校还先后聘请了一批在专业上颇有造诣的人士来校任教，如宗教学教师芮伯格（Narola E. Rivenberg）、生物教师惠特默（Harriet E. Whitmer）、音乐教师苏德兰（Miss Sutherland）等。但对于管理委员会指派的教师，校方若觉得此人不是恰当人选，便会不留情面地予以辞退，从而有效确保了学校的教学质量。

金女大早期教师主要由教会提供，外籍教师比例居同期其他各教会大学之首，而中国教师的聘任仅为配合学校开设中文课程之需。据统计，金女大外籍教师人数在 1923—1924 年是一个高峰期，这与 1924 年起该校扩充教学规模，分设英文、历史、社会学、体育、数理、化学、生物和医学预科等科系密切相关。由于学校开始以分科设系的制度取代原来只有理、文两科的教学方式，为适应补充和加强师资的需要，教会方面派遣有相关专才的教师来华任教，访问教授的到来即成为金女大迁入新校址第一年的一大特色。这批到金女大兼课的大学教授除进行

① Liu Gien-chiu, Ren En-dzi, Tang Hwei-dzin, Wu I-fang, Zee Yuh-tsung (the Class of 1919 Ginling College), "Among the Thorns", *The Pioneer*, p. 9.

② Liu Gien-chiu, Ren En-dzi, Tang Hwei-dzin, Wu I-fang, Zee Yuh-tsung (the Class of 1919 Ginling College), "Achievements", *The Pioneer*, p. 27.

短期支援教学外，主要任务是协助新科系的筹备与设立。如史密斯学院化学系访问教授埃伦·库克(Ellen P. Cook)的来华目的主要是协助自己的学生蔡路得建立化学实验室。首位体育系主任美籍教师艾米莉·凯斯(Emily I. Case)堪称金女大体育系的奠基人，是她最先引进了具有节奏性强、协调放松、动作连贯、姿势优美等特点的丹麦体操在金女大进行教学，并使之通过该校毕业生在全国各地加以推广。她还擅长体育行政和管理工作，有关体育的教学制度、课程设置和教学秩序等都是在其任职期间逐渐建立健全起来的。① 外籍教师的加入，使金女大师资阵容得到了迅速提升。



迁入陶谷新校舍后教师合影(后排左一为华群)

1926年之前，外籍教师在全校教师名额中所占比例一直维持在百分之六十以上，其中1923年外籍教师所占比例更高达百分之九十三，但以后开始逐年递减。外籍教师系由教会应学校校长之请选派的，他们不仅学有专长，且多具备实际教学经验，有的甚至在中国的女子中学任过教。他们的到任不仅有助于金女大早期师资力量的加强和教育质量的提升，还为学校日后教学制度更具规模奠定了发展的基础。

① 刘翼文：《金女大体育系教师阵容》，载金女大校友会编《永久的思念》，第121页。

在金女大，不少外籍教师本人就是响应"学生海外自愿传教运动"的传教士，其工资由教会按照美国标准发给，而华籍教师的工资只能从大学学费中获得，结果造成两者在工资水平上的较大差异。1920年底，德本康夫人参加了美国金陵大学托事部金女大委员会，在会上向委员们提出有关该校中国教师薪资问题。托事部认为不应对照传教士标准而应以经济原则付给中国教师薪资，这个决定实际上为金女大设立了两种工资标准，造成华洋教师待遇的长期不平等。① 对于女校任教教师的来源问题，校长德本康夫人深以为虑，她认为"女校付给的薪金不高，不足以吸引最优秀的男教师，而且在女校任教远不如在男校任教有吸引力。出于礼貌得体的需要，男教师不可能太年轻，这样我们又丧失了任用那些有魄力、精力旺盛的年轻教师的机会。"②因此她希望学校尽量多聘用女教师来从事女子教育。当1919年第一届学生毕业时，德本康夫人还向美国托事部力荐她们中间最优秀的吴贻芳留校任教。她在推荐信中说："在今年6月毕业的学生当中，吴贻芳是最出色的，所有人都非常赞同学校聘用她。教职员们认为：她来校任教将帮助解决因本人休假而



早期的外教（后排中为德本康校长、前排左为蔡路得）

① "Minutes Ginling Committees of the Board of Trustee of the University of Nanjing" (1920. Dec. 13th), YDSL, UB Archives, Box124, Folder2591, p. 849. 转引自朱峰著《基督教与近代中国女子高等教育——金陵女大与华南女大比较研究》，第120页。

② "The Higher Education of Chinese Women, Aims and Problems", *Educational Review*, pp. 95—101, 1916, Oct.. 转引自朱峰著《基督教与近代中国女子高等教育——金陵女大与华南女大比较研究》，第134页。

造成的许多问题。我们觉得她的水平不逊于任何留学回国的文学学士……她将是我们教师队伍的重大补充。"[①]她甚至还在信上谈到吴贻芳留校任教后的薪金安排问题。尽管德本康夫人的愿望没能实现,却足以反映出她对校友回母校任教所采取的积极推动态度。

20 世纪 20 年代前后,随着五四运动等一系列民族主义浪潮的兴起,中国国内反帝情绪日益高涨,有关取消教会、收回教育权的呼声响彻全国各地。在这一时代背景下,金女大教员中的中国籍人数及比例也开始逐渐增加。

据统计,1915—1921 年间金女大的中国教师共有 9 名,其中女性仅 2 人,9 人中竟有 6 人任教中文系科,而男教师多为兼职。1923 年,金女大 1920 届校友郝映青回母校担任中文系教师,并负责管理图书馆内的中文书籍,成为首位回校任教的金女大校友。此后校友教师人数逐年增加:1924 年又有朱溆、何昌祺两位校友回校,分别担任历史、音乐教师;1925 年则有谢文秋、陆慎仪、刘恩兰三位校友回校,分任体育、数理、地理教师;1926 年有倪逢吉回校任历史、社会学教师,李祈回校任英文教师;1927 年有张肖松回校任历史、心理学教师,黄丽明回校任体育教师。[②] 由于金女大对本校毕业生毕业后或继续进修后返回母校任教的积极争取,中国教师在金女大所占比例逐年增加,并在 1927 年首度超过外籍教师人数,以后则完全取代后者在学校中占据多数地位。1923—1927 年间金女大共有 24 名中国教师,其中 16 名女性,校友达 10 人之多,任教系别则呈现多样化趋势。


黄丽明

① "The Letter from Mrs. Lawrence Thurston to Miss Bender" (1917, Feb. 17th) YDSL, UB Archives, Box143, Folder2843, p. 528. 转引自朱峰著《基督教与近代中国女子高等教育——金陵女大与华南女大比较研究》,第 139 页。

② 参见"金女大中国教师名录"(1915—1951),载曾芳苗著,吴振汉指导:《民国教会女子教育——"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个案研究(1915—1951)》附录(一),第 229—230 页。

表3为金女大历年(1915—1927)教师人数及中外籍教师人数比例变化情况一览表[①],反映了这所基督教女子大学中国化的发展进程。

表3　1915—1927年金女大中、外籍教师人数及所占比例一览表

年　　份	中国教师人数及比例	外籍教师人数及比例	合计
1915	2(40%)	3(60%)	5
1916	1(17%)	5(83%)	6
1917	2(20%)	8(80%)	10
1918	2(20%)	8(80%)	10
1919	3(27%)	8(73%)	11
1920	2(18%)	9(82%)	11
1921	3(20%)	12(80%)	15
1922	3(18%)	14(82%)	17
1923	2(7%)	25(93%)	27
1924	7(25%)	21(75%)	28
1925	10(37%)	17(63%)	27
1926	11(35%)	20(65%)	31
1927	15(52%)	14(48%)	29

二、德本康校长任期内著名师资与师生关系

金女大十分重视选拔与培养教师队伍,教务主任华群对此曾阐述道:“我们务必使每个系都配有最好的教员,并为之合理安排课时与科目,让大家都能感到自己正在为一个伟大的目标工作,人人葆有充沛的

① 曾芳苗著,吴振汉指导:《民国教会女子教育——“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个案研究(1915—1951)》,第99页。

精力，这样才会越干越有劲头。"[1]自创办以来，由于坚持唯才是择、唯贤是用的用人方针，学校形成了一批拥有较高学历和素质的师资力量，从而有效地保障了教学质量。以德本康、华群、黎富思等人为首的优秀教师，无不全身心地投入于中国女子教育事业，致力于造就中学女子教员及行政人才，为把金女大办成能与美国大学并驾齐驱的高等学府而竭心尽力。她们讲课时提纲挈领，深入浅出，引人入胜，成为各自科系的创系者与支柱。她们爱学生如女儿，以自己的言传身教极大影响了学生的学习、生活，更授予其终身受用的宝贵财富。

作为学校的创始人，德本康校长"富办学才，苠筹擘划，惨淡经营"，在 12 年的校长生涯中，她为学校创建、募集经费和规划施工耗费了许多精力，在建立教学秩序和扩大规模等方面也倾注了大量心血。在学校教工人手不够的办学初期，她曾先后给学生上过圣经课、天文课、大学代数、三角、几何等课程，另外还得负责学校人事、财务与文书报表工作，甚至指导合唱团，所以被戏称为"Jack of all trades"。1921 年 9 月至 1922 年 3 月间，她在负责学校教学楼建筑工程的同时一身二任，参加了中国基督教大学联合会(Association of Christian Colleges in China)对整个中国基督教高等教育状况的调查，该调查搜集了有关职员、学生、课程及经费方面的详尽信息，为后来国民政府教育部制定教育计划提供了重要参考。1928 年她主动辞去校长职务后，不再插手校务，而是以顾问、兼任教师及建筑监督人的身份，继续勤恳地为学校服务。[2]

德本康夫人的治校成绩获得了人们的普遍赞誉："金陵的第一任校长对学校发展所作的巨大贡献，是那些不知晓学校创业史的人难以报答的。许多使学校禀赋了自身独特品性的优秀传统可以回溯到德本康夫人担任校长的那个时代，她的勇气和信念足以战胜任何艰难险阻，随着岁月的流逝，她的大学理想将变得越来越现实。"[3]就个

① "Vautrin Correspondence", Archives of the Christainity Higher Education Union of Asia in the Yale University, New Haven, Ct.

② 吴贻芳：《金女大四十年》，载《吴贻芳纪念集》，第 113 页。

③ 德本康夫人、蔡路得：《金陵女子大学》，杨天宏译，第 156 页。

人品性而言，德本康夫人具有诸如思想高尚、眼光远大、意志坚强、态度镇静、行事公正等优点，其退职后仍为人所称道。不过由于她外表"伟大庄严"，办事风格"痛快决断"，[①]因此"有许多人以为德校长是一个严父，不是一个慈母，所以许多同学不敢与她接近"，对她大多恭敬且畏惧。[②] 1928 年 11 月，德本康夫人在辞职演讲中对自己十多年来的办校思想与实践加以总结，指出"我们的目标是建立一所活跃着基督教精神、以基督教进行管理的女子大学。大学应该保持高水平的教育，提高社会效率，促进精神发展与最高人格"[③]，反映了她坚持基督教教育方针的指导思想，也符合当年教会组织决定在长江流域创建女子大学的初衷。她还强调要培养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妇女领袖："在高等教育期间，要向学生灌输改变家庭、城市、教会和国家的理想。我认为要在所有妇女可以从事领域中培养领袖人才。"认为高等教育结果会造成"经济上独立自主女性的大量出现，这是件值得庆幸的事，无需担心"[④]。

华群女士，即魏特琳(Minnie Vautrin)，早年曾在伊利诺斯大学接受过系统的师范专业训练。1911 年她来华从事教育事业，任安徽合肥三育女子中学校长；1919 年应金女大之聘，任教育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下车伊始她便被德本康夫人倚如左右手，每逢校长休假之年即代理校长之职，承担起协调各种关系的责任。她亦处处以办好学校为己任，不辞劳瘁地辅佐校长，安排教务，革新教学，且"精心擘划，建树很多"，为学校发展尽心竭力。她认为中国女子教育的推广必先从加强女子中学教师与行政人才的训练入手，主张学生不仅要熟悉书本上所学到的知识，更要懂得如何实地教授所学科目，这在当时是富有开创性的教育思想。国民政府教育部后来也明文规定，大

---

① 程陶：《我的德校长观》，《金陵女子大学校刊》，第 19 页，1928 年 6 月。

② 李泽贞：《德校长给我的印象》，《金陵女子大学校刊》，第 20 页，1928 年 6 月。

③ Mrs. Lawrence Thurston, "Address by the Retiring President", *Ginling College Magazine*, p. 6, 1929.

④ "The Higher Education of Chinese Women, Aims and Problems", *Educational Review*, pp. 95—101, 1916, Oct. 转引自朱峰著《基督教与近代中国女子高等教育——金陵女大与华南女大比较研究》，第 133—134 页。



校长德本康夫人和担任教务主任的魏特琳女士(左)
在金女大的学位授予仪式活动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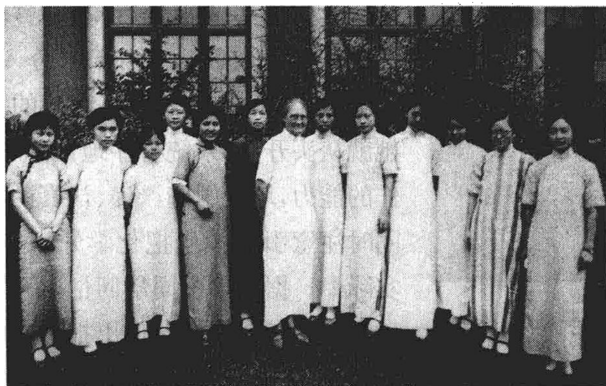
学生有志任教员者必先取得一定的教育学课程学分。不过她也注意保持教学职业训练与课程掌握方面的平衡，不赞成学生只把教育当作主课，认为师范生在掌握正确的教学方法之外，也应该熟悉所要讲授的课程。作为未来的教育工作者，知识面不宜因学科专业化而过于狭窄，这不利于实际教学工作的开展。学校由华群讲授教育课程时，曾吸引大批学生到教育系来听课。出于对教学实践重要性的认识，她在校内创设了附属实验中学，附中一切均由其规划，学生实习时必躬亲指导。



1937 年的魏特琳女士

华群对学生极其负责，学生毕业后她仍很关心她们的工作情况，有机会就去听她们讲课，了解其任教是否合格，因而得“同学尤深爱戴”。她通过对远近学校的走访，熟悉了中国的中学教育及女子学校状况，对金女大学生毕业后要去的地方了如指掌，因而能够向这些学校提出中

肯的建议。她一有空暇就去学校附近拜访邻里妇孺，关心她们的疾苦，尽量帮其解决困难，并创设“乐群社”（又称“社会中心馆”）、懿师家政学校，课余时间带领学生前往服务。华群“体格魁梧，容貌庄严；然对人时露笑容，以此高贵而和蔼可亲。至待贫儿寡妇，更是谦卑柔和，所以不仅本校师生乐于亲近，就是附近邻居，也都喜欢和华教授往还”①。吴贻芳评赞她“秉性慈淑，见义勇为”，“盖女士深得基督教之博爱精神，待人接物无不具有爱心，故能舍己为群，乐善不倦，其感人之深，如铭入心脾，永远不能使人遗忘”。②



生物系主任黎富思（中）与生物系学生

金女大外籍教师均具有学士以上学历，基本上都有过曾在本国或国外高中乃至大学任教的经历。黎富思博士（Cora D. Reeves）1917年即加入金女大教师行列，其在金陵连续24年的服务使学校有了一个实力很强的生物系。她善用启发式教学法，以具体实验来说明科学原理；曾教导学生要刻苦钻研专业，用心观察事物。学会用锐利的眼光去看别



生物系学生在采标本

① 《华群教授事略》，《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校刊》第136期，1946年11月。

② 吴贻芳：《华群女士事略》，载《吴贻芳纪念集》，第53页。

人看不到的，用灵敏的耳朵去听别人听不懂的，用丰富的感情去感受别人感受不到的。① 她常带学生到花园去实地观察，教她们将手中花朵的花萼、花瓣从外向内一片片摘下，讲述其大小、形状、颜色及招引昆虫传粉的作用，然后要学生参阅相关资料写出结论性报告。

长期担任化学系主任的蔡路得(Ruth M. Chester)是毕业于美国密歇根大学的博士，亦于1919年秋来到金女大，开始了在此长达34个春秋的服务。她对实验操作有相当严格的要求，每次认真批改完学生的实验报告后，都要签名，热情地写上评语以资鼓励。由于部分入学新生从未上过实验课，缺乏理科实验的基础知识，她就从头开始、系统有序地训练学生独立操作的能力，培养她们严谨、认真的科学态度，同时注意引导学生把化学知识应用于生活实际中。据化学系同学回忆，蔡博士常布置她们查阅资料并据此作出报告，在系里举办读书报告研讨会，研讨会题目任选，时间不限，这是一种增长知识、培养阅读与综合能力的好形式。她还热心培养化学系接班人，自1945年起接任化学系主任之职的有机化学博士吴懋仪就是其得意门生。②


蔡路得教授

1923年受伦敦传教会派遣来校义务教书的师以法(Eva D. Spicer)是一位英国爵士的女儿，毕业于牛津大学，在金女大讲授比较宗教学和历史。她不仅不拿工资，为了能在中国长期服务，后来还自费在金女大建造住宅(即今"贻芳园"所在地)，时常


历史系主任师以法
(Miss Spicer)

① 吴贻芳：《金女大四十年》，载《吴贻芳纪念集》，第113页。
② 梅若兰：《金女大化学系简况》，载金女大校友会编《永久的思念》，第134—135页。

邀请学生上门作客。她曾在课堂上启发学生要通过独立思考破除迷信:“交战国家各自祷告上帝保护其取得胜利,上帝该听谁的? 如何可能? 因此教徒不该迷信,要多动脑筋,独立分析思考。”[①]她的话给学生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金女大建立后的第一年共招收了 11 名学生,她们分别来自南京、镇江、上海、九江、宁波等 5 座城市。这些学生平均年龄已 20 出头,除一人外,她们入学前都教过书,年头多的 7 年,少则 1 年。[②] 开学半年后,吴贻芳由当时在金女大任教的美籍教师诺·玛丽小姐推荐来校就读,由于没有中学证书,所以作为旁听生插入一年级,然而不到半年,她各门功课成绩均为优秀,较正科学生还强许多,学年末即转为该校首届学生中的正式一员。金女大第一届学生中,在经过一年的艰苦学程后,只有 9 名学生坚持下来,当中又仅有 5 人最后完成大学四年学业,幸运地成为中国第一批在国内取得学士学位的女大学毕业生。她们是刘剑秋、任倬、汤蕙菁、徐亦蓁和吴贻芳。毕业那年,她们共同出版了一份《先驱》



第一届毕业生,由左到右依次是任倬、徐亦蓁、
刘剑秋、汤蕙菁、吴贻芳

① 王耀云:《妇产科医学博士行列里的金陵女儿》,载《金陵女儿》编写组编《金陵女儿》,第 47 页。

② 吴贻芳:《金女大四十年》,载《吴贻芳纪念集》,第 102 页。

特刊，除前言外共撰有6篇文章，详细回顾了第一届金陵学生四年大学生活的经历与体验。最初四年的学校生活无疑是艰苦的，也是令人难忘的，作为校史上前所未有的拓荒人，金女大所取得的早期成就无不与她们紧密相关。

艰难创业的1915年，不仅是一年级新生开始大学生活的第一年，也是金女大自身发展的起始之年；它不是年轻的入学者赞成和融入学校精神的普通一年，而是注定要由她们来产生金陵精神的特殊年份。第一批学生尽管只有区区几个人，但由于来自国内不同省份，彼此间语



早期学生课堂讨论课

言不通、口音各异，往往因为听不懂对方说什么，只好把要说的内容写在纸上，同一寝室的室友有时竟不得不用英语进行交流。同学间因为语音误解而闹出不少笑话。有个九江女孩用家乡话向一个宁波女孩借擦皮，结果那个宁波女孩整整一年都以为九江女孩所说的九江方言是“擦皮”的英文单词。一次在宗教课上，教授按中文译音使用“国民党”一词，意指当时的革命党，一个上海女孩以为这是个新的英语单词，于是她一遍遍地重复直至掌握为止。对于首届学生来说，生活和感情上的不习惯还在其次，她们所面临的最大问题还是来自学习方面的挑战。因学习程度不一，学会如何独立学习和加强语言能力，便成为这些学生在第一学年里的主要任务。当她们上第一堂英国文学课时，精心备过

课的米德小姐课讲得很精彩，但只有一小部分学生对此有反应，因为多数人甚至难以听懂一句完整的话。学生刚开始不得不每天在一门科目上花好几个小时，却仍无法让老师满意。还有一次，米德小姐建议学生学习时制定一个计划，以便按时间线索记住课文。结果女孩们半夜三更就从床上爬起来，披上毯子去餐室准备计划，一直忙到天亮才完成。上课铃响后她们都等着上交作业，却发现老师"忘"了收计划。有个写了四页纸的学生径直向米德小姐提出来，米德小姐告诉她们写计划不过是一种应该掌握的学习方法，为的是方便她们自己学习，然而对于所有学生来说，这可是件前所未闻的事。①

后来的相关回忆文章无不提及首届学生初入校时的"时常不乐"②——远离家庭，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彼此语言不通，对大学校园生活的不适应，以及想像与现实的巨大反差，使她们没少流下伤心的泪水。每逢礼拜天，"所有人都愁肠百结地端坐桌边，向自己的父母、亲戚和朋友倾诉抱怨之情"③。这是一段压抑而郁闷的时光，她们想念家乡和亲人，怀念过去读书的中学，不仅觉得那些中式楼房官邸毫无浪漫色彩，还感到自己被禁锢在高墙内，受到各种礼节规矩的束缚。七位可敬的教职员工则以极大的耐心指导着九位毫无



绣花巷时期的学生

① Liu Gien-chiu, Ren En-dzi, Tang Hwei-dzin, Wu I-fang, Zee Yuh-tsung (the Class of 1919 Ginling College), "Exploring the Unknown Forest", *The Pioneer*, pp. 6—7.

② 《德校长传》,《金陵女子大学校刊》,第6页,1928年6月。

③ Liu Gien-chiu, Ren En-dzi, Tang Hwei-dzin, Wu I-fang, Zee Yuh-tsung (the Class of 1919 Ginling College), "Exploring the Unknown Forest", *The Pioneer*, p. 6.

经验的学生，她们没有一丝半毫的冷淡与矜持，随时乐意向学生提供任何帮助。她们了解这些新生孤独与想家的感受，于是尽量为其安排一些不拘礼仪的活动，诸如下午四点钟的茶叙及其他社交聚会等，用以排遣女孩们的愁绪。师生间通过密切接触和相互理解，日渐形成一种不可分割的联系，尽管仍有这样或那样不尽如人意的地方，金女大却从不缺少家庭气氛与和谐精神。从德本康夫人 1918 年的年度报告中，我们也可见到创校时期师生关系的发展轨迹："第一份年度报告(1915)因过于悲观而遭到批评，但那不过是对困难和失望的坦率表达，那年年底我们已经看到了充满希望的将来；第二学年(1916)，更多的愿望得以实现；第三学年(1917)，我们的信心在增加，学生不再是办学的困难，反而令我们感到鼓舞和振奋，她们是大学未来发展的希望所在。"①

在金女大全体师生的心目中，整个学校就像个相亲相爱、其乐融融的大家庭，她们就是家里的成员。有人曾在《金陵女子大学校刊》纪念特刊上对此作过生动的描述："金陵的家庭精神已广为人知。这是个有广泛联系的家庭圈子，德本康夫人好像母亲，教职员们好比姨妈，毕业校友就像大女儿，在读学生就是小女儿，还有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东吴大学、杭州的之江学院等外地兄弟及表兄弟，金陵大学如同我们毗邻而居的兄弟，史密斯学院则是我们远在海外的姐妹。"②那时候，大多数教职员都住在校内宿舍楼



花园里上舞蹈课

① "Annual Report", 1918, YDSL, UB Archives, Box154, Folder2961, p. 584. 转引自朱峰著《基督教与近代中国女子高等教育——金陵女大与华南女大比较研究》，第 115—116 页。

② Liu Bao Dju, Fourteenth Annual Founder's Day, Ginling College Magazine, p. 12, 1929.

里，师生接触极为便当，尊师爱生蔚然成风。教师们经常鼓励学生利用业余时间开展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以增进集体感情，训练个人才干。金女大最早举办的社会服务性机构——邻童主日学校，就是在高切尔小姐、米德小姐等人的指导、帮助下开办的。教师们还常常参加学生的课余活动，有时还亲自出马，与学生比赛打球或是在话剧中扮演角色。校方对学生健康也至为关心，定期组织校医和体育老师为全体同学检查身体，为入学新生建立健康档案；此外还十分重视膳食管理，餐具清洁卫生，开水供应充分。学校曾接洽鼓楼医院医生对其中检查出来有扁桃腺炎、常患伤风感冒的进行手术，将肺弱的分配到环境良好的花园宿舍居住；校医则根据需要每天上午十点在课间供应诸如牛奶加黄豆或土豆泥之类的营养汤，下午为体弱学生再添加鸡蛋以保证营养；学校还负责补助经济困难者的营养伙食。[①] 据1926 年毕业的校友邓裕志撰文回忆，学校甚至安排过她们几个患肺结核等重症的同学去庐山牯岭的肺病疗养院疗养，一切费用由校方承担。[②]

由于金女大师生关系紧密和睦，有较高的师生比例(据统计，1926年的师生比为 1∶4.6)[③]，这就为学校实行家庭化管理提供了条件。该校早期施行顾问制，分为级顾问和个人顾问两种，前者属团体性协助，后者为个体性指导。国民政府教育部颁行导师制后，学校便将个人顾问改称导师，实行导师导生制[④]，即每个学生可找一名教师作导师，一位导师可带五至十五名学生，由导师负责指导学生选课和学习，或以小组活动等其他方式帮助学生解决学习、生活等各方面的问题。这一制度的实行进一步密切了学生和学校的联系。

---

① 严莲韵：《“绣花巷时期”的金女大学生生活概况》，载金女大校友会编《永久的思念》，第 102—103 页。

② 邓裕志：《难忘的岁月》，载《金陵女儿》编写组编《金陵女儿》，第 30 页。

③ Earl Herbert Cressy,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 A Study for the Year 1925—1926*, p. 102, Shanghai: China Christian Educational Association. 转引自朱峰著《基督教与近代中国女子高等教育——金陵女大与华南女大比较研究》，第 361 页。

④ 《私立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要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第 10 页，六六八/26。

校方除要求教职员与学生多接触外，还鼓励她们利用假期进修专科，提高自身素质和教学水平。[①] 它对外籍人员实行每六年回国休假一次的制度，以使其有时间放松身心，或赴国外讲学、深造，同时兼办校务。例如，华群最初毕业于伊利诺大学教育系，取得文学士学位，后利用返美休假的机会获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学位。1925 年华群又借第二次例行回美休假之机，进入芝加哥大学教育系继续进修。忙于选课学习、撰写报告的同时，她还直接负责在美购买图书、甄选教职员以及策划新课程等事务。1931 年，身为教育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的华群赶赴欧洲，参观考察西伯利亚、芬兰、挪威、瑞典、丹麦、法国、英国、瑞士等地教育机构，访问调查当地社会各阶层的教育状况，对丹麦、芬兰两国的成人学校尤感兴趣，此行启发、促进了她在金女大将其助贫教育的思想进一步推向实践。

第三节　系科初创与课程设置

一、学校早期运作状况与系科发展

金陵女子大学是基督教会继北京的华北协和女子大学和福州的华南女子大学之后，在中国开办的第三所教会女子大学，但由于前两所学校的程度和规模都很有限，金女大实际上是基督教会在中国创办的第一所设置完整大学课程的女子大学。由于金女大是由多个教会合办的女子高等教育机构，所以其生源范围涵括长江中下游流域以及华南等沿海省份。以 1925—1926 学年为例，该校学生有 45.5%来自江苏省，另有半数以上的学生来自于全国其他省份。[②]

金女大入学起点要求较高，入学学生必须以完成高中语文、英文、数

---

① 德本康夫人、蔡路得：《金陵女子大学》，杨天宏译，第 16 页。

② Earl Herbert Cressy,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 A Study for the Year 1925—1926*, p. 186, Shanghai: China Christian Educational Press. 转引自朱峰著《基督教与近代中国女子高等教育——金陵女大与华南女大比较研究》，第 270 页。

学、科学、历史和宗教课程为先决条件。至于招考情况，金女大每年暑假在全国范围内公开招生两次，日期由学校选定后登报通告或通知各高级中学，第一次招生时，选择考生便利地点设代考处，第二次招生则是在金女大校内举行入学考试。据 1921 年 3 月华群所作报告称：当年 5 月 29 日学校在长沙、九江、天津、南京、上海、福州、邵武等七处设考点，入学考试分综合考试、词汇考试、理解能力测试、语法测试、英文写作、中文写作等六部分，这是金女大第一份标准入学试卷，由担任该校招生委员会主席的高切尔小姐参考上海沪江大学考试标准后确定的。①

当时教会大学大多在国外注册。金陵女子大学与金陵大学在美国同属一个托事部，金女大委员会通过该托事部替其托管全部财产、捐款，并将资金和礼物交给董事部管理。董事部负责照看学校所有财产、收集学费、任命校长和教员、确定人员薪水和学习课程，以及准备年度预算并呈交给托事部等各项事宜。为使学校取得合法地位，能够授予毕业生学位文凭，金女大于首届毕业生产生那年，即 1919 年，通过金陵大学托事部在美国纽约州立大学进行注册，并获颁办学执照。纽约大学董事会认为金女大“成绩优良，学生程度与各大学相埒，准即立案，并发给学位”②。特许证的取得，意味着金女大毕业生可以不经考试，直接进入美国大学研究院攻读硕士学位，体现了它作为教会大学独立于中国教育体制之外的特色。由于校方有为毕业生代为申请留美助学金的权力，这使得在校学生读书更加努力，除上课外就去图书馆翻阅参考书和作笔记，常常忙到深夜才回房休息。③

经费是学校组织运作的基础，各教会大学筹措经费的主要方式有国内外捐助款、学生缴费及政府补助等。赞助金女大办学的教会因同时还需资助其他多所大学，故金女大建校后便努力寻求其他捐款来源

---

① Vautrin, “Report of Ginling College” (1921, March), YDSL, UB Archives, RG11, Box154, Folder2961, pp. 600—603. 转引自朱峰著《基督教与近代中国女子高等教育——金陵女大与华南女大比较研究》，第 265 页。

② 《私立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要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第 3 页，六六八/26。

③ 严莲韵：《“绣花巷时期”的金女大学生生活概况》，载金女大校友会编《永久的思念》，第 103 页。

和财政支持。1916 年,在学校英文教师米德小姐和美国马萨诸塞州史密斯女子学院(Smith College)来华传教的校友戴丽亚·李文斯(Delia Leavens)的大力推动下,金女大同史密斯女子学院结为姐妹学校。史密斯学院将金女大列为该校在国外的传教基地之一,使金女大从这年起得到了它第一批为数 1 000 美元的捐款,且每年都能得到 1 000 美元的资助,5 年后款额又提升至 2 500 美元,此项支持即使在战争年代也从未中断过,并最终上升为每年 4 000 美元。为表达自己诚挚的谢意,金女大学生寄给史密斯学院两面旗子,一面是当时的五色国旗,另一面是有白色中国字绣在紫色缎面上的校旗,使其在召开有关金女大会议时以之代表远在东方的姊妹学校。1923 年,史密斯女子学院又成立"金陵女子大学校友会",为金女大建立永久校址捐款 50 000 美元,另外加上最高 5 500 美元的年度捐赠,该校成为继赞助教会外金女大的主要长期赞助者之一。1923—1924 年又有美国圣公会(Protestant Episcopal)、复初会 (Reform Church) 和英国伦敦会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等教会组织加入学校管理委员会,使得支持金女大的社会团体增至 40 个。①

进入 20 年代后,金女大入学人数大增,加之教会学校收费较高,学生所缴学杂费、膳食费便成为学校主要经费来源之一,在整个学校收入中仅次于捐款,此外还有做礼拜所得的奉献金、校友会捐助款及国外个别赞助等其他临时性捐款等。以 1926 年为例,金女大年度经费收入总计为 79 441 元,其中学费 13 759 元,手续费 9 168 元,教会拨款 23 911 元,国外收入 31 511 元,国内收入 774 元,捐赠 318 元。② 经费来源的拓展与扩充,不仅是金女大维持校务运作和进一步扩展规模的基础,更有助于学校设备、师资的健全。

金女大实行的是以校长为中心的教授治校制度,由校长负责学校

---

① 《今日之金女大(1929—1930 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六六八/26。

② Earl Herbert Cressy,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 A Study for the Year 1925—1926*, pp. 234—237, Shanghai: China Christian Educational Press. 转引自朱峰著《基督教与近代中国女子高等教育——金陵女大与华南女大比较研究》,第 235 页。该书原表中列教会拨款为 235 911 元有误,应为 23 911 元。

重大事务，教师参与校内各项日常行政工作，以达到民主决策、集中管理之效。校务管理方面有专职秘书宫特拉赫(Adelaide Gundlach)，她毕业于奥伯林学院，曾获文学学士学位，1918年到金女大专管教务和注册工作，负责处理各种琐碎事务。学校行政管理人员虽少，工作效率却相当高，许多教师都身兼数职，以利于节约费用。以1926年为例，该学年年度经费支出总额为75 433元，其中行政费(包括校长室、会计室、注册室有关人员薪金及相关办公费，并其他办公费用在内)9 502元，占总经费的12.5%，校园维持费(包括校监薪金、工饷、维修费、水电费、燃料费、物料费、租金及家具费等)6 106元，人事管理费9 014元，学生费用(包括助学金贷款、体育、医药及学生活动支出)2 025元，图书馆经费很少，包括图书馆员、馆员助理薪金、中外文书籍采购费、期刊费及日常开支在内仅为2 505元，占总经费的3.3%。将近支出总额的一半被用于教学，包括各学科的仪器设备、教师薪金等在内的教学费用总计36 830元，占到了48%。此外还有包括宿舍费、餐厅及杂项开支等在内的非教育性经费支出9 451元。从以上数据分析可以看出，金女大属于小规模的教学型高等教育机构，教职员薪金水平与其他基督教大学相比偏低，办学经费非常节俭。①

德本康夫人曾在建校初期的一次报告中，明确阐述了学校设置课程的宗旨与方针："我们要使任何与学院相关的问题，诸如教育的、科学的、社会的、宗教的问题之学习成为可能。我们将尽可能提供预测科学、教育、宗教方面的特殊课程，以便使学生在服务于这三个领域时，无论身体、心智及精神意志均能适应其需要。相信学院全部学习训练对于那些有志成为中国基督教领袖的年轻女性来说，将是一种理想的准备。我想，这种训练是她们所选择的，它会使我们把学院办得更有特点，更能鼓励学生树立崇高的目标，更能引导学生把自己的全部生活奉献给耶稣基督和他的天国。"②

---

① 参见金陵、华南1926学年度经费支出项目表，转引自朱峰著《基督教与近代中国女子高等教育——金陵女大与华南女大比较研究》，第240—242页。

② 德本康夫人、蔡路得：《金陵女子大学》，杨天宏译，第16页。

就学校科系设置而言，早在绣花巷时期，在师资和学生不足的情况下，学校只设文、理两科，学生可在二者中自由择其一，文科有心理学和英国历史，理科有化学和数学，此外还学习中文、英国文学、修辞学、宗教、基督生活、卫生学、美术绘画等内容。从1924年9月起，金女大开始分科设系，文科设有英语、历史、社会、体育等四个系，理科则有数理、化学、生物、医学预科等四个系，并添办附属实验中学作为学生实习教学的场所。在以后的几年里，学校又陆续建有音乐、宗教、中文等系，截至1927年共有七个文科系、四个理科系，此时金女大已成为具有较完整大学课程的女子大学。①

1925年后，学校开始实施主修、辅修（也称副修）制。② 学生可根据自己的爱好或特长任选一个主修系，一个辅修系。该年度辅修系科即增设教育学、心理学、卫生等课程。一年级课程全为必修，四年学程中除主修、辅修课程外，还有中文、英文、历史、教育学、音乐等必修课程，成绩优良者在学好必修课之余可选读其他课程。由于在选课上讲究文理渗透，学校还规定文科学生一定要选读一定学分的理科课程，反之亦然，从而尽可能地拓展学生的知识面，使之具备较为广泛的知识。

学校允许经济有困难的学生在校学习一个阶段后，可离校工作一段时间，积攒一定费用后再回到学校继续学业。前面提到的金女大学生张芗兰出身贫寒，她辗转于各地教会学校，靠向基督教会贷款和半工半读才艰难地完成中学学业。1921年张芗兰考入金女大，中途两度辍学去东海县乐德女中教书，攒足学杂费后再回校继续学习。结果她三进三出金女大校园，原本学制四年的学业竟用了八年时间方得以完成。正是受惠于这种制度，像张芗兰这样的贫困学生才有


张芗兰

① 孙海英编：《金女大大事记》，第2、5页。

② 该制度一直实行到1939年，才按照当时教育部的要求取消辅修系，只有主修系。

可能完成学业，并继而赴美深造，最终获得两个博士头衔。[①] 再如章太炎的女儿章展曾于 20 年代初进入金女大学习，后因故中断学业，40 年代她又回母校完成学业，和自己的独生女儿朱人娴同校就读，在金女大校史上被传为一段佳话。[②] 学校另设有奖学金与助学金，大都由热心人士捐设，一方面用以褒奖学行俱优者，扶助家境清寒者，另一方面希望受奖助者"将来亦能同样协助他人，藉符人类互助之高尚原则"[③]。

二、早期教学与专业特色

经过一段时间的探索与发展，同其他学校相比，金女大在教学和专业建设方面已开始形成一定的特色。

（一）注重中、英文基础教育

金女大承袭了西方教会学校注重古典语言、数学、哲学、宗教的传统，只是转而以中文、英文取代后者的拉丁文和希腊文教学。为符合大学要求和教会宗旨，金女大按照英美大学的标准办学，课本全部选用英美大学的原版教科书，参考书也以英文居多，甚至一年级刚开始就用英国大学教材来教英国历史，加之学校不设预科，因而对学生英文程度要求很高，以致部分英文基础较差的学生觉得很不适应，学习起来非常吃力。不过她们在教师认真负责的指导下，英文水平提高很快。学校十分重视英文教学，除讲授中国古典经书外，差不多每门功课都用英语教学，就连几位中文教师也愿意在课堂上用英文讲课；学生平时读、写、听、说英语的机会较多，记笔记、写报告或答考题多用英文，还要参阅大量英文书籍。学校每学期都举办英语演讲会、座谈会，上演英语剧，不仅对学生学习英语有很大的帮助，对她们口头表达能力和临场经验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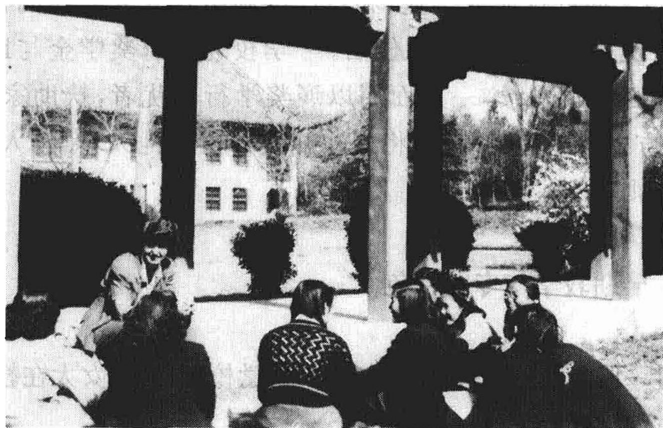
---

① 张志：《我的养母——张芗兰》，载《金陵女儿》编写组编《金陵女儿》，第 38—39 页。

② 毛彦文：《难忘的往事》，载《金陵女儿》编写组编《金陵女儿》，第 59 页。

③ 《私立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要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第 11 页，六六八/26。

是很好的锻炼。因此只要是金女大毕业生，无论主修何系，均具备一定的英语水平。



师生英文口语课

不过在办学早期，金女大的教学标准曾受到各方面质疑，以至于校方对此有无所适从之感："大学在前几年一直被两个不同方向的意见所困扰。支持我们的一个教会已经要求我们降低入学标准，因为她们觉得不可能在其所属的中学开办理科课，而且我们的英语要求也太高了。她们要求我们加办一年预科，教授英文和理科知识，以使学生们达到我们的标准。另一方面，我们又因为英文水平太低而被人们批评，连大学的资格也受到挑战。"①学生们也经常听到社会上对学校的英文教学情况进行批评，以为该校几乎所有课程都使用英文课本和参考书是完全不恰当的，他们甚至说"学习那么多英文有什么用？你可能一辈子也不能指望在国外教书，可你肯定得用中文教自己人。"但学校坚持认为，学生如果不通晓英文，就很难从国外文献中汲取有益的资料，特别是理工科，因为当时图书馆根本无法保证有好的翻译书籍供应，原始资料总是比译本来得更有价值，也更准确些。既然如此，那么在真正适用的中文课本出现之前，学会使用英文就显得很有裨益，而且许多人也相信，总

① "Annual Report", 1918, YDSL, UB Archives, Box154, Folder2961, p. 596. 转引自朱峰著《基督教与近代中国女子高等教育——金陵女大与华南女大比较研究》，第 116 页。

有一天人们会领悟到多学英语的必要性与合理性。[①]

从课程设置来看，金女大对中国文化科目比较重视，不断增加中文课程。学校早在创立之际，就规定文理两科学生在四年学程内都要学习中国古典著作，且毕业前必须修完 20 个学分的国文课程，是所有科目中学分要求最高的。国文科开设的课程有：中国语言、中国典籍、中国哲学、诗歌及古代文学、中国文学史和当代中文写作等。[②] 学校刚开始规定各种文章得用文言文写作，但自从 1917 年白话文运动在全国兴起后，学生使用白话文写作和研究现代文学便成为现实。另外，金女大早期曾因"藏书楼中文书太少，学生中文程度低"而多次遭社会各方诋诟，校方也意识到这一问题并极力加以改善，到 1925—1926 学年度，学校藏书量总计达 11 246 本，其中中文书 6 418 本，英文书 4 828 本，[③] 中、英文书籍比例较为合理，基本保持了平衡。

校长德本康夫人也强调要吸收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我们创校时的教育目标包含着许多西方文化理念。当时学习外国课程蔚为风尚，我们也提供了这方面的课程，因为有些称之为西学的思想受到广泛尊崇与追慕，人们认为中国需要西学。相比于中式教育所提供的旧的传统学问来说，有些课程是新式现代的。但让金陵引以为豪的是，我们从不贬低中国的传统理念，这是学生来金陵求学前所固有的东西。尽管我们发现强调国学是很困难的，然而我们的理想是：国学科目一定要有高水平，中国文化传统应该保留。大学的建筑正反映了这一努力。坚持中国传统中的优良部分是今天金陵理想的一部分。"[④]1919 年，金

---

① Liu Gien-chiu, Ren En-dzi, Tang Hwei-dzin, Wu I-fang, Zee Yuh-tsung (the Class of 1919 Ginling College), "Seeing the Vision", *The Pioneer*, p. 41.

② "Bulletin of Ginling Nanking China", 1915, YDSL, UB Archives, Box128, Folder2632, p. 1076. 转引自朱峰著《基督教与近代中国女子高等教育——金陵女大与华南女大比较研究》，第 207 页。

③ Earl Herbert Cressy,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 A Study for the Year 1925—1926*, pp. 226—227. Shanghai: China Christian Educational Association. 转引自朱峰著《基督教与近代中国女子高等教育——金陵女大与华南女大比较研究》，第 248 页。

④ Mrs. Lawrence Thurston, "Address by the Retiring President", *Ginling College Magazine*, p. 6, 1929.

女大不再根据学生的英文水平，而改用中文水平来编排年级课程，这一举措在当年被视为是该校“在课程上最关键、最困难的改变”。①

（二）宗教教育与特色

1915 年金女大就规定：文、理两科学生毕业前都必须修完 20 个学分的国文课程、16 个学分的英文课程、10 个学分的宗教课程。校方所注重的中国文化特色，实际只是女子基督教教育形式上的中国化，以基督教为主要内容的宗教课仍是学生必修课程。金女大 1919 年开设的宗教课程有：研究四福音书的基督生平（The Life of Christ，每周 2 学时），研究教会发展史及使徒行传的基督教之成长（The Growth of Christianity，每周 2 学时），研究旧约历史及思想的基督教之准备（The Preparation of Christianity，每周 2 学时），讲授宗教教育心理学及教授法之应用的宗教教育哲学（The Philosophy of Religious Education，每周 2 学时），研讨耶稣教训中有关当代社会重要问题的耶稣社会观及伦理思想（The Social and Ethical Teaching of Jesus，每周 2 学时），讲授旧约智能文学和希伯来诗的宗教文学课程（Lecture Course，每周 1 学时）等。② 相关宗教课程虽不希冀学生毕业后直接进行传教，却要求“给予高等教育妇女圣经背景知识，有助她们个人生命的成长，有侍奉神的心志”，强调“应用先知的信息在中国的社会里”。③

金女大作为一所教会学校，宗教课程及宗教性质的活动是它有别于其他非教会学校的一大特色。学校早期曾规定学生必须修读一门宗教课程，每天上午得参加 20 分钟的早祷，每周四晚则举行一次为期半小时的默祷会，由教师和学生轮流主持，“全体同学毫无勉强”。金女大更于 1926 年添设了宗教系，当时开设的科目有基督教人生观、历代先

---

① “Report of Ginling College” (1921, March), YDSL, UB Archives, Box154, Folder2961, pp. 600—603. 转引自朱峰著《基督教与近代中国女子高等教育——金陵女大与华南女大比较研究》，第 122 页。

② “Bulletin of Ginling College”, 1919, YDSL, UB Archives, Box128, Folder2632. 转引自朱峰著《基督教与近代中国女子高等教育——金陵女大与华南女大比较研究》，第 291—292 页。

③ 黄洁珍著，吴梓明指导：《从吴贻芳与金陵女子大学看基督教教育理念的实践》，香港中文大学宗教哲学硕士论文（未刊稿），第 173 页，1996。（以下引用该论文皆为此版本）

知言行、教会组织史、宗教心理、比较宗教学。由此可见，该校的宗教教育不再只局限于对基督教教义的传授，更设置了宗教心理、比较宗教学等具有现代宗教学专业特点的课程。学校女青年会"每星期晚间有宗教讨论，演讲者多半是本校师生，论题大都是各人对于宗教的心得或是各种训勉言辞。"此外还有日常礼拜，"主讲的多半是教师同来宾，讲题大都是社会问题和人格修养的训练。礼拜的仪式简单，大概将一半的时间都支配在演讲之上。"学生们对宗教课程的兴趣很高，可以说不亚于其他课程，她们还在校内自发成立了查经班（Bible Class），全校约有五分之四的学生自愿参加，编入名册。

不过也有许多教会方面的人士批评"金陵是忘本的学校，思想过新"，因为"一般的教师都是绝对新派"，"就平日讲授的意见而论，大概都根据基督的人格、人生观及精神等等来作耶教的真义。有时引用圣书的时候，无非将其中训语详细解释或渐渐引用到现代问题。至于他们对于传教功夫上，甚觉大方自然"；而"凡非基督徒的同学在全体中不过十之二，然他们对于宗教的态度也是极为融洽的，遇有礼拜或其他宗教事业等，莫不与基督徒一致行动。静观她们的表情，并非屈从或被限制，实因全体同学中非基督徒同基督徒从未分过界限，平时各走各的路，抱定两不相犯的宗旨，至于一切的课外事业，也据各人的才干而支配，并未有宗教的限制。"[①]由此可见，信教教师虽然在非教徒中从事传教活动，但从不对不信教的学生施加压力，而是强调校园生活的基督教因素，注意将宗教思想的灌输融会在日常生活中，对学生进行潜移默化的影响。传教士出身的教职员工均有较高宗教热忱，希望能够利用其基督教经验为学生们提供有价值的指导与信息。她们相信：尽管一个学生的思想见解是会发生改变的，但是一旦她在前进道路上坚定了信仰，就不会轻易改变自己，并终将在没有教师指引的情况下把握自我，明了自己的所作所为。

由于学校与教会的特殊关联，金女大校园内宗教氛围浓厚，信教学生比例极高：1915年入学的11名新生分属三个教会，只有一位不是基

① 肖我：《我对于金陵宗教观念谈》，《金陵女子大学校刊》，1926年3月。

督徒；1918年有四个年级学生注册时，新生中只有三四个人是非基督徒，信教学生64%来自教徒家庭(其中2位来自四代的教徒家庭，16位来自三代的教徒家庭，16位来自两代的教徒家庭，还有15位学生的家庭首度入会)；1920年，教徒数量占学校总人数的九成，全校60人中就有54人为基督徒；①到1926年，信仰基督教的学生比例为82.9%，出身于基督教家庭的占56.6%，来自基督教中学的占88.8%，而毕业后在基督教机构工作的占46%。② 金女大的信教学生可分为四类：一是"素称热心的"虔诚教徒，她们自幼生长在教会家庭，对于宗教训育耳濡目染，因此独尊耶稣教义而排他，对礼拜祈祷亦抱多多益善的态度；二是稳健派，信仰不坚定而易摇摆，对于宗教举动抱有无两可的态度；三是冷静派，对宗教事业不闻不问；四是可称为"现代中国化的基督徒"，其观念是去尽陈腐迷信和虚文缛节，专诚吸取基督教的纯粹精神和真理，"对于各宗教的主见不偏不倚，思想纯正"。③

受学校环境的影响以及周围同学的带动，少数入学时还不是教徒的学生往往读书期间才开始信奉基督教。以吴贻芳为例，入学时因遭遇家庭变故而落落寡欢的她，就是在基督徒好友徐亦蓁的影响下开始信教的，并于1916年夏在金女大上二年级时，在上海四川北路晏摩氏女中的浸礼会怀恩堂接受洗礼，成为一名虔诚的基督教徒。④

(三)引起社会关注的体育专业

在近代中国体育史上，金女大女子体育专业是全国知名学系。该校于1924年分科设系之初即设立了体育系，而1925年上海女子体育师范学校的并入，更在体育方面扩充了学校的发展力量，使体育专业成为金女大最具特色的专业之一。

---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编：《中华归主——1901—1920中国基督教事业统计》，第93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

② 朱峰：《基督教与近代中国女子高等教育——金陵女大与华南女大比较研究》，第271页。

③ 肖我：《我对于金陵宗教观念谈》，《金陵女子大学校刊》，1926年3月。

④ 朱学波：《吴贻芳》，第41页，《江苏文史资料》编辑部，1993。(以下引用该书皆为此版本)

1915年8月，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全国协会为适应各校增设体育课程、补充女体育教师的形势需要，在上海创办了一所女子体育师范学校(Shanghai Physical Training School)。学校校址始在昆山路上，后又在荆州路37号建成新校舍。该校学制两年，课程分专修与论理两种，专修如体操、游戏、运动、跳舞、拳术等各种技能之实习，论理如体功学、运动功用学、化学、测病、按摩、急救等理论。学生大都由各省官私立学校派来，毕业后仍回各自母校教学，每年卒业学生超过一二十人。[①]据《先驱》特刊称，两校学生早在1918年的一次省级运动会上就有了接触和交往，一起度过了“为数不多的快乐日子”。上海体育师范学校女生们在金女大表演节目，吸引了自称“体育在这里从来就不广受欢迎”的金女大学生的注意，她们健康的外表、活跃的精神面貌让金陵女孩很是羡慕，希望自己也能通过适当的体育锻炼来提高身体素质。[②] 金女大1920届毕业生郝映青曾担任过该校副校长之职。为使学生接受更好的课程训练，上海女青年会于1924年作出了将体育师范学校与金女大合并的决定。1925年9月，该校全部教师和二年级学生共16人及其设备都从上海搬迁来，基督教女青年会还同意在五年内每年支付5 000美元作为专门的体育教育经费，并承诺帮助招收学生，指导有关学校合理使用毕业生。[③] 这次合并壮大了金女大的实力，尤其加强了学校体育方面的专业力量，使之成为当时国内拥有最强体育专业的女子学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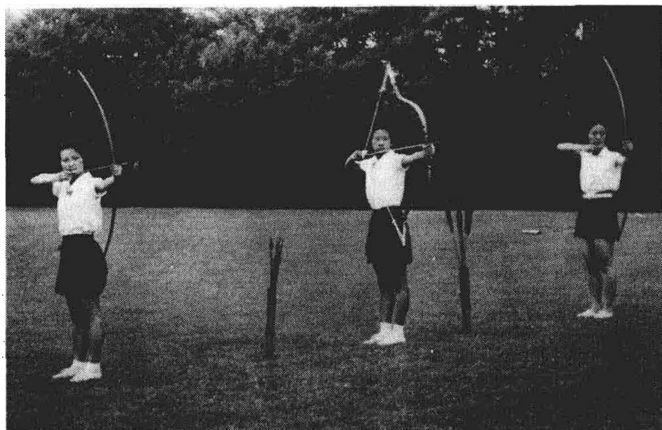


学生在体育课上学跳“土风舞”

① 中国女青年会：《中国女界须知》，第13页，1920年3月。

② Liu Gien-chiu, Ren En-dzi, Tang Hwei-dzin, Wu I-fang, Zee Yuh-tsung (the Class of 1919 Ginling College), “Achievements”, *The Pioneer*, pp. 29—30.

③ 德本康夫人、蔡路得：《金陵女子大学》，杨天宏译，第53页。



学生在体育课学射箭

为造就中小学体育师资，金女大于 1929 年添设了体育简易科，因其训练时期短，翌年秋又改办体育专修科。这样，该校体育专业就分为公共体育和专业体育两大类，公共体育为全校学生必修（即普通科），不及格者不能毕业。每个学生一至四年级期间保证每周均有四小时体育课，内容包括徒手操、田径、球类活动等各项体育训练，目的不仅在于使每个学生拥有健康的身体，免除娇弱习气及矫正坐、行、站立时的不良姿势，更欲使其养成运动的习惯，并可在任教后以应体育教员缺乏之急需。专业体育又有专修与主修之分：体育专修科学程定为两年，英文要求可适当降低，毕业后专供中小学体育师资或女青年会等社会机关娱乐指导；体育主修科学程四至五年，课程较专修科复杂，包括大学普通科之运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必修科目，及有关体育、卫生方面原理与技术，使毕业后能胜任中学、大学或专门学校之体育指导。体育设施方面，校内设有室外运动场与室内体育馆，供体育专业学生使用。①

金女大还拥有全国一流的体育师资力量，如早期师资中的谢文秋、黄丽明等人均毕业于美国威尔斯理女子大学体育专业，更有 20 年代即

① 朱峰：《基督教与近代中国女子高等教育——金陵女大与华南女大比较研究》，第 309—310 页。

担任该校体育系主任的张汇兰，后来获得过五项“中国第一”的称号：中国第一位女体育学博士、第一位女篮裁判、全国高等体育院校第一任女教务长、首位获“国家体育荣誉奖章”的女教师及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发“荣誉奖”的第一人。张汇兰曾在1924年12月的《金陵女子大学校刊》上撰文，认为体育不单是一种技术，还是教育最重要的工具，于强身健体之外更能造就良好思想，承担儿童教育的责任，女子对此也应与男子负同等之责。她还指出，女子体育师资必须具备人格、普通知识、技能知识、专业技能、自修与研究等基本素质，因此体育专业应该在四年内进行多种培训，才能达到以上素质要求。从她对中国女子体育发展认识的具体阐述中，不难看出金女大发展女子体育的基本思路。① 张汇兰的老师陈英梅则是中国首位女体育教师，1925—1930年间曾在金女大体育系任简易科和专修科主任、教师。她为人谦虚朴素，精力充沛，教学既认真又风趣，课上不仅自己亲自作示范，还专请金大体育优秀的学生来示范，以增加动作的标准性，帮助学生很快领会动作要领。学生上她的课不但秩序好，学得也愉快，有些原本不喜欢乃至不懂体育运动的学生也逐渐掌握了各项运动技能，体质大为增强。陈英梅还编写了《中小学体育活动和游戏》一书，内容丰富，是30年代初我



谢文秋



张汇兰

① 张汇兰：《中国女子体育之需要》，《金陵女子大学校刊》，1924年12月。

国中小学体育教师广泛采用的一本体育教学参考书。[①]



1937 年体育系主任陈英梅(中)和体育系其他师生

(四) 初显特色的教育学与社会学专业

华群女士任职教育学系时,力主列教育学为全校必修课,但教育系只作辅修系,不作主修系。她根据自己所受的专业训练和多年积有的教育经验,认为学生毕业后如担任教学工作,就必须懂得教育学,具备正确的教学方法,不过掌握所教知识更为重要,因此学生在校至少应选定一门中学课程为主修,再学习教育原理、教学法、心理学及实习教学等科目,经过中学实习,最后取得良好成绩后方可毕业。经长期教育实践证明,这套教学程序与标准是行之有效的,后来在中国师范院校中得以普及和推广。金女大还于 1924 年秋添设了一所实验中学(the Ginling College Practice School,最初只设高三年级一个班,后渐扩充为高级中学,并于 1933 年夏立案),作为教育系培训教师的场所,其他科系的四年级学生毕业前则在此进行为期一个

① 刘翼文:《金女大体育系教师阵容》,载金女大校友会编《永久的思念》,第 121—122 页。

月的实习，使之在掌握教育原理与方法外，还可获得实地教学的经验，也使得学校更具师范性质。

金女大强调“学习与实践结合”的教育方法。教师上课大多不用课本，要求学生自己记笔记，广泛阅读参考书，撰写报告和解题，以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学习过程中则讲究发挥实践作用，理科报告与论文必须依据实验写出，努力使学生养成严谨的科学态度。学校的特色系科之一——社会系，就特别注重课堂教学与社会实践的结合，经常就某些专题举行社会调查，进行分析研究。金女大第八届毕业生邓裕志主修科目为社会学，其毕业论文《南京锦缎工厂生产情况和工人生活福利斗争情况的调查》就是根据社会调查材料写出来的。[①] 后来，社会学系成为金女大品牌专业之一。

第四节　早期学生群体与校园生活

一、早期学生组织及课余活动

首届学生初入学校时备感孤独，因为她们当时是校园内仅有的一届学生，没有比自己高一级的学长在学习和生活上提供指导和激励，所以在经历了较长时间的调适后才逐渐步入正轨。往往来自同所中学的两三名学生组成一个小群体，其余人只能形单影孤地游离在外，除了需要在同一时间赶去上课外，各人都独自返回自己的房间。她们甚至没有建立一个班组织，后来在校长的建议下才聚在一起推选班委会主席和秘书。让教员们觉得好笑不已的是，这帮学生由于彼此间仍很陌生，不晓得应该投票给谁，最后只好根据中国尊长敬老的传统，将威信给予年龄最大的学生。有个女孩还清楚地记得自己因不熟悉学校规章条例而导致的一段痛苦经历：“学校条例规定晚七点至十点为预习功课时间，我以为它同我们中学时规定学到九点钟是一回事。每天晚上大约八点半，我

① 邓裕志：《难忘的岁月》，载《金陵女儿》编写组编《金陵女儿》，第30页。

的眼皮就开始上下打架，迫使我合上书本。我真想去打个盹，又害怕这样做会违反规定，于是我努力睁大眼睛，但一切努力都是徒劳白费。仅仅出于这个原因，我甚至一度有退学的打算，很愚蠢也很可怜，对吧?"①

第二学年的情形则完全不同，学生们期盼着开学返校，像家庭姐妹一样地团聚，她们不再只埋头于书本和局限于个人小圈子，开始将关注的视线投向周围人群及事务，从前冷漠、思乡的女孩已经成长为开朗、热情的金陵女儿了。过去一年的亲身经历使她们认识到：作为高年级学生，她们有责任对才来的新生进行力所能及的帮助，使之尽快融入到学校大家庭中去。因此第二届新生刚到校时，她们不是忙于折磨和戏弄，而是很早就着手准备欢迎新生的招待晚会。在欢乐的气氛中新生们很快就打消了生疏感，对学校产生了与首届生全然不同的第一印象，甚至从她们热忱的"前辈"身上感受到了集体的精神——一种"奇妙的金陵精神"。② 当第三届新生入学时，上届新生们就主动接过了接待任务，由二年级学生负责接待新生的传统从此便在金女大固定下来。作为回报，新生们也在欢迎会上表演拿手节目，其成熟、大方的表现常使得学长们发出"后生可畏"之慨叹。③

金女大的姐妹班制度亦由此形成：三年级学生与一年级新生结成姐妹班，不同年级的同学之间以姐妹相称，校方还安排高年级的姐姐与初来乍到的妹妹同住，一方面可使前者学会关心照料他人，另一方面也能使后者很快适应新的生活，有助于同学间形成团结互助的友爱精神，培养学生的群体归属感。每学年秋季开学之初还有一个"新生辅导周"，刚踏进校园的各届新生都必须经过新生训练，这在国立大学很少见，在金女大却早已成为惯例。新生一进校，就由教务处、训导处、总务处、校长室和学生组织分别介绍情况，使之了解学校组织的梗概及规则；带新生参观图书馆，游览校园乃至全市，帮助她们掌握利用图书资

① Liu Gien-chiu, Ren En-dzi, Tang Hwei-dzin, Wu I-fang, Zee Yuh-tsung (the Class of 1919 Ginling College), "Exploring the Unknown Forest", *The Pioneer*, p. 7.

② Liu Gien-chiu, Ren En-dzi, Tang Hwei-dzin, Wu I-fang, Zee Yuh-tsung (the Class of 1919 Ginling College), "Achievements", *The Pioneer*, pp. 23—24.

③ Ibid, pp. 27—38.

料的方法，熟悉学校及周边环境；通过校史讲述、校友会报告，使其了解学校既往的光荣历史，激励其早立宏志。另外，还召开晚间迎新会、姊妹班联欢会等交谊活动，为学生们结交新朋友创造机会。对于新生来说，她们最感棘手的问题往往是入学注册和选课手续的繁杂琐碎，然而在高年级同学的热情引导下，均得以顺利完成。低年级学生常得到高年级学生的照顾和指导，以至于毕业后历时多年，有些同学仍保持着亲密的姐妹之情。吴贻芳在论及这一制度时说："新生住的房间里一定有一个三年级或四年级的'姐姐'同住，便于在各方面照顾她们，使这些新来乍到的'妹妹'能很快习惯新的生活，也使当了'姐姐'的高年级学生学会关心照顾别人，培养了学生间互助友爱的精神。"①金女大这一特有制度对刚进大学女生的大学生活来说实为至关重要。



1922 年开学典礼学生入场

1916 年金女大有了两个班级以后，学生们变得更加成熟和自觉了，不愿再被舍监像对待中学生似的进行管理。为证明自己能够管理好自己，她们向校方申请成立了学生自治会(the Self Government Association)，选有一定服务经验的学生担任主席，后来成为该校校长的吴贻芳当选为金女大第一届学生自治会会长。学生自治会先是将宿舍监管权接管过来，由学生自己轮流监督宿舍规定的执行情况，从而向实现学生自治的理想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学生自治会组织同学自觉遵守各项规章制度，有关纪律、请假、宿舍卫生、生活和出入校门等事宜均由自治会负责管理：每晚熄灯后由负责本宿舍的自治会负责人将宿舍大门锁好，查看同学是否都已安静休息；学生各自打扫房间，轮流整理宿

① 吴贻芳：《金女大四十年》，载《吴贻芳纪念集》，第 111 页。

舍交谊室，以便养成节俭和自理的生活习惯；学生出入学校时要在出入签名簿上自动签名，晚上必须在十点以前回校，如因故过了时间才回来，第二天早上得向学生自治会负责人说明情况。① 学生自治会除安排与维护校园日常生活，督促同学们自觉遵守校规外，有时也代表学生向校方反映意见。例如，以往学校浴室的门除开放时间外是一律上锁的，同学们认为“这是对我们的不信任，我们是不会违反规定去洗澡的”，经学生自治会与校方交换意见后，学校同意取消锁门的规定。②

1919年3月，学生自治会经与教员委员会商议，在对其规章作出一定修改与完善后，校方将管控该组织的特权完全交给学生，女孩子们感到由自己对学生集体福利负责的那天终于到来，“经过两年时间的训练，我们并不觉得被这种责任所困扰；我们准备好去承担它，并决定为这一理想的全面实现而努力。”这年年底，学生因不满于宿舍管理状况，呼吁学校撤换女舍监，校方经过慎重调查与考虑，最后采纳了学生的意见，女舍监被迫辞职。学校在学生宿舍管理方面也加以调整，作出了一些新安排。



1920年全体在校生

1924年，因学生人数大幅度增长，学生自治会订立新章程，标明其宗旨为：“本会之宗旨，为制定及执行本会之一切条规，管理学生自治事件；及谋所以养成健全公民之方法。”③与其他教会大学相比，金女大作为女校，采取了信任学生、培养学生自治生活的教育方式，鼓励学生自觉培养良好素质与习惯，除培养学生尊重个体的独立自主精神，还将

① 吴贻芳：《金女大四十年》，载《吴贻芳纪念集》，第111页。

② 邓裕志：《难忘的岁月》，载《金陵女儿》编写组编《金陵女儿》，第30页。

③ 严彩韵：《“绣花巷时期”的金女大学生生活概况》，载金女大校友会编《永久的思念》，第102页。

道德感的训练融合在日常生活的教育中。

为了不被学校高墙囿于自我的小天地中，金女大于建校后积极举办活动，召开集会。1915年末，学校举行了第一个创始人纪念日的庆祝活动，这成为校史上的头等大事。学生们事先学唱了歌曲，还准备了两面各写有中、英文的班旗，紫色和白色被选为班级的颜色(后来也成为金女大校色)。她们设计的班徽是一柄斧子同一把凿子的交叉图案，代表着艰辛的开拓与垦荒。那天，师生们第一次聚首于同一张桌旁，不拘礼节地交谈，在上菜间歇唱歌。历史老师诺·玛丽小姐向学生们娓娓讲述了当初学校创始人筹划、创建这所女子学院的情况。这次聚会带给学生的不单是一段快乐时光，更使她们省悟到自己对学校所应承担的责任：金女大不是早已建成、可供继承的，必须由她们自己亲手加以创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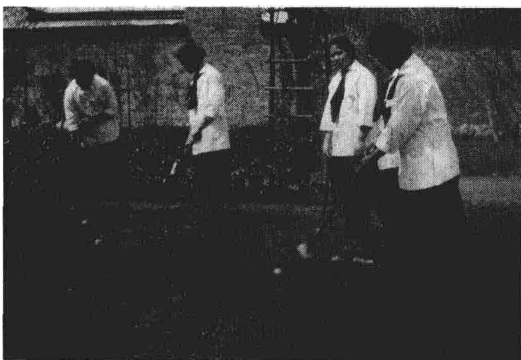


学生文艺演出

1916年5月9日，金女大为进一步扩大自己的社交范围与社会知名度，曾邀请南京其他高校、女子中学以及南京所有中级以上学校参加相关集会。会上，郭秉文博士以《妇女高等教育的重要性》为题作了演讲，金陵大学新校长包文博士(Arthur J. Bowen)亦发表讲话，述及金陵办校目的与打算，使学生们认识到妇女是否值得接受高等教育，金陵

能否实施其目标宗旨——都是需要她们不光用语言，而是用生命回答的问题。[①] 同年底，女青年会又为全市高中的三年级学生安排了一次娱乐招待会，因为学校与其他中学相距甚远，所以此次联谊为该校女生同大群女孩交往提供了良好的开端。校方也尽量为学生创造与来自其他学校的同龄人联络接触的机会，女孩们甚至和美国大学的女生互寄卡片、信件，交流校园信息，以增进彼此间的友谊。

学校认为参加各项课外组织不仅可以极大地丰富精神生活，还可以砥砺学行，养成公民习惯及团队协作精神。每逢假日，校方总要组织师生出去郊游远足，放松身心，近的如玄武湖、莫愁湖、紫金山、栖霞山、燕子矶等当地风景名胜，远的则到过采石矶、泰山、曲阜等地，充分感受自然美景。一次，有位学生在游览了十二台洞后记下了这段美好经历："春天大自然的壮美景色以及我们在溶溶月色下划船回家的情形真是令人心旷神怡之至。船上宁静的辰光，为在一天的自然享受之后进行冥想与沉思提供了难得良机。"[②]金女大校园里除联谊会、迎新会、欢送会、茶聚等定期集会外，还时常举行歌舞表演、诗歌朗诵、演讲辩论等形式的文娱活动，班级间每学期都举行球类比赛，它的音乐会和戏剧演出在南京很有名气。此外，学校还举办工人夜校、暑期平民学校等许多有意义的社会服务事业，为学生接触、了解社会，锻炼工作能力和培养献身社会服务的精神提供了实践机会。来金女大听音乐会或是参加学生社交娱乐活动的人常称赞



金女大学生在打门球

① Liu Gien-chiu, Ren En-dzi, Tang Hwei-dzin, Wu I-fang, Zee Yuh-tsung (the Class of 1919 Ginling College), "Achievements", *The Pioneer*, pp. 20—22.

② Ibid, pp. 25—26.

她们是一群富有社会责任感、充满活力与朝气的女孩，许多教堂负责人也极力褒奖她们乐于助人的美德，但学生们自知所做的还很不够，她们用于服务的时间还很有限。

金女大定“厚生”(Abundant Life)为校训，它取材于《圣经》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中“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我来不是要人服侍我，而是要服侍人的。”意为人生的目的不光是为了自己活着，而是要用自己的智慧和能力来帮助他人，造福社会，这样不但有益于别人，自己的生命也因之而丰富，即“施比受更为有福”的精神。[①] 德本康夫人曾对此进行过专门诠释：“‘厚生’就是在各方面得到至善至美的发展。在多项发展中，学生人格的塑造，基督生命的培育至为重要。获取丰盛生命的学生才懂得为人类社会多作贡献。”[②]学校以“厚生”为目标来教导学生，并在学校生活的各个方面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引导学生朝此方向努力。校训“厚生”成为金陵人精神的源泉。

学校外面的人由于不了解金女大，“见本校校舍富丽堂皇，遂怀疑本校同学趋尚奢华”，强加给她们“贵族式女子”的头衔，但金女大学生素以扶助贫困妇孺为己任，热心社会服务，时刻不忘自己对国家、大众的责任。该校学生课余时间从事社会服务事业的历史可说是与学校同时产生，1916 年即成立的基督教女青年会(the Young Wo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是一个以基督教精神为基础的学生组织，始建时仅有正、副主席及秘书等三名成员，很快便发展为学校宗教生活和社会服务的主要负责机构。它往往在开学后一个月内即召开就职会议，宣告其组织方针，使新来者对学校的宗教、社会活动有所了解，委员会成员也真诚地邀请新生加入协会。此外，女青年会还积极组织安排校际联谊会、全校师生野餐郊游，协助一些教堂举办礼拜学校，以及帮助妇女社会服务团工作等。

女青年会最初通过造访学校周围的农民及小手工业者家庭，约集

---

① 吴贻芳：《金女大四十年》，载《吴贻芳纪念集》，第 111 页。

② Wang Shuh-hi, "Our Mother's Ideals and Aims, and My Appreciation of Her", *Ginling College Magazine*, p. 16, June, 1928.

其子女参加礼拜天下午为他们举办的邻童主日学校(Sunday School for Neighborhood Children),这成为金女大学生进行社会服务工作的小小开端——每逢礼拜天,学校总是聚集了一大群孩子,在一起唱歌、讲故事、玩游戏。当在此服务的学生进而了解到,邻居中有上百名学龄儿童因家境贫寒无法上学,即使少数上了学的,也只能在旧式私塾里读《论语》、《三字经》之类的书时,就产生了为附近失学儿童开办一所小型现代化学校,专门吸收他们来校识字读书的想法,结果此议在女青年会会议上一经提出讨论,便得到大多数人的赞同。1917 年 2 月,一所社会慈善性质的初等小学——培幼小学正式开学,并得到德本康校长的极力支持。它借校内东花厅南面的两间小厢房作教室,置备了 20 套桌椅及国民小学应用图书等,"因当时无专任教员,只就 15 位同学中择一人为校长,总理一切,至于功课则由两级同学 15 人分别轮流担任,书籍等费概由同学供给。"1920 年小学由半日制改为全日制,男女兼收,聘请了专职教师,学生们则于必要时助理教学及校务。从 1921 年起,其经费全由女青年会支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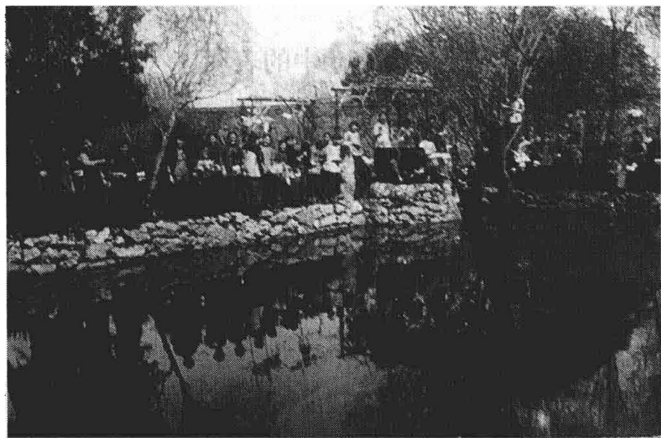
半日学校的学生放学了



金女大学生义务教邻里儿童学棍操

管理。金女大迁入新校址那年培幼小学停办，次年2月继续开办，女青年会在全校师生中发起募捐，用募得的钱购买了与大学相连的两亩土地，在上面为小学兴建了包括两间教室、一间阅览室和一个食堂在内的校舍。小学每学期应缴学费虽低，但无力缴费者颇多，书籍亦由学校供给。[①] 学校还设立了一个医务室为邻里的老弱病残及儿童服务，校医负责治疗，由学生担当助手。同学们在助人为乐的同时也学到了不少医药常识。

合唱团(Glee Club)也是学校最早成立的组织之一，起初由除两人之外的全体学生组成，对其成员未作特别要求，但同样在社会上为金陵赢得了广泛的声誉。1916年冬它举办了第一次音乐会，节目由赞美诗和器乐演奏组成，同一节目被再三要求重演，表明这场音乐会开得非常成功。[②] 合唱团的演唱很有特色，一般为女声三部合唱，有时也由师生将歌曲改成四至五个声部合唱。每逢校庆周年日、宗教节日或是校方举行公共聚会，合唱团出场表演已成为会场上一道不可或缺的程序，不少教堂也时常邀请学生们在特殊集会或礼拜仪式上一展歌喉。



1917年金女大举行灯会

① 裕生：《培幼小学之经过及现状》，《金陵女子大学校刊》，第31—34页，1924年12月。

② Liu Gien-chiu, Ren En-dzi, Tang Hwei-dzin, Wu I-fang, Zee Yuh-tsung (the Class of 1919 Ginling College), "Achievements", *The Pioneer*, p. 26.

1918—1919学年间，三、四年级学生成立了英语社（English Club），目的在于练习英语会话、阅读及朗诵，后来又分成戏剧组（Dramatic Club）、诗歌朗诵组（Poetry Chorus）和木偶组（Puppet Show）等三个小组，通过演戏、背台词和诗朗诵来加强学生的口语练习。演讲班则于1919年举办了中国文学社（the Chinese Literary Club），除锻炼清晰优雅地讲话外，还练习写作和翻译。① 校内更有各级级会以及"由兴趣相同者集合"而成的各种学会，"种类既多，活动情形则视参加分子而定"。②

1924年创办的《金陵学刊》（*Ginling College Magazine*），是一份以中、英文两种文字出版发行的季刊。它内容广泛，不仅载有散文、诗歌、时论等形式的学生习作，校庆特刊及某某届毕业生专刊，有关学校经费、建筑、科系方面以及各组织、学会动态的情况通报，还囊括了聚会、出游、捐赠、友好往来、同学近况等各种消息。《校刊》忠实记录了金女大前进历程中的点点滴滴，汇聚成一部完整而细致的学校发展史。

二、历次政治风潮与社会变动中的表现

早期金女大学生大多曾在教会女子中学接受过教育，且多半来自政府公务员或工商界信教家庭。受家庭出身及社会环境的影响，女孩们往往有不问政治的倾向，以至于在其他各校学生中有"冷血之雅号"。金女大以发展女子教育为己任，不过受美国19世纪以来自由主义妇女运动的影响，校方所提倡的女权是以崇尚服务工作为指导思想，对于对抗性的社会运动多采取回避态度，因此校内比较缺乏进步的政治空气，"稳健主义"是该校在各项运动中表现的基本特点。但事实表明，学校不可能成为摆脱政治影响的象牙塔，历次重大革命、政治运动仍不可避

① Liu Gien-chiu, Ren En-dzi, Tang Hwei-dzin, Wu I-fang, Zee Yuh-tsung (the Class of 1919 Ginling College), "Achievements", *The Pioneer*, pp. 32—33.

② 郝映青：《本校概况》，载金女大校友会编《永久的思念》，第98页。

免地波及到这里，学生纷纷参与群众行动并开展社会服务活动。金女大的英美籍教师均属于基督教中较为开明的社会福音派，非但讲授包括达尔文进化论在内的自然科学，也传播资产阶级的民主思想。她们虽不希望学生参加政治活动，但也不会强加制止。学校在历经各种政治、经济危机及战争威胁后，仍保持持续发展的趋势。

金女大创建之际，正处于袁世凯阴谋复辟的"假共和时期"。学校首届毕业生曾在《先驱》特刊中述及她们对时势的担忧："之所以说是假共和，因为当时议会已遭解散，政府不再具有代表性，人民对它充满了怀疑和惶恐。大总统袁世凯是个极端迷恋权势和渴望王位的人，他对权力的绝对掌握令人生畏。京城里正在修建城墙、寺庙和宫殿，到处是复辟的景象。人们生怕被特务盯梢，唯恐因为发表了反对王权的言论而遭逮捕，并在一两天的时间里就被秘密处决掉。"[①]在复辟蠢蠢欲动、民主横遭践踏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女子高等教育的命运更是岌岌可危，前途未卜。因此一个问题反复地在她们脑际盘旋，她们不断自问："我这个时候到金陵来，到底是为了什么？"经过认真思考，她们对此作出了如是的回答："我们到金陵来就意味着准备拯救和获取力量，要全身心地奉献出所有的一切，如有需要，甚至不惜付出自己的生命，为的是丰富我国孱（孱）弱无助之女界，俾国内不识不知的女性因而获救。"不久，袁世凯公然冒天下之大不韪复辟称帝，又很快在全国人民的唾骂与声讨中死去。消息传到金女大，同学们无不欢欣鼓舞，学生自治会自动组织全校学生集会庆祝。吴贻芳作为学生自治会会长在会上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讲，有理有据地胪陈袁世凯种种罪状，博得了全场的热烈掌声。[②]

1918年春，一次位于学生宿舍晒台下的厨房储藏室不慎失火，火灾对整个学校的安全构成了威胁。全体师生、员工都顾不上回宿舍抢救自己的衣被，而是到处寻找木桶、铁皮桶以及一切可用于灭火的工

---

① Liu Gien-chiu, Ren En-dzi, Tang Hwei-dzin, Wu I-fang, Zee Yuh-tsung (the Class of 1919 Ginling College), "Among the Thorns", *The Pioneer*, p. 10.

② 朱学波：《吴贻芳》，第 4 页。

具,组织起一条传水线传水灭火,半小时后终于将大火扑灭。经过这场危机,大家都更加意识到老房子的珍贵与重要。然而空前的危难接踵而至,刚从火灾中幸存下来的金女大又遇上更严峻的考验:一场疫病空前流行,有几个人感染致死,许多学校被迫关闭,沪宁铁路也停止营运。金女大所有大门都上了锁,大门口则设置了警察,在封闭校园的两周时间里,学生们在教职工的照料下消除了忧虑,不但继续照常学习,而且过得很充实,不出校门便可在后花园里欣赏到户外怡人的春光。她们无不为自己的学校感到骄傲,因为金女大是当时少数几个未因疫病而停课的学校之一。

让金女大师生们更为担惊受怕的是动荡不安的国内时局,在那个兵荒马乱、危机四伏的非常时期,"我们犹如站在一座火山顶上,不知危险将于何时来临。金陵成立于民国尚未完全建立之际,因而根本无法预料明天将会发生什么。"①疫病带来的危机过后几个月,又传来了北方士兵向南京推进的可怕消息。当时南北方省份之间发生内战,大批北方军队被遣南下同南军作战,驻守南京的江苏督军李纯抵制了北方的拉拢而保持中立,派士兵到浦口加以警戒。幸运的是北军慑于这种戒备而最终撤退,使得学校工作未经中断而继续进行。金女大首届学生在《荆棘丛生》一文中回顾了上述往事后说,她们为金陵不仅未被刺人的荆棘所伤害,还学会冷静和忠诚而感到高兴,前面的危险也给她们每个人上了很好一课。文章最后还引用了诗人亨利·范戴克(Henry Van Dyke)的一首诗来表达自己的感受,诗中写道:"让路像山那样蜿蜒起伏,无论艰险还是平坦,都会是愉快的旅途:新的友情、极度冒险以及胜利花冠。我的心将永葆探索与追求的勇气,期待着道路尽头会有最迷人的风景。"②

1919年五四运动兴起,北京学生举行了反对北洋政府出卖国家主权的示威游行活动,得到全国各界的积极响应。运动于5月底6月初

---

① Liu Gien-chiu, Ren En-dzi, Tang Hwei-dzin, Wu I-fang, Zee Yuh-tsung (the Class of 1919 Ginling College), "Among the Thorns", *The Pioneer*, p. 10.

② Ibid, p. 11.

波及南京，金女大学生希望通过自己的加入，来增强学生运动的联合力量，并利用这一危机进行社会服务，藉以唤醒大众。当时正值金女大首届学生即将完成学业、面临毕业之际，因学生自治会响应社会号召，作出了参加罢课的决议，学校不得不让学生按其全体决议行事。但四年级学生如果也参加罢课，势必会影响毕业，可她们坚决要求与全校同学一致行动，并毅然中止了毕业考试的准备。那时德本康夫人正好打算去美国募集建校经费，作为校长，她十分犯愁：怎样才能为一个没有毕业生的大学募到捐款呢？吴贻芳、徐亦蓁等人向她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和要求，希望能够取得校方的理解。尽管德本康夫人不主张学生中断学习上街参加游行，但由于学生们的坚持，她最后采取了默认的态度，并未强行制止。

全校学生参加了南京市大中学联合会，走上街头请愿抗议，又任命了一个七人委员会，制定出一份排有日常时间表的特别计划。计划于6月2日开始实施，分成演讲、工商、普及教育、调查、音乐和艺术六个小组，上、下午各工作四小时。学生们全都精力充沛地投入工作，通过编写壁报，写通俗讲稿，上街宣传演讲，组织儿童来校识字唱歌，组织妇女识字班、缝纫班等形式，对附近的妇女儿童进行爱国主义宣传。当时离学期结束只剩下两三周时间，她们甚至决定在学校放假后继续这项工作。金女大教师也为学生的精神和行为所感动，不仅积极撰写文章、通讯，向国外宣传中国学生的爱国运动，还对学生进行慰问，表演了晚会节目。① 毕业班的女孩们坦然面对社会上对她们推卸学生义务的指责，甚至准备放弃令全校师生期盼已久的毕业典礼，因为她们觉得自己“所做的这一切都是我们作为民国公民应该做的”，所以只能对远道而来为中国妇女教育事业操劳的教员们心怀歉疚。她们投票决定在夏天完成所学课程，并要求获准于秋季举行毕业考试。校方尽管对此感到失望，却不得不面对现实，宣布学校将于原订举行考试的那天关闭。

罢课两周后，这场政治危局出现转机，北洋政府迫于压力将曹汝霖等人撤职，学生自治会认为罢课目的已部分达到，经慎重讨论后决定复

① 吴贻芳：《金女大四十年》，载《吴贻芳纪念集》，第114页。

课。于是，一年一度的学年考试推迟两天半后得以继续进行。教师们忙着准备毕业典礼，学生们紧张地复习迎考，毕业班学生更是抓紧一切时间补习、撰写论文，不但修毕了课程，还顺利通过了毕业考试。6月14日晚，全校师生为毕业班学生举行告别晚会。“有人评论说，这个夜晚是我们最独特的一次班日。是的，我们从一开始就注定是个独特的班级，甚至连结束时也是非同寻常的。”她们在会上发表的告别演说中提到，如同观赏一次精彩绝伦的落日景象。有人说：“没有周围云彩的映衬就不会有落日的壮丽辉煌，落日本身是美丽的，而乌云背后金光闪耀的景象更为迷人，太阳在那些黑色背影中沉稳落下，就此结束其一天的历程，但不久又会重新开始它另一天的历程。当1919届毕业班的大学历程行将结束时，国家的职责、社会的职责、学校的职责和家庭的责任，就是其头顶上的遮挡之云。尽管意识到她还不能完全担负起生命中一切相关的责任，但凭着由上帝指导其历程的信念以及拨云见日的信心，金陵师生们确信1919届毕业班将抛却身后的一切，朝着理想和目标继续努力前进。”①



德本康校长同首届毕业生合影

在6月25日风和日丽的早晨，学校举办了庄重而简单的毕业典礼，五名毕业生在少数友人的出席见证下，第一次在中国女子大学取得学士学位。在那个庄严的时刻，金陵开拓者们的脑海中一定浮现出四年前9月17日的凉爽秋晨，一小群师生聚集在小教堂里举办开学仪式的情景，当初微不足道的开端现在已然结出果实。作为华东地区首批

① Liu Gien-chiu, Ren En-dzi, Tang Hwei-dzin, Wu I-fang, Zee Yuh-tsung (the Class of 1919 Ginling College), "Achievements", *The Pioneer*, p. 36.

高校女毕业生、中国极少数经过挑选而接受正规高校教育的妇女，低年级学生向她们投来钦羡的目光，朋友和家长都为她们感到骄傲。不过她们面对社会现实仍保持着清醒认识："当了解到当今中国每千名适龄女童中只有三人才能上学时，我们还会为此而自豪吗？如果我们为自己优于他人的特权和幸运而沾沾自喜的话，那么金陵的大学教育根本就不值一文。作为一个班级，我们仍坚信自己的理论：不断超越。我们所取得的仅仅是最基本的一步，我们认识到等待我们的生活测试与考验，要比学校里的考试更为繁忙；我们知道比起为了一些难做的功课而熬夜来说，会有更多的不眠之夜；比起我们在短短四年内所学的一点东西来说，将会有多得多的东西去学。尽管还会出现更加复杂和不满现状的情况，但肯定会有更多的毕业典礼，每个人都会比现在更好。"①

20 世纪 20 年代中期实乃多事之秋。1924—1925 年，南北方军阀为争夺地盘在苏浙地区爆发了多次争战，1924 年学校原定于 9 月 11 日开学，受战事影响不得不推迟至 9 月 20 日。尽管金女大处于遭受败兵打劫的阴影之下，教员们仍继续从事教学工作，兢兢业业地完成自己的主要职责；学生们相信教师对于形势的判断，没有时间和精力去作无谓的担忧。但第一学期刚结束时又爆发了第二次江浙战争，一些学生被迫回到家中，第二学期的学生注册人数因而有所减少。第二学期尚未结束，1925 年 5 月 30 日上海又发生五卅惨案，日本纱厂的资本家枪杀工人领袖顾正红，英国巡捕枪击并逮捕示威游行的工人和学生，从而引发了席卷全国的罢工、罢课、罢市浪潮。金女大学生一开始分为两派，后来学生自治会通过决议，加入全市 21 所大中学校组织的学生联合会，到英国大使馆门前举行示威游行，还把节约下来的伙食费汇寄给上海学生联合会，以示对工人斗争的支援。② 学生还成立了爱国团，其成立纪事曰："我校同学自五卅惨案以来，莫不痛心疾首而欲谋为亡羊补牢之策。顾今日学生所视为可以救国救民之要图，不过游行演讲捐

① Liu Gien-chiu, Ren En-dzi, Tang Hwei-dzin, Wu I-fang, Zee Yuh-tsung (the Class of 1919 Ginling College), "Seeing the Vision", *The Pioneer*, pp. 38—3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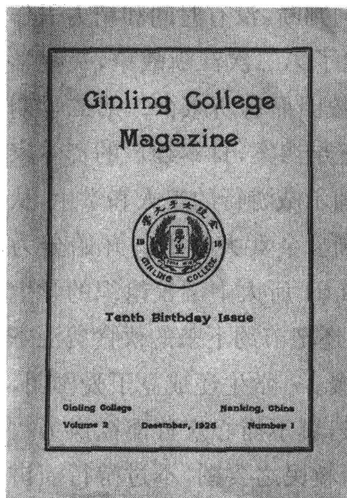
② 吴贻芳：《金女大四十年》，载《吴贻芳纪念集》，第 114 页。

款等事,此数者大都激于一时义愤,功效微末,且劳民伤财,父老疲于捐助而又司空见惯,或为血气之勇,甚且指为受党人驱使,譬之为洪水猛兽。我同学有鉴于此,屡思有所作为,为永远爱国救民之策。"该团下设国货调查部、平民教育部、制国歌部、管理阅报部,由各部具体制订以推广国货、平民教育为主要内容的行动计划。制国歌部所作《满江红》歌词表达了金女大学生的爱国情怀,词云:

荆棘纵横伤国事,壮怀激烈。空相负,锦绣河山,几多豪杰。日色昏暗鸟哀鸣,白骨苦寒谁死节,看平原处处染腥红,英雄血!

五九耻,犹未雪,五卅恨,何时灭。要外抗强权,内除国孽。胡骑遍地烟尘,情关家国兴亡切,是谁道巾帼不英雄,无高节!①

不过运动中金女大的教学工作也深受影响。学生们在离开课堂三天后意识到,应该利用课余时间给予学生运动尽可能的支持与帮助,自己则可以通过完成学年课程的形式来传达一种更为现实的爱国主义。她们忠实地信守诺言,完成了所有课程,让教师们深感满意。虽然不能完全按照常规方式进行教学,为完成期末考试还不得不将学期延长了三周,但金女大比其他学校显然要幸运得多,因为它毕竟在紧张的局势下完成了自己的年度教学计划。是年11月初,学校迎来了自己的十周年校庆纪念日,鉴于当时存在的种种不稳定因素,庆祝活动无法大规模举行,只邀请了校友和师生在校内出席参加。曾像兄长一样给予金女大慷慨帮助的金陵大学校长包文



金女大十周年纪念刊封面

① 《附爱国团成立纪事》,《金陵女子大学校刊》,第22—26页,1926年6月。

在会上发言，他从自己的视点出发回顾了金陵所走过的开拓性历程，热情赞扬了它自建校以来10年间所取得的骄人成绩。金女大校友们向母校捐献了总价值为1 000美元的礼物，学校还收到许多来自国内外的问候信函，接受了刚度过50周年校庆的史密斯学院1 500美元的捐款。①

1926年3月，又爆发了一次大规模全国学生运动。当时八个列强国家联合向中国政府发出最后通牒，要求维护《辛丑条约》中赋予外国军队的特权，段祺瑞政府答应了这一要求。消息传出后，北京学生组织了爱国示威游行，反对段祺瑞政府对外屈膝投降，结果遭到当局的血腥镇压而酿成惨案。南京学生也上街游行，但金女大学生这次没有卷入其中，而是制订实施了一份爱国纲领，确定了尽量使用国货，拒用洋货；阅读报纸，关心时事；定期举行爱国的教堂服务活动；邀请有关人士来校讲演等四个具体目标。学校每天举行轮番肃立的庄严仪式为中国国运祈祷，而非机械地向国旗致敬。7月，广东国民革命政府开始挥师北伐，北伐军向两湖地区顺利推进。11月，由学校师生各自推选出一批人组成教工学生联合会议，负责讨论和处理学校生活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师生间的感情也因之更为融洽。她和其他中国教员都认为形势还没坏到必须撤离妇孺的地步。

1927年3月，当国民革命的风暴真正席卷南京时，还有近百名学生、24名教职工(其中有15名西方人)以及约50名工友留在金女大校园内。当时“枪炮之声不绝于耳，本校同学仍镇静读书，晚上团聚科学室以便照应，教员等尽保护治安之责。”南京城秩序因失控而出现动乱，发生了多起士兵拦路抢劫、乱民趁火打劫的事件，国民革命军也曾数度“造访”金女大。大部分教会学校不得不停课，金女大所有外籍教员也被疏散到上海，正常的教学秩序完全被打乱。为使学生们免于失学，校方从全国各地聘请了一批中国教授，利用暑假开办补习班，为学生补了六个星期的课，上海校友会也特派刘剑秋、邓裕志和严莲韵三人回母校协助管理，以应付非常局面。刘剑秋为总管兼保健教师，邓裕志负责学

① 德本康夫人、蔡路得：《金陵女子大学》，杨天宏译，第60—61页。

生生活，严莲韵掌管学校教务，直到补习班结束为止。[1] 这样，一个由校友、教职工和学生组成的特别行政委员会就承担起学校的行政责任。后来，金女大成立了中国国民党区党部，“也有同学担任市党部妇女部的秘书及干事”，学生们参加了各党部或协会的成立、游艺大会，并在南京市党部妇女部发起的农妇运动中取得第一名的好成绩，获得一面写有“实践厚生”的奖旗。[2]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金女大于 9 月 22 日如期开学，有教职员 22 人，学生 97 人，[3]且各项事务有条不紊，中外教师合作无间，金陵又一次安然度过难关。事后，华群在写给纽约委员会友人的一封信中说：“金陵不会也不可能倒下，因为她年轻的根已深扎于对她忠心耿耿的师生与校友心中。”[4]德本康夫人也在退职演讲中特别提到：“当前不久学校遭遇到历史上最为严峻的考验时，我们看到人人立场坚定。正因为有信徒和师生们的无限忠诚，校友们的无比忠诚，以及国内外友人的持久忠诚，金陵才得以从战争风暴的袭击中幸存下来。”[5]

---

① 李葆真：《爱母校至深至长的严莲韵》，载《金陵女儿》编写组编《金陵女儿》，第 35—36 页。

② 云英：《国民革命中之金女大》，《金陵女子大学校刊》，第 36—39 页，1927 年 12 月。

③ “A Contour History of Ginling College, 1915—1940”，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六六八/26。

④ “Vautrin Correspondence”, Archives of the Christainity Higher Education Union of Asia in the Yale University, New Haven, Ct.

⑤ Mrs. Lawrence Thurston, “Address by the Retiring President”, *Ginling College Magazine*, p. 7, 1929.

第三章 “本土化”运动与金女大

第一节 吴贻芳出任校长

一、本土化运动的背景

自中国新文化运动开始后，面对中国被列强分割的危险，中国知识阶层对于以基督教为中心的西方文化的渗透显得十分敏感。1922 年 4 月 4 日，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第十一届大会在北京国立清华大学召开。由于这次大会宣传声势浩大，激起了中国知识阶层的反对浪潮。在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开会前一个月，上海各校学生便成立了“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并通电全国学界抗议在清华召开基督教学生同盟会议。3 月 9 日，他们公开发表了《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宣言》，宣言指出：“各国资本家在中国设立教会，无非要诱惑中国人民欢迎资本主义；在中国设立基督教青年会，无非要养成资本家底（的）良善走狗……‘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为现代基督教及基督教会的产物，我们预备于本年四月四日，集合世界基督教徒，在北京清华学校开会。所讨论者，无非是些怎样维持世界资本主义及其怎样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把戏。我们认彼为污辱我国青年、欺骗我国人民、掠夺我们经济的强盗会议，故愤然组织这个同盟，决然与彼宣战。”①此举得到了北京、广州、南京、杭州、长沙、厦门等地的积极响应。1924 年 4 月，广州发生圣三一基督教学校开除学生领袖事件，在国共两党的共同推动下，非基督教运动再度掀起高潮，并

---

① 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第 354—355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将运动引向反对教会教育、收回教育主权的目标上。同年10月,全国教育联合会第十届年会,通过了"取缔外人在国内办理教育事业案"及"学校里不得传播宗教案"两大议案,使收回教育权成为全国一致的舆论。[①] 五卅惨案后,民族主义浪潮席卷全国,在全国舆论的压力之下,北京政府教育部于1925年11月颁发布告,制定了六项"外人捐资设立学校请求认可办法",掀起收回外国教会学校教育权的运动。

20世纪20年代中期,中国掀起的收回教育权的浪潮很快波及到了南京。1926年7月,广东国民政府开始北伐,北伐战争由此拉开了序幕。1926年底至1927年初,当北伐军推进到长江流域时,在上海、南京等地的外国机构出现了恐慌。一些青年学生也受到了外部思想的影响,导致许多基督教学校的师生关系紧张。金女大也不例外。在1926年秋季学期将结束时,"一些学生被鼓动起来,她们向教职工提出'要求',结果,教职工对她们提出的一些合理的要求表示愿意加以考虑。重组学生组织的风声也传开了……一些人被教工和学生推选出来,组成教工学生联合会议,负责讨论所遇到的问题。"[②]在这种形势下,德本康夫人并不显得过分担心,她认为"学生们都很高兴。我们很难想像在湖南省发生的那些事,我也不相信金女大也会遇到那样的遭遇。金女大在教会外有很多朋友,外面的人大多认为我们是进步的学校。我相信我们能比其他学校更容易适应新政府的统治。女校比男校好多了,没那么狂野——女孩子要比男孩子文明得多。"[③]

然而,金女大管理委员却没有德本康夫人那么自信,而是表现得较为慎重。1927年2月10日,Miss Bender致信给美国的金女大托事部,就增加中国人在金女大管理委员会中的职位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并提出"各委员会的主要席位应尽快交给华人代表",将章程中"所有基督教会(Evangelical Churches)的成员"改为"所有信仰基督教(Professing Christians)的成员",明确规定校长有任命所有中国教职员和代课

① 顾卫民:《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第406—40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② 德本康夫人、蔡路得:《金陵女子大学史》,杨天宏译,第63页。

③ "The Letter to Miss Hodgo form Thurston"(1927,Feb. 2nd),YDSL,UB Archives,Box143,Folder2844.

教师的权利等提议。① 显然，金女大管理委员会的这些提议，主要是为了适应中国政府的要求，以应对国民革命的新形势。

1927年5月，正当南京还处于不稳定状态时，金女大的校董会和执行委员会在上海召开会议。由于教会组织发生的巨大变化使与会人数有所减少，因此会议决定选举一个新的执行委员会。在这次会议上，还选举了金女大第一届毕业生徐亦蓁为执行委员会主席。



徐亦蓁

徐亦蓁(1894—1981)，江苏昆山人，其祖父是一位基督徒，在昆山主持教会工作；父亲是上海圣约翰大学历史和文学教授；母亲精通古典文学，曾任昆山浸礼会女子学校校长，并从事组织孤儿院、管理乡村卫生及助产士训练所等工作。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及家庭的影响下，幼年时的徐亦蓁即遍读“四书”、“五经”。16岁时，她毕业于上海市晏摩氏女中。在此后的五年中，她从事家庭教师工作。1915年，金女大首次招收学生，徐亦蓁幸运地成为首批八名学生中的一员，主修历史，副修心理学。四年后，她成为金女大第一届五名毕业生之一。1919年徐亦蓁毕业后，先后在东南大学和北京高等师范学院任教。

1922年，徐亦蓁赴美留学，进入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主修教育行政学，副修心理学。1923年夏，徐亦蓁顺利通过论文答辩，获得教育学硕士学位。此后，她返回中国，在上海从事教育工作，主管盲童学校、教会免费学校及孤儿院等。

徐亦蓁当选为金女大执行委员会的主席，标志着金女大的本土化拉开了序幕。

---

① “The Letter to Miss Bender to Membera of Ginling College Committee” (1927, Feb. 10th), YDSL, UB Archives, Box124, Folder2592, pp. 0997—0999.

二、吴贻芳应聘出任校长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前后，全国各教会大学本土化运动的步伐进一步加快。面对全国收回教育主权的呼声，外国教会也被迫对此作出回应，决定尽可能让中国人担任各级教会学校的校长，同时淡化宗教课程，并向中国政府立案注册。当时全国基督教大学共计有震旦大学、东吴大学、圣约翰大学、之江大学、华西协和大学、武昌华中大学、金陵大学、华南女子文理学院、沪江大学、湘雅医学专门学校、岭南大学、燕京大学、福州协和大学等14所教会大学。从1927年开始，各教会大学纷纷改革，各大学校长相继改由中国人担任。如钟荣光被聘为岭南大学校长，陈裕光被聘为金陵大学校长，杨永清被聘为东吴大学校长等。在这一背景下，金女大第一任中国人校长人选也被提上议事日程。

在徐亦蓁当选为金女大执行委员会的主席后，“在华教工中的外籍教员，包括校长，向学校提出辞职，希望学校能体谅她们的苦衷，她们这样做，对执行委员会来说，是最好的决定。她们做出这一决定并不是她们不愿意继续为金陵工作，而是为了推进学校行政机构的调整，促成一个中国人领导下的新的行政机构的产生。这一重新调整之所以必要，不仅是保证学校通过官方注册的需要，而且也是为了跟上时代的步伐。”①在这一状况下，学校执行委员会通过投票决定邀请金女大第一届毕业生吴贻芳接替德本康担任金女大校长之职。当时提议出任金女大校长的人选有



吴贻芳校长与徐亦蓁

① 德本康夫人、蔡路得：《金陵女子大学史》，杨天宏译，第71页。

两位,一位是徐亦蓁提议的吴贻芳,另一位是德本康夫人推荐的郝映青女士。在当时的情况下,选择一位中国人出任校长,如果得不到校董会外籍董事的支持是很难通过的。虽然德本康夫人推荐郝映青女士,但吴贻芳得到了美籍教授黎富思的竭力推荐。黎富思教授早年毕业于美国密歇根大学,获生物学博士学位后,曾在密歇根州立师范学院任教两年。1917 年秋,他来到金女大执教,承担生物学教学任务,后又担任生物系主任。他在金女大一直工作到 1942 年退休回国。由于徐亦蓁女士的提议和黎富思教授的竭力推荐,校董会最终决定聘请吴贻芳任校长。

当时吴贻芳正在美国密歇根大学攻读生物学博士学位,一时无法回国任职。在此情况下,金女大成立了有五位中国教师组成的行政委员会,负责学校的各项事务。

严格地说,在吴贻芳没有到任之前,德本康夫人仍然是金女大的校长,但是她此时仍然避居上海。虽然在 1927 年 7 月她曾来南京参加了学校的毕业典礼,但很快又回到了上海。1927 年 9 月,德本康夫人在一封信中写道:"今天,我们离开南京已经有六个月了!这六个月来,我生活迷惘,不知道随后会发生什么事,不知道过些日子自己会在何方,不知道该怎样拿定主意,或找谁出主意。这是段非常沮丧的日子。有时,我真想一走了之。"[①]对德本康夫人是否回南京的问题,金女大的教工们纷纷表达了自己的意见。华群认为:"许多人向我打听你何时回校。我个人认为,你还是观察一段时间,再决定回校为好。眼下金女大的中国师生非常反对外来的压力,最好是先由学生向你发出回校呼吁后,再决定回校。"[②]外籍教师(Miss Marth Hackett)则表示:"假如吴贻芳能够治理学校,你再要求回校任教不迟。假如你现在回来,看到这么多变化,你会感到很痛苦的。一年后,中国人将有点治理学校的经验,也会对事情多点理解宽容的态度。"[③]金女大的教工 Miss Koo 则明确表示:"虽然我们很想念你,盼望你回校和我们在一起,但你呆在上海会

① "Diary of Thurston"(1927, Sep. 25th), YDSL, UB Archive Box143, Folder2844, p. 0677.

② 朱峰:《基督教与近代中国女子高等教育——金陵女大与华南女大比较研究》,第 126 页。

③ 同上。

更好些。你现在回金陵，只会招致外界对金陵的批评，为我们增加更多的麻烦。因为总有人在打听你的情况，了解在吴贻芳来校前由谁代理校长一职。当然，在我们金陵大家庭中，我们不分彼此；我们需要你的建议、合作和帮助……"①

10月2日，德本康夫人最终决定自己不休假，也暂时不回南京，而是在上海处理学校的事务。她在上海圆明园路23号设立了办公室，与秘书 Mrs. Berger 在这里办公。此时，金女大出现了两个权力中心，一是德本康夫人在上海设立的办公室，另一个是由中国人组成的金女大行政委员会。而实际上，德本康夫人无法也不可能管理学校的具体事务，只是在上海代表金女大参加各种会议而已。具体管理学校事务的是在南京的金女大行政委员会。

1928年1月，德本康夫人以金女大校长的身份出席了中国基督教高等教育联合会会议。这是她最后一次以金女大校长的身份出席的大型会议。一些新上任的华人校长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其中有金陵大学校长陈裕光、燕京大学校长洪业、沪江大学校长樊正康、福建协和大学校长林景润等。尽管德本康夫人在出席了这次会议后认为"我仍然相信政府所有的干预基本上是不友善的，而那些想以此削弱英、美影响的人又在不断地推波助澜。华人基督徒被这些人玩弄于股掌之中。民族主义蒙蔽了他们的眼睛。"②但是这次会议对她毕竟产生了一些触动。

1927年，正当吴贻芳在美国密歇根大学攻读生物学博士学位，并进入了毕业论文的写作阶段之时，她收到了金女大董事会通过设在美国纽约的金女大托事部转交的聘请信函，聘请她担任金女大的校长。

吴贻芳，字冬生，祖籍江苏泰兴，1893年1月26日出生于湖北武汉。其曾祖父曾是翰林，祖父也是举人。父亲吴守训，秀才出身，曾任牙厘局局长、湖北当阳县知县。其外祖父陈豪，原籍浙江，曾任湖北房县、应城、蕲水、汉川、随州等地地方长官。晚年退居浙江杭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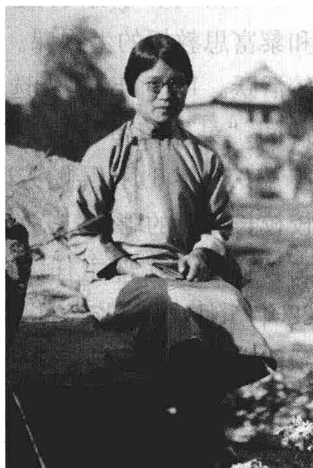
---

① "Diary of Mrs. Thurston"(1927, Oct. 2nd), YDSL, UB Archives Box143, Folder2844, p. 0678.

② "The Letter from Mrs. Thurstonto Wallace" (1928, Jan. 20th), YDSL, UBArchives, Box113, Folder2845, pp. 0717-0723.

幼年的吴贻芳就生活在这样一个传统的家庭。家中的成员并不算多，除了吴贻芳外，她还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和一个妹妹。7岁时，吴贻芳和哥哥跟随一位塾师求学。清朝末年，随着中国新式教育和女学的兴起，改变了吴贻芳的成长道路。在吴贻芳11岁时，她的姐姐吴贻芬得知杭州成立了一所女子学校，其小姨妈也进了这个学校念书，于是很想去杭州读书。家人认为一个女子独自外出很不安全，于是决定由吴贻芳和姐姐一同去杭州求学，这样姊妹二人也好相互照顾。1904—1906年，吴贻芬、吴贻芳姊妹俩在杭州女学堂读书。①

在杭州读了两年半书之后，吴贻芳姊妹二人又转入上海天主教启明女校学习英文。启明女校主要招收非基督教的学生，不以传教为主要目的，但该校校规极严。1907年，吴贻芳姊妹二人回到武昌，跟随一位教师学习英文和数学。



吴贻芳

1908年，吴贻芳姊妹又赴苏州监理会景海女校读书。第二年，由于父亲吴守训去世，姊妹二人回家奔丧。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吴贻芳一家避居上海。不久，吴贻芳的哥哥去世，其母不堪悲痛，也于一个月后病逝。吴贻芳的姐姐吴贻芬也在其母入殓前夜自缢身亡。在短短的数月间，吴贻芳的母亲、哥哥和姐姐相继去世，这给她的心灵带

① 一说吴贻芳就读于杭州弘道女校。朱峰在其《基督教与近代中国女子高等教育——金陵女大与华南女大比较研究》一书中，根据吴贻芳1936年的回忆：“杭州这所女校是由一群要发展中国现代教育的人士创办的。学校大部分女生都产生了男女平等的新思想。”《吴贻芳纪念集》中也这样记载：“这一年的春天，十一岁的吴贻芳和大姐一起来到杭州的外祖母家，进入了公立杭州女子学校。这所学校是在维新思想影响下，冲破封建礼教，由维新人士举办的一所女子学校。”据此可以判断吴贻芳就读的是1904年成立的杭州女学堂，而不是1867年由美国长老会创办的杭州弘道女校。另外，吴贻芳1973年在自己的回忆文章《八十生辰感言》中也说：“1904年我十二岁时，进入了维新派创办的‘杭州女子学校’”。可见，吴贻芳在杭州就读于弘道女校一说有误。

来巨大的创伤。此后,吴贻芳与妹妹在二姨夫陈叔通的照顾下,搬到了杭州生活。

1913年,吴贻芳作为特别生进入杭州弘道女校四年级学习。1914年,吴贻芳一家又随陈叔通搬到北京。在北京,吴贻芳经过陈叔通的介绍,到北京师范女校及附属小学任教。1915年,吴贻芳又随陈叔通搬到了上海。正在此时,原杭州弘道女校的教师诺玛利推荐吴贻芳到金女大去就读。1916年2月,作为插班生,吴贻芳终于跨入了金女大的校门。

在金女大学习期间,吴贻芳勤奋好学,尤其喜欢蔡路得教授的化学课和黎富思教授的生物课。除了学习勤奋之外,吴贻芳在其他方面也比较活跃。1916年,她当选为学生自治会会长。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期间,"吴贻芳带领学生走上街头,投身到这一伟大的历史洪流中去。"①1919年6月,吴贻芳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应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校长方还的聘请,毕业后的吴贻芳去了北京高等女子师范学校,任英文教师兼英文部主任。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任教近三年后,1922年5月,吴贻芳经推荐获得了巴勃奖学金,赴美国密歇根大学生物系留学。在美国留学期间,吴贻芳先后担任北美基督教学生会会长、留美中国学生会副会长等职。

当吴贻芳收到金女大董事会聘请她为校长的信函时,她思想上并没有准备。她是学生物学的,原准备回国从事生物学的教学与研究。但要她出任母校的校长,她还是有些犹豫。吴贻芳收到聘请信后,迅速给金女大董事会复信,一方面对校董们对自己的厚爱表示感谢,另一方面也表示如果母校急需自己回国,哪怕论文没有答辩,也可以立即回国。同时她又表示,校长一职不敢轻易接受。校董会在收到吴贻芳的复信后,更加认为她们决定的校长人选是正确的,并立即发出了聘书,通过纽约的托事部转交给吴贻芳,同时考虑到吴贻芳很快即将毕业,还告诉她不必急于回国,可以边完成论文,边与纽约的托事部接洽,参观考察美国的女子大学,作为今后办学之参考。在完成毕业论文,取得博

① 周和平、吴友松:《吴贻芳传略》,载《吴贻芳纪念集》,第127页。

士学位后再回国任职。

根据校董事会的要求,吴贻芳前往纽约与托事部接洽,并参观考察了美国一些著名的女子大学,"从学校的办学宗旨、规模、经费来源,一直到生源情况,课程设置等等,都逐一详细记录"[1]。此外,吴贻芳在考察过程中还举办演讲会,向美国民众介绍中国的情况以及金陵女子大学的情况。参观考察结束后,吴贻芳回到了密歇根大学,抓紧一切时间赶写博士论文。由于她学习勤奋、功底扎实,很快就完成了论文的写作,并顺利通过答辩,获得了生物学博士学位。

1928年初,吴贻芳参加了在美国亚特兰大召开的金陵托事部会议。不久,吴贻芳启程回国,在途经日本时,她致信美国金女大托事部,表示自己只是试任金女大的校长一职,而自己更愿意当一名教师。同时,她在信中还呼吁美国教会继续给予金女大稳定的财政支持。在谈到美国一些人指责中国人企图夺取大学的控制权时,吴贻芳指出:"我们想要的只是金陵继续存在下去,培养基督教领袖,更好地为人群服务,谁掌职权并没有什么差别。"[2]

1928年6月1日,吴贻芳回到了上海。7月1日,吴贻芳正式开始主持金女大的工作。1928年11月3日,金女大举行了一个简单但令人印象深刻的新校长就职典礼。蒋介石夫人宋美龄参加了典礼活动,国民政府教育部也发来了贺信。上午10时,新校长就职典礼正式开始,由金女大校董会主席徐亦蓁致开会词,接着,宋美龄、德本康夫人、吴贻芳、俞庆棠、赵运文等分别发言。[3] 宋美龄在致词中谈到了中国妇女承担的教育责任,并说,如果中国妇女要服务于自己的国家,服务于全世界妇女的伟大事业,她们必须尽自己最大努力去承担这一责任。[4] 吴贻芳在发言中强调金女大要为社会培养妇女界领

---

① 朱学波:《吴贻芳》,第56页。

② "The Letter WU I-fang to Miss Bender"(1928, May 28th), YDSL, UB Archives, Box 124, Folder2592, pp. 1032—1034.

③ 何荣贞:《新校长就职记》,《金陵女子大学校刊》第11期,第63—66页,1929年3月。

④ 德本康夫人、蔡路得:《金陵女子大学史》,杨天宏译,第74页。

袖多作贡献，学校要努力“使学生容易养成健全的人格，将来能做有实益的领袖。”[1]在这次就职典礼上，德本康夫人将其办公室的印章交给了徐亦蓁，徐亦蓁代表校董会又将印章交给了吴贻芳。


吴贻芳校长

吴贻芳出任金女大的校长，这在金女大的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标志着金女大在本土化过程中迈出了具有重要意义的实质性一步。

三、学校注册立案的风波

1925 年 11 月 16 日，北京政府教育部颁布了《外人捐资设立学校请求认可办法》，其主要内容为：一、凡外人捐资设立各等学校须向教育行政机关请求认可；二、学校名称须冠以私立字样；三、学校应由中国人担任校长，如校长为外国人者，则须以中国人出任副校长；四、学校董事会中中国人须超过半数；五、学校不得以传布宗教为宗旨；六、学校课程须遵照部定标准，不得将宗教课程列为必修课等。

吴贻芳出任校长后，面临着向国民政府教育部注册立案的问题，这对学校来说是一件十分重要的工作。而对吴贻芳来说，却使她陷入两难的境地。“当时吴贻芳的处境则是夹在两难之间：一方面，她不能只为承担承先启后的使命，履行创校人的办学理想而不顾中国时局的转变，另一方面，她又不能单为符合教育部的要求，而忽视教会的办学精神。”[2]

1928 年 7 月，金女大校董会就向政府立案注册问题召开特别会议。校董会能够理解中国人的爱国情绪，也承认中国政府的主权，但同

① 吴贻芳：《就职致辞》，《金陵女子大学校刊》第 11 期，第 58—60 页。

② 黄洁珍著，吴梓明指导：《从吴贻芳与金陵女子大学看基督教教育理念的实践》，第 38 页。

时希望保留学校的基督化人格的办学宗旨。金女大创办人不愿意放弃学校进行宣教、发展基督化人格的办学宗旨，认为中国政府“不得以宗教宣传为目的”、“宗教课程不能设为必修课”的规定是对基督教的敌意。这与中国政府有关学校注册的规定相抵触。而在这时，在纽约的金陵学院委员会已经提出了注册是否绝对必要的问题，并把这一质询转达到了教育部。关于金女大是否必要注册的问题，教育部的回答是，要求注册的主要目的是要限制教育机构的过分膨胀，一些学校自称学院或大学，但并不做学院或大学的工作。即便金陵不注册，教育部也不会令其关闭，但它因此也不能享受某种特权，例如进口仪器和设备的关税减免权等。更为严重的是，金陵的毕业生将没有资格享受政府助学金到国外学习，也不能在任何已经注册的学校找到一个工作位置。① 正当金女大在与政府交涉，以争取政府放宽注册要求的时候，南京、上海、苏州的三所男女合校的基督教大学已经注册，燕京大学和华中协和大学也正在准备注册。如果金女大坚持自己的意见，那就意味着学校的毕业生无法享受政府的助学金到国外学习，同时也大大增加了就业的困难。

金女大行政委员会曾草拟了三个办学宗旨给校董会参考。1928年11月，校董会采纳了行政委员会的第一个办学宗旨，即“金女大校董会主要是保持金陵女子大学为一所私立学校。这所学府是由基督教教会资助。学校所办的教育是达到高度的教育水平，推动社会福利事业及公民的最高理想。学校本于创办人的原先办学宗旨着力发展基督化人格。校董会成员及其他的负责人等必须具有高尚的品格及愿意为推进学校的目的努力。”②在此后的两年多时间里，金女大校董会试图将学校的办学宗旨明确地陈述给政府，以求在注册问题上与政府达成共识，同时又在学校的组织方面进行改革，以符合政府的有关规定。在这一过程中，吴贻芳实际上扮演了政府与学校之间调停者的角色。她多

① 德本康夫人、蔡路得：《金陵女子大学史》，杨天宏译，第75—76页。

② 黄洁珍著，吴梓明指导：《从吴贻芳与金陵女子大学看基督教教育理念的实践》，第38页。

次试图说服金女大校董会，并不厌其烦地向校董会说明与政府方面沟通的情况。

1928年12月，吴贻芳向金女大委员会列举了金陵大学、东吴大学等其他教会学校向政府注册的情况，指出学校的办学宗旨中不能出现“基督教”等字眼，否则不可能得到政府的批准。她列举了金陵大学的注册经验，金陵大学的办学宗旨中只是含有了基督的精神，而没有“基督教”的字眼。吴贻芳认为，在注册时，在学校的办学宗旨中不应出现“基督教”的字眼，但可以包含保持学校基督化人格的精神。

在努力劝说金女大委员会的同时，吴贻芳还多次与教育部沟通。在一次与教育部某次长的交谈中，该次长表示，任何学校在办学宗旨中包含有“基督教”字眼，均不可能得到政府的批准。他还表示，教育部是国家的一个部门，只能承认学校为一个教育机构。由于这位教育部次长也是基督徒，出于他自身对基督教的理解，认为基督徒不能固执于文字的描述，而应该强调如何把基督教的精神与理想融于现实生活中去。

金女大校董会拟订的学校办学宗旨中有“发展基督化人格”一句。对此，吴贻芳认为，在注册时，如果学校的办学宗旨中有这样的词句，肯定不能为教育部所接受，因此，不必过分强调文字上的表述。她建议将“基督化人格”改为“高尚人格”，并保留学校的办学“符合创校人的原先理想”的字句，这样既能保持“基督化人格”的内涵，又能够被政府所接受。1929年5月2日，吴贻芳在给金女大委员会的信件中，再次力图说服委员会在修改学校的办学宗旨时，不要出现学校“在基督徒赞助下”的词语。她认为校方不要坚持文字上的表述，既然校董会与金女大委员会已经同意向政府立案注册，就应该尽量符合政府的有关规定，以表示与政府的合作。①

1929年5月4日，金女大行政委员会在给校董会的报告中指出，政府将不会同意经校董会及金女大委员会通过的办学宗旨。从学校的长远利益着想，学校应该向政府立案注册。行政委员会建议校董会采

① Yale Div. 11/IV/124. 2593, “The Letter from Dr. Wu to Miss Bender”(1929, Feb. 5th).

纳金女大委员会及学校教职员咨询委员会修改后的办学宗旨，即“校董会在南京创办一所私立学校，提供高等妇女教育的目的是使学校达到高度的教育水平，拓展社会福利及公民的最高理想，发展高尚人格，以符合创校的五个基督教差会的原先目标。”①校董会采纳了这一建议。6 月，金女大委员会也批准通过了修改后的办学宗旨。

1930 年 10 月，为了顺利完成注册，避免再出现麻烦，吴贻芳建议将办学宗旨中“五个基督教差会”的文字删除。校董会最终采纳了吴贻芳的建议，删除了“五个基督教差会”的字眼。这样，学校的办学宗旨终于得到了教育部的认可。

办学宗旨虽然得到了教育部的认可，但另一个有争议问题又摆在了吴贻芳面前。按照政府的规定，学校不得进行宗教宣传，也不允许注册的学校将宗教科列为主修课程。1928 年 10 月 17 日，金女大行政委员会在给金女大校董会的报告中指出，如果学校保留宗教系，并以宗教科作为主修学科，教育部肯定不会接受金女大的注册申请。行政委员会建议将宗教和哲学合并为宗教哲学系。1929 年 10 月，校董会会议决议采纳行政委员会的建议，并同意不再将宗教单独设为一个系。

1929 年 12 月，吴贻芳在给金女大校董会的信中，转述了教育部的意见，并阐述了自己的看法。教育部建议金女大可以设立哲学系，将宗教科目归入哲学系。吴贻芳认为，宗教科目归于哪个系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否开设宗教课程。根据吴贻芳的意见，1930 年 10 月，校董会最终采纳了吴贻芳的建议，决定将宗教哲学系改称为哲学系，将宗教科目归于哲学系。同时，教育部也准许金女大在哲学系开设宗教课程。至此，宗教系废存的问题终于得到了解决。

然而这时，大部分的教会大学如金陵大学、上海沪江大学、东吴大学、燕京大学等都已经先后注册立案或正在注册立案。随着中国民族意识的不断高涨，政府对注册立案学校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规定也越来越严格。教育部修改了《外人捐资设立学校请求认可办法》的部分规

① Yale Div. 11/IV/127. 2618, “Minutes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of Ginling Collge Committee” (1929, Oct. 18—19).

定：一、注册的学校必须由中国人担任校长；二、中国人在校董会的比例，由原来的大多数改为必须超过三分之二多数；三、任何学校最少必须有三个学院才能称为大学。此外明确规定学校的宗教活动必须自由参加，不得强迫；宗教课程不得列为必修课，必须列为选修课。

1930年12月，金女大最终还是根据教育部的要求完成了注册立案事宜。根据教育部的要求，金女大在学校内停止了强制性的宗教活动，并将宗教系并入哲学系。宗教科也被列为选修课程。金女大正式注册时给教育部呈递的办学宗旨为："校董会在南京创办一所私立学校，提供高等教育给妇女，目的是使学校达到高学术水平，为社会训练妇女领袖，发展高尚人格，此方向乃符合创校人的原先目标。"[①]同时，金女大校董会的名称由 Board of Control 改为 Board of Directors，并以金女大校董会发起人的名义取代了美国的金女大委员会。



金陵女子大学改为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后的校旗

至此，经过耐心的劝说与协商，吴贻芳终于完成了金女大的注册立案工作。由于金女大达不到教育部规定的"任何学校最少必须有三个学院才能称为大学"的要求，因此立案注册后，金陵女子大学更名为金陵女子文理学院。

四、吴贻芳的办学理念

金女大的本土化，不仅表现在人事更替和立案注册上，更体现在办学理念的转变方面。

1930年，金女大立案注册后，根据政府的要求，学校不得以传布宗

① 黄洁珍著，吴梓明指导：《从吴贻芳与金陵女子大学看基督教教育理念的实践》，第44页。

教为宗旨,并且不能将宗教科列为必修课。这一变化客观上促使吴贻芳办学理念的形成。另一方面,吴贻芳虽然接受的是教会学校的教育和西方的现代教育,但是她毕竟生长在中国,她的民族情结和爱国思想使她对金女大的办学宗旨有着自己的认识和理解。当然,吴贻芳作为基督徒和教会大学的校长,她的办学宗旨不可能完全违背学校创办人的意志,因此,她将学校创办人“培养为基督教服务的妇女领袖人才”、“发展基督化人格”的办学宗旨,与推进“社会福利及公民的最高理想”、着重公民教育或爱国教育结合起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办学理念。可以说,吴贻芳的办学理念是一种适合中国国情的基督教教育,或者说是本土化的基督教教育。

吴贻芳的办学理念,首先体现在她对校训“厚生”的理解上。金女大在创办后将“厚生”定为校训。德本康夫人在解释“厚生”的涵义时曾说过:“‘厚生’就是在各个方面得到至善至美的发展。在多项发展中,学生人格的塑造,基督生命的培育最为重要。获取丰盛生命的学生才懂得给人类社会多作贡献。”①而吴贻芳在谈到学校的这一校训时也曾说:“当时学校用‘厚生’作为校训,涵意为:人生的目的,不光是为了自己活着,而是要用自己的智慧和能力来帮助他人和社会,这样不但有益于别人,自己的生命也因之而更丰满。学校用这个为目标来教导学生,并通过学校生活的各方面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引导学生向这个方向努力。”②

在民族主义高涨以及非基督教运动背景下出任金女大校长的吴贻芳,在尊重和理解学校创办人确定的办学宗旨的前提下,也将自己的理念融合进了学校创办人的办学宗旨中。即淡化学校的宣教色彩,注重培养服务于社会的有用人才和学生人格、道德的养成,以期与非基督教学校注重学问、培养人才的办学宗旨相一致。吴贻芳在 1928 年 11 月出任校长的就职典礼致词时就明确表示:“现在办学,就是培养人才,从事于中国的各种工作。”“学校于国学科学同时并重,既培养了中国学者

---

① Wang Shuh-hi,“Our Mother's Ideals and Aims, and My Appreciation of Her”, *Ginling College Magazine*, p. 16, June, 1928.

② 吴贻芳:《金女大四十年》,载《吴贻芳纪念集》,第 111 页。

的思想，又能得到科学家的方法，然后到社会上去，才能适应各种的新需要，运用自己所学，贡献给各种工作。”“凡是办教育的，没有不注意学问同道德。”①

从吴贻芳的上述表述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出，与德本康时期相比，她更注重为社会培养有用的女性人才。她把金女大的办学宗旨由扩展基督教在中国的影响转向为社会培养有学问、有道德修养、对社会有用的人才方面。黄洁珍在论述吴贻芳的办学理念时曾指出：“吴贻芳的关怀更是广阔，她所强调的办学目的并不是宣教的作用，她在金女大推动的基督教教育较为着重爱国的层面，是基督教教育中国化，而不是中国基督化。”②

吴贻芳的办学理念，还体现在她融合了爱国主义思想，将爱国教育与人才培养有机地结合起来。吴贻芳曾感言：“孙中山先生领导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建立了共和，我庆幸祖国前途有了希望。可是，接着就是袁世凯称帝，军阀连年混战，列强瓜分势力范围，祖国四分五裂，民不聊生，我又失望地感慨祖国没有出头之日。一九一六年我抱着所谓‘读书救国’的愿望，来南京金陵女子大学读书，并立志于所谓‘教育救国’。我和当时中国许多知识分子一样，为了向西方国家寻找救国的道理，一九二二年我到美国密歇根大学留学……一九二八年我回国，担任美国教会办的‘金陵女子大学’校长，目睹国民党当局腐败无能，我国继续遭受列强帝国主义的欺负和宰割，人民处于水深


吴贻芳校长在100号楼前

① 吴贻芳：《就职典礼致词》，《金陵女子大学校刊》第11期，第59页。

② 黄洁珍著，吴梓明指导：《从吴贻芳与金陵女子大学看基督教教育理念的实践》，第44页。

火热之中，我的内心十分矛盾和痛苦。”①由此，我们可以深切地感受到吴贻芳的爱国情怀。在这种爱国情怀的驱使下，吴贻芳担任校长之后，将爱国教育融入金女大的办学宗旨中。1934年，吴贻芳曾在信件中明确表示，“训练妇女为国家服务乃学校的使命”②。她还经常对学生们说：“我们办学的宗旨，是要把大家培养成具有高尚理想，不图个人私利，掌握一定专业基础知识，对工作认真负责，与同学相互合作，对社会有精诚服务的态度，对国家从爱国主义出发，在各自岗位上，尽到自己应尽的义务的人。”③显然，吴贻芳办学的出发点，是为国家培养妇女人才，造就妇女高尚的人格，而不是单纯培养基督教妇女领袖了。

吴贻芳的办学理念，还体现在她的女子人格教育方面。金女大是一所女子高等学校，因此，吴贻芳把培养和造就妇女的健全人格作为办学的主要目标之一。要培养妇女人才，训练妇女为国家服务，首先培养学生，使其具有健全的人格。吴贻芳曾指出：“人格教育的实现，因习惯贵在‘慎之于微’，而学校尤当注重慎微的陶冶，方能使整个的人生有良好的发展”。④ 吴贻芳所说的人格教育，是在原先“发展基督化人格”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并融入了新的内容，即将爱国教育与人格培养有机地结合起来。

吴贻芳在培养学生的高尚人格时，十分重视教职员的身教作用。她指出：“要使学生能够人格完全与否，全在教职员方面平时所与以耳濡目染的模范之良否，所以基督教教育……确非单独注意于课本上的接受，是在司教职者能在他们整个生活中时时表现基督的真精神，以熏陶学生。”⑤在要求教职员的同时，吴贻芳也身体力行，作出了表率。自她出任金女大校长之后，她就主动搬进学校居住，过着简单而朴素的生活，将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学校的工作之中。

学者们经过研究，归纳出吴贻芳人格教育的八个特点：一、从细

① 吴贻芳：《八十生辰感言》，载《吴贻芳纪念集》，第81页。
② 1934年吴贻芳信件，美国耶鲁大学图书馆资料，11/IV147,904。
③ 朱学波：《吴贻芳》，第59页。
④ 吴贻芳：《基督教教育之特殊贡献》，《教育季刊》第六卷第二期，1930年6月。
⑤ 同上。

微处做起，将人格教育贯穿于从幼教到大学的整个过程中；二、强调教师人格的示范作用；三、强调人格教育对整个人生发展的作用；四、人格教育的重心是道德品性的养成；五、强调在人格教育中注重个人教育，因材施教；六、人格教育是德、智、体、群、灵(后改为美)五育充分发展的教育；七、人格教育是一种爱国教育；八、参与社会服务和社会实践是人格教育的重要途径。① 当然，吴贻芳毕竟是一位基督徒，而且担任教会大学的校长，因此，她的人格教育思想还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基督人格”、“基督精神”的影响。但是，她对基督化人格的理解与德本康时代已有了很大的不同，她为人格教育注入了新的内涵。可以说，吴贻芳对人格教育的理解，反映出她已由一个教会学校的管理者向新型教育家转变。

第二节　吴贻芳掌校初期的师资与学生

一、学校机构建设与教师的管理

从民国成立之初，政府就重视高等学校的组织建设。1912 年 10 月，教育部即颁布了《大学令》，除了对大学的办学宗旨、学科设置、学制等均作了较为详细的规定外，还对大学内部的组织管理提出了明确要求。1913 年 1 月，教育部又颁布了《大学规程》详细规定了各种课程的设置。然而，当时的教会大学并没有向政府注册，因此，外国在中国设立的教会大学成了在中国教育行政当局管理之外的独立的教育体系。由于这一原因，教会大学内部的组织设置和管理制度具有特殊性并缺乏规范性。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教育部于 1929 年 7 月 26 日颁布了《大学组织法》和《专科学校组织法》。《大学组织法》规定：大学应遵照十八

① 程斯辉、孙海英：《厚生务实　巾帼楷模——金陵女子大学校长吴贻芳》，第 38—39 页，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以下引用该书皆为此版本)

年(1929)四月二十六日国民政府公布之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实施方针，以研究高深学术，培养专门人才。大学设校务会议，以全体教授、副教授所选出之代表若干人，及校长、各学院院长、各学系主任组成之，校长为主席。校务会议可由校长聘请专家列席。校务会议负责审议预算、学院学系的设立与废止、课程设置、内部各种规则，关于学生考试事项、学生训育事项及校长交议事项。[1] 1929年8月14日，教育部又根据《大学组织法》颁布了新的《大学规程》，对大学及独立学院的系科设置、必修课程、学生考试等作了进一步的规定。这些法令法规的颁布，表明教育部对大学组织的规范较民国初年有了一定的提高，其要求也更加丰富和完整。

吴贻芳任校长后，对以往学校内部组织管理和机构设置的随意性和不规范进行了调整，使学校的组织管理形式和人员配置尽量符合政府的要求。尽管当时这样做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向政府注册立案，但吴贻芳认为建立规范的学校组织管理体系，使其与国立大学相一致也是十分必要的。在吴贻芳的努力下，金女大逐渐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善的组织管理体系。金女大行政组织机构设置和人员配置如下：

由校董会聘请院长1人，负全校行政责任。院长室设秘书1人，襄助院长办理一切。设教务、训导、总务3处，各处设主任1人，由教授兼任，分掌该处事项。另设有会计室、主办会计事项。

教务处设注册组及图书馆，各设主任1人，组员及馆员2—3人。出版事宜，如学术刊物，另设委员会办理。至于讲义等，则暂由注册组兼管。

训导处设学生生活指导、课外活动、体育卫生等3组，各设主任1人，组员及医师、护士1—2人。此外，请讲师以上专任并住校之女教员担任导师。

总务处设文书与事务2组，各设主任1人，组员1—2人。至出纳组，为办事便利，暂归会计室办理。

会计室设主任1人，会计1人，办理审计及出纳事项。至统计则暂

---

①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教育(一)，第171—173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

不设专人，由各处室自行办理。

各学系科，则有系科主任及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等。

除以上部门外，金女大还设有乡村服务处、儿童实验所等附设服务机构。①

此外，金女大还在吴贻芳的主持下，对学校行政管理方面的有关规则进行了制定，并设立了学生生活指导委员会、事务委员会、卫生委员会等议事机构。学校还制定了《金陵女子大学组织大纲》，规定："本校设校务会议为商讨校务最高机关，由校长及各处馆室系科主任与生活指导委员会、事务委员会之负责人及教授代表 2 人，讲助教代表 2 人，学生代表 2 人组织之，每月开会 1 次，校长为主席。会议中讨论有关附属机关事项时，附属机关之主管人可以临时列席。"②此外，校务会议下还设有常务委员会，该委员会由校长、教务主任、秘书、生活指导委员会及事务委员会之负责人及校务会议推选的 2 位教授代表（文理各 1 人），1 位讲助教代表、1 位学生代表组成，主席由校长担任。

校务会议之常务委员会每周开会一次。作为最高权力机构的校务委员会职权如下：

一、关于院系学科之设立、废止及变更之建议事项；

二、预算决算之初步审议；

三、关于建筑及重要设备之建议事项；

四、章则之制定、修正或废止；

五、决议校长交议事项；

六、决议校内各部门请议之事项；

七、关于校内其他重要事项。③

除上述机构外，金女大还设有"全体教职员会议"。全体教职员会议由校长召集，主要职责是报告校务和意见咨询。有关各系科的事务，则由各系科召开系科会议，由系主任为主席。

---

① 参见《私立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要览》，第 5 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六六八/26。

② 《金陵女子大学组织大纲》，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六六八/23。

③ 同上。

在吴贻芳的主持下,金女大在学校的组织机构建设方面有了较大的改进,使学校的各项工作逐步走向正规,并形成了自身的一些特点。

第一,学校管理的民主化。除了学校及各院系的负责人外,教师代表、职员代表、学生代表均有参与学校管理的权利,形成了一套民主管理的体系,并以制度规定了下来。这种民主管理的制度能够调动学校各方面的积极性,使教职员和学生都能关心学校的事务,关心学校的前途。

第二,学校管理的法制化。由于学校组织体系和各项议事规则的逐渐建立、机构设置的逐渐完善,以及办事程序的相继确立,使学校的管理逐步进入法制化轨道。

第三,学校董事会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这种管理体制能够调动董事会成员与院长两个方面的积极性。董事会能够指导学校的各项工作,而院长则负责学校的具体事务。在吴贻芳任校长期间,她能够很好地协调与董事会的关系,既及时向董事会汇报学校的情况,又能够积极向董事会提出建议,同时还能够与董事会进行有效的沟通。

第四,管理人员少,办事效率高,管理成本低。吴贻芳强调学校的管理人员要精干。她曾说:“学校行政管理向来人数少,费用节约。校内工作人员重视工作效率。”①选用精干的管理人员,既节约了费用,又提高了效率。

教师管理,是吴贻芳任校长期间的一项重要工作。吴贻芳上任之初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师资力量不足。她根据师资不足以及教育部对大学教师资格的要求等实际情况,采取了一系列相应的措施,以解决教师队伍问题。

首先是广开门路,解决师资不足的问题。师资的缺乏,已影响到学校的正常教学。在此情况下,吴贻芳多方设法解决师资问题。一是聘请南京其他高校的教师来金女大任兼职教师。在此期间,金女大聘请了金陵大学等高校的教师来校兼课,并与金陵大学实现相关课程的互修,学分互认。这就是说金女大的学生可以到金陵大学选修相关的课程,同样,金陵大学的学生也可以到金女大选修有关课程。这样,金女

---

① 吴贻芳:《金女大四十年》,载《吴贻芳纪念集》,第113页。

大不仅部分解决了师资不足问题，也相应拓宽了金女大的课程范围。二是邀请外国学者、教授等来华访问、度假，并来金女大讲学。1931年，太平洋国际关系学会的一批专家学者访问金女大，其中有拉德克列夫学院阿达·L. 孔斯多克校长、夏威夷大学克劳弗女士、《太平洋事务》编辑伊丽莎白·格林小姐、明尼苏达大学奎格尼教授、牛津大学万灵学院亚当斯教授、澳大利亚工业部顾问陶尼教授等人。[①] 此外，“还有好几位外国教授来华度假兼讲学。如美国密歇根大学音乐学院的芮德夫人利用一年假期来校教授钢琴并举行钢琴演奏会，帮助好几位钢琴专业学生改进了技艺。”[②]三是发动学校在职教师推荐合适的教师。学校编制了“各学科部聘请教师候选人名单”分发给在职教授。表中列有“被推荐人姓名”和“荐举理由”两个栏目，并在填表注意事项中要求“荐举人得于本名单外另列举荐其他合乎原办法第二条规定各条件之人选”，并确定了被推荐人选的具体要求：1. 在国立大学或独立学院任教十年以上者；2. 教学确有成绩，声誉卓著者；3. 对于所任学科有专门著作且具有特殊贡献者。4. 选择一些优秀的毕业生留校任教，并分别派遣出国深造。[③] 例如金女大1933年毕业生王仁慈，毕业后留校任教。由于她考入金女大时得到了福建泉州培英女中的资助，在金女大毕业时“她坚决如约返回培英女中执教，直到服务期满，才离开培英回到金女大任职。”此后，她又被送往英国伯明翰大学锡利渥学院学习，后又转到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研究院学习，并获得硕士学位。[④]

其次是在解决教师缺乏的同时，金女大也注意教师结构的调整。由于历史的原因，金女大教师中外籍教师的比重较大，特别是在学校创办的初期，外籍教师占绝大多数。随着中国收回教育权运动的开展，以及金女大本土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学校在聘用教师时，尽可能

---

① 程斯辉、孙海英：《厚生务实　巾帼楷模——金陵女子大学校长吴贻芳》，第137页。

② 吴贻芳：《金女大四十年》，载《吴贻芳纪念集》，第103页。

③ 《各学科部聘请教授候选人名单》，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六六八/37。

④ 魏大复、魏大为：《一株挺拔的翠竹——忆我们的母亲王仁慈》，载金女大南京校友会《金陵女儿》(续集)编写组编《金陵女儿》(续集)，第172页，南京师范大学金陵女子学院，2000。(以下引用该书皆为此版本)

地选择中国人。经过努力，在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学校的教师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实现了从原来外籍教师为主向中国教师为主的转变。

经过吴贻芳及全体教职员的努力，金女大的教职员人数逐年增加。1927年9月23日金女大开学时，有教师24人；1928年，教职员人数上升为37人；[1]1930年，教职员人数已增加到47人，其中中国教职员30人，美国籍教职员14人，英国籍1人，法国籍1人，德国籍1人；[2]而到1936年，仅中国教师就有44人，其中专职教师34人，兼职教师10人，此外还有若干职员。



1932年全体老师合影留念

值得一提的是，德本康夫人辞去校长职务后，并没有离开金女大，而是留在学校担任校长的西方顾问，并兼授课程。根据金女大校董会的决定，德本康夫人在学校从事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根据课程委员会的安排，在哲学系教授宗教方面的课程；

二、教授一门天文课程或更多的课程；

① 黄洁珍著，吴梓明指导：《从吴贻芳与金陵女子大学看基督教教育理念的实践》，第68页。

② 程斯辉、孙海英：《厚生务实 巾帼楷模——金陵女子大学校长吴贻芳》，第136页。

三、促进金女大在海外的宣传，与在华的外国朋友保持联系，帮助解决学校的经费问题；

四、与外国教会、朋友保持建设性的友好关系；

五、担任新校长的西方顾问；

六、担任大学建筑委员会委员。

尽管德本康夫人这位前任校长和新校长吴贻芳在工作中存在一些意见分歧，但这主要是中西方文化差异的表现，也是中西方文化在教育理念上的差异，双方仍然能很好地配合工作。1983 年，吴贻芳在回忆德本康夫人的工作时说："一九二八年她主动辞去校长职务后，将主要精力用于完成校舍建筑，如大礼堂、图书馆和女教师宿舍等，兼任教师，始终勤勤恳恳，不再插手校务。"[①]而德本康夫人在评价吴贻芳时也表示："吴贻芳博士曾经担任金陵校长，并积极参与国内、国外其他组织的活动。凡是熟悉吴博士的人都会意识到，金陵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她在最为困难的年代富有能力的忠实的领导。金陵在全中国所获得的高度的重视，在一定程度上也表达了人们对金陵校长的尊重。她具有兼顾各方的判断能力，她对金陵在完全被战争打乱了正常生活时亦能找到继续其事业道路的坚定信念，她在制订新的必要的调整细节时所表现的耐心，是学校精神得以保存的基本因素。没有她的不屈不挠的勇气和毅力，很可能金陵在战争年代将作不出任何积极的贡献。"[②]显然，吴贻芳与德本康夫人都对彼此的工作给予了积极的评价。

在教职员人数不断增加的同时，金女大也多方设法改善教职员的生活，提高他们的待遇。在德本康任校长时期，教师大多来自外国，她们的薪水是由学校创办人的教会参照外国的标准提供的。吴贻芳任校长后，教师队伍已由外籍为主转变为华籍为主。如何解决好教职员的生活问题，使他们无后顾之忧，安心工作，是吴贻芳面临的又一个问题。为了解决好这一问题，吴贻芳主持了宁海路教职员宿舍两栋、校内南山

---

① 吴贻芳：《金女大四十年》，载《吴贻芳纪念集》，第 113 页。

② 德本康夫人、蔡路得：《金陵女子大学史》，杨天宏译，第 113 页。

教职员宿舍两栋的兴建，改善了教职员的住宿条件。此外，吴贻芳还积极争取外界的资助，以完善学校的服务设施。1936 年，在学校创始人纪念日这一天，严彩韵（金女大校友 1921 届）、严莲韵（金女大校友 1924 届）等严氏四姊妹向金女大捐赠了一所小医院，她们的丈夫则捐赠了医院的内部设施。“这一慷慨的捐赠满足了学校长期渴求的需要”。①

1927 年，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曾制定了国立高等学校教师的薪俸标准，即教授每月 400—600 元，副教授每月 260—400 元，讲师每月 160—260 元，助教每月 100—160 元。

在 20 年代下半期和 30 年代上半期，国立各高校教师的薪俸虽不完全一致，但基本上沿用了政府制定的这一标准。这一时期，金女大作为私立高校，也制定了学校正式教师的薪俸标准。其具体标准为教授每月 320—500 元，副教授每月 240—360 元，讲师每月 160—260 元，助教每月 100—180 元。

除了以上薪俸外，金女大还制定了教师的津贴标准：

一、生活津贴：每人每月 200 元。

二、薪贴：助教每月 20—30 元，讲师每月 30—40 元，副教授每月 40—50 元，教授每月 50—80 元。

三、教员之指数津贴：按每月物价指数及薪额各贴 20%。例如 10 月份此项津贴为正薪之 6 倍半，则月薪 100 元者可得津贴 650 元。

四、米贴：除教员本人 1 双市斗外，直系眷属之无职业者亦照教员本人贴付。惟不满 10 岁之子女则贴 5 双市升。此项米贴每双市斗均须扣基本米价 10 元。

五、日用品津贴：教员本人全年为 800 元，其无职业之配偶同子女则为 300 元，均一次发给。

六、房贴：凡不住本校宿舍者，月贴房租 30 元，有眷属者加

① 德本康夫人、蔡路得：《金陵女子大学史》，杨天宏译，第 88 页。

倍。兼任教员以授课时间计算，讲师每小时30元，副教授每小时40元，教授每小时50元。①

从金女大支付给教师的薪俸来看，应该说高于国立大学的水平。这体现了金女大对教师的关爱，也保持了教师队伍的稳定。

在教职员人数不断增加的同时，金女大在提高教职员素质方面也做了大量的工作。在吴贻芳任校长期间，一方面改善教师的待遇，解除她们的后顾之忧，另一方面也加强教师队伍的建设，注重培养，以提高教师的水平。

由于金女大是教会大学，与外国的大学联系密切，因此，在选送优秀教师与学生出国深造方面，比其他国立大学更具有优越的条件。例如女教师刘恩兰，1925年从金女大毕业后留校任教，1929年赴美国克拉克大学攻读地理学，在获得硕士学位后回金女大创办了地理系。再例如1936年，李德忱"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两年，完成作为律师所需要的课程学习之后，回到金陵。她也讲授宗教方面的课程。"②教师出国深造，不仅提高了教师队伍的学历层次，而且也提高了学校教师的整体教学水平。



刘恩兰

为了培养教师，金女大积极鼓励和支持教师参加各种学术交流会，以及举办各种形式的报告会，以加强学术交流，提高教师学术水平。例如1937年2月，社会学系主任龙冠海教授、穆桂曼教授出席了中国社会学第六届年会，并向大会提交了《中国各大学社会学课程调查》、《介绍促进中国社会工作之训练》两篇论文。一些教师还参加了国际学术

① 《金女大教师福利和教师待遇》，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六六八/39。

② 德本康夫人、蔡路得：《金陵女子大学史》，杨天宏译，第92页。

会议，扩大了金女大在国际上的影响。在加强国际、国内学术交流的同时，金女大的教师们还在校内举行各种学术演讲。如1933年10月，国文教授龙铁元向学生演讲《文学与哲学》，数理系李国鼎先生演讲《从时间说到超人的宇宙》，详细介绍了爱因斯坦的时间观。①



李国鼎

吴贻芳十分重视教师的人格培养，她认为教师的人格会对学生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吴贻芳在1930年发表的《基督教教育之特殊贡献》一文中指出："要使学生能够人格完全与否，是全在教职员方面平时所与以耳濡目染的模范之良否，所以基督教教育……确非单独注意课本上的接受，是在于教职者能在他的整体生活中时时表现基督的真精神，以熏陶学生。"②同年，吴贻芳在《教育评论》又发表了另一篇《教会学校的一条出路》的文章。吴贻芳在文章中指出："教师必须明白教育是包含基督的爱和服务精神。作为一位教师，他是全然的付出给学生。倘若学校有足够数量的教师存有这种心志教学，学校的基督办学精神必能保存。真正的基督教气氛比圣经课程及崇拜更为重要。教师的素质直接影响学校的学术水平及健康的风气。"③正因为这一原因，金女大在聘请教师时，除了考虑教师的学术水平及教学经验外，还要看教师是否愿意遵循教会大学的理想，并具有基督徒的人格。也因为这一原因，在金女大教师中基督徒始终占大多数。根据1933—1934年的统计，金女大40位教师中，有32位是基督徒，基督徒的比例达到80%。在25名中国教师中基督徒有17名，基督徒在中国教师中

① 程斯辉、孙海英：《厚生务实 巾帼楷模——金陵女子大学校长吴贻芳》，第148页。

② 吴贻芳：《基督教教育之特殊贡献》，《教育季刊》第六卷第二期，1930年6月。

③ 黄洁珍著，吴梓明指导：《从吴贻芳与金陵女子大学看基督教教育理念的实践》，第68页。

的比重亦达到68%。①

金女大每学期要举办教师进修会，其目的在于促进教师的灵性修养。由于金女大的教师大多是基督徒，因此，通过进修会，使教师检讨工作得失，研究改善的措施与方法。1935年金女大举办的进修会，其内容涉及到如何把教职员的工作与基督徒的宇宙观联系起来，强调奉献精神。在进修会上，师以法先生主讲了"自然、人类与上帝"，德本康夫人主讲了"天文与宗教"。1936年3月举办的进修会，集中讨论了基督教大学宗教生活研究报告，强调人格力量的重要性，要求教职员以人格力量去体现"厚生"之道。②

从金女大举办的教师进修会的主题来看，重点是围绕教职员的品德修养，使教师们树立基督徒的人生观，反省自身的工作态度与敬业精神；讨论如何协助学生在智育、德育与灵育方面综合发展等。其目的除了促进教师的灵性修养外，还促使教师检讨过去工作中的得失，寻求改善的方法，最终达到提高教师队伍整体素质的目的。

二、学生的增加与学生管理

随着金女大社会声誉的不断提高，报考金女大的学生人数呈逐年上升之势，在校学生人数也不断增加。1915年，金女大招收的第一批学生只有9人，1924年以后，学生人数超过100人。尽管1927年由于国内政局动荡，学生人有所减少，但仍有97人。③ 1928年，国内政局逐渐稳定，金女大的学生人数也开始逐年增加。具体数字参见表4。

---

① 黄洁珍著，吴梓明指导：《从吴贻芳与金陵女子大学看基督教教育理念的实践》，第68页。

② 同上书，第70页。

③ 同上书，第137页。

表 4 1928—1936 年金女大学生人数表

年 份	学 生 人 数(人)
1928	132
1929	135
1930	169
1931	192
1932	174
1933	212
1934	213
1935	238
1936	259

资料来源：黄洁珍著《从吴贻芳与金陵女子大学看基督教教育理念的实践》，香港中文大学研究院哲学硕士论文，第 138 页，1996

从上表可以看出，自 1928 年以后，金女大的学生人数逐年上升，只是在“1932 年秋季开始的那个学期，学生注册为 174 人，略低于头一年同一时期的注册人数。这主要是因为九一八事变后政局缺乏稳定性。翌年，学生注册人数达到 212 人，这一数字直到 1936 年也没有发生大的变化。”①

从学生的毕业人数来看，从 1928 年以后，也呈稳步上升之势，详见表 5。

表 5 1928—1936 年金女大学生毕业人数表

年 份	本科(人)	简易科(人)	专修科(人)	合计(人)
1928	21			21
1929	26			26
1930	19	30		49

① 德本康夫人、蔡路得：《金陵女子大学史》，杨天宏译，第 89—90 页。

续 表

年　　份	本科(人)	简易科(人)	专修科(人)	合计(人)
1931	18			18
1932	26		8	34
1933	36			36
1934	29		3	32
1935	33		14	47
1936	34			34

资料来源：吴贻芳著《金女大四十年》，载《吴贻芳纪念集》，第108页附表，江苏教育出版社，1987。

金女大的学生来自全国各地，学生的素质和层次也参差不齐。随着学生人数的不断增加，金女大也加强了对学生的管理。吴贻芳认为国立大学与教会大学的办学宗旨存在差异。国立大学偏重学生智育的发展和学问的探求，并没有特别的组织来指导学生的课余活动及关心学生的人格发展。而基督教大学办学的宗旨是促进学生德育、智育和灵育的整体发展，除了学习以外，还注重学生的人格培养和推进课余活动的开展。

由于金女大组织、支持和推动学生开展各种有益的活动，学生在校园内的活动也丰富多彩。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使学生的学习和课余活动规范化、制度化和组织化，金女大制定了一系列的规章制度。

金女大在学生平时的学习成绩之外，还就学生平时的操行表现制定了相应的规章制度，要求学生在校期间遵守校规，以养成健全人格及优良学风。为此，学校制定了《私立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学生手册》，其中规定：学生不得有破坏学校秩序或妨碍学校声誉及其他不道德之言语行为。学生不自敦品励行，无论校章有无规定，均须就情节轻重，分别加以惩戒。惩戒分导师训诫、训导处警告、训导会议会询、开除学籍四种，并由学校通知该学生家长或保证人。学生在寝室、教室、实验室内有违反规则者，其负责教职员需加以训诫，或交由训导处执行；学生所受惩罚，除由训导处通知有关各处外，并将事实存案备查。遇情节重大

时，函知该学生家长及保证人。凡曾受严重惩罚的学生，不得领取学校任何奖学金，毕业时导师不得给以训导证书。学生操行成绩于每学期终了时，由各生导师及教师分别评定，交训导处登记，由训导处会议通过后，通知教务处，载明成绩簿，呈报教育部。①

为了学生操行的评定，金女大还确定了十条标准，要求教师从以下十个方面对学生进行考查和评定：一、举止仪容；二、银钱使用；三、消遣方法；四、言行诚实；五、工作认真不懈；六、爱护公共用物，尊重他人利益；七、慎言择行；八、合作精神；九、任事负责可靠；十、富于同情，乐助他人。②

从上述评价学生在操行方面的十个标准来看，金女大在学生的培养方面，重视学生的道德修养和人格培养。据金女大校友回忆：“学校不仅对学习、校规纪律提出要求，而且对学生的体格非常重视，每个学生都进行严格体检，而且对每个人的坐、立、行的姿势都有记载。抬头、平肩、挺胸、收腹等都是新生训练的内容，在这方面有缺陷而又不重视，会受到提醒，必须纠正。吴校长和老师们也以身作则，不仅内在素质要好，外在的气质也是端庄优雅，这一点对我们教育很深，终生受益。”③另一位校友回忆说：“记得校长非常注意学生的仪表。有一次我和自文外出采购，我这个痴迷大红色的女孩，发现有红色袜子出售，喜出望外，于是就兴高采烈的选购一双返校，第二天得意洋洋的穿上这双红袜就去上课了。后来吴校长看到了，婉转地告诫我，一个女大学生穿着要以庄重得体为宜，一个人的服饰往往会影响她的仪表，希望加以注意。我马上体会到校长的关怀，十分感动，从此不再穿红袜。”④

金女大对学生的生活管理也是十分严格的，尽可能让学生们在校期间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比如要求学生遵守作息时间，规定时间起

---

① 《私立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学生手册》，第19—20页，1940年9月。

② 程斯辉、孙海英：《厚生务实 巾帼楷模——金陵女子大学校长吴贻芳》，第189—190页。

③ 黄绫汉：《情系母校金女大》，载金女大南京校友会《金陵女儿》（续集）编写组编《金陵女儿》（续集），第39页。

④ 孔宝定：《吴校长对我的教育和关怀使我终生难忘》，载金女大南京校友会《金陵女儿》（续集）编写组编《金陵女儿》（续集），第124页。

床、吃饭和睡觉。学校还要求学生勤俭节约,杜绝浪费现象。金女大校友回忆说:"学校的水是靠自凿的自流井和建在山岗上水箱来供应的。学校自己有小型发电机供电。这些设备都由教科技的老师管理。用水、用电都很节约,定时、定量,无论校长、教职员工都和学生一样,一律遵守使用水电的规定。膳食、起居都很朴实,决无奢侈浪费。""学生生活很有规律,饮食也很节约,不许浪费。记得早晨 7:00 打钟用早餐,7:30玻璃门挂上'不入内'的牌子,就不准进餐厅了……还有所谓的习惯训练,对我一生的健康都很有关系,如冬天清晨洗脸、刷牙要用凉水,三餐之间不吃零食;谁要吃零食,请你在用餐时吃。这些习惯现在仍然能遵守"。①

三、学生的校园生活和社会活动

金女大的办学目标在于使学生在德育、智育和灵育方面协调发展,以养成健全的人格。因此,在正常的学习课程以外,金女大学生的校园活动也是丰富多彩的。通过形式多样的集体性活动,达到了培养学生集体精神、为社会服务的精神以及为人处事之道,进而达到人格的健全发展和素质的整体提高。到了 30 年代之后,学生课外活动更加丰富,如音乐、话剧、体育活动、宗教活动以及社会服务活动等。一些学生团体如学生自治会、女青年会在学生课外活动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

(一) 学生自治会

吴贻芳担任校长以后,针对学生自治会存在的问题,加强了对学生自治会的引导和建设,使其逐步走向健康的轨道。在 20 世纪 30 年代前半期,学生自治会的工作主要是围绕服务、生活、艺术、娱乐等方面展开。从 1933 年金女大学生自治会的内部组织就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主要活动。1933 年,学生自治会下设研究、游艺、平民教育、国货、出

---

① 吴柳琪:《怀念吴贻芳校长和母校》,载金女大南京校友会《金陵女儿》(续集)编写组编《金陵女儿》(续集),第 117—118 页。

版、文书、庶务兼会计等股。其中研究股下设有政治、社会、学术等研究会及演讲会；游艺股下设有戏剧、音乐等会；平民教育股主要办理工人夜校，利用晚上教国语、珠算、算术、公民等科。① 由此可见，与早期的学生自治会相比，这一时期学生自治会的活动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抗战爆发后，随着战事的发展，1938 年，吴贻芳将学生自治会改组为“厚生团”。

（二）学生女青年会

到了 30 年代，学生女青年会在学校学生中扮演的角色日益重要。根据《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基督教青年会章程草案》的规定，金女大女青年会是以发挥基督精神，团结青年同学，养成完全人格，建设完美社会为宗旨。女青年会的具体目标如下：一、研究基督教信仰之基础；二、崇奉并传扬基督之福音；三、促进全校丰满团契生活；四、实行个人与团体之生活锻炼；五、团结立志献身社会之同学。该章程草案还对会员提出了明确要求：如必须具有灵性修养，实行简朴生活，言行真诚，严守时刻，养成合作精神，养成正义感及责任感。②

由上可以看出，金女大学生女青年会侧重于基督精神的修炼和学生间基督徒的联谊，并通过提倡社会服务来实践基督精神。金女大女青年会是全国基督教青年会的下属机构，而当时基督教青年会在中国活动的重点是“社会服务”，因此，“学生女青年会办有培幼小学，让附近失学儿童来校识字读书，由学生轮流上课，经费也由学生女青年会筹募管理。以后人数逐年增加，由学校女青年会捐款在学校对面建了平房，成立邻里服务处，将这个小学由半日制改为全日制，聘请了专职教师。还设了妇女浴室。又请校医每周去半天为附近的妇女儿童治病。这些为邻里服务的项目，经费都是向全校师生募集的。”③在从事社会服务的同时，在“暑假期间由女青年会全国协会领导，在风景优美地区举办

---

① 程斯辉、孙海英：《厚生务实 巾帼楷模——金陵女子大学校长吴贻芳》，第 165 页。

②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基督教青年会章程之草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六六八/197。

③ 吴贻芳：《金女大四十年》，载《吴贻芳纪念集》，第 111 页。

大学生夏令营，为期约一周，请教会名人演讲，举行座谈，开展文娱活动。”①

金女大学生女青年会还与一些科系联合组织团体开展活动。例如与社会学系联合组织了“乐群社”，开展以救国自强为主要目的的工作。1936年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校刊》第41期上刊载的《乐群社民国24年秋季工作》一文指出：“中华民族衰落之四大病症，为愚贫私弱。如欲救亡图存，惟有去除愚昧，启发民智，施以文艺教育，以培养智识力；增加生产，提高生活程度，施以生计教育，以培养‘生产力’；锻炼健全身体，减低死亡率，施以卫生教育，以培养团结力。”②可见，学生女青年会组织的团体已将自己的服务提升到提高国民素质，自强救亡的高度了。1937年，乐群社又开展了以下方面的工作：

一、在教育方面，举办平民夜校，设立手工班，为青年男女们组织四维社团，教授园艺、养鸡等方面的知识，并组织有益的体育活动。

二、在卫生方面，与南京市卫生事务所合作，每月组织一次母亲会，开展体检、免费接种牛痘及进行预防注射，并开放浴室，为母亲们提供服务。

三、在娱乐方面，放映电影，四维团戏剧演出等。③

青年会毕竟是一个基督教的组织，金女大学生女青年会的活动当然也离不开推进基督教信仰，促进学校的宗教生活。

吴贻芳在一次工作报告中记述说：“1928年女青年会的活动有祈祷会，逢星期四进行，星期日的晚祷会出席的人数令人满意。此外，设有自由参加的查经班，由教职员带领。”④在30年代初，金女大学生女青年会的主要活动之一就是基督教教义的传播。在金女大学生女青年会中设有布道部长、宗教委员长、主日学部委员等。她们聘请校外人士来校演讲，聘请校内外音乐家演奏；讨论及表演德育故事、举行祈祷会；向邻里妇女讲解基督教的教义，以及家庭管理与卫生常识等。

---

① 吴贻芳：《金女大四十年》，载《吴贻芳纪念集》，第111—112页。

② 程斯辉、孙海英：《厚生务实　巾帼楷模——金陵女子大学校长吴贻芳》，第172页。

③ 同上书，第172—173页。

④ 《金女大校长吴贻芳工作报告》(1928)，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六六八/1。

(三) 新生入学周

在每年秋季开学之初,金女大都要举办一个“新生入学周”。主要是因为一年级新生刚跨进大学的校园,既没有大学生活的经验,又对学校缺乏了解,因此,“每学年秋季开学之初有一个‘新生入学周’,对新生进行训练。教务处、总务处、校长室、学生组织等在这几天里分别介绍情况和规则,带新生参观图书馆,游览校园,帮助她们了解如何利用图书资料,熟悉环境。”①

“新生入学周”的活动是丰富多彩的。在1934年的“新生入学周”期间,学校向新生们介绍了金女大的办学宗旨和学校的发展历史;介绍学校的组织机构和各机构的职能;介绍学校的课程安排及学生组织情况;介绍学校的毕业生就职情况等,并参观学生女青年会举办的培幼小学与社会活动中心,观看反映金女大生活的电影等。② 金女大的新生来自全国各地,她们许多人是第一次离开家庭,单身来到一个陌生的环境。金女大举办“新生入学周”,就是针对新生的这一情况,进行入学培训,使她们熟悉环境,熟悉学校的规章制度,适应集体生活,为正式的学习生活奠定基础。

(四) 四年级同学退修会

四年级同学退修会是金女大创立的一种对跨入四年级,即将完成学业步入社会的学生进行人生教育和社会教育的形式。金女大规定,凡修满三年学程的学生,在进入四年级时,必须参加退修会。退修会一般在每年秋季开学前两天举行,由学校的教师作主题报告或演讲,然后学生们围绕主题展开讨论。例如1929年的同学退修会由师以法先生为四年级同学讲《生命的永恒价值》,学生们围绕“如何把所追求的价值实现在金女大的学校生活里”这一主题展开讨论。1934年的退修会由多位教师主讲,其中毕范宇先生演讲《如何发展健全人格》,马文焕博士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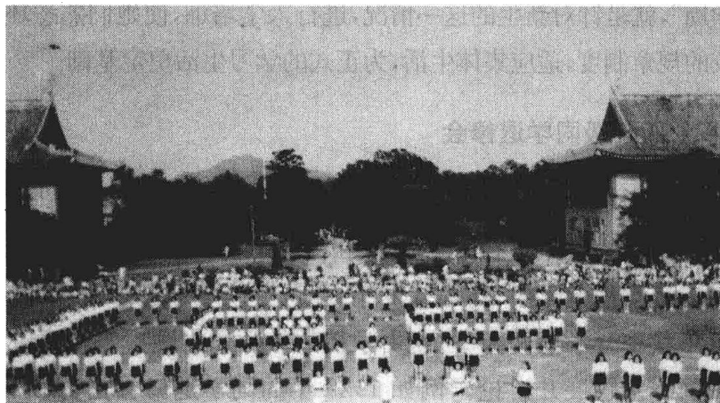
① 《私立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要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第11页,六六八/26。

② 程斯辉、孙海英著:《厚生务实 巾帼楷模——金陵女子大学校长吴贻芳》,第176页。

演讲《大学生对于社会之关系》，穆思曼女士演讲《团结精神于个人及团体生活之重要》，而校长吴贻芳则演讲了《最后一年如何达到我们的希望》。四年级学生在听完这些演讲后，围绕“如何希望大学教育发展我之健全人生”这一主题开展了讨论。[①] 金女大通过这种形式，促使学生们进一步思考人生价值问题和社会问题，并促使学生们把握好最后一年的大学生活，更好地跨出校门，走向社会。

（五）文体保健活动

金女大学生的课余活动是丰富多彩的，“有班级间的球类比赛、歌咏会、音乐会、辩论会等。也曾有为救灾举行各种义演。还有话剧表演，有中文的，也有英文的。师生的关系比较亲密。教师们常常参加学生的课余活动，有时与学生赛球……有时还参加文艺节目或话剧演出”[②]。金女大学生与教师一同参加文体活动，这不仅密切了师生的关系，而且使学生们的校园生活充满了生机与活力。



运动会上运动员在草坪上排出 G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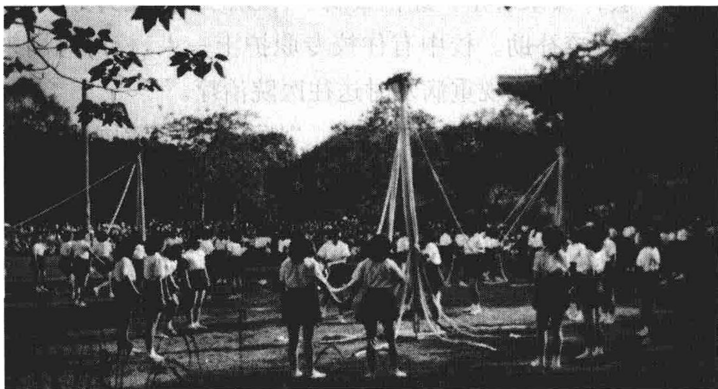
金女大除了有学生们必修的体育课以外，课余体育活动也很丰富。

---

① 程斯辉、孙海英著：《厚生务实 巾帼楷模——金陵女子大学校长吴贻芳》，第 178—179 页。

② 吴贻芳：《金女大四十年》，载《吴贻芳纪念集》，第 112 页。

"每学期都有班级间的球类比赛、民间舞蹈表演等活动。每年冬季来临前要举行一次全校运动会,每年春季要举行一次室外体育表演。"[①]除了室外的体育活动外,金女大也开展室内体育活动。1936年春季,金女大举办了室内运动会,项目有基本体操、国术、太极剑、韵律运动和体育舞蹈等。



学生五月杆舞

金女大还组织学生参加校外的运动会或其他体育比赛。例如,1934年,金女大的女子体育运动队代表南京市参加了全国运动会;1937年,女子划船队参加了由中国青年服务社在南京玄武湖举办的大中学生划船比赛,并获得大学女子组的冠军。[②] 在女子裹足或足不出户的年代,金女大大力开展形式多样的女子体育活动,提高女



体育教师宋鸿坦和代表南京参加全国运动会的女大学生

① 吴贻芳:《金女大四十年》,载《吴贻芳纪念集》,第111页。

② 程斯辉、孙海英:《厚生务实 巾帼楷模——金陵女子大学校长吴贻芳》,第183—184页。

子的身体素质，应该说是走在时代前列的。

金女大在开展校园体育活动的同时，也十分重视学生的保健工作。“每年秋季开学时都要进行严格的健康检查。新生检查体格后建立健康档案，由学校保存，定期复查。检查后，对有轻度骨骼问题如平足等的学生，教一套体操来矫正。经检查属于体弱的学生还另加营养伙食，经济困难者由学校补助。校中有住校专职护士一人，校医每周来校一次，治疗一般病痛，如发现重病及时送往医院治疗。”

学校的卫生保健设施也有了改善。“毕业生严彩韵姐妹捐赠的医务室除普通病房外，还有短期隔离病房。”此外，学校也重视学生的膳食营养，“学生的饭菜有必需的营养，并且在冬季注意保温，不叫学生吃冷饭冷菜。餐具清洁卫生。开水供应充分”①。金女大对学生的保健和膳食营养方面的重视，说明学校重视生命，珍惜生命，使学生们在学校能更好地学习和生活。

（六）社会服务与救济活动

金女大的校训为“厚生”，就是希望学生们在学校领受丰盛的生活，同时也能与他人分享这种生活。吴贻芳鼓励学生从事公益事业并服务于社会，并“特别强调为社会服务要见诸行动。”②在二三十年代，金女大学生的社会服务主要表现在为邻里服务方面。

金女大学生的邻里服务工作是多方面的。第一，开办邻里学校，为附近的妇女和儿童提供免费学习的机会。在邻里学校中，学生们自己担任教师，或聘请专职教师为妇女和儿童们上课。除了教妇女儿童识字外，还教授家政、手工艺等实用课程。如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超过三十名‘社会改革者’每周探访邻近居民，一些同学教导当地妇女编织。”③1933 年秋，学生们为邻里的男子开办了夜校，另为妇女开设了下午班。1934 年，学生们又为附近的妇女和儿童开设了手工艺班。魏

---

① 吴贻芳：《金女大四十年》，载《吴贻芳纪念集》，第 111 页。

② 同上书，第 112 页。

③ 黄洁珍著，吴梓明指导：《从吴贻芳与金陵女子大学看基督教教育理念的实践》，第 82 页。

特琳在 1937 年 6 月 20—22 日的日记中记述了手工艺班的学生毕业时的情况："今年，在我们学校旁还有另一个有趣的毕业典礼，8 名年龄在 14—19 岁的女孩子从家庭手工学校毕业。这所学校是我们的大学生为救助附近的穷苦女孩而出资开办的。我们鼓足勇气，邀请南京市市长夫人在毕业典礼上讲话，她接受了邀请，并对这 8 位女孩作了一个非常现实和有效的讲话，我相信她们对此将永生难忘……正如你们中的一些人所了解的那样，毕业的条件之一是每个女孩能够做一件毕业服装和一双鞋子。今年她们做得确实非常好。大学生们对这所学校的工作越来越感兴趣。在过去的一年里，有 12 位大学生在那里定期上课。"①1935—1936 年，金女大又筹款兴建了邻里中心，中心内设有日校、交谊室、医疗健康中心，为附近的妇女提供教育、医疗、职业培训、娱乐活动等。此外，金女大的学生们还走出校门访问邻里，为邻里提供一些帮助。再例如一些学生团体联合起来，"发起了在邻近地区消灭疟疾的运动，在学校周围的一些贫苦的家庭中，相当多的人从事了认识了解疟疾病例的活动。"②有些时候，一些学生每人定期探访邻里家庭，并尽可能向这些家庭提供帮助。金女大学生的社会服务活动，既培养了学生的关爱精神和实际工作能力，又为邻里们做了许多有益的事情。

当遇到自然灾害、战争等突发事件时，金女大的学生同样也伸出了援助之手，表现出她们的关爱精神。1931 年，长江、淮河流域发生了罕见的大水灾。灾情发生后，引起了全校师生的极大关注。吴贻芳向学生们介绍了灾民们流离失所的情景，并号召同学们要以实际行动救济灾民。学生们一致通过决定，各宿舍的交谊室冬天不生火炉，将节省下来的取暖费用全部捐赠给灾民。此外，学生们还捐钱捐物，救济灾民。德本康夫人记述说："1931 年的洪水——一场差不多危及全中国的灾害，激起了金陵师生的极大关注和同情。全校师生被号召起来，尽其努力，提供帮助，捐献了大量的钱和物。设立了一项专门的金陵基金，总数

① 明妮·魏特琳：《魏特琳日记》，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译，第 2—3 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以下引用该书皆为此版本)

② 德本康夫人、蔡路得：《金陵女子大学史》，杨天宏译，第 93 页。

达2 068.26美元。帮助在魔岭关*维修了一座水坝,买了一些种子,以备春种。在一段时间内,学生们在洪水威胁已经减弱的情况下回到没有暖气的宿舍里。通过一点一点的个人捐献,基金数又增加了204美元。"[①]

1932年,日军大举进攻上海,一·二八事变爆发。事变爆发后,金女大学生中一时流传日军已经到了无锡等传言,一时间校园里气氛紧张。在这种情况下,吴贻芳立即召开会议,一方面稳定学生的情绪,另一方面告诫同学们"爱国不是挂在口头上的,应该见诸行动。"[②]吴贻芳的讲话给学生们以很大的鼓舞。正在这时,南京鼓楼医院的有些护士由于害怕战火蔓延到南京,离开南京跑回了家,医院的护理工作受到了很大影响。金女大寒假留在学校的学生自发地每天去医院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护理工作,使医院度过了困难时期。

(七)参与爱国救亡运动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全国学生群情激昂,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活动。南京中央大学的学生上街示威,并到外交部,痛打了外交部长王正廷。在这样的形势下,金女大的学生也响应号召,准备上街游行和请愿。身为一校之长的吴贻芳并不是不支持学生们的正义行动,但是她冷静地思考后,将重点转移至"强国"与"自强"上。她认为是否参加游行并不是关键,抗日活动不能单注重形式,关键是要看其有没有实际的意义。她希望同学们从事一些有实际意义的、建设性的抗日活动。在吴贻芳的号召与推动下,金女大的师生将重点放在了抵制日货上。师生们组织了一个全国抗日救援分会,将学生组织起来,分成若干个小组,到大街小巷宣传国货,检查日货。此外,在吴贻芳的支持下,地理教师刘恩兰和部分学生举行了一次中国地理展览会,以中国的地理和疆界等方面的材料来激发同学们的爱国热情,宣传抗日。

---

① *原文翻译有误,应为南京市南郊的秣陵关。——作者注
德本康夫人、蔡路得:《金陵女子大学史》,杨天宏译,第79—80页。

② 朱学波:《吴贻芳》,第68页。

(八) 校园宗教生活

金女大毕竟是一所教会大学，因此，学生们在宗教课程之外，还参加一些校园宗教活动。在德本康夫人任校长时期，金女大在外籍教师的领导下，强调以基督教的人生哲学影响学生，通过宗教课程、参加宗教活动以及与学生的接触，使学生们接受基督教的理念。吴贻芳担任校长后，尤其是向政府立案注册后，宗教课程已不是必修课，而是选修课了，一些宗教活动也不再强迫学生参加，而是自愿参加，以保障非基督教学生的宗教自由。金女大通过这些宗教活动去关怀信教学生的灵性需要。

金女大设有宗教委员会，以师以法先生为主席，校园宗教活动也是多样化的，有主日崇拜、每天早祷、祈祷会、星期讨论会、团契等。

在 20 年代末和 30 年代上半期，金女大和金陵大学联合举行主日崇拜，星期日的宗教仪式是在金陵大学举行，由金陵大学聘请的牧师主持，两校学生自由参加。每日早祷一星期举办四次，由学校的教师或学校的女青年会安排。虽然早祷是自由参加的，但根据 1929 年的统计，参加的学生约占学生总数的 75%—80%。[①] 金女大的祈祷会一般每周四晚上举行，有时周日晚也举行，由女青年会举办。讨论会每星期举行一次，一般均邀请校内的教师主讲，其主题也围绕人生价值、上帝的存在、对基督教的认识、如何服务社会等。团契一般 1—2 周举行一次，每次由两位学生分别介绍所阅览的宗教书籍以及读书心得。每次团契还有几分钟的灵修分享，然后同学们召开讨论。

此外，一年一度的圣诞节、复活节，校庆、毕业典礼等，也都有宗教仪式、宣讲和宗教活动。例如，在 1928 年的校庆上，宣讲的内容是“信心的德行”；1929 年和 1933 年校庆时宣讲的主题都与发扬基督精神，改善人民生活，建设新国家有关。1933 年的圣诞节，金女大举行了联合音乐敬拜，女青年会也举行了音乐崇拜。1934 年，金女大的新教堂

---

① 黄洁珍著，吴梓明指导：《从吴贻芳与金陵女子大学看基督教教育理念的实践》，第 183 页。

正式启用，这一年的复活节崇拜仪式首次在新教堂举行，首先是讲道，然后有三位学生受洗。[①] 金女大通过校园宗教活动，净化了学生的心灵，培养了学生的基督化人格。据统计，1934 年，金女大学生中大约有三分之二为基督徒。[②]

第三节　系科发展与课程改革

一、系科的设置与调整

金女大在初创时只有文理两科，文科称为哲学组，理科称为科学组。学生们可以在这两个组中自由选择一个。1925 年以后，学校又调整了学科，设主修学科和辅修学科。学生在大学一年级修完规定的课程后，从第二年开始可以自行选择一个主修系和一个辅修系。文科主修系设有中文、历史、外语、社会学、音乐、体育、哲学等；理科主修系设有生物学、化学、数学、物理学、地理、医预科和护预科等。这种主辅修制度一直实行到 1939 年。此后，学校按照教育部的要求，取消了辅修系，仅设主修系。

从 20 年代后半期到 30 年代前半期，金女大在原有系科的基础上，新设立了一些系科，以适应社会的需要。具体如下：

1927 年，学校增设中国语文系，由缪镇藩先生担任系主任。

1928 年 9 月，金女大增设经济系（1936 年 9 月撤销）和哲学系。

1929 年秋，金女大与基督教女青年会全国协会合作，增设体育简易科，学制一年，以培养中小学体育教师。同年又增设数学系。

1930 年秋，学校增设政治系（1935 年 9 月撤销），并将一年制的体育简易科改为体育专修科，学制二年。

---

① 黄洁珍著，吴梓明指导：《从吴贻芳与金陵女子大学看基督教教育理念的实践》，第 194 页。

② 同上书，第 183 页。

1933年9月,增设了地理系和护预科。

1934年,又增设了物理系。①

护预科与原先设立的医预科一样,是金女大与北京协和医学院合作设立的。关于医预科和护预科,吴贻芳记述说:“医预科和护预科是与北京协和医学院合作设立的。主修医预科的学生必须读完协和医学院所规定的预科课程,同时顾到金女大必修的课程。读完三年的学生考入协和医学院,毕业时获医学博士和金女大学士学位。在金女大读完二年半护预科的学生,考入协和高级护理学校,毕业后如再回金女大读完大学的必修课程,可以获得本校的学士学位。”②

金女大的系科设置与学校教师所学的专业密切相关。在金女大创办之初,首批来校任教的是外国传教士,因此,学校根据这些教师的专业特长及所受到的训练设置系科,宗教系以及与宗教相关的系科首先设立起来,以后则逐渐扩充。由于金女大的办学目标强调为社会服务和适应社会建设的需要,因此,20年代以后,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和社会的需要,金女大及时调整了系科设置,逐渐加强了一些受社会欢迎的系科和专业,而停办了一些社会需求不多的专业,如1935年停办了政治系,1936年撤销了经济系。金女大在设置系科时充分考虑到女性的特点,在系科设置上尽量考虑设置一些社会上适合女性工作的相关系科和专业,如医预科、护预科、社会学系等。在这些系科和专业中,由于当时“中国女性从政或参与理工类工作的为数不多,且面临着要做贤妻良母的压力。因而金女大在系科设置中比较重视社会学系、医预科、护预科以及家政系和辅修系教育学的建设和发展。”③

经过近十年的发展,到1937年抗战爆发前,金女大共设有文理两科,并设有主修系和辅修系,主修系科达16个,这还不包括分别于1935年、1936年撤销的政治系和经济系。其中文科主修系科分别为中国语文、英国语文、历史、社会学、哲学、音乐、体育、体育专修科;理科主

① 南京师范大学校史编写组:《南京师范大学大事记》(1902—1990),第57—63页,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以下引用该书皆为此版本)

② 吴贻芳:《金女大四十年》,载《吴贻芳纪念集》,第107页,江苏教育出版社,1987。

③ 程斯辉、孙海英:《厚生务实 巾帼楷模——金陵女子大学校长吴贻芳》,第83页。

修系科分别为数理、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地理、医预科、护预科。[①]辅修系设有教育学、卫生、心理学、天文学、德文、法文等学科。

随着系科的发展，金女大的一些设施如图书馆等已不能满足学校发展的需要，于是，学校多方筹款，兴建了体育简易科用房和新的图书馆兼行政楼、大礼堂兼音乐系大楼等。1929 年，位于南京宁海路的体育简易用房建成，这是一座四合院式的平房，面积为 450 平方米。图书馆兼行政楼、大礼堂兼音乐系大楼主要由德本康夫人具体负责筹建。1931 年德本康夫人回到南京后，一方面担任教师和学校的顾问，另一方面就是筹建早在 1919 年就已规划设计的图书馆兼行政楼和大礼堂兼音乐系楼，以完成 1919 年规划设计的学校建筑群。1932 年 6 月，两幢新楼房开始动工兴建。经过一年多的施工，大楼基本建成，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工期延误，这两幢楼房直到 1934 年 4 月才交付使用”[②]。建成后的图书馆兼行政楼面积为 1 396.92 平方米，大礼堂兼音乐系大楼面积为 1 444.38 平方米。[③] 德本康夫人记述说：“图书馆是一个令人十分愉快的去处。那里环境幽静，非常有利于学习。一位学生捐献了 1 000元，用于购置图书馆的灯具。”[④]



金女大附中宿舍

由于金女大的毕业生有许多人从事教师的工作，因此，学校十分重视附属中学的建设，并将此作为学生的实习培训基地。1933 年，宋氏三姐妹即宋庆龄、宋美龄、宋霭龄向金女大捐赠了实验中学的宿舍，使金女大的附属中学

① 南京师范大学校史编写组：《南京师范大学大事记》(1902—1990)，第 57—63 页；吴贻芳：《金女大四十年》，载《吴贻芳纪念集》，第 109 页

② 德本康夫人、蔡路得：《金陵女子大学史》，杨天宏译，第 88 页。

③ 南京师范大学校史编写组：《南京师范大学大事记》(1902—1990)，第 60—61 页。

④ 德本康夫人、蔡路得：《金陵女子大学史》，杨天宏译，第 93 页。

有了较快的发展。德本康夫人记述说:“1933 年 4 月,一幢新的实验中学的宿舍建成。这是中国人捐赠给金陵的最大礼物。捐赠人是孙逸仙夫人宋庆龄、蒋介石夫人宋美龄、孔祥熙夫人宋霭龄姐妹三人。这一义举使 60—72 名学生有了住房,一所三年制的高级中学也因此得以发展起来;另外,由于有一个单独的地方作为教室,这就使实验中学成为教育系培训教师的样板。”①

值得一提的是,金女大附属实验中学 1924 年设立时仅仅是作为学生在毕业前的教学实习场所,当时只开设高三年级一班。此后,由于生源不断增加,学校遂扩大实验中学,并作为金女大的附属中学,其作用也不仅仅作为学生的实习场所了。从 1932 年秋季开学起,实验中学添设班级,并改为三年制,每班以 24 人为限,使其成为一所名副其实的高级中学。为了加强实验中学的管理,金女大特别要求教育系主任协助实验中学开展工作。1933 年 5 月,随着实验中学宿舍的建成,金女大也向南京市政府社会局申请立案,同时教育部也准予备案。立案后的校名改为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附属高级中学。至此,实验中学成为一所正规的高级中学。

二、教学管理与课程改革

金女大从创办到 20 年代中期,学校的各项工作逐步走向正轨,并形成了一套教学管理体系。吴贻芳出任校长后,为了培养高素质的为社会所需的人才,加强了学校的教学管理,使之更加充实与完善。可以说金女大之所以得到较高的社会声誉,与学校具有自身特色的教学管理体系有着直接的关系。

首先,金女大实行了一套严格的招生考试制度。金女大在创办初期,招生办法比较灵活,有考试入学的,也有直接推荐入学者。如吴贻芳本人就是经过推荐作为特别生进入金女大的,在入校半年后再经测试转为正式生的。即使是考入金女大的学生,也大多是教会女子中学

① 德本康夫人、蔡路得:《金陵女子大学史》,杨天宏译,第 88 页。

的学生或家庭景况较好的学生，以及具有基督教背景的家庭女子。20年代以后，随着金女大办学声誉的提高、中国女子教育的发展以及教会女中数量的增加，报考金女大的人数逐年增加，其生源主要还是来自基督教家庭和教会女中的学生。吴贻芳任校长后，针对学校生源较窄的局面，她认为这不利于选拔优秀的学生，同时也容易为社会所误解。吴贻芳主张逐步增加面向普通公立、私立中学的毕业生的招生人数，以改变生源结构。经过近十年的改革，金女大的生源结构有了一定的变化。1928年，在金女大在校学生中，来自基督教学校的学生占录取学生总数的87%，而到1935年，这以比重降为66%。详见表6。

表6 1928—1936年金女大在校学生来源情况表

年 份	来自大学附中及其他基督教中学(所)	来自公立学校(所)	来自私立学校(所)	来自教会学校比例(%)	来自公、私立学校比例(%)
1928	115	4	12	88	12
1929	135	11	20	81	19
1930	136	15	13	83	17
1931	160	14	18	83	17
1932	133	不详	不详	76	24
1933	152	不详	不详	72	28
1934	144	不详	不详		
1935	157	44	37	66	34
1936	181	40	38	70	30

资料来源：黄洁珍著《从吴贻芳与金陵女子大学看基督教教育理念的实践》，香港中文大学研究院哲学硕士论文，第139页，1996。

从表6可以看出，1928年以后，金女大学生生源结构发生了变化，即毕业于教会中学的学生比重呈逐年下降趋势，而毕业于公、私立普通中学的学生比重却稳步上升。

20年代以后，金女大在招生时逐步改变多种模式的做法，转而趋向于单一的考试制度。在入学考试中，金女大也从严掌握，严把考生的

质量关，从总体上提高了新生的素质。例如，1933 年报考金女大的学生有 219 人，经过考试，学校实际录取了 68 人；1934 年，报考金女大的考生有 226 人，而实际录取学生只有 79 人，其中还有美国学生 3 人。[①] 合格且优秀的学生是学校提高教学水平的基础，没有高素质的学生，学校的教学水平和社会声望也很难提高。金女大严把生源关，从源头上做起，使学校的教学水平稳步提高。

其次，金女大实行主辅修制。从 1925 年起，金女大实行了主辅修制，即设立主修科和辅修科，“学生可以选一个主修系，一个辅修系。这个制度一直实行到 1939 年，才按教育部的要求，取消辅修系，只有主修系”[②]。虽然这一制度 1939 年后被取消了，但后人对金女大的主辅修制给予了积极的评价：“金女大实行主辅修制是扩大学生知识面，对学生进行多方面的训练，以适应社会需要的积极举措。后来教育部将其取消，强调学科的高度专业化，虽有一定的理由，但从发展看是缺乏远见的。随着社会变化的加剧和发展的加速，尤其是科技的迅速发展及职业的此消彼长，要培养适应社会变化的学生，采用主辅修制不失为有效的办法。”[③]

第三，实行学分制、积点制和弹性学制。金女大对学生的成绩实行学分制，规定学生在修完一定的学分后方能毕业。根据教育部颁布的课程标准，修满 132 学分的学生方可申请学士学位，但在这 132 个学分中不包括党义、体育、军事看护等内容。在教育部规定的课程标准之外，金女大作为教会大学，还十分重视学生的外语学习，增加了 6 学分英语课程。金女大学分计算的标准为：在一、二年级时，每一学分系指每星期上课 1 小时，并且课外预习 1 个半小时而言；在三四年级时，每星期上课 1 小时，并且课外预习 2 小时而言；每星期实验 3 小时为 1 学分。

在 30 年代，为了进一步提高学生的成绩和办学质量，金女大还一

---

① 程斯辉、孙海英：《厚生务实 巾帼楷模——金陵女子大学校长吴贻芳》，第 101 页。

② 吴贻芳：《金女大四十年》，载《吴贻芳纪念集》，第 106 页。

③ 程斯辉、孙海英：《厚生务实 巾帼楷模——金陵女子大学校长吴贻芳》，第 103—104 页。

度将学分制和积点制合并使用。对此，吴贻芳记述说："金女大对学生成绩实行学分制。在三十年代有一段时间还执行积点制（Point System），就是说某门课程得六十分算及格，但得不到积点。积点的标准是根据各门课的学分多少和考试分数多少而定，学生毕业时除学分达到规定数目外，积点也必须达到要求。这个规定说明学校对学生成绩要求是较严格的。"①学分制要求某门课程只要考试及格，也就是得到60分即可拿到学分，而积点制的要求则更高，除了考试及格外，还要达到一定的分数才能得到积点。当时主要是由于太多的社会活动、不必要的礼尚往来、接物待客牵制和耗费了学生太多的精力，以至许多学生觉得力不从心，干扰和影响了学校正常教学工作的进行，且这种状况还有愈演愈烈的趋势，教员们对此也深感忧虑。而积点制的实施实际上是提高了对学生的要求，以避免和克服一些学生仅以及格为目标的学习态度。②

金女大的学分制具有弹性的特点。学校规定"学生如因健康或他种关系，宜少读学分者，校方可减少其功课，准许于4年以上修毕大学课程"③。对此，吴贻芳记述说："学分制还允许经济有困难的学生读了一个阶段后，离校工作一个时期，积一些钱，再来读满所要求的学分，不会因离校而失去学籍。成绩优良者在读好必修课程之余，还可以选读其他课程。许多毕业生毕业时学分总数往往超过规定。"④从学分制实施的效果来看，金女大对学生的学业管理既相当严格，又有一定的灵活性，使绝大部分学生都能够顺利地毕业。一些成绩优秀的学生，在读好必修课之余，还可以选修其他课程。因此，许多学生在毕业时学分总数往往超过学校的规定。

第四，严格的学籍管理制度。金女大对学生的学籍管理较为严格，在学生的注册、转学、休学、缺席、旷课、作息、毕业等方面均作了明确的规定。

① 吴贻芳：《金女大四十年》，载《吴贻芳纪念集》，第107页。
② 一说积点制是从1924—1925学年开始实施的。
③ 《私立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学生手册》，第5页，1940年9月。
④ 吴贻芳：《金女大四十年》，载《吴贻芳纪念集》，第107页。

关于注册的规定。金女大要求学生须在开学前一天到校，在训导处报到，并安排宿舍。在开学之日上午 8 时 30 分开始办理注册手续，学生应在注册后即行缴费。学生如欲早日到校，须经校方许可。除新生外，二、三、四年级学生可以进行预期注册，即在学期结束时，在主修顾问处商量预选下学期的课程，在取得课程单后再进行预期注册。新学期开学时，学生持预期注册单在各级课程指导员处注册。

学校还规定，学生如果选定课程之后又要更改，“须先得主修学系顾问之签字许可，取得学程更改单，再至课程指导员处得其签字许可后交至注册组，始能实行更改”。但注册 10 天后，除非得到课程委员会的许可，否则不得更改课程。“凡未经正式注册之课程，不得随意听讲”，“凡不能按时入校注册上课之学生，每课课程第一堂缺席做双倍缺席计算，其余缺席照常计算，缺席至三星期之久者，须少读若干学分。”①

关于转学、休学之规定。金女大的学籍管理制度规定，从其他公、私立大学转入金女大就读的学生，须进行资格考试。对从金女大转出者却没有具体的规定。在学生休学方面，金女大规定“因事自请休学者，须由家长或保证人来函陈请校长室核准，所缴学膳等费用一概不退还。若因疾病经校医诊断须休学者，则得退还膳费之一部。凡休学学生欲回校继续学业，须于开学前两个月，备函向本校教务处申请，经核准后方得续学。”②

关于缺席、旷课之规定。对于缺席，金女大有许可与不许可之分。对于许可之缺席，学校规定：“学生除因下列事故外，概不得缺席：一、疾病；二、正式代表学校出席（如参加竞赛等）；三、进行教职员指定工作。”这三种情况属许可的缺席，但要求因疾病许可的缺席，学生“须先得校医许可，病愈后，须领得校医准假证，缴注册组。否则，以旷课论”。住在城里的学生想回家就医养病，“必须先向训导处请假，校中得随时请护士前往诊视。不遵照此种手续办理者，概作旷课论（校外医师证明无效）”。因代表学校参加比赛等原因的缺席，“学生必须先得校务执行

① 参见《私立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学生手册》，1940 年 9 月。

② 同上。

委员会或课程指导委员会之许可，报告训导处，然后可以缺席”。因进行教职员指定的工作而缺席，“学生必须请求教职员先将理由、工作情形及缺席何课报告课程指导委员会，经该会同意后，始得缺席”。那些未经许可的缺席，即为旷课。对于旷课，金女大规定：“假期前后两日之缺席一律双倍计算，旷课缺席皆从每学期开课第一天起计算。”对学生可能遇到的一些特殊情况，学校又作了一些灵活的规定：“学生于每一学期内遇必要时，得自由缺席若干次，其次数为每一学分之学程，于每一学期内可缺席一次，每二学分之学程可缺席二次，余类推。”“学生缺席至三星期之多者，必须少读 4 学分；缺席至四星期之多者，必须少读 6 学分；若缺席至五星期之多者，则该学期所读的学程概不给予学分。学生之总平均若在 70 分以下，课程指导委员会得令其少读若干学分。”①对于迟到、早退，金女大也列入了缺席范畴内，规定：“学生上课或集会等三次迟到或三次早退，作一次缺席论。”金女大在办学过程中严格执行了这些规定，从而赢得了学校在教学管理上以严格著称的声誉。

第五，关于学生撰写毕业论文的规定。吴贻芳任校长后，金女大加强了学生研究能力的培养。从 1935 年开始，学校对学生增加了必须撰写毕业论文的要求。“毕业班学生必须写毕业论文。学生读满应该的学分，成绩平均达到七十分，才能在本主修系论文指导教师指导下，在四年级第一学期选定题目，通过专题研究、社会实践或科学实验，写出毕业论文。论文必须是个人自己的创作，不得抄袭他人的论著。到第二学期的第二星期交初稿，第八星期交正式稿，经系主任签字通过，认为已达到毕业要求，才能获得毕业文凭，接受学士学位。”②

第六，严格的考试评分制度。考试是检验学生学习情况的一种手段，与其他学校一样，金女大也实行考试制度。金女大将考试制度与评分制度结合起来，综合衡量学生的掌握知识的程度。金女大规定：“90—100 分为超等，80—89 分为优等，70—79 分为中等，60—69 分为

① 参见《私立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学生手册》，1940 年 9 月。

② 吴贻芳：《金女大四十年》，载《吴贻芳纪念集》，第 107 页。

劣等，不满 60 分为不及格。”①而对于 50 分以下的学生，“非重读不给学分”。每门课程的成绩由平时成绩和期考成绩两部分构成。“期考成绩占 1/3，平时成绩占 2/3”。学校还规定：“凡学生成绩低劣，不能达到毕业标准，或操行成绩不合本校训导标准者，本校得于任何学期终了时，予以警告或转学、休学、退学等处分。受警告之学生，在第二学期中即令为试读生，试读一学期，以观其有无显著之进步，有则仍改为正式生，否则，须受更严厉之处分。”②

金女大对学生的考试也作了严格的要求。在《私立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学生手册》中，专门有“考场规则”一章，规定：

甲、纸张、笔记本、书籍等，一概不得携入考场。

乙、参加同样考试之学生，必须分开座位。

丙、学生如有舞弊嫌疑及事实，即提交训导处按照情形分别惩办。

丁、学生有被人抄袭无法制止者，须立即报告监考员，否则，施受双方同等处罚。

戊、平日考试舞弊，照期考考场办理。③

金女大学生除了平日的考试和期考外，还要参加“主修系之概括考试”，以“使学生对其主修系有一正确与整个的概念”。如果主修系概念考试不及格，则下年度须再考。对于毕业生，还需要参加毕业考试。应当说金女大的一系列考试制度是严格的，这种严格的考试制度对提高办学质量、促进人才的培养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以及办学理念的转变，金女大在严格教学管理制度的同时，对课程作了相应的调整和改革。

金女大的毕业生许多人成为各类学校的教师。德本康夫人曾

① 《私立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学生手册》，第 5—6 页，1940 年 9 月。

② 同上书，第 7 页，1940 年 9 月。

③ 同上书，第 18 页，1940 年 9 月。

说："正如人们所期望的那样，金陵女子大学的毕业生从事教育的比例极高，因为在中国，女子能够从事的职业为数甚少。58%的金陵毕业生担任教师，大多数在中学教书。"①因此，教育系一直是金女大的一个重要的系科。然而金女大实行主辅修制以后，教育系却没有被列为主修系，而是列为辅修系。对此，吴贻芳解释说："教育学是全校学生的必修课，体现了学校的师范性质。可是教育系却只作辅修系，不作主修系，因为学校认为，学生毕业后如果担任教学工作，应当懂得教育学，具备正确的教学方法；但更重要的是能够掌握所教的知识。"②为了使学生们掌握更多的知识和更宽的知识面，金女大规定，"文科学生一定要选择一定学分的理科课程。一年级课程全部是必修的。四年大学的必修课除主修、辅修者外，还有中文、英文、中国历史、教育学、心理学、音乐、美术概论等，使学生在各方面都有一定的知识。"③

为了提高学生的体质，金女大也十分重视体育课程。体育课被列为必修课。"一、二年级每周有四节体育课，三、四年级每周有两节体育课，不及格者不能毕业。上体育课纪律很严，每个学生必须按教师的要求去做，内容包括各种体育训练，如徒手操，各种田径、球类活动等。体弱的学生可以不参加剧烈的体育活动，另设一班，让她们进行力所能及的活动。"④除了正常的体育课程以外，金女大还开展多种形式的体育活动，如球类比赛、舞蹈表演等，以进一步提高学生的体质和丰富学生的校园生活。

金女大的课程设置较为全面和完整，尤其是一些重点系科更是如此。吴贻芳校长将培养为社会服务的人才作为重要的办学目标，因此加强了社会学系的建设。社会学系的研修课程也十分全面。据统计，主修社会学系的学生除了要学习公共必修课程外，还必须修习35门课程。这些课程涵盖了社会学的方方面面。为了使人们更直观地了解

---

① 德本康夫人、蔡路得：《金陵女子大学史》，杨天宏译，第92页。

② 吴贻芳：《金女大四十年》，载《吴贻芳纪念集》，第106—107页。

③ 同上书，第107页。

④ 同上书，第110—111页。

金女大课程设置的全面与完整，现将社会学系的课程列于下表（表7）：

表7 金女大社会学系课程设置表

序号	课程名称	学分
1	社会学原理	3
2	社会问题	3
3	中国社会史	4—6
4	民族学	6
5	人口问题	3
6	社会统计学	6
7	社会制度	3
8	家庭	3
9	都市社会学	3
10	农村社会学	3
11	社会思想史	6
12	社会教育学	3
13	宗教社会学	3
14	经济社会学	3
15	社会变迁	3
16	西洋社会思想史	4
17	社区组织	3
18	儿童福利	3
19	社会心理学	3
20	社会研究方法	3
21	社会调查	3
22	个案工作	3
23	集团工作	3
24	社会事业与行政	3—6
25	近代社会运动	3

续 表

序 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26	社会病理学(或社会改造原理)	3
27	贫穷与救济	3
28	社会机关行政	3
29	合作经济	3
30	乡村教育	3
31	劳工问题	3
32	近代社会学原理	3
33	犯罪学	3
34	社会立法	3
35	精神病理社会工作	3

资料来源：程斯辉、孙海英著《厚生务实 巾帼楷模——金陵女子大学校长吴贻芳》，第88—91页，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

由上表可以看出，金女大社会学系的课程设置是非常全面和完备的，“纵使与当代一些社会学系的课程设置相比，也不逊色。它体现了课程设置的完整性与个性(对所关注热点问题的研究)的结合，体现了基础学科与应用学科的结合，历史与现实的结合，国内与国外的结合，体现了理论研究与实际能力训练的结合”①。

第四节 办学特色与社会声誉

一、学业特点与办学特色

如果说金女大在创办之初尚未形成自身的学业特点的话，那么到了吴贻芳任校长之后，金女大的学业特点就逐渐显露出来，并形成了自

① 程斯辉、孙海英：《厚生务实 巾帼楷模——金陵女子大学校长吴贻芳》，第91页。

身的办学特色。

由于吴贻芳所提倡的办学宗旨是淡化学校的宣教色彩，注重培养服务于社会的有用人才和学生人格、道德的养成，并在学校的管理中始终贯彻这一办学理念，因此，经过近十年的努力，金女大在学业上逐渐形成了自身的特点和办学特色。

首先，金女大的学生知识面广。这与吴贻芳主张文理兼通，注重学生广博的知识训练有着密切的关系。金女大主修文科的学生必须选修四个学分的自然科学课程，而理科的学生也必须选修一门社会科学的课程。所以吴贻芳说："金女大在学业方面有一个相当突出的特点，就是知识面广。"①

其次，金女大重视学生基础知识的训练，学生的基础知识较为扎实。金女大的课程设置较为全面和完整，专业基础课程的设置尤为完备，这就使学生们的基础知识较为扎实。这种扎实的基础知识，为学生们今后进一步的深造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吴贻芳曾说：学校重视基础知识，有利于继续深造。金女大医预科和护预科学生去考协和医学院和协和高级护士学校，没有不录取的；且入学后都能够很快地适应新的学习生活。②

第三，金女大十分重视外语教学，学生的外语水平普遍较高。学校对教育教学有明确的规定。吴贻芳在谈到金女大的教育教学时说："一二年级的必修英语，在二年级读完后举行一次英语概括考试，测验学生对英语的理解和运用能力。测验及格才准升入三年级，除主修或辅修英语者外，免试英语。如果测验不及格，必须在三年级补读一年英语，再参加概括考试，如果仍不及格，就须自动退学。在普通英语课中，每学期必须读若干本英语小说名著。英语系四年级的作文，教师批改后还个别辅导，十分认真。学生平时读、写、听、说英语的机会较多。除中文外，教师讲课多用英语，参考书也以英语者为多。记笔记、答考题、写报告也多用英语。每学期都有英语演讲会、辩论会，还上演英语剧。英

① 吴贻芳：《金女大四十年》，载《吴贻芳纪念集》，第107页。
② 同上。

语系还举行用英语讨论的英语文学座谈会。所以凡是金女大毕业生，不论主修哪一系，都具有一定的英语水平。”①

第四，金女大在教学方法上提倡启发式和讨论式教学。吴贻芳在学校大力推进启发式和讨论式教学，要求教师不要仅依靠教科书，而应该多让学生阅读相关的参考书，以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和独立分析、思考能力。对此，吴贻芳说：金女大“教师上课多不用课本，要求学生记笔记，广泛阅读参考书，写报告，自己解题，以培养学生自学能力。”即使是实验课，也“系统地、有顺序地训练学生独立操作能力”②。

第五，金女大十分重视体育，也重视学生的体质。金女大除了设有体育系外，还有体育专修科。因此，体育是金女大的强项。金女大不仅将体育课列为必修课，还规定体育不及格者不能毕业。“体育教师不仅教体育技术，对学生站立、走路、坐的姿势都很注意。学生的凹胸凸腹、弯腰驼背等不正姿势都需纠正。”正是因为金女大具有较强的体育运动实力，所以金女大体育运动队曾多次参加各种大型体育赛事。

第六，金女大重视学术交流，学校学术气氛活跃，学生视野开阔。吴贻芳校长十分重视与外界尤其是学术界的联系，经常邀请国内外专家学者来校为师生们作学术报告。仅从1933—1936年，来金女大作学术报告的专家学者就有几十人，其中包括：

1933年10月，外交部情报司司长李迪俊博士演讲《外交与情报》。

1933年10月，国防设计委员会专门委员王文山博士演讲《安内的基本问题》。

1933年11月，华中大学校长韦卓民博士来校致词，勉励学生贡献于社会。

1933年12月，外交部参事林东海博士演讲《新疆概论》。

1933年12月，全国经济委员会农业处副处长、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许士廉博士演讲《华北农村组织》。

① 吴贻芳：《金女大四十年》，载《吴贻芳纪念集》，第107页。

② 同上书，第107—108页。

1934 年 4 月，陈立夫应邀演讲《信仰与力量》。

1934 年 4 月，金陵大学农学院副院长章之汶演讲《从吾国农村的危机到吾辈青年的责任》。

1934 年 6 月，财政部赋税司司长高秉仿演讲《捐税与农村》。

1934 年 9 月，实业部矿业司司长、钢铁专家黄金涛演讲《钢铁对建设事业之功效》。

1934 年 10 月，曾任武汉大学校长的石蘅青演讲《到乡村去》。

1934 年 10 月，中央大学艺术科主任徐悲鸿演讲《游欧之经历》。

1934 年 10 月，全国经济委员会专员、曾任金女大政治系主任的徐国懋博士演讲《全国经济委员会之组织及事业》。

1935 年 3 月，中央大学教育学院吴南轩教授演讲《心理卫生》。

1935 年 3 月，美国著名政治学教授霍尔康博士来校演讲。

1935 年 3 月，波兰公使魏登涛夫人来校演讲。

1935 年 11 月，金女大毕业生郝映青回校演讲《实地农村服务经验》。

1936 年 2 月，中央大学政治学教授王季高博士演讲《国际局势与中国地位》。

1936 年 2 月，美国密歇根大学天文学教授罗佛司演讲，并放映天文知识影片。

1936 年 2 月，行政院秘书吴景超先生演讲《妇女运动之过去及将来》。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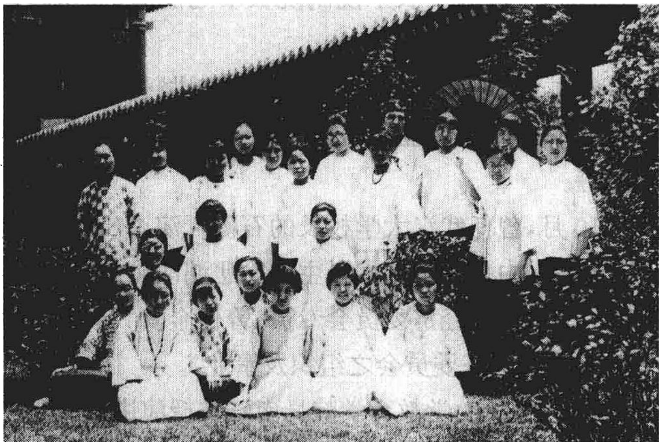
在邀请校外专家学者来校演讲报告的同时，金女大的教师也经常给学生作学术报告或演讲，介绍自己的研究成果。这种经常性的学术交流和学术演讲，开阔了学生的视野，使学生及时获得学术信息，有利于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和创造能力。

第七，金女大实行导师制。1938 年 3 月，国民政府教育部针对现行教育“偏于知识传授，忽略德育指导”的现象，曾颁发《中等以上学校导师制纲要》，要求导师对于学生的思想、行为、学业及身心等，均应整

---

① 参见程斯辉、孙海英：《厚生务实 巾帼楷模——金陵女子大学校长吴贻芳》，第 98—99 页；南京师范大学校史编写组：《南京师范大学大事记》(1902—1990)，第 57—63 页。

体观察，严密训导。



华群教授与1928年毕业生合影

金女大实行导师制要比教育部的规定早许多年。金女大早在20年代德本康夫人任校长时期就创立了导师制。吴贻芳出任校长后，又对导师制加以完善。金女大对导师的职责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导师应排定时间与本组学生作个别谈话和指导；应当召集学生举行讨论会、谈话会等，作团体生活之训导；导师应与学生家长取得联系；导师应熟悉学生所修课程，并向教务处接收学生的成绩报告；导师应知学生健康状况及加强锻炼、诊治疾病等问题，并注意其思想及行为；学生毕业时，导师应准备训导证书，此项证书为取得学位之必要证件之一。① 吴贻芳在谈到金女大实行的导师制时说："学校实行过导师制。每个学生可以找一位教师当导师。一位导师带八九个学生，用小组活动或其他方式帮助学生解决学习上、生活上及其他方面的问题。导师制密切了学生与学校的联系。"②

导师制的实行至少起到了两个方面的作用。第一，正如吴贻芳所说，"导师制密切了学生与学校的联系"。第二，培育了"家庭精

① 《私立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学生手册》，第19页，1940年9月。

② 吴贻芳：《金女大四十年》，载《吴贻芳纪念集》，第113页。

神”,营造了学校如家的气氛。这也正如金女大所说的“本校素来主张学校家庭化,学生在校不啻在家庭中,一切训导以此为目标,故有金陵大家庭之称。”①为了配合导师制,金女大还推行了姐妹班制度,以进一步营造大家庭的气氛。“这些措施使学生对教师和同学不仅有师生之情、同窗之情,还有亲情之感,毕业后仍然对母校有着浓浓的眷恋之情”。② 导师制的实行,既营造了学校的家庭气氛,通过导师的具体指导,使学生们在学业、生活、体质、心理等诸多方面都得到了健康的发展。

第八,金女大十分重视学生的社会实践。学生积极参加社会实践活动是金女大办学的一大特色。吴贻芳充分认识到社会实践在培养学生实际工作能力方面的重要性,她大力提倡学生参加社会实践活动,这也是她“培养人才、服务社会”办学思想的具体体现。吴贻芳在谈到金女大学生的社会实践活动时说:金女大学生在“学习中重视实践,如社会学系重视课堂教学与社会实践相结合,常常举行社会调查。当时有些中学没有理科实验,学生缺乏理科实验的基础知识,所以理科教师如蔡路得博士,从新生开始上实验课就系统地、有顺序地训练学生独立操作能力。她对实验操作要求十分严格,以培养学生严格对待科学的态度。”③在吴贻芳的大力推动下,金女大在重视基础知识学习的同时,形成了学以致用、重视实践的办学特色。

二、社会声誉的提高

金女大从创办到1937年抗战爆发前,经过20余年的发展,尤其是吴贻芳任校长后,在为社会培养有用人才和培养学生的高尚人格的办学思想指导下,学校逐渐形成了自身的学业特点和办学特色,并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其社会地位和社会声誉也显著提高。

---

① 《私立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要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第11页,六六八/26。

② 程斯辉、孙海英:《厚生务实 巾帼楷模——金陵女子大学校长吴贻芳》,第142页。

③ 吴贻芳:《金女大四十年》,载《吴贻芳纪念集》,第107—108页。

金女大素以教学质量高、所受教育毕业生素质好著称。早在1919年，美国纽约州大学委员会认为金女大学生成绩优良，所受教育程度与各大学相符，核准立案并授予学位。同时，设在美国纽约州的金陵大学托事部内的金陵女子大学托事部，获得美国纽约州大学对金女大学士学位的认可，并且在金女大获得学士学位的毕业生可以不经考试，直接进入美国大学的研究院深造，攻读硕士学位。① 校友严彩韵的妹妹严莲韵回忆说："1921年，19岁的彩韵姐从金女大毕业，是金女大第二届毕业生。这年秋天，她去美国波士顿史密斯大学专修食品化学和营养学。为了学习更多的知识，她又利用暑假去芝加哥大学攻读3门学科。后来3门均得了'A'。就在这年暑假，金女大有位学生张肖松申请去芝大攻读硕士学位，芝大校方因不知道中国学生的程度，不敢接受。但两星期后芝大又给中国方面来信表示愿意接纳中国金女大的毕业生，其理由就是芝大经过查询，获悉有一位金女大毕业生严彩韵，暑假时曾在芝大攻读3门学科，3门均获'A'等。由此芝大对金女大的教学水平表示认可，愿意接受金女大的毕业生进该校深造。当时，华群教务长曾特给我来信报告这个喜讯。"②在国内，金女大的毕业生也是成绩斐然。吴贻芳曾说："金女大毕业生虽然不算多，但在当时大学女毕业生还不多的情况下，她们在我国妇女界高级知识分子中占有一定比重，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在我国的教育工作、科技工作及其他领域有一定贡献。"③据统计，截至1931年，金女大共毕业学生188人，有106人从事教育工作，其中15人担任女子学校的校长，8



严彩韵

① 南京师范大学校史编写组：《南京师范大学大事记》(1902—1990)，第54页。

② 严莲韵：《我的大姐、营养学家——严彩韵》，载《金陵女儿》编写组编《金陵女儿》，第26页。

③ 吴贻芳：《金女大四十年》，载《吴贻芳纪念集》，第108页。

人担任教务长或校务监督;31 人在国内或国外的学校攻读研究生,其中 5 人获得文学硕士、5 人获得医学博士、3 人获得哲学或科学博士。正因为金女大的毕业生素质较高,口碑较好,所以金女大的毕业生供不应求。据统计,1931 年,社会各界到金女大招聘毕业生 87 人,而当年只有 36 人毕业,远远不能满足社会各界的需要。[①] 金女大医预科和护预科学生去考协和医学院和协和高级护士学校,没有不被录取的。其中金女大学生李季明“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协和医学院,并获得协和金钥匙奖(Golden Key)。”[②]



1933 届毕业生与老师合影留念

金女大社会声誉的提高,首先得益于学以致用、求真务实、服务于社会的办学指导思想。同时与吴贻芳的个人魅力也有着密切的关系。吴贻芳并不是出生于名门贵族,但她自幼就勤奋学习,刻苦追求,最后终于走上了大学讲台,并担任大学校长。这种人生经历在当时的中国妇女中是不多见的。吴贻芳在出任金女大校长之后,凭借她对学校创始人办学宗旨的理解,以及自己特有的办学理念,对学校的管理和教学

① 程斯辉、孙海英:《厚生务实 巾帼楷模——金陵女子大学校长吴贻芳》,第 95 页。

② 汪潜:《回忆我的母亲李季明》,载金女大南京校友会《金陵女儿》(续集)编写组编《金陵女儿》(续集),第 255 页。

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革，使金女大在高等教育界的地位显著提升，社会影响日益扩大。同时，吴贻芳也成为中国妇女界和教育界的名流。

德本康夫人在谈到吴贻芳时的一段文字，颇能反映吴贻芳的个人魅力和金女大地位的提高。现辑录如下：

> 在当时的中国，仅有3所高等学校是专门为女子开办的。即北平的女子师范学院，南京的金陵女子大学，以及福州的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因而十分自然，吴贻芳校长企图（试图）成为学校的发言人和一些重要组织的成员。在那些组织的活动场合，她行事的方式极大地增加了她的威望。1933年4月27日，她应邀到九江Rulison高等学校参加该校16周年校庆，发表演讲。该校从第一年开始便送了大批学生到金陵学习。这次外出，她还参观了另外4个城市，金陵有很多校友在这些城市的学校里教书。自从1919年德本康校长做了一次类似的访问之后，许多所这样的学校已经没有任何大学的代表前去访问了。
>
> 荣誉随之而至。不久，吴校长接到一份电报，邀请她出席1933年7月16日在芝加哥召开的为期一周的与世界事务相关的国际妇女会议，并在会上发言。一位在南京的朋友说，当一听到这个消息时她就知道，没有人比吴博士更能代表中国妇女出席这次盛会。尽管吴校长的暂时离开会给学校工作带来一些困难，但是教师们一致认为，她应该接受这一邀请。在出席了这次有许多国家的代表参加的国际会议之后，吴博士又赶到班夫，出席太平洋国际关系学院召开的会议（这是吴贻芳博士第三次出席该学院召开的会议）。在这两次会议上，她发表了大量的讲话，这把她带进了与金陵利益密切相关的人的圈子之中，使她能够通过这些联系，加深这些人对金陵的兴趣。最后4个月，吴博士在外国教会会议上发表讲话，这些会议在美国最大的33个城市举行。在那里她遇见了老朋友，也为金陵结识了一些新朋友。1934年5月，吴校长再次离开学校外出访问。这次出访的目的地是南海及附近地区，包括厦门、香港、广州、巴达维亚（印尼首都雅加达旧称巴达维亚）和

马尼拉。在所有这些地区，她都受到了金陵女儿的热烈欢迎，她们非常高兴能见到自己母校的校长，并非常自豪地把她介绍给自己的朋友。在这些地区，她发表了一些讲话，接受了大量的宣传采访，从而使金陵女子大学更加广为人知。

除了在海外从事这些活动外，吴贻芳博士还在中国基督教运动内谋求合作的执行委员会和顾问委员会任职。她是中国基督教协进会的副主席之一。她在任职期间的所作所为非常出色。她还用同样的方式在与政府教育工作有密切联系的委员会任职。她在北平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 3 年经历使她和许多公立学校的校长及各种委员会的成员建立了联系。她还适应形势需要，参与了旨在推进社会及教育事业的各种运动。①

由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吴贻芳的个人魅力以及她与外界的广泛联系，使金女大的影响不断扩大。随着金女大的声誉不断提高和影响的不断扩大，国内外一些著名的专家学者或政府官员纷纷拜访金女大。仅 1931 年和 1932 年两年，来访的著名专家学者或政府官员就有数十人。



吴贻芳校长 1936 年在美国华盛顿

1934 年 6 月，金女大在新建的大礼堂举行了毕业典礼。蒋介石和夫人参加了这次毕业典礼。德本康夫人记述说：“蒋介石将军及其夫人接受了吴校长的邀请出席了学生毕业典礼，给学校带来了意想不到的荣誉。蒋介石夫妇都加入了学校师生的行列，从科学厅门外一直行进到礼堂西门外。蒋向毕业班的学生发表了一个非正式的讲话，强调了宗教生活的重要性，鼓励高年级的学生在基督教大

① 德本康夫人、蔡路得：《金陵女子大学史》，杨天宏译，第 85—87 页。

学毕业之后，本着耶稣基督的精神，为社会服务。”①作为当时中国国家最高领导人的蒋介石亲自前来参加金女大学生的毕业典礼，是相当少见的，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金女大社会声誉的提高。此外，一些社会名人也向金女大捐款、捐物，如宋氏三姐妹为金女大附中捐助了宿舍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也说明了金女大社会声誉的提高和影响的扩大。

经过 20 余年的发展，尤其是吴贻芳出任校长后对金女大办学宗旨的调整和对学校管理及教学制度的改革，金女大为社会培养了一批又一批有用的人才，社会也给予了金女大积极的回报，那就是金女大在海内外影响的扩大和社会声誉的提高，这反过来又为金女大今后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① 德本康夫人、蔡路得：《金陵女子大学史》，杨天宏译，第 95 页。

第四章　抗战时期的金女大

第一节　高校内迁与金女大的应变举措

一、日军空袭与决定迁校

1937年夏天，中国华北的上空弥漫着战争的阴云。7月7日，驻华北的日军以一名士兵失踪为借口，突然向北平城郊的宛平城发起进攻，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日本蓄谋已久的全面侵华由此爆发。很快，日军就占领了天津、北平。8月初，为了扩大侵略，日本又以“虹桥机场事件”为借口大举增兵上海。8月13日，停泊在黄浦江上的日本军舰突然向上海闸北地区开炮轰击，日本海军陆战队也向闸北、江湾等地发起大规模进攻，中国军队奋起反击，淞沪抗战也拉开了序幕，这更使当时首都南京笼上了深深的阴霾。

两天后，即8月15日，日军就开始了对南京长达近4个月的空袭轰炸。当日下午2时许，日本海军木更津航空队的20架九六式陆上攻击机出现在南京上空。南京明故宫机场和光华门外的大校场机场两地分别遭到了250公斤重磅炸弹的轰炸。下午5时，第二批敌机再次对南京进行了猛烈的轰炸。一时间，昔日的文明古都里充溢着烟硝与血腥。机场、建筑纷纷被毁，无辜平民伤亡惨重。日机过后，繁华的南京城废墟遍地，满目疮痍，一片凄凉景象。此后，日军更是空袭频繁。据南京市政府1937年11月的统计，仅8月15日至10月15日的2个月内，日机在南京共投弹532枚，炸死我军民392人，炸伤438人，炸毁房

屋1 949间。[①]

此时,在金女大的校园中,往日宁静、祥和的假日氛围也被紧张与不安的空气所取代。早在8月初,金女大就成立了一个五人紧急委员会,讨论保护学校的应急措施,其中包括将贵重仪器和设备包装好,并储藏在学院大楼的地下室内;购买一批灭火器材,以备急需;把学院的档案转移到上海等。[②] 开始空袭后,空中时常回响的警报,使在校的师生们不得不被迫躲入地下室、防空洞,往往是一件事还没等做完就得急着转移。此起彼伏的隆隆爆炸声,不时冲击着人们的耳膜,提吊着人们的心弦,真所谓是惶惶不可终日。

所幸的是,金女大因远离市区且临近美国大使馆,当时并没有遭到袭击。然而在这种环境下,要开学上课却成了当时十分棘手的难题。虽然,国民政府教育部早在8月12日即下令南京市内的学校延期到9月20日上课,但到时的正常开学,在谁看来都觉得希望渺茫。魏特琳在8月29日给纽约金女大委员会的信中就写道:"我们希望能在九月二十日开学,然而我们说这种话只是为了要提起勇气,因为惟有奇迹的出现,南京到那时(九月二十日)才能和平下来……"。[③]

然而,奇迹终究没有能够出现。由于日军的空袭不但没有中断,而且在不断加剧、升级,8月30日教育部被迫再次下达指示:继续推迟各校开学的时间,并要求学校把所有学生送走。此时,人们意识到在南京开学已不可能。金女大将何去何从,这成为吴贻芳校长和老师们不得不思考的紧要问题。

其实,当时的国立大学不外乎有这样几种选择:一是战争期间关闭学校;二是留在华东,不顾日本人的干扰继续教学;三是迁移到非沦陷区的内地办学。大多数公立学校选择了迁移的办法,他们以极大的

---

①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南京市档案馆等合编:《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档案》,第6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

② 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主编:《魏特琳传》,第49页,南京出版社,2001。(以下引用该书皆为此版本)

③ 魏特琳女士致瑞倍嘉信,1937年8月29日。转引自胡华玲著《金陵永生——魏特琳女士传》,第5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以下引用该书皆为此版本)

热情把自己的学校迁往大后方，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实现抗日救国。例如，七七事变后，由于平、津两地相继沦陷，教育部决定让当时的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三所高校联合在长沙成立“长沙临时大学”。南京的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也决定于8月15日将学校立即迁往重庆。此外，在抗战期间内迁的高等院校还有同济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等总计70多所。

然而，对于外国人开办的教会大学来说，其实当时还有另外的一种选择，即利用自己的国外关系来避免日本人的干扰，留在沦陷区或濒临沦陷的地区继续办校。例如：上海的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广州的岭南大学等都纷纷迁入了外国保护地；燕京大学等学校甚至还在校园里挂起了美国国旗，试图使学校也变成享有治外法权的领地。由于起初日本人并不想冒犯西方各国，他们和后来的南京傀儡政府都没有完全无视西方人在通商口岸的特殊地位，所以有些教会大学直到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前，还勉强能够在华东继续办学。

但是，金女大作为美国人开办的教会大学，最终还是决定不留在南京开学上课，而迁校他处。其理由主要有：“一、在非战区的金女大学生家长不会让女儿来战云密集的南京上课。二、原在南京的学生家庭多已撤离他去。三、当时若要仍在各地度暑假的教员回到南京，不但很难找到交通工具，并且在日机空袭之下也是非常危险的。四、南京是国民政府军事策略中心，日机会继续不断地轰炸南京，同时日军必会来将之攻占。五、如果金女大仍如期开学，时局一危急，必难及时撤退女学生及教职员，因为船只越来越少。六、在日机日夜轰炸下，保护学生的



去成都的路上冒着空袭唱“我们的行进歌”

安全，责任着实太大。”[①]8 月 30 日，在接到教育部再次推迟开学指示的当天下午，校长吴贻芳就立刻组织召开了教工会议，就学院应在何处开学进行讨论。9 月 1 日，在吴贻芳的要求下，魏特琳女士制定了一个计划，将金女大的人员根据专业、学生和教工原籍分为几块，来确定迁校何处。

最后，吴贻芳决定实行分区教学，并选择武昌、上海和成都三个城市作为战时的办学中心。在其向教育部呈报的《二十六年度第一学期开学计划》中就写道：“本院地处首都，又系女校，学生来源计有十余省市，今在此种形势下，各家长多数不愿送学生返京肄业；且集处此间，不但防空设备难求安全，即课业亦难静心学习。若另觅安全地点，迁往教授，则校舍等又咄嗟能办，故拟暂用分区教授办法，俾可各得便利……查本学院学生，现在聚集及最易集之地点，经统计结果，以上海、武昌二处为最。至于安全，莫如成都。兹除本学院仍在静候南京局势稍佳，能开学时即开学外，特就上列三处接洽合作，以维持学生学业。”[②]

二、武昌办学

1937 年 9 月 2 日，吴贻芳和魏特琳一起写信给武汉的华春（音译），提出让部分女大学生在那里入学，并决定在那里成立一个临时的金女大委员会，委员会的成员包括张肖松、陈品芝和伊娃·韩博士。另外，当日上午金女大还派娄小姐前往武昌，处理办学的具体事务。[③] 9 月 9 日，在武昌的教师发来电报，说一切都进展得



张肖松

① Minnie Vautrin, “Ginling College, Nanking, China” (Oct. 26th, 1937), UBCHEA (IV—18). 转引自胡华玲著《金陵永生——魏特琳女士传》，第 55 页。

② 《私立金女大拨补助费及其他经费书表（一九三七——九四五）》，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全卷宗五，教育部档，案号 4749。

③ 明妮·魏特琳：《魏特琳日记》，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译，第 36—37 页。

很顺利，华中大学愿意接受金女大的30名学生，并同意学生在那儿选课学习。张肖松已经在那里开始帮助学生们进行注册。至此，武昌分校的办学计划便已初步实现了。9月14日，龙冠海博士携社会学的参考书籍离开南京赴武昌，社会学系决定移至那里开学。9月18日，金女大又通知所有生物专业的学生去武昌，他们在陈品芝博士的领导下也将在那里开始学习。此外，9月20日、21日，刘恩兰、陈中凡两位老师也先后由南京前往武昌，分别到那里教授地理和中文。

然而，当时武昌的办学条件实际上也是比较艰苦的。华中大学的宿舍只能够容纳部分的女大师生，还有一部分只能住在由教会房子改成的宿舍中。另外，武昌也有遭受日机空袭的危险。1937年9月24日下午，日本飞机就在汉口、汉阳和武昌三地进行了轰炸。虽然敌机原先准备轰炸的是弹药库，但却炸到了贫民区，炸死、炸伤200多人。此外，他们还击中了武昌的一所天主教学校，这自然不能不让在南京的金女大老师们担心不已。魏特琳女士在其9月28日的日记中写道："我们正在焦急地等待武昌方面的来信，因为，自从那里被轰炸后还没有收到他们的信，为此我们非常担心。我们知道我们的学生在那儿挤在一间不大的宿舍里，而且他们可能还没有防空洞。"①

条件虽然如此艰苦，但金女大师生间的深深情意以及高涨的爱国热情，还是让武昌分校的办学顺利地延续着。由于冬天的临近，在武昌的学生大多缺少冬衣，老师们便决定将尚留在南京的衣服送往武昌。但当时船只紧张、江水湍急，交通十分不便。10月3日下午，魏特琳等七名教师员工乘坐了向有关方面借来的一艘小艇，沿江而上10多英里去寻找西行的趸船，找到后又克服水急浪高等种种困难，硬是将40籍书籍和行李无一遗损地吊上了"巴特菲尔德号"船。其后凯瑟琳女士还亲自护送行李到武昌，给那里的学生们带去了温暖与帮助。

10月30日是金陵女子大学的校庆日。10月29日，在南京的吴贻芳校长就给武昌的学生们发了这样一份电报："我们民族的抗战向金陵

---

① 明妮·魏特琳：《魏特琳日记》，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译，第78页。

女子文理学院的全体人员提出了挑战，要求她们积极地追求丰富的生活，无私地奉献自己的一切。"[①]第二天，她又向各地的学生发电报说，"愿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全体成员通过不懈的自我修炼，无私地承担起民族的危难，使自己无愧于学院创始者和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理想。"[②]校庆当天，武昌分校也给南京发来电报说："虽被分开，但不沮丧，依靠信念，不久又会欢聚一堂。母校久长。"[③]正是他们共同的信念——挽救民族危亡、重建美好家园，激励着他们克服困难，勇往直前。

但是，由于淞沪会战的失利，南京变得岌岌可危。另外，大量由前方退下来的伤员从武昌经过。他们血肉模糊、断手缺腿的惨状既让人为之同情，同时也使武昌的人们为自己的命运越来越感到不安。当时在华中大学等一些学校中，部分学生已经开始悄悄地离校。此时，吴贻芳等老师们也意识到，日军侵占南京后，进攻的下一个主要目标就会是武汉，武昌也不是久居之地。所以，武昌分校不得不继续西迁。1937年12月3日，吴贻芳便离开南京去到武昌结束那里的事务。1938年1月吴贻芳与武昌的师生一同去了成都。至此，仅为期三个多月的武昌办学即宣告结束。

三、上海分校

上海是金女大选择的另一个办学中心。上海是淞沪会战的主战场，较之南京自然更为动荡不安，也更有可能很快被日军占领，成为沦陷区。吴贻芳她们又怎么会将这样一座危城作为其延续教学的中心之一呢？这主要是由于当时上海市区内有"租界"这样一块招牌。即使上海四周已被日军侵占，但英法等西方国家享有治外法权的特权，上海的租界地区尚不会很快被危及。另外，金女大作为一所教会大学，自然也

---

① 明妮·魏特琳：《魏特琳日记》，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译，第125页。
② 同上书，第126页。
③ 同上书，第127页。

方便与上海地区的教会学校相联系，以便寻求帮助。

1937年9月7日，吴贻芳与南京的在校教师就商量着要去上海为金女大在那里的办学进行早期准备，最后决定由王明珍当日下午就动身前往。9月17日，王明珍由沪返宁，并报告了上海方面的情况。她说，进展并不理想。在上海的35名学生中，只有4人的父母同意她们离开上海。但法租界与公共租界却又都以担心增加租界危险为由，不愿意新的学校在那儿开学。而上海大多数基督教学院和大学的校长们虽然说他们希望能在10月1日开学，但实际上他们都还没有制定具体计划，而且他们的精神状态也很差，显得较为颓废。此外，王明珍还亲自看了租界内的情况。她说，那里非常拥挤，人们也无法摆脱枪声与飞机轰鸣的干扰。[①] 这无疑给满怀希望的金女大老师们当头泼了一盆冷水。

但吴贻芳并没有就此放弃。9月21日，她写信给上海圣约翰大学的代理校长孙先生，商量与之合作办学的计划。9月29日，金女大收到圣约翰大学的回信说，他们欢迎金女大与之一起行动，并于10月15—16日注册，18日开学。这无疑又为吴贻芳在上海办学计划的实现提供了条件。不久，蔡路得、克馥兰等老师便前往上海去组建金女大的第二所分校。10月2日，蔡路得等在上海潘亭街321号A座租下了一所带家具的小公寓，并在韦尔路999号建立了一个上海分校临时总部。她们已在那里开始为金女大的学生进行注册了。同时，由于学校要到10月18日才正式开学，她们还计划为仅有的7名新生再进行一次入学考试。[②] 这样，



上海的师生为成都的华西坝办学点运书

① 明妮·魏特琳：《魏特琳日记》，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译，第55页。

② 同上书，第83页。

金女大在上海的办学中心也就较为顺利的成立了。

其实，当时的金女大上海分校由于受条件限制，除了在女青年会全国协会借了几间房间，由蔡路得、克馥兰、陈黄丽明、朱谢文秋、胡惜苍等几位教师负责教课外，学生大多是在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以及后来迁来上海的杭州之江大学、苏州东吴大学这四所学校中选课学习。而此时上海的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也已经不能在原来的校址上课了。沪江大学用的是原沪江商学院的房子，圣约翰大学以及杭州之江大学、苏州东吴大学则是在建成后尚未开张的大陆商场租用了一些房间上课。所以说，当时上海的办学条件也是十分艰苦的。在这些大学中，只有圣约翰大学有一些简陋的实验设备和一个小图书馆。另外，由于入学人数增加，宿舍日益拥挤，读书学习的地方也变得极为紧张。无处可去的工友们夜晚只能睡在桌子上，白天再把铺盖卷起放在屋子角落里。由于还有许多逃难的家庭也栖身在大陆商场里，他们使得整座楼房更为嘈杂，要为那些用功的学生提供必要的学习环境几乎成了不可能的事。但即使是在这种简陋的环境中，各个学校出于它们的爱国责任，仍然尽量开出了全部课程，而莘莘学子也依然在为挽救祖国危亡而努力拼搏，勤奋学习。

然而，在沦陷区的办学毕竟不同于在内地，因为在日军的包围监视之下，许多学校为了掩护学生，都不得不限制他们的课外活动，以求尽可能少招惹日本人，尤其是军事和宣传方面的活动是受到严格控制或根本禁止的。例如，东吴大学当时就曾为学生的课外活动作了以下规定："未经事先允许不得张贴通告，不得进行演说或举行集会；所有课外组织必须备案，必须只限于教育、宗教或社会性质的活动；学生不得在校外利用学校名义组织团体或出版刊物。"①燕京大学制定的关于课外活动的规则就更为严格。除了膳食、宿舍和社会生活方面的组织以外，学校停止了学生自治会的一切活动；所有其他的学生组织必须备案，集会必须经过批准。学生不得订阅或拥有当局不满的书籍；学生不得张

---

① 卢茨：《中国教会大学史(1850—1950)》，曾钜生译，第347页，浙江教育出版社，1988。(以下引用该书皆为此版本)

贴告示；发表文章须经批准，学生离校之前必须先登记……①

虽然这些规定是高校应沦陷区的特殊环境不得已而提出的，但毕竟还是引起了一些人尤其是非占领区进步人士的批评与不满，甚至这些学校有的还被怀疑与日本人相勾结。另外，由于缺乏图书与实验设备，学校在管理入学考试、评分标准以及课程要求等方面的规章制度也不像以往那么严格，所以它们的教育和学术水平也受到了质疑。这也是当时在上海孤岛及各沦陷区办学比在非占领区更显艰辛和困难的地方。

金女大在上海创办的分校也并没有持续很长的时间，由于考虑到当时已有几所教会大学集中于上海，足够这一地区教学的需要。另外分区办学，学校的人力财力耗费较多，且学生的精神训练也很难达到步调一致，所以吴贻芳校长决定放弃在上海办学，遂于 1938 年 3 月 28 日前往上海办理结束事宜。当时，学校给了上海的学生三种选择：一、随学校去成都上学；二、继续在上海借读；三、转学到上海的其他学校。结果有 5 名学生随 6 位教师去了成都；31 人仍作为金女大的学生在上海几所教会大学借读，直至毕业；其余的转学到圣约翰大学。②至此金女大的上海办学也就宣告结束。

从 1938 年 4 月起金女大的办学就已基本上全部集中到了成都，直至抗战结束后的 1946 年初，学校才又重新迁回南京。

第二节　魏特琳与南京校区

一、危机重重的南京与不愿撤离的魏特琳

南京的秋天历来短暂，很快瑟瑟的寒风就开始卷扫满地的落叶，冬天的脚步已经临近。但日军飞机低沉的轰鸣仍不时地在空中回响，空

① 卢茨：《中国教会大学史（1850—1950）》，曾钜生译，第 347 页，浙江教育出版社，1988。

② 吴贻芳：《金女大四十年》，载《吴贻芳纪念集》。

袭的爆炸声依旧此起彼伏。满地的废墟，浓重的烟硝，纷纷逃难的人群，使此时的南京更显悲凉与凄惨。11 月 2 日，《字林西报》上刊登了一则消息，该消息援引日军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大将的话说，上海将在 10 天内被日军包围，与南京的一切联系将被彻底切断。这顿时让南京城里更是充满了恐慌与不安。但不久，不幸的预言就得到了应验。11 月 11 日，最后一支中国军队撤出了上海。翌日，上海就沦陷了。很快，日军吉住良辅的第九师团主力就沿着京沪线(今沪宁铁路)向西发动了进攻。11 月 19 日，苏州被攻占。11 月 25 日，日军又占领了无锡。11 月 28 日，日本参谋本部又向华中方面军发出命令：向南京追击。12 月 1 日，日本军事当局以大陆命第七号，下达了华中方面军的正式战斗序列令。接着又以大陆命第八号下达敕令："华中方面军司令官须与海军协同，攻占敌国首都南京。"①

上海沦陷以后，大批撤退下来的军队和伤员来到南京，同时也涌来了不计其数的难民，南京城里是一片恐慌和混乱。其实，早在 10 月 29 日，蒋介石在国防最高会议上就曾作了《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与抗战前途》的报告，提出了迁都重庆的问题。到这时，国民政府各部门更是加紧了迁移的准备工作。11 月 15 日，拉贝先生在日记中就记述说："在交通部里，我确信政府正准备撤离南京。交通部走廊上和办公室里放满了皮箱和木箱。人们打算迁到长江上游的长沙去。我去了铁道部，那儿的一个杂工偷偷告诉我，铁道部明天也要装箱打包。"②11 月 22 日，南京国民政府便正式发表了《迁都重庆宣言》，声称："迩者暴日更肆贪黩，分兵四进，逼我首都……国民政府兹为适应战况，统筹全局，长期抗战起见，本日移驻重庆，以后将以最广大之规模，从事持久之战斗……"③见到政府各部门已纷纷西迁，南京的百姓也是扶老携幼，举家逃难。在如此危难、紧急的情形下，金女大的南京本部又将如何应对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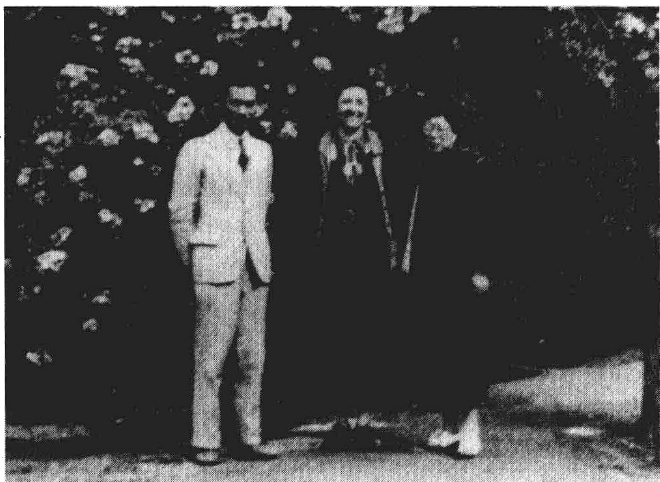
人人皆知南京今后的局势难以预料，尤其是日军进城以后的情况

①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一卷第二分册，齐福霖译，第 109 页，中华书局，1918。

② 约翰·拉贝：《拉贝日记》，第 85 页，江苏人民出版社、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

③ 南京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宣言》，《申报》，1937 年 11 月 21 日。

更是不堪设想。所以，这时尚在金女大南京校区的部分教师也开始纷纷撤离，即使是一些女勤杂工也在准备离开。但就在这危急的时刻，有三个教员却自愿地留了下来，承担起保护学校的重任。她们是魏特琳、陈斐然和程瑞芳，由魏特琳负总责。



三人留守小组成员(左起：陈斐然先生、魏特琳女士、程瑞芳女士)

1937年，魏特琳已经51岁了。为了躲避日机的轰炸，她几乎每天还要和学生们一起躲入阴暗潮湿、蚊虫众多的防空洞，有时一待就是几小时，甚至晚上也不例外。而且，由于日军的不断空袭，学校经费透支，魏特琳此时拿到的薪水只是平时正常工资的60%。但就是在这样战火纷飞、动荡不安的环境中，她依旧无怨无悔地辅助着吴贻芳校长操办校务，辛勤地劳作、四处地奔忙。

当时有很多人规劝魏特琳离开南京，回到美国。早在1937年8月19日，魏特琳就从广播中得知，所有在上海的美国人都已经被通知撤离上海。8月22日，金陵大学的美籍教师洛辛·巴克给魏特琳打来电话，通知她说：美国大使馆希望所有的美国妇女和没有特殊原因的男子要作好撤离南京的准备。8月27日，美国大使馆又给魏特琳送来一封措辞比较强硬的信，要求所有的美国公民撤离南京，同时告知魏特

琳，美国大使馆的妇女第二天也将撤离南京。信中表示，如果她不撤离南京，今后发生的一切事情，美国大使馆将概不负责。9月4日，美国大使馆官员佩克先生再次向魏特琳传达了美国国务院的指示：建议撤离所有美国公民。他认为在当时的形势下，可以说中国没有一个地方是安全的，所以也力劝魏特琳离开南京回国去。另外，金女大的老师们也没有强留魏特琳的意思。早在8月初，吴贻芳校长就认为她应该撤离，但她始终没有走。即使到9月20日，传来一个可怕的消息：日本为尽快结束战事，将于明日对南京进行全面的大轰炸。这同样没有让魏特琳有丝毫的动摇。12月1日，美国大使馆召集所有仍留在南京的美国公民开会，并将与会者分成三组：一、立即要离开南京的人；二、暂时必须留在南京，不过愿在最后关头乘美国炮艇离开，若届时所有城门已告关闭，愿借绳索吊下城墙外；三、无论如何都不离开者。① 两天后，美国大使馆给魏特琳打来电话，要她必须在上面的三种选择中选择一项，并签上自己的姓名。魏特琳依旧毫不犹豫地在最后一项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魏特琳为什么始终不愿离开南京呢？是什么让她对这座已是千疮百孔的城市那么眷恋不舍呢？我们还是用魏特琳自己的话来解释吧。8月27日，魏特琳在日记中写道："我认为我不能走，因为我要是走了，正承受着巨大压力的吴博士除了要做她现在正在做的事情外，还将不得不承担应由我做的那份工作。我觉得我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18年的经历，以及与邻居14年的交往经验，使我能够担负起一些责任，这也是我的使命，就像在危险之中，男人们不应弃船而去，女人也不应丢弃她们的孩子一样。"②这些言语十分的朴实、明了。她不愿意走是因为自己的离开要加重他人的负担。她对金女大，对她的学生以及她的邻居和伙伴们都有着极为真挚而深厚的感情，她将他们视作是"男人的船，女人的孩子"，是她不可推卸的使命与责任。

在9月18日的日记中，魏特琳又写道："当人们最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却离开，在我看来这是丢掉了一次需要我们服务的绝佳机会。

---

① 胡华玲：《金陵永生——魏特琳女士传》，第66—67页。

② 明妮・魏特琳：《魏特琳日记》，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译，第29页。

当然，我们应该自己承担留下的风险，并使传教董事会和大使馆清楚地明白这一点。如果我们留下将威胁到中国同事的生命时——我们认为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我们应该尽快离开。”[①]10 月 9 日，魏特琳又写下：“我深深感到，对基督教领导人来说，现在正是为教会服务和领导其成员救济百姓，从事各项有益工作的绝好时机。我还感到，现在是我们基督教徒更深刻地理解基督教教义的绝好时机。”[②]从以上这些话中我们又可以看出，魏特琳的留校又不仅仅是为了金女大和她的学生、同事，她还是出于她传教士的身份和使命。她认为宗教就是为了帮助那些受苦受难的人们而产生的，教会的责任就是让人们脱离苦难，过上幸福的生活。所以，她留在南京更是为了帮助饱受战争煎熬的中国人民。

为此，魏特琳甚至曾经想用她自己的方式来阻止这场战争，用道义的力量来感化那些热衷于动用武力的人。她在 8 月 11 日的日记中写道：“全世界的道义力量能够被动员起来反对战争、反对所有国家的战争机器吗？”[③]8 月 14 日，她写道：“在我看来，各国都有许多人、和平组织、宗教组织及文化组织，如果我们能联合采取行动的话，是会产生影响的。我的想法是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对日本的军事集团及平民施加压力，迫使日本从中国的领土上撤走其军队……由于我们对热爱和平的日本人——日本的工人、农民怀有友好感情，我们保证随时准备帮助这些团体。”[④]虽然，这些试图用宗教和道义等手段来阻止战争、换取和平的设想都是无法实现的空想，但从中我们可以看出魏特琳的正义与善良，看出其渴望和平的良好愿望。

二、避难所与活菩萨

1937 年暑假过后，金女大南京校区在日军的狂轰滥炸下，始终没有

---

① 明妮·魏特琳：《魏特琳日记》，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译，第 57 页。
② 同上书，第 94 页。
③ 同上书，第 10 页。
④ 同上书，第 12 页。

能够开学上课。教师、学生们分批地迁移到了外地。它已经不是一所实际意义上的学校了，只不过是一个指挥部。吴贻芳校长和一些教师在这里指挥着其他各分校的创办和教学，并且尽可能地保护学校的仪器和设施不在敌机的空袭中损毁。然而，上海陷落之后，这个指挥部也无法继续维持了。国民政府西迁后，尚留在南京校区的许多教师、校工也纷纷撤离。12月2日，吴贻芳校长为了学校的发展和前途也离开了南京。此时，眼看着日军进城已成必然，南京校区在这场浩劫中又将如何应对呢？

随着日军向南京的步步进逼，大批难民涌入南京。这些衣衫褴褛、没有栖所的难民激起了魏特琳的无限同情。早在11月17日，魏特琳就致信美国驻华大使馆，建议在南京城里建立一个安全区，赶在日军攻入南京前，预先为那些无法避难的贫苦妇女、儿童，及其他市民设立一个较为安全的场所。她在信中说："我认为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从地理位置和建筑物的牢固性来说，作为（安全）中心是再合适不过了。如果这里被用作人道的目的，那些出资捐助者们（指美国资助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教会组织）也一定会很乐意的。若本校被指定为（安全）中心，我们准备立即腾出楼下的房屋，准备好大房间，以备万一。"[①]这一建议得到了美国大使约翰逊的赞同。在多方协商之后，终于在12月1日晚上，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拉贝先生在北平路中英文化协会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宣布了安全区正式成立。而金女大正在这个安全区的范围之内，这个消息让魏特琳欣喜不已。

很快，魏特琳他们便投入了为迎接难民的准备。12月1日当天，由魏特琳、陈斐然、程瑞芳等组成的金女大紧急委员会举行会议，决定组织一个由6名工人组成的治安小组。学校一边为他们提供训练，一边还为他们制作臂章。会议还决定由金女大旁邻里学校的教师薛小姐把她的学生组成一个难民服务队，并训练他们，为他们准备胸章。在随后的几天里，他们又把大部分的家具从中央楼、科学楼、音乐楼和实验学校里清理出来，并把几个宿舍清理完毕，以供难民们使用。另外，魏

① 魏特琳致美国驻华大使W.R.佩克的信，载[日]南京事件调查研究会编译：《南京事件资料集》，第125页，青木书店，1992。

特琳和中国同事还制定了一个分配房屋的方案，标出有多少房间能提供给难民使用以及如何使用。她还特地安排了一些少年，为难民引路，把她们带到各自的房间。所有这一切在魏特琳的安排下有条不紊地进行着。从 12 月 8 日起，金女大南京校区就开始接收难民了。而到 12 月 11 日中午，校园里便已有 850 名难民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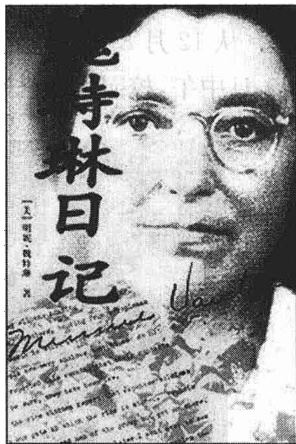
金女大难民所工作人员合影
（前排左三陈斐然、左四魏特琳、左五程瑞芳）

1937 年 12 月 13 日，中华民国的首都南京城沦陷了。很快，疯兽般的日军开始对南京进行大扫荡，奸淫掳掠、屠杀平民，无恶不作。仅 12 月 16 日一天，日军在中山码头、鱼雷营、汉中门和江东门四处，就屠杀了 24 000 余名中国的俘军与百姓。至于抢劫财物、奸淫妇女等其他罪行则更是不计其数。南京城顿时火光冲天、哀嚎不绝，成了尸横遍地、惨不忍睹的人间地狱。无辜的平民在水深火热中遭受煎熬。

这时难民们更是像潮水般地涌入金女大这个相对安全的避难所。12 月 18 日，校园里已有难民 5 000 余人。到 21 日，学校中的难民人数达到了 6 000—7 000 人。由于缺少住所，许多人只能睡在水泥路、露天草坪上。学校所有的大厅和走廊里都住满了人。虽然如此，但仍有许多惊恐万状的妇女和年轻姑娘要求进校避难。她们哀哀地恳求，有的甚至跪下不住地磕头。这一幕幕悲惨的情景，无不让魏特琳备感心酸

和怜悯，她一次次无奈地将她们放入校园。

然而，金女大这个避难所也并不是十分安全的。南京沦陷的第三天，100 多名日本兵便以搜查中国士兵为由闯入了学校。他们要求魏特琳把校内所有的门都打开，如果一时找不到钥匙，就用斧头强行劈门。同时，校园里还架起了 6 挺机枪，随时作好射击的准备，如果有人逃跑就立刻开枪。日本人还无耻地抢夺食物、床上用品和金钱。他们如果怀疑谁是士兵，就要将谁带走。科学楼管理员蒋师傅的儿子就因此被抓走了。12 月 17 日，日本人还恶劣地使用诡计：派三四个士兵假装要进入学校搜查中国士兵，他们在前门把魏特琳等负责人缠住，而其他人则乘机从后门闯进学校，轮奸了 3 名妇女，抢走了 12 名姑娘。① 19 日、20 日两天也都发生了日本兵闯入校园带走或强奸妇女的事件。就连魏特琳这样的美国人也遭到了日军的殴打。



《魏特琳日记》
(1999 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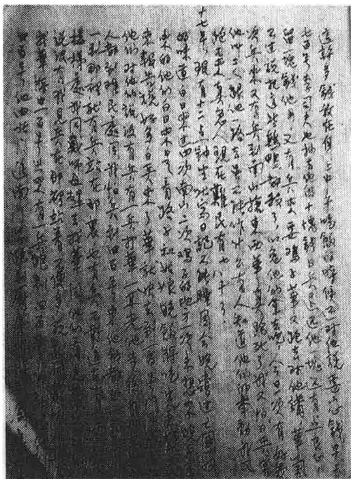
12 月 22 日，日军又发出布告，令所有难民一律要于三日内亲往登记，领取“良民证”，否则便认作是中国便衣队，格杀勿论。这其实又是日军为搜捕、屠杀中国军人和青壮年而设下的一个险恶阴谋。当时，金女大也是难民的登记点之一。日本人在登记前先训话说，如果谁是


住在金女大难民所的难民

① 明妮·魏特琳：《魏特琳日记》，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译，第 199 页。

中国士兵，前去自首，那就不会受到伤害，并让他去做工。魏特琳等美国人也被要求集中住到另一个地方去，以便对他们加以保护。其实，这些都是其诱骗的手段。他们想避开外国人的监视，将青壮年骗出安全区进行屠杀。此外，他们还逐一检查每个难民的手，并把可疑的人挑出来。许多裁缝、小贩其实并没有当过兵但也被挑了出来。

但就是在这样极其困难的情况下，魏特琳还是尽其最大的可能，运用一切手段来保护学校里的妇女和儿童免遭日军的蹂躏和摧残。例如：1937 年 12 月 18 日，魏特琳就到日本使馆，反映了日本士兵连日来骚扰金女大的情况，并要求使馆官员写了一封可以随时带在身上的信，以便用它将闯入校园的日军赶走。另外，日本使馆还在魏特琳要求下同意在学校门口贴上日本官方的告示，以制止日军进校。[①] 12 月 20 日，魏特琳再次通过美国大使馆向日本使馆报告了金女大被日军骚扰的情况，使日本方面被迫同意每天派 25 名宪兵来学校守夜。这些努力争取来的措施都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日军对学校的侵犯，使得在金女大的难民能比在其他 24 个安全区的难民得到更多的保护。此外，魏特琳每天的大部分时间，还要像卫兵一样在学校前门守卫，或是在校园四处不断巡逻，去对付闯入校园的一批又一批日本兵。所以，她成了南京妇女、难民们眼中的"守护神"、"活菩萨"。有一位 80 多岁的老太太甚至每天都为魏特琳磕 10 个头，祈求她能够继续管理金女大这一难民所，一直庇护难民所里的年轻妇女们。[②] 事实上，魏特琳



南京大屠杀期间，留守成员程瑞芳也留下一部十分重要的日记，这是程瑞芳的日记原件

① 明妮·魏特琳：《魏特琳日记》，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译，第 201 页。
② 同上书，第 365 页。

已经成了难民们赖以生存下去不可或缺的精神支柱。

三、特殊学校的开办

在南京大屠杀期间，日军血腥的屠刀深深地印在了难民们的脑海中，恐怖与死亡的威胁时时萦绕着他们。已无法主宰自己命运的难民们急需一种精神的寄托来给他们光明与希望。此时，作为虔诚基督徒的魏特琳更把传播福音看成是自己的使命。于是，她便开始向难民们进行传教，希望他们通过祷告来寻求摆脱苦难的机会。魏特琳认为："在我们校园开展了这些宗教活动，这将会消除去年 12 月带给人们的一些恐惧，甚至是消除大部分恐惧。"①



在金女大校园里躲避战火的妇女与儿童

从 1938 年 1 月 17 日开始，金女大便在圣公会人员的协助下给难民们举行布道会。在会上，难民们秩序井然，在接受布道时她们十分的庄重和虔诚，一些妇女甚至还学会了几首简单的赞美诗。鉴于有如此好的成效，2 月 18 日魏特琳又开始策划成立一个圣经班，根据难民受教育的程度，让她们分班进行学习。2 月 21 日，圣经班正式开课，其中

① 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主编：《魏特琳传》，第 197 页。

初中、高中共有两个班，六年级有两个班，五年级（70 人）也分成两个班，三、四年级（300 人）分成 4 个班，总共 10 个班。[①] 到 3 月 11 日，魏特琳又增开了 12 个班，其中有 5 个班针对的是有初级文化水平的姑娘和妇女，另有 7 个班是为未受过教育，年龄在 12—30 岁的年轻难民们开设的。此时，参加学习班的人数已超过了 1 000 人。[②] 这些难民每周上 3 次课，她们除了要求熟记主祷文"耶稣与我们同在"和上"主的生活"等宗教课程外，还要学习赞美诗、《诗篇》和《圣经》的其他章节。魏特琳认为，在痛苦的日子里，学唱赞美诗和学习经文对于难民来说是最好的安慰[③]。圣经班的开办一直延续到 4 月 16 日。18 日，金女大组织了一个隆重的结束仪式。23 个班，每个班都准备了一个节目。有的班唱歌，有的班朗诵赞美诗，有的班还表演了短剧，真是场面宏大。魏特琳见到这样的情景不禁感叹，校园里人们的精神面貌和以往相比是多么不一样啊！妇女们脸上的极度恐惧已了无踪影，她们是那么热爱校园里的空旷场地！[④]

1938 年 4 月 30 日，魏特琳又请来了南京城里的 6 位牧师，开始为 200 多名需要更多了解基督教的难民们开课。根据她们各自水平的不同，学校开设了 6 个班，每个星期六早上集中上课，直到 5 月 21 日才结束。5 月 23 日，学校举行了结业典礼，学生们展示了各自所学的内容。此后，学校还根据她们在城里住所的所在地进行了分组，以便她们在离开难民所回家后，能够继续到当地的教堂进行学习。5 月 28 日，魏特琳还邀请了南京城中 4 个教堂的教会工作者来到学校，分组与那 200 多名难民学员进行交流、沟通，并举行了简单的茶话会。另外，魏特琳还克服了当时缺少纸张、封套等的困难，给她们油印了赞美诗、圣经篇章的小册子。[⑤] 她真心希望通过自己的这些努力能使学员们在难民所关闭以后可

① 明妮・魏特琳：《魏特琳日记》，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译，第 300 页。

② 同上书，第 305 页。

③ 章开沅编译：《天理难容——美国传教士眼中的南京大屠杀》，第 390 页，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

④ 明妮・魏特琳：《魏特琳日记》，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译，第 353 页。

⑤ 同上书，第 363、389 页。

以继续在各个教堂寻求慰藉,接受教育,基督教的教义可以广布四方。

到1938年5月底,日军和南京市督政府要求南京所有的难民所都必须解散,所有难民必须回家。但此时日军枪杀和强奸的暴行仍时有发生,许多妇女已是无家可归。为了这些年轻妇女的安全,魏特琳准备在国际救济委员会和国际红十字会的支持下,让金女大以教学为掩护,继续收容难民。经过仓促的准备后,6月11日上午金女大暑期培训班举行了开幕仪式。这个班共招收了难民学生785名,从文盲到高中毕业的都有,她们被分作了67个班,其中:17个中文班,5个英文班,3个历史班,17个宗教班,5个音乐班,7个数学班,3个体育班,10个生理卫生班。由20位教师和14位实习教师负责教学工作。①

暑期培训班结束以后,魏特琳见到南京城内许多妇女无以为生,尤其是那些失去了亲人的更是可怜,所以她又计划开办一个秋季手工、家政学校,教授她们一些简单的谋生技能。1938年9月1日起,手工、家政学校就开始了注册工作。为了让学员们能够学习毛巾、袜子等纺织技术,魏特琳9月6日订购了8台织布机、4台织袜机,还筹买了6台手纺车。另外,魏特琳还特地派人外出调查,选择那些真正贫穷的人,那些难以度过今年冬天的人来参加学习。由此可见,所谓的手工、家政学校实际上还是有难民所的性质。同时,也是"帮助难民掌握一定的技能,今后能自力更生"。②

9月20日,手工、家政学校在科学楼举行了正式的开学仪式,当时共有95名妇女和28名小孩到场。随后,这些特殊学生被分配住在学校西北角的700号宿舍楼,4个人一间房间,由程夫人统一负责她们的饮食起居。手工、家政学校为学员们安排的学习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大家住在一起学习,过集体生活。学生被分为四组,轮流上山砍柴,负责全体学员的饭菜。二、普通教育及有关家庭方面的课程。学生按受教育的程度分为六组,学习家庭算术、中文读写、家庭卫生、儿童养育训练、唱歌等课程。最高班还加开历史和作文课。三、家庭手工

① 明妮·魏特琳:《魏特琳日记》,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译,第413页。

② 林弥励:《我参加过"留守校园"的工作》,《金陵女儿》编写组编《金陵女儿》,第139页。

业及工艺训练。学生在惠特曼小姐的带领下学习剪裁、缝制衣服，打毛线，织手套、帽子、袜子等技能。同时学员们还得学习农技、园艺，由哈丽雅特负责教授她们种菜种花、饲养家禽、腌制食物、制作糖果等。另外，学校还为难民学生们提供了实习的机会。例如：让选择将来要当女佣的学生去魏特琳朋友家，向那里的女佣学习；让选择要当厨子的学生跟职业厨师学习烹饪；让选择从事纺织的学生向由上海请来的老师傅学习相关的技术等。①



金女大实验班集体合影照（四排右 2 马宝章，前排右 5 卫煌）

1939 年 1 月 9 日，魏特琳等决定正式结束开办了六个月的手工、家政学校。但她们还留了一部分人在学校，让她们再进行一段时间的训练，以便熟练所学的技能。4 月 1 日，金女大举办了一次别开生面的家政手工作品展览，以展示学员们的学习成果。那些展品还以成本价向参观者销售。虽然这些都是学生们的习作，料子也是旧的，但毛巾、袜子等生活用品竟然很受人们的欢迎。这让魏特琳备感欣慰，她相信这些妇女们在离校以后一定能够独立地参加工作，自信地养活自己。4 月 11 日，剩余的学员也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学校。此前，她们还几人一

① 胡华玲：《金陵永生——魏特琳女士传》，第 130 页。

组来到魏特琳的办公室向其告别。她们对所接受的培训很是感激，有人甚至流下了眼泪。这既充分体现了她们与魏特琳之间的深厚情谊，更是对魏特琳长期以来辛勤劳作的一种慰藉与肯定。

在开办手工、家政学校的同时，魏特琳还在金女大校园里开办了一所实验女子中学。由于当时南京城中原有的教会中学尤其是女子中学纷纷关门停办，或迁移内地，许多正值受教育年龄的女孩子竟找不到地方可以上学。所以，早在1938年8月24日，魏特琳就开始为她计划中的女子中学招聘教师了。然而，当时学校的经费十分紧张，魏特琳真为能付教师多少工资而担心。她经常称自己是在做不能做的事。很快，学校又开始了招生的工作。到9月8日，前来报名上学的女孩已有92人了。学校原计划学生每学期需交学费20美元，伙食费20美元，杂费4美元，实验费2美元，服装费2美元。但当时的92人中仅有37人能够交纳所有费用，有39人只能支付20美元的伙食费和6美元小费用。另外，有9人只交2美元的申请费，4人不交任何费用。[①] 即便如此，魏特琳还是设法安排，让那些交不起钱的孩子也参加了入学考试。其实，当时的入学考试已不是考察学生能否进校的手段了，每个考生都可以入学。学校只是根据考试的成绩来为学生们分班，使她们能够更好地投入学习。

9月27日，实验中学正式开课了。上午9时45分，学校在音乐楼举行了开学典礼，当时共有120名学生参加。但随后几天，又有许多学生要求入校学习。到10月11日，学生的人数已达到了143人，其中来自政府学校的学生71名，占50%；来自私人学校的学生18名，占12.7%；来自基督教学校的学生54名，占37.3%。学校将她们分为五个年级，其中初一65人，指导老师为王先生和凯瑟琳·舒茨；初二35人，指导老师为布兰奇和吴淑琴；初三22人，指导老师为杨牧师和夫人；高一14人，指导老师为哈丽雅特和叶先生；高二7人，由魏特琳亲自指导。[②]

虽然，当时学校的条件、资金还十分有限，周边的治安也很不好，仍经常有日本兵横行霸道、无端生事，但魏特琳还是尽可能地为学生开设

① 明妮·魏特琳：《魏特琳日记》，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译，第439页。

② 同上书，第469、478页。

了各种类型的课程。例如,当时实验中学的学生程淑英在她的回忆文章中就写道:“她充分发挥金女大留校教授的作用,请一位美国教师教我们英语口语,一位中国教师教我们英语语法。我们住校的时间多,还请了一位天文学教授讲点天文知识,请一位美术教师教我们插花艺术。对愿意学钢琴的则介绍老师,提供练习用的钢琴。华小姐自己还经常介绍一些英语的课外读物,个别辅导。”[①]此外,学校还安排了袁其蓁、凯瑟琳和魏特琳来教授体育,并经常组织学生在体操房举行室内垒球比赛等娱乐活动。[②] 在生物课上,学生被要求学习园艺,学习如何培植花卉、蔬菜,如何腌菜,如何饲养家禽。在化学课上,学生得学做实验,制造墨水和肥皂等。这些都是普通中学的课程内容中所没有的。在学生成绩的评定上,魏特琳也进行了改革的尝试。她不是只看学生考试的分数,而是将重点放在学习习惯、态度和掌握知识能力上。她把学习成绩只是分作不及格、及格和优秀3个等级。但如果学生在“勇于负责的精神,与人合作的能力,忠实与忠诚”等品质方面有突出表现的话,学校将对其予以加分奖励。[③]

此外,魏特琳十分注重学生们各方面良好素质的培养。例如:为了让学生热爱劳动,她规定每天中、晚餐后,必须由各班轮流洗刷碗筷,打扫食堂。为了让学生了解穷人生活的疾苦,学校定期向邻近的贫苦小孩施粥时,也让她们分批轮流帮助盛粥。在日常行为习惯上,魏特琳对学生的要求也十分严格,规定学生不得攀折校园内的花木,刮大风时要将门窗关好,人离开教室要把椅子塞到课桌下等。即使是在学校的树下发现糖纸,音乐教室的地板有一处被划破,这样的小事魏特琳也会严肃追查、处理。[④]

在生活方面,魏特琳对学生的关怀更是无微不至。为了让学生能

---

① 程淑英:《华群小姐与金女大附中》,载金女大南京校友会《金陵女儿》(续集)编写组编《金陵女儿》(续集),第283页。

② 明妮·魏特琳:《魏特琳日记》,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译,第530、596页。

③ 同上书,第520页。

④ 程淑英:《华群小姐与金女大附中》,载金女大南京校友会《金陵女儿》(续集)编写组编《金陵女儿》(续集),第283页。

够吃上新鲜蔬菜,学校特地在空地上种了菜。学校平时还定期为学生们进行体检。对于部分营养不良的孩子,魏特琳还抽出资金,为她们补充些鱼肝油、胡萝卜等食物。另外,学校对学生每天的睡眠也十分关注,要求她们按时作息。魏特琳每天早晨和晚上都会亲自或派人对学生宿舍进行巡视,不让学生过早起床或过晚睡觉。在战争年代,日军的统治之下,老师们的工作是那么辛苦和艰难,但她们还能做到对学生那样细心地关怀、照料,由此可见她们工作的敬业精神和良苦用心。

金女大实验女子中学的开办持续了很长的时间,即使 1940 年 5 月,魏特琳因病被迫回国治疗,学校的教学也没有中断,直到 1942 年 6 月 19 日日军强占了金女大校园,实验女子中学才被迫关闭。

由于魏特琳自己是在农村里长大的,她热爱土地,深知农民的疾苦。当时,日军对中国农村的破坏十分严重,庄稼纷纷枯萎、大片良田荒芜,看到这样的情景她痛心疾首。因此,除了圣经班、手工、家政学校和实验女中以外,魏特琳还设想过为农村妇女开设一些乡村建设方面的课程。她计划在 1940 年的秋天,金女大能招收 50—80 位农村年轻妇女,为她们开办 6—8 个月的课程,使她们将来回到农村能够更好地重建自己的家园。但这良好的愿望最终未能实现。魏特琳病倒了,她不得不离开她深爱的南京和金女大。

四、魏特琳的离校和逝世

一位善良的大学教师,爱好和平的基督徒,却长时间身处于纷乱的战场、血腥的沦陷区。从 1937 年 8 月 15 日日本开始空袭南京起,轰炸的硝烟、军民的伤亡、人们的逃散,这种种灾难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种恐怖、压抑的环境和氛围。尤其是南京陷落以后,日军那血腥的屠杀、累累的恶行,难民们无限的苦难、哀哀的乞求,妇女们遭害的惨状、凄厉的悲嚎,无不在魏特琳心头留下了深深的阴影。她既对中国民众无限同情,又对战争、日军切齿痛恨,但自己的能力却又是那么有限,这时常让魏特琳备感无奈和忧伤。她在日记中经常写下这样一类的话:“我赶到教工楼,看见一个家伙站在 538 号房间门口,另一个家伙在强奸一个

姑娘……在我内心深处，真希望自己有力量把他们揍扁。"[①]"南京上空低低的云幕并不能阻止许多架重型轰炸机频繁地飞往西北。看到这些飞机我就战栗不已——因为对我来说它们意味着残缺不全的尸体和可怕的痛苦。"[②]"哦，上帝，阻止日军凶残的兽性，安慰今天无辜被屠杀者的父母们破碎的心，保护在漫漫长夜中备受威胁的年轻妇女和姑娘吧！愿没有战争的日子早日到来！"[③]"我感到很压抑，有一种无助的感觉……上帝可怜那些无法逃离这场可怕灾难的穷人们吧！我不想谴责任何想逃跑的人，因为他们知道战争意味着恐怖和苦难。"[④]由此可见，魏特琳的内心是多么的痛苦和难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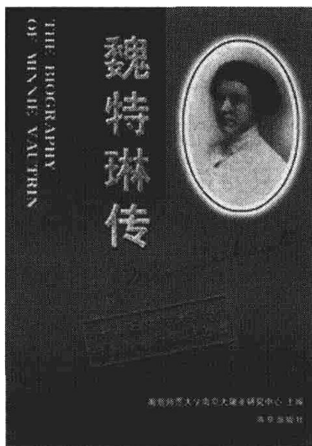
1940 年 3 月 10 日，汪精卫的伪国民政府正式粉墨登台，许多原先对国家忠心耿耿的人迫于生计此时也不得不沦为汪的党羽，这更让魏特琳感到痛心疾首。另外，很快南京的傀儡政府又下令要金女大进行登记注册。一旦注册了，学校就必须遵守伪政府对外侨办学的章程，并采用其所发行的教科书，原先学校的许多教学计划就无法实施了，所以魏特琳一再采取拖延政策。她经常提醒自己，只要立场站得住，就该坚持到底，但日本人及伪政府的官员不时地来金女大视察，魏特琳也不知道为逃避注册自己究竟还能与他们周旋多久。这也使得魏特琳感到压力巨大，难以支持。

此外，由于学校各方面的工作堆积如山，魏特琳日夜操劳，少有休养，这使她的身体越来越虚弱。从 1938 年冬天开始，我们从魏特琳的日记中就可以经常发现她对自己身体疲劳、精力不济的描述："今晚我太累，无法多写。"(1938 年 10 月 16 日)"今晚太累，写不动了。依然忙着安排计划……"(1938 年 10 月 18 日)"今天异常疲劳。"(1938 年 10 月 19 日)"今天一天一直在工作，今晚累极了。"(1938 年 10 月 20 日)"今晚我又很累。今天教了两节体育课。"(1938 年 10 月 21 日)"我感到很疲倦，要是我们能多几个女帮手就好了。"(1939 年，3 月 4 日)"到

① 明妮·魏特琳：《魏特琳日记》，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译，第 202 页。
② 同上书，第 354 页。
③ 同上书，第 197 页。
④ 同上书，第 497—480 页。

下午4时30分,我已是筋疲力尽了……”(1939年3月27日);“晚上洗完澡后我觉得筋疲力尽。”(1939年4月28日)“我真希望春假刚刚开始,因为我太累了。”(1939年4月29日)“我累得筋疲力尽,不想再思考任何问题。心情也不好。”(1939年6月30日)“今天晚上,我真是累得疲惫不堪,真不知这星期怎么熬到头。”(1939年12月11日)“我已经有近3个星期没在日记上写一行字了……主要原因是我已筋疲力尽了。”(1940年3月22日)①从这些言语中,我们可以深深地体会到当时魏特琳每天的工作量是多么大,实际上她一直是以热爱学校、无私奉献的精神力量在支撑着自己濒于崩溃的身体。

魏特琳终究还是倒下了。1940年春天,她得了严重的精神抑郁症,常常想着那些自己没有能救出的人,为战争的延长而无限地忧虑,甚至彻夜难以入眠。5月2日,魏特琳告诉苏尔斯顿等几位教师,她已无法再继续掌理校务了,并把所有的过失都归在自己身上。虽然,程瑞芳、舒兹小姐和德本康夫人等轮流照看她,并请来医生为她进行治疗,但一切都收效甚微,魏特琳的病情还是在不断加重。很快,学校就通知了魏特琳所属的联合基督教传教士工会及金女大在纽约的董事会有关她精神崩溃的情况。传教士工会与美国著名的心理学医生伍德先生取得联系后,决定将魏特琳送到美国爱荷华州立大学所属的心理疗养院治疗。1940年5月14日,魏特琳乘坐美国长江舰队司令格拉斯将军的军舰前往上海。5月19日,在舒兹小姐与约翰·马吉牧师的陪同下,她乘坐“亚洲皇后号”从上海出发返回美国,由此正式结束了她在中国20多年的生活和



《魏特琳传》
(2001年南京出版社出版)

① 明妮·魏特琳:《魏特琳日记》,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译,第475—760页。

教育事业。[①]

6月8日，回到美国后的魏特琳被诊断患了非己意能控制的忧郁症。她依旧终日地忧虑、消沉，认为自己一事无成，是使金女大蒙羞的废人。1940年7月，主治医师为其进行了"梅特拉左尔痉挛治疗法"后，魏特琳的病情有了较大好转。这时，她心中又挂念起了远方的中国。7月28日，她写信给联合基督教传教士工会的秘书鲍尔博士，要求自己能在月底就出院，并且问道："你认为我应该为回中国去做准备吗？中国是我的家，不回去似乎不对。"她还特别在"中国是我的家"这几个字下面画了线，以示加重语调。[②] 此后，魏特琳的病情又有多次反复。一次，她甚至独自跑到药房买了30颗安眠药，企图自杀，幸好被旁人及时发现，加以制止。1941年初，魏特琳被送到金女大的校董杜恩太太家中休养。她的精神一度显得很好，甚至还可以在办公室帮助整理传教士所用的教育资料，这让魏特琳的医生、朋友们都欣喜非常。

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1941年5月14日，当魏特琳独自一人呆在联合基督教传教士公会的一个女秘书公寓里时，她想起了一年前的5月14日她离开南京回美国时的情景，情绪突然激动起来。她草草写了一份不连贯的遗书，说其在中国的传教失败了，与其受精神错乱之苦，不如一死为快。[③] 然后，她跑到厨房，打开了煤气开关。享年55岁的魏特琳就这样离开了人世。最后，她被安葬在密歇根州的雪柏得镇，墓



2002年建成的魏特琳铜像

① 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主编：《魏特琳传》，第245页。

② 胡华玲：《金陵永生——魏特琳女士传》，第157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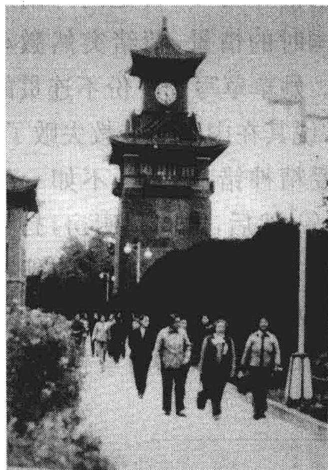
③ 《金女大校长吴贻芳往来函件》(英文)，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六六八/88。

碑上雕刻着金女大校舍的剖面图，并写有“金陵永生”四个汉字。这对她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中国，并至死牵挂着金陵是一个很好的写照。

魏特琳虽然早早地走了，但中国人民并没有忘记这位有着崇高人格和巨大功绩的异国友人。噩耗传来，金女大的师生们悲恸异常。1941 年 5 月 18 日下午，在美国密歇根州雪柏得镇举行魏特琳葬礼的同时，成都的金女大分校也在吴贻芳校长的主持下举行了隆重的悼念仪式。6 月 10 日，国民政府也特地颁布国民政府令，以褒扬魏特琳在中国的卓著功绩。此后，几乎每年金女大都会举办一些活动来缅怀和纪念她。直到半个多世纪后的 1999 年 12 月 6 日，还有 3 位白发苍苍的老太太自发地来到南京师范大学（原金女大）的校园，对着魏特琳的遗像敬献花篮。她们含着泪水，静静地伫立在初冬的寒风中，给她们当年的救命恩人致哀。所以说，魏特琳人走了，她的精神却不会泯灭，她将永远活在人们的心中，永远受到世人的尊敬。

第三节 抗战时期的成都校区

一、华西坝办学



1995 年，校友们重返华西坝，在校园里的钟楼下追忆往事

巴蜀历来被誉为天府之国，人杰地灵、环境优美。在纷乱的抗战时期，这里又成为了西南大后方，是国民们同仇敌忾、共赴国难，继续抗击日本侵略者的重要后方基地。国民政府、各类工厂、大小商贾都纷纷迁移至此。当时许多的高等院校也都选择这里作为躲避战乱、继续办学的地方。例如：复旦大学、中央大学、中央政治学校、交通大学、朝阳学院等内迁重庆，燕京大学、金陵大学、上海光华大学、齐鲁

大学等移校成都，山东大学、山东医学专科学校、上海法商学院等迁至万县，武汉大学迁往乐山，东北大学迁到三台。当时，总计有达 40 多所高校内迁蜀地，继续办学。

金女大早在 1937 年 9 月初，就选择了成都作为其三个战时的办学中心之一。但当时金女大的办学重点还是基于武昌、上海两地，而成都最初只有三个女学生，仅由生物系主任黎富思博士一人负责所有事宜，所以吴贻芳称其为"胚胎学校"。但到 1938 年初，随着武昌、上海两处分校的相继停办，学生都迁移至成都后，这里便成为金女大最主要的办学中心了。



成都校园

1938 年 1 月，吴贻芳校长刚到成都之时，她曾考虑在四川西部找一个半农村的环境来建校，准备试行一种让学生在战争环境中能更好地为国家服务的教学方案。但由于当时教育部规定：学校课程若不按教育部颁布的方案执行，该校学生的学位将得不到政府的承认，所以吴贻芳的计划没有能够实行。另外由于在小城镇中没有能找到合适的校舍，加之学校西迁后设备不足，也无法独立办学，最后金女大还是接受了华西大学的邀请，选择在成都南郊锦江岸边的华西坝办学。

当时华西坝的环境得天独厚、美丽静谧，素有"人间天堂"之称。沿万德门及赫斐院的两旁有一条流水潺潺的小溪，溪旁柳枝倒挂，随风摇曳，形成了一条绿色的巷道。路侧的园圃里，百花争艳、馨香四溢，沁人

心脾。这就是被誉为“花街柳巷”的成都一景。另外，在小溪的一端坐东朝西矗立着一座雄伟的钟楼，它的钟声也就是提醒人们上下课的信号。钟楼四周是宽阔的草坪，不远处还有秀丽的荷花池，这些都是学生们平时最好的休憩场所。每到冬去春来之时，华西坝就像是一片花的海洋，先是广益宿舍四周株株梅花迎风怒放，送来阵阵幽香；紧接着图书馆围墙上的茶花、蔷薇，华英宿舍外的丛丛玫瑰争相绽开，真是万紫千红，令人赏心悦目。在后坝还有一片油菜田，所谓“遍地黄花分外香”，油菜花清香扑鼻，蜂飞蝶舞，却又是一派田园的风光。



华西坝

虽然华西坝景色秀美、环境宜人，但刚开始时，金女大在那里的办学条件却是十分艰苦的。学生借住在华西大学的学生宿舍，在女生院搭伙；教师们借住的是外籍教师住宅；连上课的教室也是借用华大的。实验设备则更是简陋，仅有一个又小又黑的地下室作为临时实验室。另外由于长途迁移，学校的图书所剩无几。据统计“在战前该校中西文书籍盈十万册，而杂志小册，均不在内。西迁时，除带出数千册到外地，余均损失”①。后来，由教育部补贴资金 5 000 元，四川省政府又拨款

① 曾芳苗著，吴振汉指导：《民国教会女子教育——“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个案研究(1915—1951)》，第 84 页。

10 000元，再加上吴贻芳筹措的一部分经费，金女大用华西大学女生院旁边加拿大小学原址地皮，建了一幢西式楼房作为临时教学楼，又先后在华西坝牛场的一角建了音乐系的琴房[①]、小体育馆和教职员宿舍，并添置了一些教学设备，这才使金女大的教学能够继续下去。



1938 级毕业生合影

从 1938 年 9 月 9 日起，金女大各系本科以及体育系专科已开始在成都正式招收新生了。但由于是在战乱年代，当时报名学习的学生并不很多。根据金女大历年毕业生的统计数据，1938 级最终毕业的只有 27 名学生，其中中文、历史、化学、地理四个系都只有 1 个学生，人数最多的音乐系只有 4 个学生。[②] 在课程方面，学校按照当时教育部的规定，取消了辅修学系，将主修学分为三类：一为公共必修科目，二为主系必修科目，三为主系选修科目。[③]

为了让教师们有更多时间去准备在全新形势下所面临的工作，金女大成都分校将正式开学的日子定为 1938 年 11 月 1 日。在此前的两个月里，学校安排所有在成都的金女大高年级学生参加军训课程。而刚入学的新生们也不能让他们无事可做、浪费时间，所以学校决定在正规课程开始之前，为新生做一个月的指导工作。这个月被称为“新生月”。在新生月的第一周里安排学生听有关国内、国际形势的报告，让她们逐渐熟悉校园环境，学会使用图书馆，并进行体检等活动。然后在

① 鲍惠荪校友回忆称当时金女大音乐系学生把在那里的琴房弹琴戏称为“对牛弹琴”。

② 孙海英编：《金女大大事记》(1913—1953)，第 22 页。

③ 朱学波：《吴贻芳》，第 84 页。

二三两周里，将学生分为若干小组，自由选择“教育和文化、经济和社会、健康和娱乐、农村生活”4 个项目中的一项进行学习。新生月的最后一周则被用来进行总结、讨论，并由新生自己写出总结报告。[①] 经过一个月的时间，学生们不仅熟悉了环境，增进了彼此间的了解，而且也扩大了自身的视野，学到许多书本上没有的东西。

另外，由于战争的原因，当时许多学生的家庭遭到了劫难，经济很是拮据。1941 年，金女大在向政府上交的报告中就写道：“有学生家长不愿甘作顺民，而避至后方，度其极艰苦之生活者，此种人本身之经济即乏来源，何况其子女……更有学生之父已殁，寡母在外，孤苦无依，讵能再负担子女之费用？”[②]为了帮助这些贫困学生，学校也采取了种种措施：让学生在课余或假期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如打字、整理图书资料、收发信件、接电话、为学校采购物品，为体育课担任钢琴伴奏等，并由学校付给一定的报酬；同时又设立奖学金，发放救济物品和补助，帮助大家克服困难，使学生的学习不致中断。另外，金女大还大大降低学费，对一些来自沦陷区的困难学生甚至免收学费。而学校所短缺的经费，一方面由吴贻芳校长四处奔波张罗，向政府、社会募集款项；另一方面学校用减少行政管理人员，提高工作效率的办法来节约开支。例如，1938 年金女大的行政管理人员就只有 10 人，即院长室 2 人，会计处 2 人，注册处 1 人，图书室 1 人，农村妇幼服务处 3 人，连全校伙食管理也只用 1 人。[③] 许多教师都是身兼数职，加倍地工作。

二、六所大学的合作办学

抗战时期，迁至成都华西坝办学的还有金陵大学、齐鲁大学和中央大学医学院。1942 年，北平的燕京大学也来到华西坝复校开学，再加上原先在此的华西大学，一时间六所高校，数千名师生共聚一地。由于

---

① 德本康夫人、蔡路得：《金陵女子大学》，杨天宏译，第 118 页。

② 曾芳苗著，吴振汉指导：《民国教会女子教育——“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个案研究(1915—1951)》，第 70 页。

③ 南京师范大学校史编写组：《南京师范大学大事记》(1902—1990)，第 66 页。

当时西迁至蓉的学校大多设备短缺、师资不足，为了能够更好地进行教学，六所学校虽然各自独立，但它们实行的却是互帮互助的协作办学。而且这六所高校中除中央大学医学院外，都属于教会大学，这更为它们之间的相互合作提供了便利条件。

当时，华西坝的各所高校，出于合作的要求，为了达到协调一致，各校校长和各系处都有定期的联席会议。1942 年，华西大学校董的年会报告对金大、金女大、齐大、华大四校的合作情况记录道："每周至少四校长例会一次，协商关于行政、财政、教职员待遇及有关公共事宜，以故虽分四校，实合作为一，迄无冲突摩擦之虞；每月有四校教务协会，由四校教务长、注册主任会商关于授课时间规律招生考试各问题；同样亦有训导长协会，磋商关于学生训导事宜。"①另外，各校大都设有文理学院，下设的系科亦大致相同，但师资、专长各有差异，所以学校虽然是各自开课，却允许其他各校学生自由选读，所读学分都予承认。这不仅使学生们有了较宽的选课范围，而且也便于他们之间相互交流，在各校不同的教学风格中有所获益。



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校友们重返华西坝，建立了五大学纪念碑

① 王光媛：《抗战时期的华西协和大学》，载《成都文史资料选辑》总第九辑（内部发行），第 140 页。

虽说这种合作办学是战争年代受环境、条件所迫，不得已而实行的举措，但这个时期各所学校间的互帮互助，取长补短却又为它们各自的发展提供了一些帮助。仅以金女大而言，首先在校的师生人数有了不小的增加。1938 年 12 月，在蓉的金女大学生总共才 115 人，教师才 33 人。到 1940 年 9 月，学生人数已达 206 人，教师 46 人。而到 1944 年底，学生更是达到了 316 人，教师人数达到 62 人。[①] 其次，合作办学也使金女大增加了一些新的系科和专业。1939 年 7 月，女大的英国语文系改为外国语文系，1940 年又增设家政系。1943 年 3 月，学校又在社会学系与家政系分别增设了儿童福利专业。

另外，由于各地专家聚于一地，当时华西坝各校的学术研讨盛极一时。各种各样的学术讲座、讨论会、演讲会频频举行，名目繁多。主办单位有时是一个学校，有时是几校联合，有时是由学校的某个系级举办。这些活动学生大都可以自由参加，并无学校或系级的限制。例如 1941 年 2 月，为了增加学生对学术研究的兴趣，金女大各系先后成立了学会；1941 年秋，由华大文学院主办每周一次的“文化讲座”也较为突出，该院曾邀请了史学家吴宓、蒙文通、钱穆，哲学家张东荪、贺麟，医学家郑集、侯宝璋，农学家章之汶以及牛津大学修中诚、剑桥大学李约瑟等中外知名学者来华西坝作讲座。1942 年 9 月，金女大召开关于“人生哲学职业问题”的大型讨论会；1943 年 2 月学校又邀请牛津大学陶德思教授作有关《柏拉图的政治及社会哲学》和《女子高等教育》的演讲；1944 年 4 月金女大又邀请



毕业生合影留念

① 曾芳苗著，吴振汉指导：《民国教会女子教育——“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个案研究(1915—1951)》，第 99、126 页。

美国西芮蔻斯大学葛利石教授来校演讲等。[1] 这些讲座和研讨不仅大大拓宽了学生们的视野，引导他们走上了学术研究的道路，同时也是当时各校在艰苦条件下依然能有许多学术成果涌现的重要原因。

三、在日军的空袭下

虽然，在各所大学教师员工们的共同努力下，华西坝的教学进行得有声有色。金女大的成都分校也在吴贻芳校长的带领下较为顺利地兴办了起来，学校的教学得到了延续，然而，成都也并非是绝对宁静、安全的世外桃源。随着抗战的逐步深入，日军的步步进逼，地处西南的重庆、成都也先后遭到了日军的袭击。早在 1938 年 12 月 26 日，日军就派出 22 架大型轰炸机开始了对重庆的空袭。而 1939 年 5 月 3 日、4 日，日本飞机的两次大轰炸则更是引发了重庆历史上少有的特大火灾，城中房屋不少被毁，市民死伤惨重。而此时在成都的人们也是忧心忡忡，他们为自身的安全陷入了无尽的忧虑。有传言说，成都将成为日军计划摧毁的下一个目标，城内的许多学校都已被命令迁往农村。而华西坝校园由于地处城郊，且没有军事目标，所以当时还能够正常进行教学。但师生们也作好了防火、巡视等充分的准备。1939 年 5 月，大家还成立了五大学空袭救护队，以应对不测。当时，共有 300 多人参加，由中央大学医学院著名解剖学教授张查理担任大队长。大队下面设三个中队，每中队下再设三个小队。金女大师生组成了其中一个小队，由黄振圻、景荷荪分别担任正、副小队长。[2]

1939 年 6 月 11 日傍晚，分为 3 个小队的 27 架日本飞机对成都进行了首次大规模轰炸。顿时，城里爆声如雷，黑烟冲天，许多建筑被炸为废墟，隆隆的爆炸声夹杂着人们的呼救与哭嚎，一片悲凉、凄惨景象。城中的有些居民区甚至被夷为了平地，市民伤亡十分惨重。地处城郊

---

① 王光媛：《抗战时期的华西协和大学》，载《成都文史资料选辑》总第九辑（内部发行），第 147 页。

② 张素芳：《回忆读书会、战地服务团，怀念取来火种的周曼如》，载《金陵女儿》编写组编《金陵女儿》，第 168 页。

的华西坝也没有逃脱此次浩劫。日本空军中队的部分飞机在飞过校园上空时，也投下了炸弹，其中 6 枚落到了校园里。所幸的是，有 3 颗炸弹没有爆炸。否则，按它们所落的地点，金陵教学楼、图书馆和许多学生宿舍必将全被摧毁，后果不堪设想。爆炸的第一颗炸弹造成的损害最大，它炸毁了金陵大学陈校长居住的大部分房屋，严重破坏了华西协和大学尼杰斯蓝兰博士的住房。空袭中华大的一位女生黄孝卓在逃离时被流弹击中脑部致死。齐鲁大学学生崔之华的左脚被严重炸伤。①



1939 年宋美龄视察成都金女大时与师生合影
（前排左五为蔡路得、左六为吴贻芳、左七为宋美龄）

当时金女大的宿舍里，吴贻芳校长正和学生们在一起。她凭着以往的经验，先让一位教师试开电灯，电灯未亮。吴贻芳当时就警觉到敌机已经进入了市区，她立刻吩咐大家迅速卧倒，霎时间地动天摇，周围一片漆黑。幸好当时落在图书馆门前草地上的一枚炸弹没有爆炸，因而躲在不远处宿舍中的吴校长和女大学生没有人在空袭中伤亡。

随后不久，华西坝惊恐未定的师生们便又积极投入到救护伤员的工作中。校园内的空袭救护队马上发挥了作用。大家来到新老南门一

① 德本康夫人、蔡路得：《金陵女子大学》，杨天宏译，第 125 页。

带，不顾敌机扫射、烈火炽身，奋勇抢救伤员。轻伤的就地急救包扎，重伤的则由男同学和部分华西的男教员将伤员抬进学校的教学行政楼。该楼当时已成了一所急救医院，收救的伤员共有80名。金女大的师生们在尼廉·基尔克带领下，轮流帮助华西协和医院的医生看护伤员。据孔宝定等学生后来回忆，当时教学大楼里躺满了伤员，他们大多伤势严重，血肉模糊，惨不忍睹。这些场景更激起了她们无限的愤恨，坚定了她们抗日的决心。

此后，日军又多次对成都进行了狂轰滥炸。其中尤以1940年10月27日与1941年7月27日的两次最为残酷、猛烈，总计市民死伤人数至少有5 000人。为了更有效地预报空袭，1938年冬华西坝五大学学生联合会还组织了一个火警团，由金女大学生龙襄文担任团长。据龙襄文回忆，为了及时掌握敌机的情况，他们设定了许多种警报，按先后顺序分为：预行警报、空袭警报、紧急警报、解除警报等。[①] 根据不同的警报声，师生可以迅速采取相应的措施来尽可能地防止伤亡。

虽然，“六一一”轰炸以后华西坝校园的警报依然频传，但或许是由于老师们在学校的草坪上铺了一面巨大的美国国旗的缘故，学校没有再次受到敌机的袭击。但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学生们终日人心惶惶，经常要被迫躲入防空洞，这必然对他们正常的学习生活造成了不利的影响。

四、社会服务工作

吴贻芳校长在成都建校之初就曾有一个“在半乡村环境办学，使学生在战时更好为国家服务”的美好设想。虽然，半乡村的校址没能找到，但吴贻芳并没有放弃其办学要切实为社会服务的愿望。1939年春，金女大就在仁寿县设立了一个乡村服务处，希望借此服务于农村社会，服务于当地农民，改变当地“贫”、“愚”、“弱”、“私”的状况。同时这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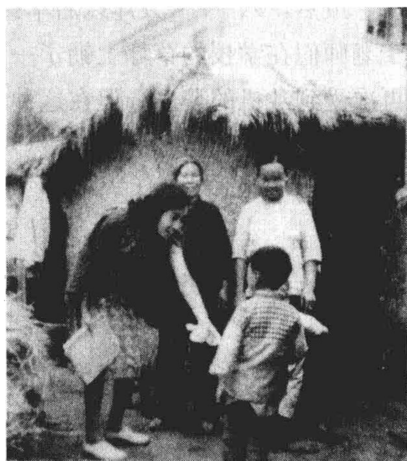
① 龙襄文：《念念不忘吴贻芳校长》，载金女大南京校友会《金陵女儿》（续集）编写组编《金陵女儿》（续集），第127页。

也为华西坝的学生提供一个寒暑假实习的场所。仁寿县距离成都有200多华里，中间还有二峨山阻隔。当时两地之间既无火车，也无汽车可通，交通十分不便。师生们只能坐人力车前往，而且还得在沿途住宿两夜。另外，由于当地比较贫穷落后，人们购置物品也很不方便。所以金女大要在这里兴办乡村服务处也是困难重重，直到1939年秋季，才正式开始工作。金女大在仁寿的乡村服务处设有：妇婴组、幼儿教育组、挑花组和种鸡改良组。



师生在乡村儿童福利院

妇婴组，主要是针对当地土法接生，孕妇与新生儿死亡率高，且缺乏幼儿疾病治疗等问题而设置的。其主要工作有：每天上午开展门诊，定期帮孕妇进行检查，及时治疗婴幼儿疾病，根据季节给儿童打预防针、接种牛痘等。另外对于产妇，不管远近，服务处的助产士都日夜出诊接生。白天她们只收接生费5角，夜晚的出诊费也才收1元，对于贫苦的农民则常常免费予以诊治。接生后妇婴组还要定期派人进行家访，直至婴儿脐带脱落。[①] 由于这项工作满足了当地人们的切实需要，因而受到了极大的欢迎和支持。



在乡村服务处服务的学生
刘瑜在乡村进行家访

幼儿教育组，主要是帮助仁寿

① 肖鼎瑛：《迁蓉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载《抗战时期内迁西南的高等院校》，第292页，贵州民族出版社，1988。

县的农民开展孩子的早期教育。当地每逢农忙，父母双双下地干活，孩子便无人照看，他们不是被锁在家中，就是任意嬉闹，这很不利于孩子的早期发展。所以，金女大乡村服务处就组织了一个免费上学的幼儿班，由肖鼎瑛等三位学生去到各村挨户招生，并根据孩子的年龄进行分班教育，为他们以后的学习打下一定的基础。

挑花组，其目的是组织训练农村妇女，增加其生产技能。由于学校发现中国生产的挑花制品在国外有较大的市场，所以挑花组就把当地的妇女组织起来，在农闲空余时间教授她们用不脱色的丝线或十字线在白麻布上挑花的技能，并按线的根数来计工资，帮助她们贴补家用、改善生活。制成的桌布、窗帘、床单、餐巾等则由学校运往外国换取外汇。

种鸡改良组，是由金女大生物系的毕业生组成的。由于四川本地母鸡产蛋率低，还经常抱窝。而“来航”鸡的产蛋量虽多，但抗免疫力却不好。所以，他们尝试着用所学的知识在仁寿县试验鸡种改良。

由此可见，金女大实行的各项社会服务针对的都是当地农村的现实问题，他们也真正做到了为农民们分忧解难，提供帮助。虽然如此，但是由于成都、仁寿两地相隔实在太远，学生在途中白白浪费了许多宝贵的时间。另外，随着当时通货膨胀的日益严重，两地交通的花费也给学校带来了比较沉重的经济负担。所以，1943 年学校最终还是关闭了仁寿的服务站，在离成都较近的华阳县中和场开了一个新的服务站。金女大在那里设立了妇女班，分为甲、乙两班，各招收当地妇女三四十人，教她们识字、写应用文、记账、手工、唱歌、卫生常识及珠算等；还设立了婴儿班，招收婴儿至 5 岁的儿童，每期收 60 名孩子。同时婴儿班还为父母们开设父母会，每周一次，教授他们培养和教育儿童方面的知识。①

除此之外，1944 年秋，金女大还兴办了一个儿童福利实验所，用的是华西坝小天竺街上修理过的三间喂过羊的草房以及侧面的三间瓦房。儿童福利实验所开办了托儿所和小学初级、高级三个班。托儿所分为半日制与全日制两组，聘请幼儿教师与助教各两名，共招收了幼儿

① 朱学波：《吴贻芳》，第 92 页。

约50名。小学的两班，则由金女大勤工俭学的大学生授课，并担任班主任工作。学校还特请了一名小学教师加以辅导。另外，儿童福利实验所还特约齐鲁医学院的护士，每周来为孩子们进行体检、治疗，并按季节进行免费的预防疫苗接种。① 由于所里接收的孩子大都为小贩或贫民的子女，以及失学儿童，所以福利实验所并不向家长收学费，从而受到当地人们极大的欢迎和支持。该所存在时间较长，直到抗战胜利后金女大迁返南京时，将其移交给华西大学，由该校的社会系继续接办。



师生在乡村服务所(中高个者为方非)

五、学生的课外活动

虽然是战争年代，条件艰苦、社会动荡，但金女大学生的课外娱乐活动还是极为丰富多彩的。她们不光组织歌咏会、游艺会、话剧表演等各类文娱活动，还积极参加各种竞技比赛、观看许多艺术家在成都的演出。有时华西坝的校园里简直是一片歌舞升平的景象。有人或许会疑惑这是否与当时抗日救国的时代主题不符。我们听听女大学生曾星华是怎样解释的："每年五月，全校照例要举行一次'五月竿会'(May Pole Dance)，草地中央竖起一根彩带飘舞的杆子，选举'五月皇后'，高年级学生还会带头绕杆跳起宫廷华尔兹舞。这种'场面'出现在山河半壁、生灵涂炭、敌机肆虐轰炸的后方高校中，也许会使许多人疑惑不解……但是，有远见的教育家们认为，四周越是惊涛骇浪，越要坚定乐

① 朱学波：《吴贻芳》，第93页。

观；国家越是歌舞升平，越应具有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任何时候，对学生除了传授知识，还要教会做人；除了提高素质，还要陶冶审美情趣。要教会每个学生懂得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自豪。有了这样的人民，民族的脊梁不会折断，国家的基业万代千秋。”①由此可见，学生们的课外娱乐并不是沉沦、颓废的表现，而是为了在当时压抑的气氛中注入一些活力，起到振奋大家精神，鼓舞大家士气的作用，为更好地投入战斗做准备。

在文娱方面，金女大组织的活动不仅内容丰富，种类繁多，而且有其自身突出的特点。首先，女大的这些活动都有教师参与其中，有时甚至吴贻芳校长也和同学们一起进行演出活动。几十年后，吴校长在回忆起当年活动的情景时，依旧感到记忆犹新、历历在目。她在文章中写到：“学生的课余生活是丰富多彩的，有班级间的球类比赛、歌咏会、音乐会、辩论会等。也曾为救灾举行各种义演。还有话剧表演，有中文的，也有英文的。师生的关系比较亲密。老师常常参加学生的课余活动，有时与学生赛球，她们穿着老式的运动衣，动作迟缓，常常成为学生手下败将；有时还参加文艺节目或话剧演出。我演第一届学生，在台上走出房门时忘了走规定的门，经台旁教师提醒，才慌忙走回原来的地方，再从规定的门走出，观众捧腹大笑。”②其次，金女大的文娱活动除了娱乐休闲之外，还时常蕴涵着教育意义，真正做到寓教于乐。例如：1939年，女大的学生们就曾根据中国木兰从军的故事，排演了一出舞蹈剧，连续上演了三天，当时不但效果十分强烈，而且还激发起了大家抗日报国的热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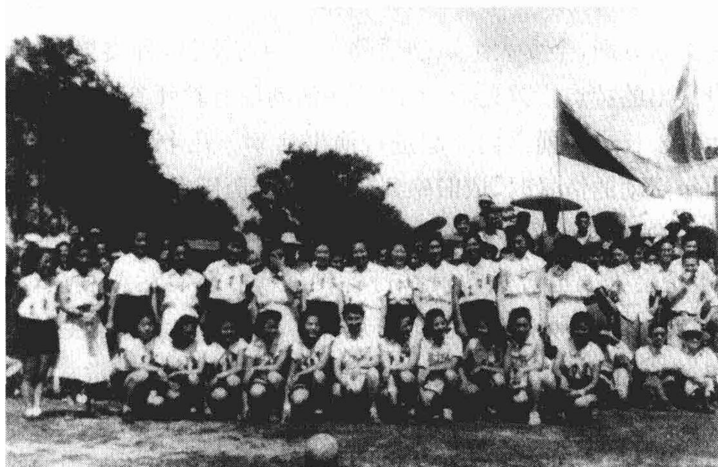
此外，抗战时期作为大后方的成都虽然屡受日机的轰炸、破坏，已是千疮百孔，混乱不堪，但在这里人们的文化生活并不沉寂，许多避难至此的艺术家们仍然经常进行演出，音乐、舞蹈、戏剧等各种表演层出不穷，真可谓是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这自然也为女大学生的

---

① 曾星华：《回首往事——记抗战期间的成都华西坝》，载金女大南京校友会《金陵女儿》(续集)编写组编《金陵女儿》(续集)，第90页。

② 吴贻芳：《金女大四十年》，载《吴贻芳纪念集》，第112页。

课余生活增添了不少色彩。据当时在成都学习的曾星华回忆说:"凡是人品艺术均属上乘的艺术大师莅蓉演出,我们都可以获得一张专为高校学生演出的专场戏票。票价之低,几乎是象征性的。最难忘的是马思聪的小提琴演奏会,斯义贵的男低音独唱音乐会和吴晓邦的独舞专场……女大体育系学生,还有幸观摩了舞蹈家戴爱莲的《青春舞曲》。"①



与燕京大学争夺排球冠军

在竞技比赛方面,金女大的学生也是比较突出的。首先在各类体育比赛上,女大健儿历来都是争金夺银的能手。例如:在 1943 年 11 月 12—15 日的四川省大中学生运动会上,由 24 名学生组成的金女大代表队就曾创下了极为辉煌的成绩,"获得女子组田径冠军,跳高、铅球、垒球、200 米、80 米低栏、200 米接力、400 米接力项目均获得第一名,200 米、80 米低栏、垒球项目打破成都市记(纪)录,200 米接力打破全国记(纪)录,同时获得女子篮球冠军"②。其次,只要在成都举办演讲、表演等各种比赛,女大的学生都会踊跃参加,并取得不错的名次。

① 曾星华:《回首往事——记抗战期间的成都华西坝》,载金女大南京校友会《金陵女儿》(续集)编写组编《金陵女儿》(续集),第 92—93 页。

② 程斯辉、孙海英:《厚生务实 巾帼楷模——金陵女子大学校长吴贻芳》,第 184 页。

这些比赛不仅丰富了学生的课余生活，同时也宣传了金女大，提高了学校的声誉和影响。

六、抗战时期的学生艰苦生活

战争年代虽然条件艰苦、物资匮乏，但金女大对于在校学生的日常生活，仍是非常地关心与照顾。在衣食住行各个方面，学校都尽可能为学生做到最好。所以，几十年后金女大的老校友们在同学会上回忆起这段生活的时候仍是记忆犹新、感激万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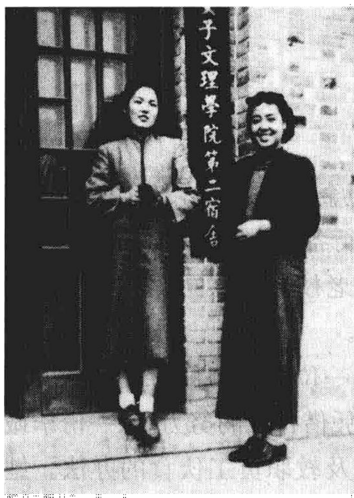
当时，金女大在成都的伙食后勤是由一位被亲切称为“王师母”的护士负责的。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她总是凭借自己的努力，以一份挚诚的爱心，去摸索管理好 100 多名女大学生及教职员工伙食的办法。她不分冬夏，每天总是一早 4 点左右就起床，一直忙碌到晚上 10 点多才能休息。即使是在通货膨胀最严重的几年，王师母也想方设法让学生的每一分钱都能吃进肚里，落到实处。所以当时在华西坝，金女大的伙食总是几所大学中最好的。早餐是用麦麸大米熬的稀饭、白馒头、油炸花生以及自制的红、白腐乳和各色酱菜，有时每人还有一个鸡蛋。中晚餐都是四菜一汤，有荤有素，营养搭配。① 在当时的条件下，这的确已是十分难能可贵了。

另外，由于当时成都学生的住宿分在“院部”和“分部”，两地相距较远，所以学校为了方便学生就餐，在两处都设了食堂，饭菜是在院部做好后由人双肩挑到分部的。此外，学生们日常喝的开水也是由学校的工友们直接送到各个寝室的。后勤人员四季如常，风雨无阻，其中的辛苦可见一斑，但学生生活却总是被安排得井井有条。

更为难得的是，吴贻芳校长和许多教师还经常关心到每个学生的饮食习惯和特殊情况。例如：1938 年考入金女大的学生吕慰庭是北方人，其对南方的伙食尤其是“平价米”很不适应，所以常常在吃饭时偷偷

① 王馨恩：《怀念金陵——献给妈妈一份深切的爱》，载金女大南京校友会《金陵女儿》(续集)编写组编《金陵女儿》(续集)，第 32 页。

落泪。吴校长发现后就特地交代食堂厨师为这位学生安排馒头。[1] 又如：每年秋季开学时学校都要为学生们进行严格的健康检查。被查出身体有病或虚弱的学生不但会被及时送往医院进行治疗，还常常能发现自己的伙食中，中午多一盘猪肝，晚上多一盘绿色蔬菜，这其实也是学校为给她们增加营养而刻意安排的。



华西坝女生宿舍

在学生的衣着、仪态方面，金女大也有很高的要求。学校十分注意学生的仪表，要求着装得体，仪态大方。学生不许穿着不符合学校规定的服装和饰品。此外，吴贻芳校长还特地根据女生的生理特点和学生之间的差异给学生开设形体训练课，以规范她们日常的行为举止。比如，她规定学生走路时必须要抬头、挺胸、收腹。发现谁没有达到要求时，她还经常亲自作示范。而且吴校长也以身作则，为学生作榜样。一次，有位学生指出她双肩有一点不平，吴贻芳当即表示自己会马上改正，并要所有学生为其监督。

金女大的宿舍管理也极为严格，制定有详细的《宿舍规则》。首先，女大的学生寝室被称为“禁宫”，男生是绝对不准越雷池一步的。其次，学校还安排每间寝室由两位三、四年级的大姐与两位新生同住，目的是让学长的言传身教能对新生起到潜移默化的影响。在寝室内，女大的规则也很多。例如，规定学生衣着必须整齐，行为要谦让，举止要文雅，入室先敲门，有“请”方可入，爱护宿舍用具，按规定时间作息，不准高声言笑，不能乱扔杂物，不得留客住宿，不许用茶炉烹调食物等。[2] 凡此种种，学校让学生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形成大方得体的女性气质，这

---

① 吕慰庭：《怀念我们敬爱的吴校长》，载金女大南京校友会《金陵女儿》（续集）编写组编《金陵女儿》（续集），第129页。

② 《私立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学生手册》，第22—25页，1940年9月。

也是金女大有别于其他大学的地方。

金女大在成都华西坝的办学一直持续到抗战胜利以后，至 1946 年师生们才分批陆续迁返南京本部。在成都的八年多时间里，金女大在艰苦的环境中努力建设，认真教学，不仅培养了一批社会所需的高层次人才，为战后的重建工作提供了可贵的力量，而且其组织的各项服务于社会大众的活动，解决了当地人们的实际困难，提高了许多妇女的生产技能。所以，金女大在这些年里受到了人们普遍的赞扬，赢得了广泛的社会声誉。

七、品牌特色专业

金女大在创办之初，由于师资不足，在系科方面只设文理两科，后来随着学生和教师人数的增加，系科建设也得到了进一步完善。在所建各系中，金女大文科系科中的社会系、音乐系、历史系和理科系科中的生物系、化学系和家政系实力较强，这些系科毕业的学生也相对较多。其中抗战期间的社会学系和家政系可堪称金女大的品牌专业，具有相当影响。

金女大是较早设立社会学系的大学。早在 1923 年时，金女大就聘请 Mary B. Treudley 博士担任社会系的主任，开设社会学相关课程。到 1927 年时，金女大就已有两名社会学专业的学生毕业。1928—1937 年担任系主任的是 Mereb E. MossMan。抗战爆发后学校迁至成都，系主任由龙冠海担任。龙冠海是中国著名的社会学家，曾赴美留学，获社会学博士学位，著有《社会学》一书，影响很大。由于金女大社会学方面师资力量较强，在老师的



1940 年学生在成都开展社会调查

调查集刊目录

指导下，学生参与社会调查的能力十分突出。抗战期间，金女大社会学专业的学生大都写有质量较高的调查报告。1939 年，系主任龙冠海曾将学生的调查报告汇编成《社会调查集刊》（上、下）邮印出版。其中上集收录了十名学生的调查报告，如马必宁的《成都慈善机关调查》、蔡淑美的《成都保育院难童调查》、孔宝定的《成都市市立第一游民教养所流浪儿童之研究》、卢宝媛的《成都市三十个犯罪儿童的研究》、魏贞子的《成都地方法院刑事罪犯案件的分析》、萧鼎瑛的《成都离婚案件之分析》、刘臻瑞的《成都市妇女社会活动调查》、李秉贞的《成都市牙刷工业与其工人生活概况调查》、刘寿珍的《华西坝各大学工友调查》和冯家雯的《成都五大学基督徒学生暑期乡村服务团之研究》。[①] 这些调查报告虽然都是学生的处女作，但是笔者仔细阅读后，感觉到这些调查报告其调查之周密、统计数据之翔实、结论之公允、质量之上乘，实在令人惊叹敬佩！

社会学系是金女大最有名气的大系，不仅在抗战期间，乃至到抗战胜利后，一直是全校学生选修最多的专业。据陈祥凤校友回忆称，1948—1952 年，为了培养社会所需人才，金女大从实际出发曾调整系科设置和教学内容，社会系改名为社会工作系。[②]

在金女大的系科中，家政系虽然成立较晚，但在抗战期间及其之后，也是金女大的热门专业。据吴贻芳回忆称："1940 年，金女大在四

①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社会学系编：《社会调查集刊》（上集），南京师范大学档案馆藏，1939。

② 陈祥凤：《在一个三易其名的大系里学习了四年》，载金女大南京校友会编写组编《金陵女儿》（第三集），第 310—311 页，金女大校友会，2005。（以下引用该书皆为此版本）

川教育厅建议下，设家政系。”[①]家政系内分儿童福利、营养、应用艺术三个组，其专业设置的出发点，一是注重家庭管理，二是注重食物营养与卫生，开设的课程有儿童发展、儿童健康、托儿所管理、普通心理学、营养学、膳食与疾病、烹饪学、应用艺术、生理学等。由于许多课程同理科有关，因此这一专业所以属于理科。创办初期，吴贻芳曾专门邀请华南女大家政专业负责人陈佩兰来校任教，陈佩兰是前清遗老陈宝琛的侄孙女，华南女大毕业后曾前往美国俄勒冈大学专攻家政学。家政系建立后，很受学生欢迎，吴贻芳报告称：家政专业“已成为金陵第三大专业，学生修读人数仅次于社会学系和英文系。”[②]金女大家政系的毕业生大多在医院任营养师或在托儿所、幼儿园、中小学执教。



家政系师生合影

八、战时不利的教学条件

然而，迁校内地后的金女大也不是在什么方面都尽善尽美。在当时特殊的环境中，她也像其他的高校一样，遇到了许多原先从未碰到的问题，这让学校在教学方面出现了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首先，由于图书和实验设备短缺，学校的教育和学术无法保持以往的水平。金女大经过了长途迁移，图书和实验设备所剩无几。虽然华西大学慷慨地让其他内迁的学校共用其设备，但毕竟学校众多，远远不能满足正常教学的需要。尽管吴贻芳四处筹措资金，添置设备，甚至有

---

① 吴贻芳：《金女大四十年》，载《吴贻芳纪念集》，第 107 页。

② 朱峰：《基督教与近代中国女子教育——金女大与华南女大比较研究》，第 307 页。

时学校还在政府的支持下，自已制造小型仪器和初级科学的教学用具，但在高级设备方面，女大还是不能满足学生们学习和研究的需要。另外，由于交通不便，当时华西坝几校共用的图书馆也无法添置很多新的书籍杂志。这使得在那里的学者、学生们常有孤陋寡闻、脱离学术前沿的感觉。后来因为华西坝各校都扩大了招生规模，这使得学校教学的困难进一步加剧。有时因教室紧张，校与校间不得不采取轮流上课的办法。学生的课本也出现了供不应求的状况，金女大许多课都没有课本，学生只能依靠课堂笔记来学习。而且到1945年，学校用的一些课本也都过时了，教师们大多是依赖自已原先所积累的知识在进行授课。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当时金女大教学和科研水平的提高。



华西坝图书馆

其次，学校无法保证战前学生的入学标准。由于当时跟随学校迁移到成都继续学习的学生并不多，所以为了能够延续正常的教学，金女大就必须在当地招收新生，而内地中学所提供的生源在英语和自然科学水平方面都远远不如华东地区教会中学的毕业生。另外，当时爱国主义是一根巨大的指挥棒，学校处处都要体现爱国和抗日，在招生方面也是如此。例如：爱国的义务要求学校接收流亡学生作为借读生，因为流亡学生只要能继续读书，就可以领取政府的补助，如果拒绝这些无家可归的学生，就等于切断了他们一切的经济来源，这在当时是被视为

不道德的，甚至似乎是犯罪。[1] 而学校招收进来的流亡学生却又大多参差不齐，其中有很多学生所受的教育程度并不能和学校相衔接，这就进一步加大了学校教学的难度。有时老师们不得不为一些学生开设补习班来拉近学生间的差距。这些情况也都使得金女大在成都无法保持和战前一样的教学和科研水平。

再次，战争影响到了金女大正常的教学秩序，学生缺课现象严重。经济困难、家庭负担等因素让一些学生分心较多，难以按时上学。又加之日军对成都的空袭，学生的军事训练、救护训练，抗日的宣传或救济活动，以及后期的疾病和营养不良等问题，种种不利因素都干扰了学生们的正常上课学习，学校的课程经常是时断时续。为了在一定程度上加以弥补，学校有时还得采用开设假期班或延长学年的办法，这无疑也对学校的教育和学生的学习造成了不利的影响。

最后，国民政府当时所作的一些关于教育的规定，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使得内地高校学术水平下降的因素之一。当时在陈立夫的主持下，教育部不断加大对学校教育内容和教育组织的控制。教育部认为国家由于战争已无力负担研究生教育，因此要求提高本科教育的专业化程度。教育部禁止开设任何选修课，并要求主修课一般达到 80 个学分小时。其他必修课还包括每周两学时的军训、体育和卫生课，一门三民主义课，基础课约 60 个学分小时。1940 年后，每周还有几小时的劳动服务。1940 年，金女大接到通知，说大考应当是综合性的，并且必须随时可让政府检查。[2] 如此详细的规定，大大束缚了学校的手脚，学生和教师们都觉得在教学过程中毫无选择余地。尤其是作为教会大学的金女大，不得不改变原先美国文理科大学模式的教学方式，在课程方面进行重大变革来适应政府的要求。但这种强加的教育模式并不利于学校保持其原有的特色，而且为了适应新模式，学校也必须花费更多的时间来尝试和磨合。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学校教学水平的提高。

---

① 卢茨：《中国教会大学史(1850—1950)》，曾钜生译，第 358 页。

② 同上书，第 362 页。

第四节 金女大的抗战活动

一、抗战初期的抗日救亡运动

学校原本是教书育人、传道授业的场所，但在国土沦丧、民族危亡这样一个特殊的年代里，抗击日军侵略成为了一切国人义不容辞的责任，各大院校也纷纷投入到了抗日救亡之中。师生们激情澎湃、斗志昂扬，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抗日活动。

在南京，金女大本部，魏特琳等留校的老师们努力保护难民，使其免受日军的屠杀和蹂躏。他们以自己的方式默默地抗击日本侵略者，不顾自身的安危，献身于抗敌的前沿阵地，以自身的微薄之力，尽可能地在日军的魔爪下挽救生命，减少损失。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这些舍己救人的杰出英雄。

在成都，早在金女大尚未建立分校，仅是有几名学生在华西大学借读的时候，就有一名叫周曼如的学生和华大的学生沈萌家、艾尔达等一起，团结了一批积极分子秘密地开始进行抗日宣传活动了。当时，由于四川地方实力派、省主席刘湘在一定程度上对群众的抗日救亡活动持支持态度，所以 1937 年 10 月，华西大学便公开成立了抗敌后援分会。此时周曼如等更是成为了其中的中坚骨干，他们领导着 17 名会员和其他的进步教员、学生，积极进行抗日活动。到 1938 年 4 月，成都全市学生又统一成立了抗敌宣传团，川大学生组成其中的一团和二团，华西坝五所大学的学生则组成了三团。抗宣三团于 4 月 21 日召开全体会员大会，参加者共有 80 多人。① 其实，当时在华西坝的学生中已经建立起了中共的党支部，抗宣三团便是直接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开展活动的。金女大的周曼如便是由原先的民先队员转为了中共党员，并担任了党

① 王光媛：《抗战时期的华西协和大学》，载《成都文史资料选辑》总第九辑（内部发行），第 156 页。

支部委员的职务。

但是，在校学生们的抗战活动毕竟不能与前线的战士们冲锋陷阵、拼死杀敌相比，更多从事的是舆论宣传与后方支援。抗宣三团组织的活动主要有：

一、组织宣传队进行宣传演出活动。在抗敌后援分会的领导下，华西坝的学生们组织了宣传队、演剧队、歌咏队等各种团体，到成都的街头巷尾、公园广场等公共场所向广大群众们进行公开演讲、演出宣传，报告当前国内外形势，鼓舞人们起来抗击日本侵略者。他们在安顺街、浆洗街等处还专门设立了抗敌壁报，使人们随时能够了解国家的抗敌大事，坚定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的信念。节假日，学生们利用农民赶场聚集的时候，还经常赶往成都的郊区乡村进行抗日宣传。例如：1938 年 4 月，华西学生救亡剧团利用春假，组织同学们步行去新繁县城宣传演出，在当地引起了巨大的反响。①



金女大师生上街作抗日宣传（演讲者为张芗兰）

二、为前方的将士募集冬衣。从 1937 年岁末起，在华西坝的师生们就开始发起募集捐款，为前线战士制作冬衣的活动。同学们纷纷走上街头，动员群众捐款。歌咏队还义演了一场音乐会，金女大音乐系教授喻宜萱、华大教授德乐尔和刘延龄等都参加了演唱和演出。其后，同学们还选购了布料并亲自动手裁剪和缝制棉衣。当时连男同学也一改以往男子汉的架势，纷纷在女生的指导下，动起了针线。② 这热火朝天

① 王光媛：《抗战时期的华西协和大学》，载《成都文史资料选辑》总第九辑（内部发行），第 156 页。

② 同上。

的场面充分表达了华西坝莘莘学子对前线战士的敬慕和爱戴，以及他们自身的一片爱国赤诚，因而赢得了社会的广泛赞誉。

三、自建救亡图书室。1938 年 3 月，在学校附近的黉门街，华西坝的同学们自己出钱租用了一间两层民房来作为抗宣三团的团部。楼下一层作为团部办公室以及当时成立的华西学生救亡剧团的活动场所，楼上被用来建立了一个"救亡图书室"。图书室中的书籍是由学生们自愿捐献后凑集起来的，书的内容包括小说、戏剧、诗歌等各个方面，其中还有《资本论》、《辩证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等部分马列著作，以及当时武汉出版的《群众》、《新华日报》等许多进步报刊杂志。此外，同学们还定期组织读书会、时事座谈等形式的活动。这些不只进一步提升了学生们的抗日热情，而且还吸引了许多校外关心政治、热爱学习的人们，他们纷纷前来参加阅读和讨论活动。许多人通过在这里的学习开阔了视野，转变了思想，故而救亡图书室也就成为了抗宣三团又一个争取和教育群众的阵地。

此外，华西坝的学生领袖们不仅积极地组织自己的学生运动，还注意经常与国内外其他的学生组织相联系，以便互通消息、相互学习。1938 年 3 月，金女大学生周曼如和川大学生胡朝芝就以"战训女学生会"代表的身份前往武汉，参加了在那里召开的全国学联第二届代表大会。返回成都后，她们在成都的少城公园组织集会，向各校学生传达学联的决议，并积极筹备组建成都市学联，这对当时成都的学生运动来说，是一种有力的推动。1938 年 6 月 20 日，世界学联的代表一行四人来成都进行访问。周曼如、韩天石、邓照明、张文澄等七名学生运动领导人来到他们的住所，与之进行了通宵的座谈。① 这又在成都学生的抗日救亡活动与欧洲反法西斯的学生运动之间架起了桥梁，起到了相互联系、彼此支持的作用。

这一段时间，在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新局面下，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极为高涨。成都的各大高校都掀起了如火如荼的抗日救亡运动，

---

① 王光媛：《抗战时期的华西协和大学》，载《成都文史资料选辑》总第九辑（内部发行），第 157 页。

广大市民也受到了极大的鼓舞，整个成都地区体现出全民抗战的热烈气氛。

二、华西坝五大学学生战时服务团

1938年11月，金女大的学生周曼如、张滢华和张素芳又秘密发起成立了一个华西坝五大学学生战时服务团，继续开展各类抗日救亡活动。当时金女大参加战时服务团的团员还有：化学系景荷荪、方荣椝、王勍、沈谱，生物系赵秀琴。团员团结的学生群众有：中文系金丽华、刘开荣、方颖保（即方非），化学系殷恭敏，音乐系洪达琳，体专的徐淑敏，还有刘臻瑞、黄振圻等。①



刘开荣

战时服务团所开展的抗日救亡活动主要有：

一、为支援前线抗日将士开展募捐，举行义卖。金女大的学生们在张滢华、方荣椝等的带领下，买来了布匹、针线，通宵达旦地赶制手帕袋、布书包、针线包等小工艺品。她们有的管裁剪，有的管贴花，有的管刺绣，有的管缝制，忙得热火朝天。1939年元旦，战时服务团组成了十个义卖小组，正式开始在成都市区电影院前等地设点义卖。他们宣传"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支援抗战"，动员大家捐款捐物，并将所募集的款项装入竹筒，再统一购置日用物品、猪牛肉等去慰问前线将士。②

二、举行义演宣传抗日。战时服务团成立后不久，学生们就组织了第一次义演。地点是在成都的春熙大舞台，义演的剧目之一

① 张素芳：《回忆读书会、战地服务团，怀念取来火种的周曼如》，载《金陵女儿》编写组编《金陵女儿》，第166页。

② 王光媛：《抗战时期的华西协和大学》，载《成都文史资料选辑》总第九辑（内部发行），第158页。

是《流亡三部曲》，共有十多人参加了演出。由金女大的张素芳扮演一位流亡老太太，赵秀珍演一位怀抱婴儿的流亡妇女。她们一边歌唱一边表演，有独唱也有合唱，将国难当头人们颠沛流离、四处流亡的凄惨悲凉，演绎得淋漓尽致，激起了台下观众的广泛共鸣。台上台下齐声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回老家去"等抗日口号。一时间，剧场内群情激愤、斗志昂扬，学生的演出起到了良好的效果。另外，义演还筹集了一些资金，被用于支援前线。此后，战时服务团还义演了反映日本国内人民反对战争的话剧《再会吧，东京》等。①



舞蹈"正义之胜利"

三、组织歌咏队大唱革命歌曲。为了以各种形式宣传抗日、鼓舞士气，战时服务团的学生们还组织了一支歌咏队，活动的地点是在华大教育学院的阶梯教室。金女大的女生大多能歌善舞，所以她们更是踊跃地参加。除了原先战时服务团的团员外，其他学生也积极地参与活动。金女大的张滢华担任了歌咏队队长。大家利用课余时间学习演唱《义勇军进行曲》、《流亡三部曲》、《团结就是力量》、《大刀进行曲》、《游击队之歌》、《黄河大合唱》、《保卫马德里》、《毕业歌》等歌曲。有时他们还把校外的市民、壮丁请到学校，和同学们一起大唱抗日救亡歌曲。

四、邀请冯玉祥副委员长演讲。1939 年初，爱国将领冯玉祥来

① 张素芳：《回忆读书会、战地服务团，怀念取来火种的周曼如》，载《金陵女儿》编写组编《金陵女儿》，第 166 页。

到成都。为了进一步推动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1 月 13 日由战时服务团出面邀请，冯玉祥来到华西坝为五校师生员工们作演讲。演讲由华大校长张凌高主持，地点安排在华大事务所楼前。演讲题为《坚持抗战到底》，其中心内容是：介绍当前的抗战形势，鼓舞人们一定要克服困难、坚定信念，将抗日进行到底。演讲结束，金女大学生张素芳还代表战时服务团给冯玉祥敬献了绣有“深入民间”四字的锦旗。冯将军也当即挥毫手书“还我河山”四个大字以作纪念。[①] 当时，师生们的抗日热情极度高涨，随即当场便掀起了又一轮为前线将士募捐的热潮。

五、慰问壮丁。当时成都南北校场分别设有一个壮丁营。1939 年春节期间，战时服务团的学生们便购买了毛巾、肥皂、猪肉等慰问品先后去两地慰问壮丁。在那里，金女大的学生赵秀琴、周曼如等还进行了义演，演出的剧目是《抓壮丁》、《打鬼子去》等。《抓壮丁》揭露的是国民党在民间强拉壮丁的暴行。而在《打鬼子去》中，学生表演了一位因孩子被日本飞机炸死而发了疯的妇女，她紧抱着死去婴孩不放的景象甚是凄惨感人，借此深刻揭露了日军的滔天罪恶，反映了中国百姓遭受的深重苦难。当时在场的许多壮丁被学生们生动的表演深深打动了，他们既为自己的不幸遭遇难过，更愤恨日军的凶残兽行。他们的抗日热情被有效地调动了起来。

六、出版《团讯》。《团讯》是一张 16 开不定期油印的小报，它是战时服务团为了扩大影响，沟通消息而出版的，由金女大的张素芳和华大的汤克湘二人负责编辑，同学们自己刻写、油印。其内容主要是：宣传抗日救亡的方针政策，报道战时服务团的各项活动以及表扬服务团员中的先进事迹等。但由于《团讯》发行数量不多，最多几十份，持续时间也只有两三个月[②]，所以其影响并不是很大。

---

① 张素芳：《回忆读书会、战地服务团，怀念取来火种的周曼如》，载《金陵女儿》编写组编《金陵女儿》，第 168 页。

② 同上书，第 167 页。



宋氏三姐妹来学校视察

需要指出的是，金女大的学生所以能够踊跃地参加抗宣三团与战时服务团，积极地开展各种类型的抗日活动，其主要因素是吴贻芳校长和许多教师不但自己主动参加抗日活动，而且大力鼓励和支持学生的抗敌宣传。当时成都有的高校强调只有认真学习才是学生的唯一职责，它们和政府一起限制学生的抗日活动。这些学校的学生如果参加战时服务团还会遭到校领导的训斥和警告。“而在金女大，学生们则感到校长吴贻芳是与她们站在一起的。有的同学因参加救亡活动回宿舍较晚，学校也给予谅解(学校规定，熄灯前学生必须全部回宿舍)；学生因参加义卖集中在宿舍的两个房间里通宵缝制手工艺品，或参加演出，排练抗日宣传剧，学校当局也不加过问。由于吴贻芳的支持，在华西坝各大学里，金女大学生的爱国活动特别活跃，也最有生气。”①

三、学生抗日救亡运动的一度沉寂

无论抗敌宣传团还是战时服务团，学生们所进行的抗日救亡活动

① 朱学波：《吴贻芳》，第85页。

虽说都只是一些义演、慰问等小事，但其体现的却是成都广大师生们的一片拳拳爱国之心、报国之志。而且在当时对于宣传抗日、支持前线，事实上也起到了较大的作用。然而 1939 年暑假以后，由于受国民党限制而缩小了范围的各类学生抗日救亡运动也都渐渐沉寂了下来，师生们原先高昂的士气也慢慢低落，这种状态持续的时间很长，一直到 1944 年春天才有所改变。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一切的发生呢?

其中，最主要的因素还是当时国民政府对学生运动的极力压制。其实早在 1938 年 10 月，政府就已开始限制、镇压各个学校的抗日活动。自 1939 年下半年起，国民党对学生抗日救亡运动的镇压进一步升级，尤其是 1940 年成都"抢米事件"发生以后，国民党更是加紧了对华西坝五校内中共党员和进步学生的搜捕。遵照党的指示，已暴露的党员和积极分子纷纷疏散到外县，有的甚至转移到了延安。而 1940 年 6 月 24 日，战时服务团中的金大学生汤克湘(战时服务团后期的团长)、胡德江，华大学生曾俊修、李志迅，齐大学生王俊选等还是不幸被捕。其后，华西坝的中共党员再次迅速撤离。只有邢珊瑚、薛葆鼎等少数几人留下与上级保持单线联系。到 1940 年底，川康特委决定把还留在华西坝的党员也转移到重庆去。① 由此，一度如火如荼的学生抗日救亡运动便沉寂下来了。

随后，国民政府又采取了一些措施来限制学生的言论和结社自由，企图进一步控制学生的思想和行动。例如：1940 年，教育部要求大学和高中恢复导师制，想借此来恢复道德教育的传统。规定导师应当对学生的思想和行为负责；学生的毕业证书应当包括导师对学生的学业、思想和行为的评语。如果学生毕业后取得成就，导师将得到荣誉；如果学生误入歧途，导师将受到责备。② 这一计划很快遭到了当时有志新青年们的极力反对，它被视作是旧时科举担保人制度与传统师生关系的结合。学生们认为政府想借此建立教育特务制度，所以对国民政府

① 王光媛：《抗战时期的华西协和大学》，载《成都文史资料选辑》第九辑(内部发行)，第 159 页。

② 《教育消息》，载《教务杂志》第 71 卷，第 251—252 页，1940。

的敌对情绪迅速膨胀。此外,政府还严格控制学生自治会的活动,强制实行新闻检查制度,指使警察搞突然袭击等。这些也都导致学生抗日救亡运动无法继续进行,学生与政府间的相互不信任日趋加剧。

另外,1938年在武汉成立的三民主义青年团也成为当时笼罩在大学生头上的巨大压力。在筹备建团的1938年6月16日,蒋介石以三青团团长的名义发表的《为组织三民主义青年团告全国青年书》中提出建团的主要目的有三:一、为求抗战救国之成功,二、为求国民革命新的力量集中,三、为求三民主义之具体实现。三青团的团章中也规定:"本团以团结革命青年,力行三民主义,捍卫国家,复兴民族为宗旨。"①另外规定团员每周应当参加关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以及其他必读书的讨论,应当参加军训和夏令营,并为抗战贡献劳动服务。因而当时许多有志青年的确想献身于三青团,为挽救民族危亡贡献力量。

但很快学生们便发现三青团的实质并不像宣传的那样,自1939年起,三青团便把反共和限制异党作为其主要任务。其在中等以上学校派遣特务学生监视、告密、摧残自由,无所不用其极。在校学习的优秀青年,服务于各学校、各机关、各社团的学生干部、进步人士的一举一动,都受到三青团的监视。只要根据只言片语的报告,有人就会被列入黑名单,甚至被无端拘捕,严刑逼供,不经公开审讯就长年囚禁。② 三青团实质上成了一个迫害抗日民众、进步人士和反对共产党的特务组织。因而,青年学生们很快就对三青团嗤之以鼻、深恶痛绝,许多人纷纷要求退出。

为了与中共争夺青年,削弱中共对学生的影响,三青团不顾众人的反对,极力地拉人入团。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一文中提出,"中国国民党和三民主义青年团乃是实行革命的总指挥部,成年的国民务须加入国民党,青年的国民加入青年团","他们对于入党入团,有权利也有义务"。1939年春,CC系分子程天放就任四川大学校长,就以设立三青团川大直

---

① 周淑真:《三青团始末》,第26页,江西人民出版社,1996。(以下引用该书皆为此版本)

② 同上书,第93页。

属队为由,把200多名学生强行拉入三青团。1943年,三青团"一大"通过的《统一全国青年组训纲领案》更是规定:"初小在7岁至10岁期间,一律编为幼童军;高小初中11岁至15岁,一律编为童子军,15岁至17岁的青年,一律编为少年团……童子军、少年团,经考核合格,始得加入青年团。"[①]由此,国民党开始强迫集体加入三青团,进一步控制了青少年的思想、行为。这自然更引发了广大学生更为强烈的不满。虽然公开的示威遭到禁止,但他们零星的抗议活动却时有发生。

然而,国民政府的压制并不是导致学生士气低落,抗日救亡运动一度沉寂的唯一原因。在一定程度上,当时经济困难,学生的日常生活难以保障也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随着40年代通货膨胀失去了控制,学校的教学、师生的生活越来越困难。原来所实行的薪水制度已无法维持;学校教科书、纸张、黑板、粉笔等最基本的设施都成为了难以获得的奢侈品。学校收到的政府补贴、粮食补偿以及其他资助也都无法弥补通货膨胀所带来的困难。许多教师为了养家糊口,不得不担任两项甚至更多项工作,这直接导致了学校教学和科研水平的下降。此时,诸如金女大一类的教会大学更是处于不利地位。原先在华西坝的教会大学相对于其他大学来说经济状况比较好,因为它们有着西方的援助以及各类募捐所得的捐款。但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后,美国也直接卷入了二战,由此带来的是"美邦人士,当尽量用其财力,为本国计,此亦人之常情。以此本学院校董会在美国募捐,希望殊渺;即有必为数无几,至不敷之款,难于弥补"[②]。而且严重的通货膨胀使得中国货币和美元的官方兑换率远远低于市场的兑换率,这就意味着教会大学的经营越来越昂贵,学校固定的美元收入的购买力越来越低。所以自1941年12月起,金女大就多次向教育部提出,因为太平洋战事爆发,"在美临时费难募,预算不敷,请求核给补助,以资弥补"[③]。当时,有些教师甚至不顾政府的严厉警告,开始从事非法的黑市活动,这使得教师的崇高形象也

---

① 周淑真:《三青团始末》,第169页。

② 《私立金女大拨补助费及其他经费书表,一九三七——九四五》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全卷宗五,教育部档,4749。

③ 同上。

遭到破坏。

在这样一种特殊的气氛中，有一些学生开始变得玩世不恭，渐渐放弃了自己原有的理想和职责。原先极度高涨的民族主义热情此时也日趋淡漠。另外，那些仍然热衷于抗日救国的学生，也对国民党消极抗战的态度、颓废不力的军队大为失望。例如，1943年11月，由于西南战局吃紧，国民政府发动了一个"学生从军运动"。当时还是有成千上万的大中学生愿意从军服役。但政府却以身体不好或训练设备不够等种种理由，拒大部分学生于门外，只录取了一小部分。而那些参了军的学生也不能如自己期望的那样为抗日效劳。他们发现国民党的军队缺乏纪律和训练，后勤工作也马虎了事。许多人甚至一直在等待而得不到上级分派的任务，整天无所事事。例如：100多名金女大的学生报名学习救护课程。但学完课程之后，她们却一直没有机会用其所长来为抗战服务。① 后来当学生发现蒋介石要把枪口对准解放区人民时，她们更是极端失望，纷纷离队回校学习；有的还积极参加反对内战，迎接解放的运动。

① 德本康夫人、蔡路得：《金陵女子大学》，杨天宏译，第121页。

第五章　战后复校、合并与金女院的创建

第一节　战后回迁与复校

一、战后南京校区的收回与整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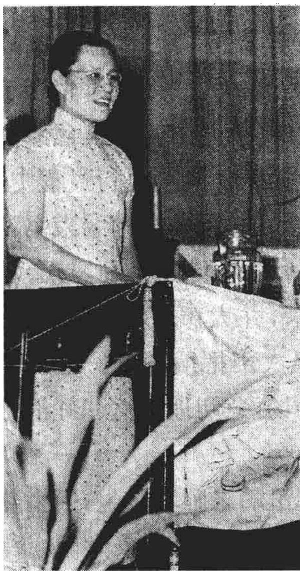
1945年8月，日本正式宣告投降，这意味着持续了八年的抗战最后以中国人民的胜利宣告结束。这给在大后方的每一个人都带来了意外的惊喜。那天，成都的九所大学和学院的领导正在款待教育部副部长杭立武，金女大的代表是训导主任张芗兰博士。晚会进行过程中，张芗兰还在问身边的人："你们认为这场战争会在中秋节之前结束吗？"很多人认为战争还将延续一年半载。突然一个消息传到会场，与会客人之一的省主席张群读了一封刚刚送到的信，并大声宣布："战争结束了！"最初，每个人都不敢相信，于是，张群又大声把信念了一遍。获得确切消息之后，每个与会者都立即离开了会场，急切地把这一好消息告诉自己认识的每一个人。①

张芗兰回到金女大宿舍，把消息告诉那里的老师和学生，引来热烈的鼓掌和欢呼声。接着，每一个人都不约而同地走向学校大门。留校的学生们手持燃烧的竹火炬，呼喊胜利口号，高唱爱国歌曲，开始游行庆祝。游行队伍从校园行进到新南门，然后折回老南门，最后回到校园。老师们也非常兴奋，教务主任蔡路得博士和黄利华女士不停地敲

① 德本康夫人、蔡路得：《金陵女子大学》，杨天宏译，第137页。

打着原来用于召集吃饭的大钟，直至敲不动为止，可见其内心的喜悦。① 八年的战争让很多人颠沛流离，饱尝辛酸，现在战争终于结束了，对于所有人来说，旧的生活已经结束了，新的生活开始了。

战争结束后金女大师生们最先想到的就是回家，大家都开始收拾行装，准备迁回南京的校园。一些学生希望学校能立即迁回南京，要求学校能提前结束本学期的课程，这样她们就可以在9月新学期开始之前有时间回家了。然而，由于战争刚刚结束，交通设施不够用，异常拥挤，对于大量的人员迁徙，这一障碍显得尤其突出。另一障碍就是南京的校园由于长期被日军占用，设施破坏非常严重，还需要几个月的时间修整，方能恢复教学之用。再加上当时许多失地正在收复，社会秩序十分混乱。在这些情况下，一时还难以回迁。所以学校决定缩短学期和寒假，以便能够在4月份开始搬迁，并寄希望于1946年9月能够在南京重新开学。同时在这段时间里做好回迁和复校的各项准备工作，主要是南京校区的接收与整理、回迁的组织和准备等工作。



1945年吴贻芳参加联合国制宪大会后在美国巡回演讲

由于这时校长吴贻芳正在参加联合国制宪大会，不能亲自处理学校事务，而学校却面临如此多的与成都和南京两方面密切相关的问题需要解决，所以执行委员会决定请蔡路得博士前往南京，了解那里的真实情况。12月初，蔡路得博士在南京待了十天，详细地了解和调查了学校被破坏的情况，制定了比较详细的整修校园计划，并具体负责整理复校等事宜。

日本投降以后，金女大于1945年10月收回了南京的校园。为了确保对校园的支配，抵制国民党军队在校内驻扎的要求，留守的负责人邬静仪女士、黄丽明女士以及顾天琢女士等按照吴

① 《迎接胜利》，《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校刊》第128期，第1页，1945年9月。

贻芳的建议，决定在金女大校园先办起了一所实验女子中学，并于10月20日开学。学校设初中和高中，共180名学生。这样，实验中学也就成了金陵战后在自己的校园里最早重新开学的一个单位，在这段时间里，她们可以一边整修校园，一边为在四川的师生返校作准备。

这时的金女大校园，主要建筑看起来表面依旧完好，其实也就只剩下一个空壳。1942年6月19日，日本军队占领了金陵校园，在以后的三年里，楼房虽没有遭受严重的结构上的损害。但是，一些地方拆除了隔墙，一些地方又加上了隔墙；一些门被封闭了，在另外一些地方又开了若干新门。各处的墙壁都十分脏。另外，当初为了加固士兵住的平房，用了很多木头来支撑，结果致使墙上出现了许多大洞。因而，在准备重新用于教学之前，一些楼房还需要做大量的装修工作，因为内部设施破坏非常严重。很多楼房都曾经被用作兵营，所有暖气装置和烤火用的炉子都被搬走，办公设备损失极大。图书馆的桌子和大多数书架还在，大礼堂的凳子也还在，但已是破旧不堪。所有实验室的设备(甚至包括桌子和实验台)都已不存在了。除了不能搬走的房子外，其余能拿走的，包括教学用具、科学仪器、图书资料、运动器具等，几乎被洗劫一空。①

刚刚收回的校园除了空荡荡的屋子和从成都带来放在屋内的舍不得丢掉的小物件，楼内已经一无所有。原有的25架钢琴有4架被保留了下来，但其中两架状况已经十分糟糕。图书馆的藏书已经被全部搬出，很多被日本人盗卖，损失非常严重。根据金女大战后的报告："受战争损失以图书仪器最为惨重，在战前该校中西文书籍盈100 000册，而杂志小册，均不在内。西迁时，除带出数千册以外，余均损失。幸接收时，得收回20 000册，约合旧时1/5。经复员之努力设法购置，现有中文书17 130册，英文书17 599册，共34 729册，约战前3/10有余"。②战后，在市政府的帮助下，从旧书商那里找回图书3万余册，这些书一

① 德本康夫人、蔡路得：《金陵女子大学》，杨天宏译，第139页。

② 曾苗芳著，吴振汉指导：《民国教会女子教育——"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个案研究》，第84页。

捆一捆地堆放在图书馆的地板上，各种书完全混杂在一起。分类和编目工作很快就开始了，但由于一时难以找到任何一个受过图书馆专业训练的人，工作进展很慢。后来图书馆的藏书大多是这些被破坏、有散失的旧书，而新书则由学校在战后重新购买。

日本人盗走了许多东西，也留下了许多东西。这包括一道封闭了大约 1/5 校园的新的砖墙，一个带有一间关押人的小屋的门房，无数木结构的房屋。其中一些可以供学校使用，虽然这些房屋建在学校里有些煞风景。各种军事和准军事的设施，包括无数的马蹄铁、电线和电缆，一些很大的防空掩体，里面装了很多准备用作燃料的木材。最糟糕的是，还留下了大量的垃圾、污物和废瓶子。[①] 很明显，日本人是在很仓促的情况下离开金女大校园的，他们留下了一片烂摊子，这使得整修校园成为一项相当繁重的工作。学校有幸有熊子敬博士帮助制订计划并监督完成这项巨大的善后工作。1946 年 3 月，惠特默小姐从美国回到南京，参与了这项工作。



熊子敬

为了筹备金女大校园的重建、添置教学科研设备和图书资料的经费，本应该在 1945 年早些时候庆祝建校 30 周年，但当时的形势似乎并不适合搞任何形式的重大庆典。不过，11 月 24 日和 25 日，金女大举行了庆祝建校 30 周年纪念活动，并发起募集重建校舍基金的活动。包括社会人士的捐赠和本校师生的捐款，一共募集到 1 047 万余元，捐款百万元的有张紫辉、李祖永、徐士浩三人，这其中各地校友会捐赠 539 万余元。1946 年，金女大第 1920 届毕业生郝映青一人捐赠 100 万，在校学生捐赠 70 万，苏州惠灵女中校长王梅娥捐赠 20 万。各地校友会通过义演、义卖等活动形式，

① 德本康夫人、蔡路得：《金陵女子大学》，杨天宏译，第 140 页。

积极为母校筹集复校的基金。广州校友会举办独唱音乐会，将挣得的200万全部汇到了母校。[①] 蔡路得博士让大家拟订出一份需要购置的教学科研仪器设备清单，由她负责寄往纽约托事部。金女大还从南京市内的旧书店收回了几万册图书，添置了一部分急需的新书。在纽约托事部、校友会和张群等人的支持下，金女大的重建工作得以顺利进行，到1946年7月，学校的面貌与头一年的12月相比，已经发生了让人难以置信的巨大变化。

二、成都校区师生的回迁

抗战胜利后，金女大为筹备回迁复校事宜。由于当时吴贻芳校长远在美国，所以当时学校委员会为复校事宜成立了一些专门机构，刘恩兰老师负责运输工具委员会，吴懋仪负责校舍修理委员会，陈世棕负责迁运委员会，蔡路得负责课程委员会，这样的专职分工提高了复校回迁工作的效率。[②]

1946年初，吴贻芳校长回到中国。在前往成都帮助制订搬迁及重建的最后计划之前，她到南京作了一次调查。紧接着又到成都待了几个星期，因为南京有更多的重要问题需要作出决定。她又于同年春季回到了南京，参加南京校区的整理工作。南京的一切安排妥当后，剩下的最大问题就是如何把远在成都华西坝的全体师生顺利迁回南京。学校的委员会研究了搬迁的各种可能的途径。在秋季，已有一些学生利用与亲戚同行的机会撤离成都；但是很明显，仍然有许多学生不得不依靠学校的安排，大多数教师和她们的家属也不得不这样做。如同当初从南京迁往成都一样，这是很困难的事，既要保证师生们的安全，又要保证正常的教学工作不受太大的影响。

1946年2月底，国民政府教育部召集会议，商议入川学校的离川程序适宜。金女大派闵侠卿先生为代表参加会议，会议决定搭船东下

① 南京师范大学校史编写组：《南京师范大学大事记》(1902—1990)，第82页。

② 《返京复校消息》，《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校刊》第128期，第1页，1945年9月。

的，以重庆地区学校先行，以便空出校舍使以后各地东下过渝的学校有住宿之处，所以成都地区各校要待到9月份以后才能搬迁。虽然教育部制订了计划，为不同的学校安排指定船位，然而按照这样的程序，在1946年10月之前还轮不到金女大。这样，沿水路搬迁的计划只好放弃。吴贻芳考虑，金女大必须在秋季正式开学，等到9月份太迟了。因此决定设法寻找运输工具自行迁回。① 于是金女大开始了大规模的自行搬迁工作，拟订了从4月中旬到5月中旬分三批离川的详细计划。大部分师生和物资乘军用卡车从成都翻山越岭前往陕西宝鸡，考虑到同时出发的人过多会使路上食宿出现问题，所以采取分批的方法，具体的日程安排是：1946年4月16日，第一批安排一辆卡车；4月22日，安排两辆车；4月29日，安排两辆车；5月15日，安排了四辆车。等全部到达宝鸡后，在那里沿陇海线乘坐火车向东行驶通过西安、洛阳到达徐州，再转乘火车沿津浦线南下前往南京，整个旅程大概要用18天左右时间，这样在6月份所有人员基本上都可以到达南京，还有大概三分之一的学生随家人自行返回原籍，待开学再回到南京。② 另一



闵侠卿先生



1946年金女大师生返回南京

① 《东归消息》，《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校刊》第133期，第3—4页，1946年2月。

② 德本康夫人、蔡路得：《金陵女子大学》，杨天宏译，第143页。

部分由水路出发，这部分人在重庆耽搁的时间较长，直到8月份才得到船位，从重庆顺江而下，直达南京。还有少数学生乘飞机回到南京。[①] 各路都有教师带队负责，尽量保证安全。整个来说，这是一次极其艰难的使人疲惫不堪的旅行，但是旅行者是在回家，尽管有许多不舒服之处，这次旅行还是给人留下了一些好的回忆。

主体搬迁后，还有一些教师仍然留在成都，以便完成最后的清理、包装以及发送物资的工作，并正式将乡村试验托儿所交四川英美教会接办，儿童福利实验所赠与华西大学社会学系继续办理，金女大使用的各种房屋及楼房交还华西协和大学，图书和教学仪器用拖轮运回了南京。

从华西坝回迁南京代表着一个新的开始了，人们都满怀希望，开始新的生活；金陵期待着新的开始，期待重新生活、工作在自己的校园里。临时性的办学方式持续了八年，而不是最初期望的一两年，在这种情况下，要保持良好的心态是十分困难的。尽管逃难生活充满艰辛，尽管人们普遍存在遭受放逐和游荡不定的感觉，但成都对每一个人来说，无疑是一个十分难忘的避难场所。大多数人离开成都时都有一种发自内心的留恋，一种永久的感激之情。

三、复校后的恢复和发展

1946年5月，国民政府迁回南京，首都南京百废待兴，对于金女大也是如此。1946年9月23日，学校在南京陶谷旧址开学复课，在从内地迁回的大学中，金女大是复课最早的。数理学教授陆慎仪兼教务主任，数理学教授熊子敬兼代总务主任。不久，总务主任由吴贻芳校长专门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聘请的郭锡恩博士担任。[②] 其后，为了集中精力处理校务，吴贻芳校长开始减少社会活动，国民党政府想任命其为教

---

① 吴贻芳：《金女大四十年》，载《吴贻芳纪念集》。

② 郭锡恩：《受命于校长——90高龄的郭博士来信回忆往事》，载金女大南京校友会编写组编《金陵女儿》（第三集）。郭回忆称：当1946年秋他到达金女大时，看到所有荒芜待修的空旷教室及宿舍时，大吃一惊。校园当时被日军长期占用，日本兵把所有能用的材料统统拆卸下来并运回日本，木桌子、椅子和书籍都用来当燃料。

育部长，她坚辞不就。1947年，她又辞去基督教协进会副主席一职。在全体师生的努力下，学校很快恢复了正常的教学秩序。

战后初期，由于还没有很快从战争的困境中完全走出来，一切都还处于恢复过程中，所以最初还是经过了一段困难的时期。学生们当然没有见过金陵校园，只是曾经听说校园异常美丽舒适。她们完全没有想到，当1946年9月学校开学时，她们看到的是临时替代使用的家具，没有床，没有实验设备，其他方面的条件也不尽如人意。由于战后交通异常拥挤，直到1947年2月，很多物资才运到。在此之前，住在有木地板的房屋里的学生就睡在地板上；如果是水泥地板，则睡学校提供的帆布床。从成都经水路顺江而下运送的货物没有按时送到，从美国发出的实验用品到得更迟。这样，重返校园的第一年是极为艰难的。这一年总的招生人数为332人，其中一些女孩住在自己家里。①

但是经过最初的一段艰难时期，金女大的情况还是慢慢好起来了。为了保证金女大的经费收入，吴贻芳等人联合发起了中国基督教大学"联合募捐委员会"。由于战后国民政府的经济崩溃，中国本土的资助大幅减少，1946年中国政府和社会资助占不到20%，而美国方面的捐助款占了大约一半以上。而且金女大的捐助款不仅来自教会的捐助，此外还有史密斯女院的年度捐款和其他一些团体的捐助。② 因此，金女大经费来源呈多元化趋势，这就使得学校在时局动荡，经济环境恶化的条件下基本保持了经费的来源，为正常的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提供了基本的物质条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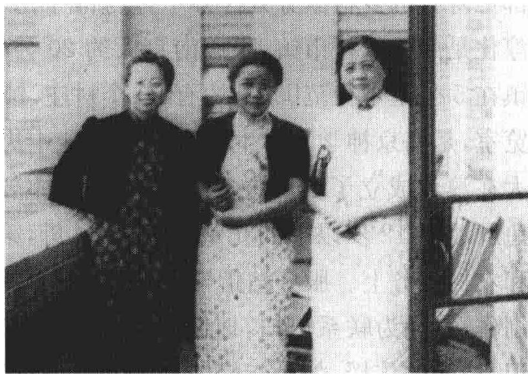
经过一段时期的恢复和发展，金女大开始进入一个快速发展时期。从1946年起，招生人数年年增加，学生人数有了迅速增长，"1946年第一学期有332人。1948年超过480人"。③ 所设的科目也明显增加，尤其是出现了一些新的学科；由于战后交通限制的取消和放宽，教职员也比以前多了，主要是教师的来源是多渠道的，有专程来教学的外籍教

① 德本康夫人、蔡路得：《金陵女子大学》，杨天宏译，第144—145页。

② 《私立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经费预算及收支情况(1935—1949)》，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全卷宗六六八。

③ 吴贻芳：《金女大四十年》，载《吴贻芳纪念集》，第106页。

师，也有来度假讲学的各国教师，也有本校毕业生去美国深造后回母校任教的，也有一些外校转过来的老师。以家政系为例，抗战后不久，家政系有专职教师六人，兼职教师一人，与外语系、社会学系教师人数一样，如果把儿童福利实验所的六人加上，其教师队伍数量能够满足教学与实验实践的需要。指导儿童发展工作的孙增敏先生，曾在美国某所学校及俄勒冈州大学研究儿童工作，教授儿童发展、儿童心理、托儿所教授法等课程。另外，还曾邀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的奥斯本博士(Dr. Ernest Osbrne)讲授父母教育。1946—1947 年，从金女大毕业后在英国剑桥大学获得营养学博士学位的鲁桂珍加盟家政系，义务支教一年，玛丽·费朗西思·利得(Mary Frances Reed)博士也来到家政系任教。[①] 抗战后的一段时期，家政系的发展得益于教师队伍建设。同样全校各系科基本上都增加了一些新教师，他们给金女大带来了新知识、新思想，为学校的教学工作注入了新的活力，也丰富了校园的学术气氛。



徐亦蓁(右)、鲁桂珍(中)、朱觉方三人



家政课教学

学校迁回南京后，除了正常的教学工作以外，还恢复了许多社会服

① 德本康夫人、蔡路得：《金陵女子大学》，杨天宏译，第 149—150 页。

务活动，继续保持重视社会调查和社会服务的优良传统。以前设在成都仁寿县的乡村服务处停办了，重新在江宁县淳化镇成立乡村服务站。淳化是一个农村市镇，距离南京大约20公里，乘车十分方便。这个小镇在5公里半径范围内，约有50个村庄，镇上有1座教堂、1座公共阅览室，是南京神学院学生的实习中心和中央政府的农业推广站。金女大在淳化成立了乡村服务站后，一开始主要开展救济活动，供应奶粉、鱼肝油给12岁以下的儿童、孕妇及乳母，第二年开始把工作转向教育和农村服务上。服务站指导农村妇女从事手工艺品如刺绣、儿童玩具制作，并代为联系出口，以改善当地农村经济。同时进行妇幼保健知识、技能的传授，如为年轻未婚妇女办的训练班，主要开设阅读、书写、编织、卫生、家庭经济、唱歌以及公民课程等。服务站还创办了托儿所、幼儿园，以减轻农村妇女的劳动负担。在保健工作方面，为不同年龄的儿童检查身体、注射防疫疫苗。服务站同时是社会学系学生的实习实验基地，学生通过服务站的实习活动，在进入社会服务以前就能了解农村社会，锻炼实践能力，拓宽和深化理论学习，“使这批年轻的社会工作者在厚生精神的指引下，在为农村和村民服务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培养为祖国和人民而无私奉献的品质”①。



抗战胜利后，十几位中外教师在南山甲楼前合影

① 王世军：《金大金女大社会工作专业沿革》，《南京师大学报》，2001年第5期。

此外金女大还在宁海路对面，恢复了儿童福利实验所，其规模比成都的大，条件也好得多，实验所共有专职人员十人，而且有美国援华会的经费资助。还设有儿童行为指导所，参与社会服务。所做的工作主要是三个方面：一是每周分配一个工作日去华东南京神经病防治医院，参加病案讨论和儿童行为指导门诊工作。在门诊病童中，挑选有典型异常行为的儿童，进行心理与环境的个案追踪研究与治疗。二是每周分配半个工作日去中央医院儿童保健门诊，向家长解答有关儿童心理与教育的问题。挑选有异常行为倾向的儿童，进行心理和环境的个案追踪研究。三是每周分配半个工作日去中央大学师范学院附属小学，与有关班主任共同研讨该班有异常行为的儿童问题，并挑选其中问题较大的，进行心理和社会的个案追踪研究与治疗。1948 年因战争局势紧张儿童行为指导所工作暂停，1949 年又恢复，并且一直开办到 1951 年 9 月。

学校还开始实施各种旨在改进生活和工作条件的计划。改进健康服务就是这些计划中的一个。特别是一年一次由市医院所作的 X 光胸部透视检查，既有效又经济，对于查出相对容易治愈的早期肺结核病例很有帮助。这些检查要求学生都做，并努力使所有的教师和工友也做。随着接种疫苗和其他公共健康措施行之有效的开展，与抗战缺医少药的情况相比，师生们总的健康状况已经得到明显改善。

可以说，抗战胜利后，经过艰难的回迁和复校过程，金女大无论是教学工作、社会服务，还是生活状况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经过这段时间的恢复和发展，金女大很快进入了自身发展的一个高峰期。

第二节　1949 年前后的金女大

一、国共内战中的金女大

抗战胜利后，金女大很快就收回并整理了南京校区，并于 1946 年 9 月在原校址复课。在全体师生的努力下，学校很快恢复了正常的教学秩序，并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但抗战胜利后的和平很快被国民党发

动的内战打破了，在动荡的时局中，金女大的发展深受影响。

抗战胜利初期，金女大的学生运动还不是很多。吴贻芳说："1946年迁回南京以后，金女大的政治空气一度比较沉闷。1946年美国兵强奸北大女生沈崇事件和1947年'五二〇'事件及浙江大学学生于子三在狱中被杀事件，虽然有其他学校学生来联系，本校学生都没有走出学校去参加。"①但学生都以罢课作为响应。吴贻芳后来给蔡路得博士的信中也记述金女大没有参加南京的学生游行。1947年5月，由于国民党当局醉心于内战，不管老百姓的死活，一味地发行贬值的纸币，造成全国范围内的货物紧缺、通货膨胀、物价暴涨。南京大学生以公费太少，无法生活为由，发起"吃光运动"，举行了"反饥饿大游行"，掀起了抗战结束后最大规模的学生运动。这一场反饥饿争取全国公费的活动，很快波及上海、杭州等大城市，这些城市和地区的学生纷纷起来响应。除对南京学生的行动表示同情与支持外，又进一步提出了挽救教育危机、增加教育经费以及反迫害、反内战等口号。沪、宁、杭三地学生组成联合请愿团，在南京向行政院、教育部、参政会请愿。5月20日，沪、宁、杭三地学生在南京组织联合大游行的途中，遭到国民党军警特务镇压，当时被打伤50余人，重伤3人，失踪40余人。5月21日，为响应南京市五二〇爱国学生运动，全校学生罢课一天。11月13日，金女大学生为抗议国民党政府秘密杀害浙江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于子三事件罢课一天。②



金女大学生上街游行反内战

1947年下半年，金女大的学生成分发生了变化，"学生中进步力量

① 程斯辉、孙海英：《厚生务实　巾帼楷模——金陵女子大学校长吴贻芳》，第156页。

② 南京师范大学校史编写组：《南京师范大学大事记》(1902—1990)，第89页。

有了发展”[1]。当时金女大确有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在活动，早在成都时金女大就有了地下党组织，只是在迁到南京后，原中共地下党员先后离校，党组织一度中断。1948 年初，党的活动才又恢复。地下党员王粹珍、吴文安和一些进步学生组织秘密读书会，出版进步板报，还带动学生参加了各种学生运动。

1948 年 4 月底，金女大的部分学生开始走出校门，有组织地参加南京大中学生在玄武湖音乐台举行的“革命歌曲大合唱”等活动。学生们开始走出校园，关心现实政治。5 月 3 日，金女大的学生们参加了南京市学联在丁家桥中央大学饭厅举行的歌舞、戏剧、诗歌晚会。[2] 5 月 4 日，金女大与金大、中大、音乐学院及戏剧专科学校的学生在中央大学礼堂举行纪念“五四”大会，并集体发表宣言，内容为反对内战，要求和平、民主，反对非法逮捕，实行独立外交等。

5 月 21 日，南京市的大中学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纪念“五二〇”运动一周年，要求民主，反对内战。尽管金女大多数学生出身于有产者的家庭，但她们受“五四”传统的影响，向往民主和自由。这一天，全校学生停课一天，同学们高举着横幅标语，喊着口号上了街，又汇合进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国民党政府十分担心日益高涨的学生运动会引起整个社会的反抗，于是又出动了大批军警，沿路阻拦游行队伍，并强行抓走了四名分别为金陵大学和中央大学参加纪念大会的学生。这一下更激起了全市学生的愤慨。金女大学生 22 日举行了全体学生紧急会议，通过了罢课决议，后又组织起大概有四五十人参加的游行



金女大举行“要求民主，反对内战”游行

① 吴贻芳：《金女大四十年》，载《吴贻芳纪念集》，第 115 页。

② 南京师范大学校史编写组：《南京师范大学大事记》(1902—1990)，第 91 页。

队伍。学生们举着“还我人来”等横幅，与金陵大学、中央大学等学生队伍汇合后，前往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青年部请愿，强烈要求释放被捕学生。经过一整天的谈判与斗争，到傍晚，当局被迫交出了被捕学生。①

1948年底人民解放战争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国民党军队兵败如山倒，其统治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校园独有的风声、雨声、读书声的气氛，终于被彻底打破。

政治影响很明显地反映在学生们的生活中。关心时局变化的学生越来越多，一部分进步同学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更加积极地投入了校内外争民主、反独裁的活动，有些甚至渡江北上，参加革命。同时，也有一部分人离开了学校，跟随她们的父母去了香港、台湾或美国。

1949年4月1日，国民党参加国共和谈的代表离开南京北上，包括金女大在内的南京大专院校的学生前去欢送，要求真和平、民主、自由。国共双方在北平举行和平谈判，南京的金大、中大、政大、剧专、金女大等十几所大专院校的师生联合举行了“争自由、争民主、争和平”的示威游行，要求国民政府接受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八项和平条件。金女大有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学生参加了游行。上午，各院校的师生们一起走上街头，强烈要求国民党当局接受和平条件。下午，大批军警特务突然冲来，见人就打，造成3人死亡，100多人受伤的惨案。伤亡的师生大多数是中央大学、政治大学、戏剧专科学校的。②

当时，金女大的很多学生都要求进步，积极参加进步组织。1949年4月上旬，金女大成立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地下组织，并且在12月正式建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女大支部，当时成员有40人左右。建国后学生活动开始公开化，进入正常秩序。

近代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很少有大学对学生参与政治活动公开表示支持的，多是默许或劝阻，当学生运动遭到当局镇压时，又会不遗余力地保护学生。金女大也是如此，校长吴贻芳一方面出于对学生安

---

① 南京师范大学校史编写组：《南京师范大学大事记》(1902—1990)，第91页。

② 同上书，第93页。

全的考虑，对学生运动往往是不提倡的，另一方面站在学生的立场上，对学生运动表现出了同情、支持的态度。丁光训在吴贻芳的追思礼拜上提及，1947 年，吴贻芳就对学生运动表示同情，并就国民党军警残酷镇压的暴行，当面向蒋介石表示了义愤与抗议。另一篇《平凡人生　丰盛生命》的文章指出，南京一些大学的校长们出于对学生的同情和保护，开会向当局请愿，吴贻芳率先出来讲话。她说："学生要爱国，我们是不能压制的。"施葆真在《我们为什么这样热爱吴校长》一文中叙述这一行动不只是简单地从一个为人师者对学生的爱护角度去理解，更表现了吴校长大义凛然的气概。①

1947 年，吴贻芳在五二〇惨案发生后当面责问蒋介石。国民参政会四届三次会议在南京举行。在蒋介石邀请参政员出席的午餐上，吴贻芳和蒋介石坐在一桌。在交谈中，吴贻芳提出，应该将南京市的警察局长调走，蒋介石反问何故，吴贻芳说："那些警察名曰维持秩序，实际上却对学生大打出手，有的学生已经逃进了水果店，警察还是紧追不放，追进去揪出来殴打，这难道不是警察局长的责任吗?"谁知这席话却大大触怒了蒋介石。蒋介石很不高兴地对吴贻芳讲："警察是为了维持公共秩序嘛！近来一些学生也闹得太不像话了，一个国家的首都总不能没有正常的生活秩序嘛！"蒋介石进而说："这些学生都是被共产党利用的，不把共产党分子从学校赶出去，学校是没法办下去的，学生们也没法好好学习。"②

1948 年 4 月底，部分学生开始走出校门，有组织地参加学生运动。面对即将兴起的学生运动，学校感到很为难。校方一般认为学生的许多活动是有理的，有积极意义的。但教会学校都觉得，作为学生，最好不要过多地去过问政治，重要的是将功课学好，国家大事由政治家去解决。在一次全校集会上，校长吴贻芳以较为严厉的口气要求同学们不要过问时局，不要介入政治运动。她还没讲完，同学们就开始了议论，一些同学

① 黄洁珍著，吴梓明指导：《从吴贻芳与金陵女子大学看基督教育理念的实践》，第 168 页。

② 周和平、吴友松：《吴贻芳传略》，载《吴贻芳纪念集》，第 131 页。

认为校长讲得不对，怎么能不关心政治呢？外面在打内战，我们能安心读书吗？有一位姓王的同学还破天荒地从座位上站了起来，顶了吴贻芳几句。吴贻芳很冷静，没有发脾气，也没再多说便宣布散会。①

1948年5月1日，为应对不断兴起的学生运动，校训导执行委员会作出一项决定：个人参加组织学校不干涉，但决不可借用学校、学生自治会名义参加任何校外组织。这表明学校作了妥协，等于默许了学生运动。

同时，学校还采取一系列措施保护学生。当时国民党政府在南京对进步学生实行大搜捕，那段时间里，有不少大专院校的进步学生，或白天在大街小巷"失踪"，或夜晚被军警闯进校园秘密抓走，从此杳无音信，生死不明。一时间南京城笼罩着一片白色恐怖。一些平日言辞激烈的人也躲了起来，生怕被列上黑名单。此时吴贻芳校长风闻金女大也有一些学生被列上了黑名单，有可能被国民党特务抓走的消息，便立即驱车前往教育部，亲自拜见次长杭立武，义正辞严地说："金女大作为一所国际知名的女子大学，从大革命以来，军警就没进入过学校。为了高等学校的尊严，也为了女子大学的声誉，军警宪特不得进入我金女大，不得在校内秘密捕人。"②对此，当年曾参加学生运动的金女大学生洪范写道："回想当时学生运动的那些岁月里，南京各大学都常有学生被捕、坐牢，我们金女大也一样有党的地下组织，有进步学生运动，市里的各种民主学生运动，我们的同学都积极参加，但军、警、宪、特没有进校捉拿过一个人，没有一位同学坐过牢，我们学校的地下党组织没有遭到破坏。"③

面对动荡不安的环境，由吴贻芳校长建议，金女大训导委员会改为生活辅导委员会，下设生活辅导处，代替原有的训导处，以加强对学生的指导和管理；同时制定了详细的《课外活动规则》，以求把学生的课外活动纳入有章可循的轨道。《课外活动规则》就学生课外活动的原则、课外活动及各组织的登记办法、课外活动借用学校场所或用具、刊物与壁报、学生自治组织的活动等作了明确规定。其中确定的课外活动原则为：

① 洪范：《高级建筑师——肖林》，载《金陵女儿》编写组编《金陵女儿》，第300页。
② 朱学波：《吴贻芳》，第107页。
③ 洪范：《校长和我》，载《吴贻芳纪念集》，第178页。

一、有组织之课外活动，原为利用课余之暇，启发才能，陶冶兴趣，训练互助、合作，服务人群之责任心，以培养优良健全之人格。二、凡学生各种课外活动之组织，在学校范围内，故均须先得校方核准始可成立。凡涉及校方之行政议案，亦必经校方之认可。不合校规之任何组织，校方可随时解散之。三、本校辅导处负责辅导学生个人或团体。凡学生个人或团体向学校有所申请时，应即提交辅导处代为转达。四、凡学生团体组织或临时活动，得由奉校辅导处之课外活动组主任及各宿舍生活指导，对各该团体之计划与组织予以协助及指导。该《规则》还规定学校内的社团组织，组织或参加校外活动，还要经过社团多数会员讨论通过，并向辅导处申请，经核准后方可。学校社团组织与个人邀请校外团体或个人来校参加活动，也要经过辅导处与校务委员会许可。①



金女院学生手册

吴贻芳还决定将学校对待学生活动的一些主张与学生家长沟通，以获得家长支持。学校将列出三个原则的函件寄给家长细阅，如果家长同意，再由子女阅看，然后将家长与子女签署的同意书寄给学校；不同意者不用签署，但该生需转校。这是 1948 年临近暑期时学校作出的决定。金女大列出的三个原则是：

第一，我们同意金陵女子大学的教育目标，并对学校的施教充满信心；

第二，所有学生团体必须向学校注册及得学校承认，所有活动需在学校条例的范围内；

第三，若学生所参加的活动不受大学承认，大学并不负责。②

① 《课外活动规则》，载《私立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学生手册》，1948。

② 《私立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训导委员会会议记录(1946 年 10 月—1948 年 6 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六六八/0168。

金女大的决定显然是要让家长知道，接纳三个原则的学生，校方愿意与她们合作。很多家长回复函件表示支持校方的决定，每个学生都交了签署同意书的回条。但到这年的 8 月份，留在学校过暑假的学生收到匿名函件，认为学校的三个原则是控制和压抑学生的活动。

尽管学校竭尽全力想使学生们有一个安静、温馨的学习环境，努力使外界对金女大的干扰减少到最低程度，但随着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的迅速溃败，首都南京的气氛越来越紧张。1949 年 4 月 1 日，国民党参加国共和谈的代表离开南京北上，金女大学生决定去欢送，并且呼吁要求真和平。学校听到国民党散布共产党要在这一天捣乱的消息，担心学生被军警殴打，就设法劝阻，但未奏效。果然，这天下午发生了血案，吴贻芳亲自去鼓楼医院慰问受伤者。“金女大校长的到来，使学生感到突然，接着是深深的感动，在她亲切的目光中，人们理解了她。”① 这也意味着学校对学生的同情和支持。

二、迎接新政权

1948 年，人民解放战争已接近全面胜利，国民党政权即将垮台。同年 12 月 8 日，吴贻芳在致美国托事部的一封信中，提到：四分之三的学生和部分教职员离开了南京，到 1948 年下半年，金女大的工作已近于瘫痪。但是校方决定不迁校，并作好了在新政权领导下开学的准备。吴贻芳说：“国共和谈决裂后，解放战争节节胜利，淮海战役展开了。当时有人主张将学校迁往台湾，我坚决



迎解放学生上街游行

① 周和平、吴友松：《吴贻芳传略》，载《吴贻芳纪念集》，第 132 页。

反对，认为中国共产党是要保护学校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也是秋毫不犯的，就决定学校仍留在南京，迎接解放。”[①]吴贻芳以教职员的名义列举了许多不应迁校的理由，例如“南京失守，中国也没有其他地方安全”等。另外，她提出了在新政权领导下开学的四项条件：一、宗教工作允许自愿参加；二、共产党人不可以任命入学职员；三、维持大学的教学自主权；四、大学有权决定招收或开除学生。[②] 吴贻芳的这封信是希望稳住美国托事部，说服她们不作出迁校的决定，继续在新政权领导下支持金女大。

国民党军队撤走，解放军还没有进城，南京出现了暂时的“真空”，社会秩序混乱。当吴贻芳被邀请担任南京各界治安维持委员会副主任时，她没有推辞，而是欣然同意。为了保障南京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避免发生动乱。金女大校长吴贻芳与原西北军高级将领马青苑等发起成立了临时治安委员会，签发了安民告示。

1949 年 4 月 23 日，南京解放。这一天上午，穿着土黄布军服，扛着小米步枪的解放军进了南京城，市民们都自发地走上街头迎接。金女大的教职员工也涌上街头，欢迎解放军的到来。不少学生用自己编导的歌舞节目慰问人民子弟兵。有十多名学生还就地参加了解放军“二野”、“三野”的文工团，并很快成了文艺骨干。校长吴贻芳也和金女大在校学生一起到新街口欢迎解放军。南京解放后，由于解放军没有掌握制空权，台湾当局不断派飞机轰炸，平民百姓的生命财产受到严重威胁。这时，设在南京城



迎解放学生打腰鼓、扭秧歌

① 吴贻芳：《金女大四十年》，载《吴贻芳纪念集》，第 106 页。

② 黄洁珍著，吴梓明指导：《从吴贻芳与金陵女子大学看基督教教育理念的实践》，第 104 页。

里的一些外国银行、商行和学校，纷纷竖起外国国旗，以避免飞机轰炸。考虑到金女大的情况，也有人向吴贻芳建议，在学校的最高处悬挂美国国旗，说这样一定可以受到美国方面的保护。前来空袭的飞机就不会以此作为轰炸的目标了。听到这一建议吴贻芳坚决反对："不管提出这种建议的人是出于什么目的，悬挂美国国旗是绝对不可以的。现在解放了，在中国的土地上，在中国的学校里，为什么要挂美国国旗？这事关民族气节和国家荣誉，我们不能也绝不允许这样做。"①

新中国的成立，使经费主要依靠西方资助的教会大学发生了深刻变化。首先实行了学校行政完全由中国人管理的措施。由于多数西方人已意识到这一点，因此，这一措施完成得很顺利。接着各校董事会进行改组，重新组成的校董会成员几乎都是中国人。即使个别学校因情况特殊，在校董会中留有少数西方人士，也没有表决权。这一新政策对金女大来说已不成问题，因为早在许多年前，它就实行了中国人管理校政和校董会制度。到了1950年，几乎有一半以上的外国教职员离开了金女大。她们或是以退休为由辞职，或是因为敌视共产党政权而被遣送回国。



金女大学生阅报迎解放

同是教会学校，同是中国人当校长，各个学校所出现的情况也不一样，有的学校校长，由于解放前与国民党政府和国外教会关系十分密切，学生们对他们十分反感，再加上他们平时对学生的民主活动多采取高压手段，双方的关系一直就十分对立。解放后他们当然不受欢迎，沪江大学校长就是这样下台的。金女大的情况不同，吴贻芳在师生员工

① 朱学波：《吴贻芳》，第121页。

中仍然享有崇高的威望，尽管有些人对她是虔诚的基督教徒，并与国外有广泛的联系有些微词，但没有人对她继续任金女大校长有丝毫异议。20 多年的无私奉献，已使吴贻芳一定程度上成为金女大的一种象征，人们提到金女大就自然会联想到她，提到她就想到金女大。

5 月 2 日，刘伯承、陈毅接见了金陵大学校长陈裕光和金女大校长吴贻芳。吴贻芳回忆说："他们非常热情友好，询问解放军有没有干扰学校。在交谈中，有一点被特别提到：虽然他们强烈反对美帝国主义，但这不涉及对华友好的美国人民。只要外国人不反对共产党政权，欢迎他们继续留在中国。"①

5 月 16 日下午，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中共南京市委、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邀请南京市各界知名人士和社会贤达参加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有经济界、文化界、教育界、科学界的著名学者和代表。会议是请这些学者对教育发展发表意见。刘伯承致开幕词，指出人民支持解放事业，今后的建设需要各类人才。大家畅所欲言，各抒已见，纷纷为建设新南京献计献策。市长刘伯承和市委副书记宋任穷认真、仔细地听取了各界人士的发言。吴贻芳作为教育界名流和有影响的社会活动家，也应邀参加了座谈会并作了即席发言。她在发言中首先讲述了解放军进城后自己喜悦的心情，并感谢人民子弟兵赶走了国民党政权和军队。然后，她进一步地谈到对解放后南京建设的看法，提出成人教育，初级教育要大量扩展，以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水平；由于工业建设需要技术人才，培养专门人才的大学教育也应继续办。最后她激动地说："作为一所专门培养高级妇女人才的金女大，愿意在尊重信仰自由的原则下，为人民服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继续为国家出力，为社会培养急需的人才。"②

此后，吴贻芳、陈裕光与有关当局交流办学意见。政府负责人告诉他们，有人认为旧教育制度是反动政府一手策划的，应该立即废除。但人民政府认为这一教育制度沿用了 20 余年，多几个月也无妨，不过诸

---

① 吴贻芳 1949 年 6 月致 Dr. R. J. Mcmullen 的信，转引自朱峰著《基督教与近代中国女子高等教育——金陵女大与华南女大比较研究》，第 157 页。

② 同上书，第 158 页。

如总理纪念周、党义、军训、童子军和训导主任等制度必须立即废除。

三、新的开始

1949年10月1日之后，金女大在行政组织、课程设置以及学生生活等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中一个重要的改变是学生自治和学生参与校政，在各个委员会及行政会议中都有学生代表出席。解放战争胜利后，学生们的革命热情高涨，许多学生志愿参加解放军的政治文化工作。留在学校的学生也积极追求政治进步。金女大原定5月9日召开教职员会议，商讨教务改革。在5月8日晚，40名学生召开非正式会议。会上学生们提出许多要求，如废除训导办公室、废除英语综合考试、体育课更换运动服、新生体育课由每周四节改为两节、减少英文指定参考书等。次日，大学执委会决定和学生自治会开会讨论学生的要求。5月29日，吴贻芳更收到学生们要求改革校务管理的请愿书，要求组成由学生、教职员、工友参加的校务管理委员会。学生指责校方处理学生的要求过于迟缓，吴贻芳校长理解学生的要求，积极进行各方面的改革。

1949年9月，包志立博士被委任为学生事务主任，原先的学生事务主任蔡路得博士把职位移交给中国教职员。1949年12月，新的学校委员会成立，这是金女大历史上首次在校政上有助教及学生在校务的决策会议上出席，并且可以自由发表意见。校委员会的工作主要是：成立宿舍生活委员会取代学生事务工作，成员包括校长、教务主任、一名宿舍辅导员、教员代表及两名学生代表。设立决策组负责学生课外活动及宿舍规则。1950年11月学校行政委员会举行会议，会上决定重组校董会，成员须为中国人，校董会名单呈交教育部。会上还一致通过学校向新政府注册。



包志立

另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课程改革。解放初，学校还可以自由地决定自己的课程，教育部没有新的课程标准。学生参与课程计划的工作很活跃，他们提出的改革要求主要有废除训育组、尽量地把学校的必修课减少、课堂外多设讨论等。

为适应新形势的需要，金女大的教学和课程也作了重要变动。早在1949年2月，为了了解中国的形势及其发展方向，吴贻芳校长就请一位教师把《新民主主义论》翻译成英文，在外籍教师的晚祷时向她们宣讲。[1] 1949年9月，学校接到南京市军管会高教处通知，开办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课程，时间从1949年9月至1950年1月。学校于11月29日召开教务会议，会上吴贻芳校长报告校董会年会中提出新时代课程应该如何使理论与实际结合，以配合新民主主义革命。在语言学习上，学校逐渐强调学习俄文，减少对英文的重视。宗教学科不再计入学分，并且在其他课程的教学中不得涉及宗教。当时宣布，一切宗教教育和宗教活动都必须是自愿的，基督徒在奖学金方面不能有特殊照顾。这样一来，选修宗教课的学生和参加做礼拜和宗教活动的人数就大为减少。[2]



1949年金女大毕业典礼

1950年1月，南京的高等教育专员在北京参加教育行政会议，回到南京后，在一次各大学负责人参加的会议上，论及南京大学的政治课程及课程改革，尤其是社会科学方面比北京慢。会后各大学接到通知，在每个机构必须成立政治教导及课程改革委员会，并要求集中四个星

① 吴贻芳：《金女大四十年》，载《吴贻芳纪念集》，第115页。

② 黄洁珍著，吴梓明指导：《从吴贻芳与金陵女子大学看基督教育理念的实践》，第109页。

期的时间研读社会发展史的课程。1950 年 2 月 21 日，学校接到华东军政委员会教育部颁布的《关于华东区大专院校政治课程暂行办法》。根据暂行办法，金女大在一年级的上学期开设了必修课《社会发展史》（3 学分），三年级下学期开设必修课《新民主主义论》（3 学分），二年级开设必修课《政治经济学》（6 学分）。为全体学生开办的政治讲座每两周举行一次，每学期 1 学分，四年级共 8 学分。[①] 1950 年 3 月，金女大根据南京市各大学政治教学委员会的规定，在新学期开学的第一个月停课，进行政治形势学习。开学后，吴贻芳校长带领学校各级领导与全体师生混合编组，共同学习唯物史观和政治时事，时间长达五个星期。[②]

5 月份，中央人民政府作出决定，对全国大中专院校的毕业生，不论公立、私立，一律由国家统筹分配工作，给予国家正式干部待遇。消息传到金女大，全校师生无不欢欣鼓舞。5 月 28 日，吴贻芳赴京出席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8 月 14 日中央教育部公布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决议——《关于实施高校课程改革的决定》。9 月，根据中央教育部关于课程改革的决定，学校进行了课程改革，每周学时为 44 小时，每学期所学课程以 15—17 学分为限。



1950 届毕业生合影

根据华东军政委员会教育部的通知，从 1950 年 11 月 27 日起，金女大全校工作以时事政治学习为中心，在学习的基础上开展“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宣传教育运动。时事教学，每周一次，由校务委员会、教务处、政治教学委员会推荐专人负责主讲。讲授

① 南京师范大学校史编写组：《南京师范大学大事记》（1902—1990），第 95 页。

② 黄洁珍著，吴梓明指导：《从吴贻芳与金陵女子大学看基督教育理念的实践》，第 108 页。

内容为"美国侵华简史"、"美帝真相"、"两个世界两个阵营"、"新旧中国"、"认清当前形势"等五个部分。①

1950年12月26日，金女大根据中央教育部有关规定，将毕业生在解放前所学的《三民主义》、《公民课》、《伦理学》等课目的成绩及学分，不列入毕业成绩。除此之外，为了响应政府缩短学习年限，多办实用性专业的号召，金女大开设了两年制的护理专修科。

另外在新的教育方针下，关于基督教教育和教会学校的宗教活动也作出了相应的调整，吴贻芳在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上提出，教会大学不能被帝国主义利用，宗教与教育二分，教会大学必须保证宗教自由，信与不信的自由相同，必须互相尊重，教会大学的宗教课程依据国家政治的要求制定。此后，学生开始参与策划宗教活动，此工作原来一向是宗教委员会的工作，从1949年开始，宗教活动的组织一般都是由师生组成的委员会负责。宗教活动以团契为形式仍然照常进行，宗教节日庆祝活动也继续进行，但是比之以前要宽松得多。②

总之，这时的金女大校园里，到处涌动着高涨的革命热情，师生们积极地按照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方针进行民主改革和课程改革，衷心拥护新中国。新中国的诞生的确使广大师生找到了"当家做主人"自豪感。这也为金女大其后的一系列变动、调整和改革奠定了基础。

第三节　金女大与金大的合并

一、金女大与金大的合并

1950年5月28日，吴贻芳赴京出席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

---

① 南京师范大学校史编写组：《南京师范大学大事记》(1902—1990)，第97页。

② 黄洁珍著，吴梓明指导：《从吴贻芳与金陵女子大学看基督教育理念的实践》，第111页。

在北京，政务院总理周恩来会见了吴贻芳和一部分中国基督教界的领导人，并提出了希望继续发挥中国基督教会的作用和为国家建设出力的愿望。然而这一切，在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就不复存在了，它最终导致了包括金女大在内的教会大学在中国大陆上的消亡。

新中国成立后，西方国家对这个新生的人民政权采取敌视态度，1950 年 6 月，朝鲜战争爆发。10 月，中国人民志愿军进入朝鲜，全国掀起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运动，声讨美国侵略的浪潮席卷中国大地。这场战争给在华的外国教会学校的命运带来了历史性的转变。

在全国各地掀起的声讨美帝的浪潮中，大专院校学生纷纷起来揭发西方帝国主义的阴谋，控诉外国传教士的伪善。11 月 14 日，金女大学生写信给校学生会执行委员，指出美籍教授费睿思在讲授《英文》、《社会制度》、《现代社会学说》课时，散布攻击"抗美援朝"的言论。学生会很快公布了这些信件，之后学校各级各科纷纷开展讨论。[①]

12 月 2 日，《新华日报》发表文章，揭露了费睿思的言行，全市学生极为愤慨，南京市各校代表 700 余人参加了在金女大举行的"反侮辱、反诽谤控诉大会"。3 日，南京市 60 余所大中专院校发起声势浩大的声援金女大的活动。[②] 5 日，金女大全体学生发表告全国同学书，并组成控诉队，分赴南大、金大、汇文等九所学校，控诉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罪行。7 日，金女大与金大组成代表团赴沪、杭、苏三地向华东学生控诉美帝罪行。14 日，《人民日报》为金女大事件发表了《进一步展开反帝爱国运动》的社论。之后，全国大中学校学生、教职员工展开了热烈的反美爱国运动。[③]

鉴于这些情况，多数西方教职员已开始停止工作，因为他们的一言一行都会遭到反对。这时，摆在他们面前的路只有一条：收拾行装离开中国。考虑到环境与形势的变化，原来一贯反对西方教员离开教会大学的中国教会领袖们，也迅速转变观点，赞成他们离开，并主动提出

① 南京师范大学校史编写组：《南京师范大学大事记》(1902—1990)，第 97 页。

② 朱学波：《吴贻芳》，第 126 页。

③ 南京师范大学校史编写组：《南京师范大学大事记》(1902—1990)，第 97—98 页。

帮助外国人撤离教会学校。他们一致认为，外国教职员离开教会学校可能对学校的生存是有益的。就这样，尽管在财政上遇到了一些困难，外籍教师还是一个不剩地先后撤离了各教会大学。

然而，在革命热情日益高涨，对美帝国主义的仇恨也越来越强烈的人民群众眼里，中国的教会大学仍然被认为与美国关系太密切，它们依旧是资产阶级思想的桥头堡和产生资产阶级分子的温床。随着社会上一些披着传教士外衣进行特务活动的西方人被揭露出来，以及名为关心儿童福利实为残害儿童的西方人办的圣婴堂之类的机构被发现，人们更加把教会大学当作美帝国主义进行文化侵略的工具，把它的存在看成是国家与民族的耻辱。新中国成立后，在人民当家作主的今天，继续允许教会学校使用西方教会，特别是美国资助者提供的经费办学，只会使之有害于新中国健康成长，只会使它成为散布帝国主义言论、刺探共和国机密和破坏新中国建设的敌对分子的庇护所。这显然是不行的，必须找出改变这种状况的办法。

与此同时，美国方面作出了使中美两国关系进一步恶化的行动。12 月 17 日，美国政府宣布冻结中国在美国的全部财产，并明文规定，除非有特别许可，否则把资金汇到中国大陆是非法的。中国政府立即对此作出反应，于 12 月 26 日，也冻结了美国在华的全部资产。由此西方教会基本停止了对教会学校的经济资助。为了继续办好这些学校，中国政府决定收回教育权。但是这样一来，经费主要依靠美国资助的中国教会大学都面临由于收不到外汇而断绝经济来源的危机。金女大是最为突出的一个，光是史密斯女子学院每年对口赞助的资金就约占金女大日常费用的三分之一。没有美元，学校要想继续维持下去，显然是很困难的。考虑到这种现实情况，1951 年 1 月，国家政务院颁布了《关于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机关及宗教团体的方针的决定》，并于 16 日召开了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高等学校会议，重申了新中国决不允许外国在我国办学的方针，确定了接收这些学校机关的原则、方法与措施。包括金陵大学、金女大在内的接受外国津贴学校的师生员工纷纷发表宣言或致电周恩来总理，表示坚决拥护政务院决定。不久，美国教会联合托事部来电，要求金陵大

学和金女大派代表到香港具体洽谈经费问题，表示尚有商讨的余地。对此，两校师生通过决议，彻底断绝与美国教会的联系，对来电不予回复。

1951年1月6日，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召开接受外资学校校长会议，商讨学校前途和办学方法。会上，教育部长提出，教会大学如果是由中国教会提供资金，可以继续办下去，如果无法解决自筹资金，则由中央人民政府提供经费，改成公办，并要认真清除美国的影响，各大学校长一致表示拥护政府措施，坚决割断与美帝的一切联系，同意教会大学走向国有化，收回文化教育事业的主权，办好人民自己的教育事业。这样，除金女大当时尚有一些结余经费，还可以维持学校一段时期外，其余学校多数接受了中央人民政府的经费，改为国立。经过改组的国立大学的行政领导人，多数仍为原教会大学的领导人。但是，由吴贻芳校长提议，经华东军政委员会教育部批准，金女大与金陵大学合并，新成立的学校校名为金陵大学，性质改为公立。

二、金女大与金大合并的数次风波

金陵大学是与金女大同在一座城市的另一所基督教大学。两校在发展过程曾经有过很多的合作和相互扶持，但是这其中也曾发生过多次的合校争论。

金陵大学是近代国内著名的教会大学之一，前身是美国基督教美以美会于1888年在南京乾河沿创办的汇文书院，设文、医、神三科，分别称为博物馆、医学馆、圣道馆；另设中学部，称为成美馆。首任院长是后来在上海创办《新闻报》的福开森。稍后，美国基督教会中的基督会和长老会分别于1891年和1894年在南京的鼓楼和户部街创办了基督书院与益智书院。1906年，基督、益智两书院合并为宏育书院。4年后即1910年，宏育书院并入汇文书院，以大学建制成立金陵大学堂，推原汇文书院院长包文为校长。金陵大学初建时，仅设文科，有外文、国文、宗教、历史、政治、社会、经济等系科。1912年增设师范科，1914年创设农科，次年添设林科，1916年两科合并为农林科，1921年改文科为文理

科。理科含化学、数理两系。到1926年，金陵大学有文理、农林两科共13个系、3个专修科，在校学生达500多人，成为一所完备的大学。1927年，国民政府通告收回教育主权，金陵大学遂成立新的校董会，推选文理科科长陈裕光为校长。[①] 此后，金陵大学行政权为中国人执掌，并开始招收女生。由于金陵大学与金陵女子大学在古城南京位置邻近，步行10余分钟即可到达对方校园，加上学校创设者都为美国基督教教会组织，办学目的相通，因此，两校关系非常密切，教师互请，有时宗教活动共同进行，学生跨校选课，成绩互相承认。在这种紧密联系之中，金陵大学有着合并金陵女子大学的倾向，所以就有了两校历史上的几次合校争论。

金陵大学和金女大间的合校争论必须从纽约州立大学的特许证说起。1911年4月19日，金陵大学从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处获得临时特许册，规定：凡金陵大学毕业学生的学位"改由纽约大学校董会签发，转致金陵大学堂监督，发给毕业学生"。[②] 当时金陵大学没有在中国政府教育部门立案。换言之，金陵大学的毕业文凭是中国政府不承认的。但纽约州立大学颁发临时特许证意味着金陵大学学生可以直接领到美国大学的毕业证书，得到美国教育当局的承认。这不仅使金陵大学有法律依据，还为毕业生直接升入美国研究院学习铺平了道路。正如金陵大学章程所说："此后凡在本堂毕业者，即无异在美国大学校毕业也。"1913年金女大尚在筹划建立阶段，创校者曾考虑向纽约州立大学申请临时注册。但纽约州立大学拒绝在一座城市内同时颁授临时特许证给两所高等学府。1914年，金女大筹划者投票通过，要求金陵大学托事部附设一个委员会作为金女大的托事部，代表金女大的利益。1916年3月，金陵大学托事部同意增设五个妇女代表席位，成立金女大委员会负责金女大的特殊需要。这样，金女大获得了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承认，毕业生享有金陵大学毕业生同等的权利。但是1919年金女

---

① 张宪文主编：《金陵大学史》，第11—18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

② 《私立金陵大学一览》(1933年)，载高时良等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四辑)，第581—582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以下引用该书皆为此版本)

大首届毕业生毕业时，金女大发现金陵大学的名字也出现在毕业证书中，而且作为独立女子大学的金女大常被人误解成金陵大学女部。不仅如此，金女大的土地、建筑都必须写上金陵大学托事部的名字。若从美国的法律角度上看，金女大只是金陵大学托事部的附属学校。在德本康夫人、吴贻芳两任校长治校期间，金女大同金大就两校之间关系问题作过多次讨论。

作为金女大的创校者之一，德本康夫人对金女大依附于金陵大学之下的情形很不满意。1920年，她回美国休假时，专门就此问题向金陵大学托事部金女大委员会提出异议。她要求委员们考虑成立独立托事部的可能。委员们告诉德本康夫人，要纽约州立大学在中国一个城市中同时承认两所大学学历是不可能的。她们建议德本康夫人考虑在美国其他地方教育当局谋求单独注册。但是，由于德本康夫人把主要精力集中在募集资金、兴建新校舍、聘请师资等方面，这个提议最后不了了之。1920年，金陵大学搬到南京鼓楼西坡的新校舍。1923年，金女大也搬入鼓楼陶谷的新校址。金女大的新校址毗邻金陵大学，如德本康夫人所说，新校址“位于金陵大学的东面和南面，距离很近，有利于两个学校之间的密切合作，但并没有近到容易引起财产纠纷的程度”。

确实，两校迁入新校址后没有发生财产纠纷，但合校争论却由此而起。德本康夫人抱怨说，“自从1923年金女大迁入新校园后，与金陵大学的关系就变得尖锐起来”。由于校园接近，两校加强合作，甚至合并的呼声一直存在着。除了金陵大学提出合作要求外，负责华东基督教高等教育工作的传教士葛德基也在积极推动合作计划。1922年，华东地区的基督教大学顾问委员会成立。葛德基等人希望成立一所类似伦敦大学式的松散的大学。1928年，他正式提出了一个华东地区基督教大学联合计划，要求区内的所有基督教大学合并为一所大学。为达到这个目标，金陵女子大学必须和金陵大学合并。①

面对各方面的压力，德本康夫人于1928年向托事部提交了一份报

① 卢茨：《中国教会大学史(1850—1950)》，曾钜生译，第107页。

告，列举了女子教育的特殊性和独立性，以及金陵大学和金女大的宗教气氛、爱国主义教育的内涵和形式以及两校的不同教学特点。在这份报告中德本康夫人坚决反对两校合并，甚至怀疑倡议合并者的动机。鉴于当时大多数学校对合并持消极态度，最后合并倡议不了了之。①

抗战胜利后，中国基督教高等教育计划委员会建议金女大与金陵大学合并。因此，吴贻芳作为金陵女子大学校长，在协调与其他教会学校尤其是金陵大学的关系时，仍然面临着如何保持金陵女子大学的独立性问题。

20世纪20年代以后，大学招收女生、男女同校已被政府乃至社会所接受，甚至于一些男学生认为大学必须男女合校。因此，"在这个时代，金陵女子大学要维持它自身的独立性并不容易。压力主要来自金陵大学的男学生，从他们的校园走到金女大校园只需要12—15分钟。他们也曾提出一些合作要求，但总是要求女子教育向男子教育的大纲靠拢。要和他们一起看电影，一起参加社会活动，和他们一起娱乐，使他们的枯燥生活变得丰富多彩。"②金女大的教职工和学生在保存女子大学身份方面团结一致，不为外力所动，针对现实问题，采取一些措施，加强与金陵大学的交流。如金陵女子大学和金陵大学组成联合唱诗班，共同参与星期日教堂服务；成立一个相互沟通的安排高级课程的委员会，对两校学生互相听课进行合理调配等。因此，金陵女子大学在30年代乃至抗战期间保持了女子高等教育机构的独立性与特色。

抗日战争胜利时，美国、英国等基督教教会组织考虑到战后基督教高等教育资源配置问题，提出了许多建议。其中，中国基督教高等教育计划委员会(Chinese Planning Commission for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就金女大的发展提出了两条建议。第一条，建议金女大与金大合并，金女大成为金陵大学的行政单位，财政独立，仍提供与妇女教育有关的主修学科，如音乐、家政、体育及社会服务等。第二条，

① 朱峰：《基督教与近代中国女子高等教育——金陵女大与华南女大比较研究》，第344—348页。

② 德本康夫人、蔡路得：《金陵女子大学》，杨天宏译，第78页。

如果金女大与金陵大学不接受第一条建议，则金陵女子大学仍保持为一所文理学院，最多招收学生 250 人，只提供音乐、社会服务、家政、体育学科训练。中国基督教高等教育计划委员会的建议在金女大教职员和学生中引起强烈反响，她们不主张与金陵大学合并，希望维持其女校特色。她们的主要观点是：男女合校固然可以给予女子教育的机会，提供相应的师资训练，提供适合女子入读的课程，但女子学校所具有的优势在男女合校中是不能完成的。首先，女子大学给予学生机会，带领学生活动，让女教师自行策划、推行及管理校务，能够增长女生的经验，有助于训练出妇女领袖人才。其次，现时的男女合校实质上不能提供对等机会给予女性。因男生人数总比女生多，教职员方面也是男性多于女性，尽管男女合校也希望增添女教职员，但很少有妇女符合在大学任教的学历。因此，最理想的是集中这些女教师在一所大学里，以发挥其特长和影响力。第三，男女合校现时还不能做到良好师生关系的建立与女子人格的塑造。她们认为，女子教育工作必须由女教师承担，男女合校之女生人数甚少，学校不能给予密切之师生接触，就算是男校，规模完备的大学亦很少使用导师制，即 1 个学生有 1 位导师带领。她们认为，即使有这种制度，也很难使用在女生身上。金女大每个学生都被编入一个 12—15 人的小组，由教师任顾问，影响力能达于每一个人。[①] 金女大教师也反对合并，如宗教主任师以法先生认为，如果合并，金女大在行政决策上就会受金大的控制，因为中国社会难以接受男性服从妇女的领导，日后各系主任必然由男性出任。师以法先生还认为，合并后学生人数上升，就会使基督徒师生的影响下降。

面对合并的建议及其争论，金女大校长吴贻芳态度明确，即反对合并。她认为，一所大规模的大学与一所小型的学院合并，小单位必然要跟随大单位的作风办事。因此，吴贻芳在《战后金女大的发展》建议书上列出了金女大的要求——保持为一所独立自主的机构。在课程方面，可与金陵大学合作，这样减少仪器使用及聘用职员的支出。建议书

① 黄洁珍著，吴梓明指导：《从吴贻芳与金陵女子大学看基督教教育理念的实践》，第 73 页。

中还提及在两校校舍之间兴建新的教学楼或提供巴士服务，以方便学生上课。[①] 吴贻芳的立场得到了教职员、校友的支持。金女大董事会则明确表示容许金女大与金陵大学紧密联系，但金女大的特色要保持不变。德本康夫人在谈到与金陵大学合并的建议时认为："建议如果得以实施，将在事实上把作为女子大学的金陵淘汰掉，或者将极大地改变它的性质特征。但在最后的计划里，金陵独立贡献的价值得到承认，它的地位得以维持，这给金陵同它的邻居学校建立更加密切的关系以新的希望。"[②]关于与金大合并一事，教职员反对，校长吴贻芳不赞成，校董事会的态度以及金陵女子大学办学的业绩与特色等因素，使金女大保持了独立。



陈中凡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经费等多方面的因素，由吴贻芳校长提议，经华东军政委员会教育部批准，金女大与金陵大学合并，新成立的学校校名仍为金陵大学，性质为公立。华东军政委员会于1951年5月3日批准金大与金陵女子大学合并筹委会委员名单，稍后华东教育部又批准两校合并筹委会关于系科调整的决定及招生计划。两校合并后，仍设文、理、农三院共23个系、6个专修科、2个部。9月15日，华东教育部批准新的公立金陵大学由李方训、吴贻芳、戈福鼎、樊庆笙、陈中凡、陈纳逊、高觉敷以及其他教师学生代表



吴懋仪

① 《金女大校董会发起人会议纪录》，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六六八/48。
② 德本康夫人，蔡路得：《金陵女子大学》，杨天宏译，第135页。

共15人组成校务委员会。李方训、吴贻芳为正、副主任委员。新的金陵大学设文、理、农三个学院,理、农学院在原金陵大学,文学院在金女大。金女大教授陈中凡、潘耀泉、张少微、张芗兰、王栻、钱且华、李嘉禄、张汇兰分别为文学院中文系、外文系、社会学系、教育系、历史系、儿童福利系、音乐系、体育系的临时负责人。吴懋仪、陈新国分别为理学院化学系和生物系的临时负责人。

1952年夏季,教育部决定在全国进行高等院校院系调整,成立综合性大学和分科学院。按照华东地区的院系调整方案,南京地区设立综合性大学一所,即南京大学,以原金陵大学为校址,另设立多所分科学院,如工学院、师范学院、农学院、林学院、华东水利学院等。成立不久的公立金陵大学至1952年6月宣告结束。

新组建的南京师范学院,设在原金陵女子大学的旧址上。她以原金陵大学师范学院和金陵大学部分系科为主,再加上私立上海复旦大学托儿专修科、私立广州岭南大学社会福利系儿童福利组、南京师范专科学校数理班合并而成。吴贻芳与陈鹤琴、高觉敷等人组成了南京师范学院建校筹备委员会。新组建的南京师范学院,设有中文系、数学系、理化系、教育系、幼教系、音乐系、美术系及生物、地理专修科,并附设一所工农速成中学、一所幼儿师范学校,以及大石桥小学、大石桥幼儿园、五台山幼儿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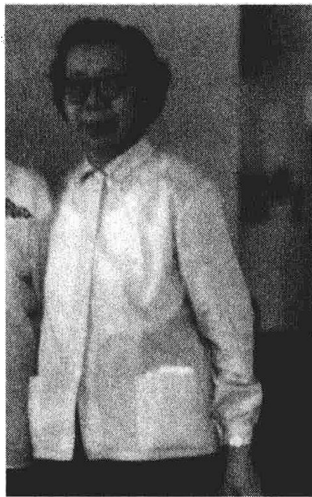
第四节　校友会与金女院的创建

大学的生命力不仅体现在学校的教育思想、校园文化,还直接体现在校友的社会表现以及精神特质上。金女大从1915年开始办学,到1951年最后一届学生毕业的30多年里培养了1 000多位毕业生。在当时的几所女子大学中,金女大的毕业人数是最多的。中国女子大学的首届毕业生就出自金女大,吴贻芳校长就是其中之一。金陵女子大学一直十分关注培育学生适应社会所应具有的素质和能力,希望从学生毕业后的事业与发展中获得社会对学校的认可和学校地位的提升。

而且学校一直有把学生当成学校财富的思想，同时毕业的学生也把母校真正当成家，所以学校和校友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甚至可以说金女大后期每一步发展都离不开校友的努力。

校友与学校的紧密关系离不开校友会的工作。金女大一贯比较重视校友工作，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末吴贻芳主管学校行政之后，金女大开始重视和关注毕业生：一方面给毕业后参加工作的校友以帮助指导；另一方面采取措施，加强与校友的联络，互通信息，了解情况；第三，发挥校友在学校管理、支持学校发展等方面的作用。

由于当时的大学毕业生尤其是女大学生数量很少，因而金女大的毕业生就业情况很好，但学生毕业走上工作岗位之后，学校并没有采取"嫁出去的女，泼出去的水"的态度，而是继续真诚地给予关注、支持，这样毕业生跟学校的联系基本没有中断。1932年金女大毕业生黄续汉回忆吴贻芳的事迹时写道："即使离开了学校，您仍注视着我们，关怀着我们。1932年，我从金女大毕业后，到上海一所学校教英语。一天上午，我走进教室上课，意外地看到母校教育学教师华群女士坐在最后一排，她认真地听了我的课。事后才知道是您让她来听我的课，让她来考查一下我是否胜任教学。我感动极了，校长，您这样关心我，几十年来每当我走进课堂，总觉得您就坐在教堂里听我的课，我竭力把课教好，不辜负您的期望。"①学校关注、关心校友的事情还有很多，校长吴贻芳经常利用出访和参加社会活动的机会了解毕业校友的情况，使金女大的教育继续延伸。



黄续汉

为了加强与校友的联络，金女大采取了很多灵活的方式。于1924年6月创办了《金陵学刊》(*Ginling College Magazine*)，每季度一册，其中

① 黄续汉：《校长啊，您慢慢走…》，载《吴贻芳纪念集》，第158页。

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介绍毕业同学的去向、变化。金女大在向国民政府注册后，于1933年出版《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院刊》，半月或一月一期，刊登校园新闻、师生文章、社团信息、校友消息等，甚至学生毕业以后结婚、生子、工作上取得什么成就都会在校刊上刊登学校的祝贺。这些刊物成为校友了解学校、情系学校、眷恋学校的纽带。随着毕业生的增加，一些毕业生相对集中的地区组织起了金女大校友会。除了在各地组织校友会外，学校还在校内专门设立校友部，由校内老师专门负责这一工作。比如黄续汉在金女大的工作职务就是"学生生活辅导员兼金女大校友会执行干事"。金女大校友会在宣传金女大、联络校友、增进母校情结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是毕业生联系沟通的桥梁，也是学院生命延续的重要环节。校友会使金女大与校友之间的联系有了组织网络上的保证。

金女大真正有一种"视自己的毕业生为学校发展的宝贵财富"的可贵理念。董事会主席徐亦蓁即为校友，校长吴贻芳亦为校友，她们后来对学校的发展作出的贡献，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如果说这两位是金女大特殊的校友，那么，一些从金女大毕业后没有在金女大工作的校友，她们对学校的支持和帮助完全出于对母校培养之恩的报答，而没有任何的私心。其中在办学经费上校友们尽可能给予捐赠，成为金女大办学经费的一个重要来源。此外在学校遇到各种困难时，我们最先看到的往往也是校友。以上海金女大校友会为例，1928年，北伐军进驻南京，德本康夫人等外籍教师离校的紧急时刻，上海金陵校友会派严莲韵、刘剑秋和邓裕志三人回金女大协助管理。刘负责总务兼保健，严抓校务，邓负责管理，使学校在战乱中维持了正常的秩序。[1] 另外，金女大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由成都，经宝



《严韵莲蓦然回首一百年》

① 李葆真：《爱母校至深至长的严莲韵》，载《金陵女儿》编写组编《金陵女儿》，第36页。

鸡、西安、洛阳、徐州迁返南京复校过程中得到校友相助之事，也是值得记述的。当时主要由陆路坐汽车运载行李和女生，沿途公路坑洼不平，兵荒马乱，行车安全、人身安全难有保障，返校之艰难可想而知。但最终她们安全迁返南京，其间沿途校友相助起了重要作用。到达宝鸡时，校友联络宝鸡纺织厂腾出空房，安置车队人马。启程去西安时，学校给陕西省主席——一位刚刚毕业的学生的父亲写信，希望他提供帮助。在西安休整等候火车时，得到车站站长的关照，金女大一行人获准占用一节一等客车车厢。这位站长的女儿，是金女大 1946 届毕业生。① 这些都表明了校友对学校发展的巨大支持和帮助。

金女大重视学校与校友之间的联络，重视对毕业学生的继续关注和支持，重视发挥校友在管理学校、发展学校中的作用，而又实实在在地使校友发挥了作用。尽管当时毕业生较少，联络相对容易，但若没有把校友当作学校宝贵财富而加以开发的思想，若没有将金女大的教育通过校友继续延伸的思想，是很难做到的。学校重视与校友的联络和发挥校友的作用，不是停留在形式上的联络，而是从精神上、情感上，从帮助解决工作中的实际问题上加以沟通，这才是金女大对校友保持向心力、凝聚力的原因。

在国内，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冲击，金女大校友会工作一度停顿。“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国内的校友会又重新开始工作。到 80 年代，校友会再度凝聚海内外校友的力量，创建了新“金陵女子学院”。

金女大毕业生遍及海内外，她们所取得的卓越成就，使吴贻芳校长感到欣慰，使她女子高等教育的理想得到实现。1985 年，年过九旬的吴贻芳博士在与她的学生们反复研究后，写信给江苏省人民政府，建议创办一所女子高等学院，以培养高层次的妇女人才，增强妇女的就业能力，提高社会地位。1985 年 11 月 10 日，在南京鼓楼医院的特护病房里，一代著名教育家、原金陵女子大学的校长吴贻芳即将走完近一个世纪的人生。弥留之际，她给围坐在床边的学生留下了唯一的遗嘱：“把

① 德本康夫人、蔡路得：《金陵女子大学》，杨天宏译，第 143 页。

金陵女子学院建起来，而且要建得比老‘金女大’更好。”①

1987年，经过近两年的上下沟通及筹划，江苏省政府正式批准：在南京师范大学内建立金陵女子学院。这是自1951年新中国高校院系调整，老金女大撤并后，全国第一所女子学院。金女院的筹建有着国内其他高校不具备的特点：公办民助，在行政建制上金女院归属南京师范大学。金女院招生在国家统一计划内，考生报读时须在南京师范大学招生目录下报读，属于非师范专业。在专业设置方面，金女院从建立初期的一个专业发展到三个专业再到四个系，三个研究中心，包括实用英语系、食品科学与营养系、会计与财务管理系、劳动与社会保障系、妇女研究中心、家政教育与社区发展研究中心和金陵烘培技术研究与培训中心。黄涛、于忠喜等人先后出任金陵女子学院院长。

金女大的校友们为金女院的成立付出了很多的努力。到1987年金女院建立时，仍有数百位老校友健在，这些老人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愿：为金女院的新生出点力。经过磋商，北美、上海、北京、四川等地的校友会，委托南京校友会负责金女院的具体筹建工作。



基金会部分成员合影

① 黄进、严国宁：《根深脉远花正茂》，载金女大南京校友会《金陵女儿》(续集)编写组编《金陵女儿》(续集)，第3页。

为支持金女院的办学，1985 年在纪念金女大建校 70 周年的大会上，海内外校友一致提出要成立吴贻芳基金会，为实现吴校长的遗愿募集基金。第一任基金会会长是陈琏彩女士。[①] 通过“吴贻芳基金会”，并委托亚联董（亚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联合基金会）[②]管理基金。金女院的每个项目需要资金都要提请亚联董审批，获准后，校友基金会才能拨款。亚联董同时按照 1∶1 的比例配套拨款。

可以说金女院从诞生之日起留下的每个脚印都离不开金女大老校友的鼎力协助和无私奉献。自 1990—1993 短短的几年里，海外校友就为金女院购置办公用品、添设备和图书资料、修缮贻芳园、争取办学空间等筹款近 10 万美元；国内校友也积少成多，捐款 7 万元人民币。从金女院成立之初到现在，金女大各地校友共计为金女院捐款达 1 000 万元，这是金女院发展的坚实基础。

首先，办学要有基地，1987 年金女院在成立之初，就收到旅美校友的两处房产捐赠。一是金女大首届毕业生，吴贻芳校长的同学汤硕彦女士，另一位是原金女大教师陈英梅女士的亲属，为支持金女院办学，两家把南京的故居都捐了出来。1994 年在省政府和学校的支持下，金女院决定在随园校区内新建一栋六层的教学楼。消息传出，各地校友很快投入到捐资助学的活动中，很快筹集到 30 万美元，加上汤硕彦和陈英梅女士的亲属的两处房产折价 5 万人



南师大金女院教学楼

① 王韵芳：《吴贻芳基金会记述》，载金女大南京校友会《金陵女儿》（续集）编写组编《金陵女儿》（续集），第 264 页。

② 亚联董（亚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联合基金会）前身是中国基督教大学联合托事部，“是由原在美国的中国基督教大学校董联合会为中国十三所基督教大学的各董事会联合办事机构演变而来的”。高时良等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四辑），第 80 页。

民币及省教委的拨款 270 万，1995 年在随园建成了 2 800 平方米的现代化教学楼。金女院从此有了自己的办学基地，极大地改善了办学条件。

各地校友除了通过吴贻芳基金会捐款外，还以个人名义捐献各种图书资料、实验设备及办公设备。如美国校友朱觉方女士捐出所藏的一套原版英语大百科全书及英文小说、杂志上百本，张彬仪女士捐助各类图书 400 多册。1989 年，初建的金女院就收到校友胡秀英女士捐的 1 万美元和亚联董配套的 1 万美元的图书经费。香港校友高维清女士 1993 年一次捐给学院 35 万人民币，设立"维清计算机房"；1999 年，她又捐建了食品工艺实验室的大部分设备。

在师资和人员方面，金女院也得到了校友的支持。由于建立之初，金女院教师中年轻居多，业务上需要进一步进修、提高，此事受到广大校友的关注。1993 年，美国校友吴玉清女士与其兄长联合捐款 14 万美元，存在亚联董，作为金女院教师从 1994—2004 年赴海外培训的费用。美国原金女大教师郭锡恩夫妇经常推荐美国加州志愿者协会的一些专家来学院教学。通过袁爱莲等校友的努力和亚联董的支持，促成了美国 Wellesley College 与金女院达成协议，Wellesley College 每年派出 2—3 名教师来金女院任教，保证了学院高质量的英语教学。还有很多定居在国内的金女大校友也为金女院的教学、科研、行政、学生管理等工作作出了贡献。



吴玉清



袁爱莲



郭锡恩和邓郭如鸯



喻娴才

为了关心下一代学生的成长，校友们捐款设立了奖助学金，在奖励品学兼优学生的同时资助困难学生完成学业。设立的奖助学金有"厚生奖助学金"、"喻娴文奖学金、奖教金"、"胡权氏奖学金"等。"厚生奖助学金"设立于 1997 年，基金是由吴贻芳校长的少量积蓄、原金女大外籍教师蔡路得博士捐赠的 2 300 美元、邓裕志女士捐赠的 40 000 人民币、台湾金陵女中捐赠的 500 美元及其他校友和友好人士合力捐助积累的。"喻娴文奖学金、奖教金"设立于 2000 年，是校友喻娴才为纪念胞姐喻娴文，专为学院英语系优秀教师和学生设立的。"胡权氏奖学金"是校友胡秀英于 2001 年 10 月捐赠 20 000 美元，为学院食品科学与工程系的学生设立的。现在，金女院共有 11 个永久基金，这些基金都是老校友们和一些友好人士为了金女院更好地发展作出的热情捐赠。



谢纬鹏

翻开厚厚的捐赠者名册，其中有金陵女子学院的教员、校友，还有她们的家人，她们大多是普通的学者、作家、教师，虽然捐赠的金额比不上实业家和巨贾的大笔捐赠，可是从那一条条捐赠记录、一句句捐赠寄语，我们不难读出其中凝聚了怎样一种真挚的母校情结。早在 80 年代，金女大当年的第一任教务长、90 多岁

的美国蔡路得女士就毅然捐赠2万美元，还用颤抖的手写下了“昔厚生之训，犹然在耳，惜别之景，宛然如昨”的文字。此后的18年间，先后共有千余名金女大校友为母校捐款捐物，“谢纬鹏奖学金”的捐助者谢纬鹏女士在儿女提出要为她庆祝百岁生日的时候，提出把钱捐出来给自己的母校，她说：“因为这里是我永远的家园。”由此可见，校友对母校情深意重，金女大的厚生精神在她们身上的传承发扬。

可以说金女院是老校友们一手筹建的，因为她们都希望金女大的生命在新的时代里能够延续下去。金女院在建立之初就确立了继承和发扬金女大的优良传统的办学宗旨；十几年来，金女院从无到有，始终奉行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努力发扬金女大的优良传统，通过教学科研以及一系列的社会活动，让“厚生”精神得到延续。金女院的诞生和发展使当年吴贻芳校长时所形成的“金陵精神”及其事业，在今天教育不断发展变革的进程中，仍在继续发扬和发展着。

第六章　金女大与中国近代女界精英群体

第一节　办学规模与毕业生去向

一、金陵女儿的人数

晚清时期"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传统观念还十分流行，但是到了民国初年，全国出现了三所女子大学，而且许多教会大学和一些国立大学也相继招收女生，女大学生群体的出现成为民国时期中国社会开始走向近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随着一批批女大学生毕业后突破"相夫教子"的家庭生活而走向社会从事各行各业后，在社会大舞台上她们开始崭露头角、人才辈出，中国近代妇女精英群体由此逐渐形成。在这一精英群体中，金女大的毕业生是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

金女大虽然不是在中国建立的第一所女子大学，但是，中国第一批取得学士学位的女大学生却是金女大 1919 届的 5 名学生。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显示，从 1919 年第一届毕业生到 1951 年最后一届，金女大共为社会培养的毕业生达到 1 000 人。20 世纪 20 年代，金女大历年毕业生一直没有超过 30 人，其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学校创办之初受师资、房舍的制约，招生规模受限。建校之初，租用的李鸿章花园，预定规模 20 人。而师资第一年连校长在内只有 6 人，一直到 1922 年，教师还只有 17 人，未能突破 20 人。二是当时整个社会发展水平不高，能够有能力供应女子上大学的家庭太少了。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金女大进入迅速发展期，陶谷校区建设已具备相当规模，而且在吴贻芳校长的积极努

力下,教师人数也有了大规模增加。1930 年时,金女大教师人数已达到 44 人。因此,从 30 年代开始,除了受战争影响外,金女大毕业生人数一般维持在 30—60 人之间。1930 年代毕业人数最多的一年是 1937 年,达到 48 人。40 年代毕业人数最多的一年是 1947 年,达到 68 人,这也是金女大历史上毕业学生人数最多的一年。

在教会女子大学中,金女大的毕业人数是最多的,1920 年华北协和女子大学已并入燕京大学,而华南女子大学毕业人数的规模一直很小,其毕业总人数为 483 人,尚不足金女大毕业人数的一半。1921 年,华南女大才有第一届毕业生,共 3 人,其后毕业生人数除了 1950 年(当年金女大毕业人数 36 人,而华南女大则达到 60 人)外,其毕业生人数一直少于金女大。

不过,我们不能仅仅从历年毕业生人数来统计金陵女大的学生数,事实上,有相当规模的大学生都曾在金女大注册就读,她们只是由于各种原因未能修完课程①,但是,她们在金女大的求学经历不管长短,对她们的一生都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在她们的潜意识中,她们都将自己看作是金陵女儿。如曾在金女大注册学习一年多就参军的钟玉征将军,尽管她后来拿的是北大文凭,但她说:"虽然,我在金女大读书的时间只有一年多一点,我的后两年大学生涯又是穿着军衣在北京大学度过的,我爱北大,但是,每当有人问我,我总还是说,我是金女大的,我是许许多多金陵女儿中的一个。"②她的话实际上代表了许多曾在金女大就读过的金陵女儿的心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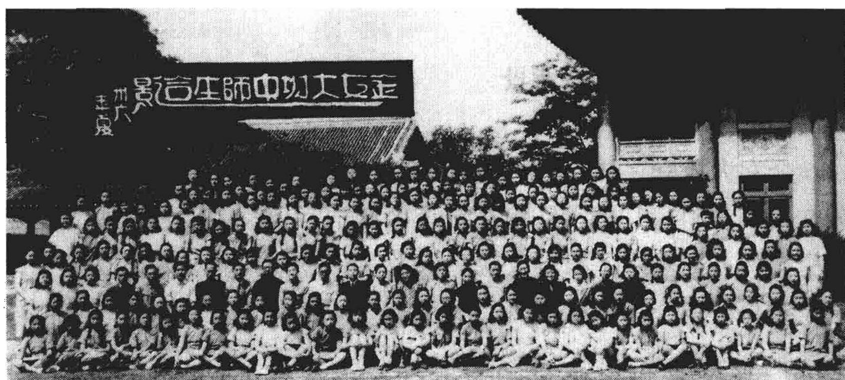
如果将曾经在金女大就读过的学生都当作金陵女儿一部分的话,金陵女儿的人数会大大增加。据表 8 显示,1930 年之后,在金女大注册入学的学生几乎一直在增长之中,1930—1931 年注册人数为 169

---

① 曾芳苗在其硕士论文中曾分析其中原因,文章认为首先是经济原因,金女大学费较高,对"非富有家庭的学生而言,确实是其继续求学时所需面对的一实际压力"。其次是由于当时社会风气的影响,认为传统女子于适婚年龄即应完成婚嫁的要求,而"金女大只招收未婚女生"。参见曾芳苗著,吴振汉指导:《民国教会女子教育——"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个案研究(1915—1951)》,第 144—146 页。

② 钟玉征:《怀念我的母校——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载《金陵女儿》编写组编《金陵女儿》,第 380 页。

人，1935—1936 年注册学生达到 238 人，抗战胜利后，金女大注册人数迅速增加，1945—1946 年时已达到 348 人，1948—1949 年时则达到顶峰，人数已达 482 人，接近 500 人。事实上，除了在金女大注册入学的大学生外，金女大附中的学生由于同处一个校园，有时任课老师同女大学生也一样，她们也将自己视为金陵女儿。如果我们将曾经在金女大入学注册读过书的学生，再加上金女大附中的学生都计算上，显然，金陵女儿的人数则会在金女大毕业人数的基础上增加数倍。具体数字参见表 8。



1947 年全体附中学生

表 8　金女大历年在校学生人数总计表(1915—1951)

年　份	人数	年　份	人数	年　份	人数	年　份	人数
1915—1916	9	1921—1922	52	1927—1928	97	1933—1934	212
1916—1917	17	1922—1923	81	1928—1929	132	1934—1935	213
1917—1918	36	1923—1924	95	1929—1930	135	1935—1936	238
1918—1919	39	1924—1925	133	1930—1931	169	1936—1937	259
1919—1920	52	1925—1926	137	1931—1932	192	1937—1938	85
1920—1921	70	1926—1927	153	1932—1933	174	1938—1939	140

续 表

年 份	人数	年 份	人数	年 份	人数	年 份	人数
1939—1940	155	1942—1943	301	1945—1946	348	1948—1949	482
1940—1941	206	1943—1944	280	1946—1947	332	1949—1950	169
1941—1942	210	1944—1945	320	1947—1948	440	1950—1951	223

资料来源：黄洁珍著，吴梓明指导的《从吴贻芳与金陵女子大学看基督教教育理念的实践》，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硕士论文，第137—138页，1996。

二、毕业生的专业背景

金女大成立之初，由于受到师资和生源的限制，学生所学专业只分文科和理科。1923年，陶谷新校区建成后，学校无论在师资还是在生源两方面均有了根本改观。从1924年开始，金女大招收专业开始按学科分设。如1924年时，文学院下设英语、历史、社会和体育，理学院下设数理、化学、生物和医学预科。其后，文学院又增设了音乐、宗教、中文、经济、政治、哲学等系科，理学院也增设了数学、地理、物理、家政等系科。除没有工科外，金女大的学科门类发展相当齐全。

从金女大各系毕业生分布状况来看，早年金女大文理科毕业生数基本平衡，但1924年之后，金女大的文科的发展较理科快，这同女子大学的特质也是相适应的。表9统计数字显示，历年毕业的文科学生有663人，占总数的66.3%，即有2/3的学生是文科毕业生；理科毕业生为337人，约为总数的1/3。从专业分布上来看，文科系科中本科毕业生人数最多的是社会学及社会工作系，共有203人，约占总人数的1/5；其次是体育系，本科毕业生有52人；而专科及简易科毕业者则达103人。外文、历史、音乐和中文系，它们的毕业生人数均在50人上下，而其他专业由于设立较迟或其他因素，毕业生人数则在10人左右，个别专业如政治和宗教只有3和1人。理科中超过50人的专业有生物、化

学和家政，其中生物系毕业生 75 人，化学系 71 人。值得提及的是 1940 年才成立的家政系毕业人数也超过了 50 人，它不愧是金女大的特色专业。

表 9　金女大各系毕业人数分布状况表

文科专业（文学院）	合计人数	百分比（%）	理科专业（理学院）	合计人数	百分比（%）
文　科（1919—1926）	45	4.5	理　科（1919—1926）	43	4.3
中　文	47	4.7	数　理	18	1.8
外　文	70	7	数　学	10	1
历　史	63	6.3	物　理	3	0.3
社会学及社会工作	203	20.3	化　学	71	7.1
经　济	14	1.4	生　物	75	7.5
政　治	3	0.3	地　理	20	2
哲　学	12	1.2	家政（含托儿工作）	64	6.4
宗　教	1	0.1	医　科	33	3.3
音　乐	50	5			
体育（含专修简易科）	155	15.5			
合　计	663	66.3		337	33.7

根据《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毕业生系科人数统计表》（1919—1951）重新制作统计。见吴贻芳《金女大四十年》，载《吴贻芳纪念集》，第 109 页，江苏教育出版社，1987。另，部分相近专业作了合并处理，毕业总人数以 1 000 人计算。

不过，由于金女大较长时间实施主辅修制，学生毕业时一般都

拥有两个专业的背景，而且金女大在学生第一学年时采用的是通识教育模式，文、理、艺术的部分课程都要修读，到二年级时再根据学生兴趣和师资情况确定专业，因此，专业背景的区分有时显得并不太重要。这也是金女大毕业生走上工作岗位后适应面较广的重要原因。

三、毕业生的就业去向

金女大从1915年创办到1951年同金陵大学合并，其存在时间只有36年，其培养的毕业生虽然也只有1 000名，但是，就近代妇女开始接受高等教育而言，这无疑是中国社会的一个重大进步。因为在民国时期，社会上大多数人仍然认为女子没有必要接受高等教育，“女子读书无用论”仍很盛行。因此，跟踪和了解这些女大学生的就业情况，是评价女子大学办学是否成功的重要标尺之一。

其实，金女大本身也特别关注学生毕业后的去向，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里，保存有金女大在1931年、1937年、1947年、1948年和1949年作过的五次较重要调查。由于金女大建校时间不长，因此短时段有时是很难反应该校毕业生的就业情况，从这个意义上来说，1949年对金女大772名毕业生的调查结果更能反应金女大毕业生的就业走向。下面是我们根据表10显示的数据所进行的分析。

首先，金女大学生毕业后从事教育工作的比例在各行各业中一直最高。从表10中可以发现，早年毕业的金女大学生从事教育的人数均占毕业人数的一半以上。1931年调查显示，在184名毕业生中有106人从事教育工作，比例高达57.61%。到了40年代后期，虽然从事教育工作的比例有所下降，但也一直维持在32%以上。1949年的调查显示在772名毕业生中，从事教育工作的有295人，占总人数的38.21%。金女大学生毕业后选择教育工作，其原因一方面同女性的性别有关，另外一方面“与基督教欲提高教师素质，并完成一贯

的教育体系的目标有密切关系。”[①]从学校层面来看，她更愿意推荐自己的学生前往中学，特别是教会中学任教。后来许多金女大老校友如严莲韵、萧鼎瑛等在回忆中都曾提及这一经历。1933 年的校友调查显示，担任教师的 118 名毕业生中，任教于教会学校者有 84 人，其比例达到 71.19%，[②]1947 年调查中，从事教育工作的 237 名毕业生中有 176 人在中等学校任教或担任行政人员，其比例则达到 74.26%。这同民国时期全国教会中学的老师有 78%者为教会大学的毕业生是相符合的。[③]

表 10 金女大毕业生就业状况统计表

<table>
<tr><th rowspan="2">项 目</th><th colspan="2">1931.9.1</th><th colspan="2">1937.2.1</th><th colspan="2">1947.10.1</th><th colspan="2">1948.11.1</th><th colspan="2">1949.11.1</th></tr>
<tr><th>人数</th><th>比例(%)</th><th>人数</th><th>比例(%)</th><th>人数</th><th>比例(%)</th><th>人数</th><th>比例(%)</th><th>人数</th><th>比例(%)</th></tr>
<tr><td>教 育</td><td>106</td><td>57.61</td><td>186</td><td>54.55</td><td>237</td><td>33.95</td><td>244</td><td>32.28</td><td>295</td><td>38.21</td></tr>
<tr><td>升学与研究</td><td>31</td><td>16.85</td><td>18</td><td>5.28</td><td>68</td><td>9.74</td><td>90</td><td>11.90</td><td>106</td><td>13.73</td></tr>
<tr><td>家庭服务</td><td>20</td><td>10.87</td><td>63</td><td>18.48</td><td>142</td><td>20.34</td><td>174</td><td>23.02</td><td>152</td><td>19.69</td></tr>
<tr><td>社会服务</td><td rowspan="2">15</td><td rowspan="2">8.15</td><td rowspan="2">26</td><td rowspan="2">7.62</td><td>89</td><td>12.75</td><td>81</td><td>10.71</td><td>75</td><td>9.72</td></tr>
<tr><td>宗教工作</td><td>11</td><td>1.58</td><td>7</td><td>0.93</td><td>10</td><td>1.30</td></tr>
<tr><td>公 务 员</td><td>4</td><td>2.17</td><td>9</td><td>2.64</td><td>66</td><td>9.46</td><td>70</td><td>9.26</td><td>33</td><td>4.27</td></tr>
<tr><td>医师护士</td><td>5</td><td>2.72</td><td>18</td><td>5.28</td><td>33</td><td>4.73</td><td>35</td><td>4.63</td><td>40</td><td>5.18</td></tr>
<tr><td>写作与编辑</td><td>3</td><td>1.63</td><td></td><td></td><td>8</td><td>1.15</td><td>3</td><td>0.40</td><td>8</td><td>1.04</td></tr>
<tr><td>商 业</td><td></td><td></td><td></td><td></td><td></td><td></td><td>2</td><td>0.26</td><td>4</td><td>0.52</td></tr>
</table>

① 曾芳苗著，吴振汉指导：《民国教会女子教育——“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个案研究(1915—1951)》，第 193 页。

② 《私立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毕业学生名单及毕业调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六六八/150。

③ 该数据是以 1933 年的调查为基础计算出来的。参见葛德基：《中等学校》，载《中华基督教会年鉴》第十二期，1933 年。

续　表

项　目	1931.9.1		1937.2.1		1947.10.1		1948.11.1		1949.11.1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其　他			21	6.16	44	6.30	50	6.61	49	6.35
总　计	184	100	341	100	698	100	756	100	772	100

材料来源:《私立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毕业学生名单及毕业调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六六八/150;曾芳苗硕士的论文《民国教会女子教育——"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个案研究(1915—1951)》在制作统计表时(第192页),在升学与就业一栏所计算的百分比错误较多,本表重新订正。

其次,金女大毕业生继续赴国外求学的比例较高。金女大创办初期,前四届33名毕业生中有20名到国外留学获得博士学位。后来随着就业渠道日益广泛,赴国外留学的人数在毕业生中所占比例有所下降,但一直保持在10%—15%之间(除1937年抗日战争影响有所下降外)。1949年统计时,在772名毕业生中有106名毕业生攻读了博、硕士学位,而且,90%以上的毕业生都选择到国外留学,如1947年68名继续深造的毕业生中只有2名选择在国内进修,1949年106名中只有6名在国内进修。[①] 金女大毕业生如此高的比例赴国外求学深造,有多方面的原因,一是金女大毕业生大都来源于教会中学,英文程度较高,赴美学习不存在语言障碍。二是由于金女大是一所教会大学,她同美国史密斯大学、密歇根大学、韦尔斯利大学有较为密切的联系,特别是史密斯大学同金女大乃为姐妹学校,而且金女大学生除获得一张金女大毕业文凭外,同时也可获得美国史密斯大学的毕业文凭,金女大的办学水准得到美国各大学的认可。三是金女大毕业生学习均较刻苦,成绩优异,大都能申请到美国的各种奖学金,能够解决她们的经济负担。另外,金女大的校训"厚生"精神的培育也很重要,金女大毕业生"并不把高等教育看作仅是自己的机会,而欲透过进一步的学习,达到

① 《私立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毕业学生名单及毕业调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六六八/150。

自我实践的目标。”[1]

第三，在传统文化“相夫教子”的影响下，金女大毕业生还是有一部分学生毕业后，未能参加社会工作。从统计资料反映，早期毕业生中由于毕业总人数较少，约有十分之一左右的人从事家庭服务，但到了40年代后，这一比例增长较快，约占毕业人数的五分之一左右。这些学生毕业后并非找不到工作，当时金女大在社会上声誉很高，每年各方向金女大聘请之人数超过毕业生数约三倍。[2] 金女大并不反对学生毕业后服务家庭，她们给予学生的观念是：为家庭而牺牲奉献，亦是一种“厚生”精神的实践。因为帮助丈夫事业，培养优良子女，也是发挥个人才华的方式。[3]

另外，考察金女大毕业生的地域分布情况，也很有意义。虽然，表10的统计数据中没有能够列出金女大毕业生的地域分布信息。但在档案中，有1948年各毕业生国内外分布情况的资料。在786名毕业生中，已有30名去世，健在的756人中，留在江苏省的人最多，几乎占总人数的一半，达到了353人，这主要同学校的所在地是密切相关联的。由于抗战八年金女大内迁成都，因此，毕业留在四川省人数占第二位，有48人。此外，广东39人，湖北35人，河北26人，福建17人，台湾17人，香港14人，浙江9人，江西8人，安徽、湖南、山东各有7人，陕西5人，贵州3人，甘肃2人，河南、云南各1人。除国内以外，还有125人在国外，其中美国人数最多有95人，英国10人，马来西亚8人，加拿大3人，其他国家9人。另外有32人情况不明。[4]

总之，从以上数据分析可以看出，金女大的毕业生在就业方向至少呈现如下两个特点：一是作为女大学生，在民国时期金女大的学生毕业后为社会服务的比例是相当高的，80%以上的毕业生都走上了服务社会

---

① 曾芳苗著，吴振汉指导：《民国教会女子教育——“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个案研究(1915—1951)》，第197页。

②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20周年纪念特刊》，《申报》，1935年11月2日。

③ 曾芳苗著，吴振汉指导：《民国教会女子教育——“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个案研究(1915—1951)》，第208—209页。

④ 朱峰：《基督教与近代中国女子高等教育——金女大与华南女大比较研究》，第381—382页。

之路。二是金女大毕业生就业的主要行业是教育界、医护界和社会服务,另外有1/10以上的毕业生从事科学研究。金女大只有36年的办学历史,在培养的1 000名毕业生中竟然有100名多名留洋博、硕士,确实让人惊叹。当然,仅以统计数字还并不能真实反映金女大在中国社会各界的影响力。在统计数字的背后人们才能找到金女大的真正魅力。

第二节 近代女界的金陵女儿

一、金陵要做祖国灯光

我们都是金陵的儿女,独立在这伟大的时代高岗上。
我们是紫金山的朝霞,我们是扬子江的波浪。
不怕黑夜风雨颠狂,金陵要做祖国灯光。
快乐欢欣永不悲观与嗟叹,齐声高歌志气扬。①

这是众多金女大校园歌曲中的一首,歌词中"金陵要做祖国灯光"最能表达金女大师生的共同追求。其实,早在1915年金女大成立的章程中,当时学校筹备委员会就明确指出学校办学的宗旨:"在基督教的影响下,金女大得以创立,为伸展基督教在中国的影响的缘故,及为着教育的延伸,学校必须提供领袖训练,教育基督徒妇女,以装备她们为基督服务,并发展妇女高等教育。"②虽然其办学宗旨带有十分浓厚的基督传教色彩,但是其造就女界领袖人才的目的一开始就已确立。1928年11月,吴贻芳回国接任校长。她在就职演讲中也十分明确地宣称金女大的建设目标就是成为"造就女界领袖的摇篮"。她说:

① 洪镜纯:《重访华西坝有感》,载金女大校友会编《永久的思念》。

② "Constitution of Ginling", 1915, Yale Div. 11/IV/124. 2589。转自黄洁珍著,吴梓明指导:《从吴贻芳与金陵女子大学看基督教教育理念的实践》,29页。

> 本校开办的目的，是应光复后时势的需要，造就女界领袖，为社会之用。现在办学，亦是要培养人才，从事于新中国的各种工作……现在受高等教育的女子还是很少，所以对于社会有一种为领袖的责任。若做领袖，高尚的人格，实在是最紧要的资格。所以学校一方面不能不注意学生的生活同环境，使学生容易养成健全的人格，将来能做有实益的领袖。①

在吴贻芳执掌校务的20多年时间里，她较好地将基督教育和国家社会的需要紧密结合，一直在营造学生追求崇高目标的氛围。一些任教老师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学生。如社会学系的刘玉华回忆时说："记得训导主任张芗兰在给我们上'新生训练'课时说过，金女大要培养的是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最优秀的新型中国女性，不仅在学识、能力、才华方面是出众的，而且在言谈、举止、气质、生活习惯、风度方面也是有很高的素养的。"②由于学校从老师到学生都有这种较高的追求，全校学生都有了一份共同的期许和责任。"愿吾辈各本自助自奋之精神，为二十世纪创造优良之女子，则庶几可以挽救中国，且不负本校培养厚望欤。"③事实上，金陵的这种氛围确实给很多学生未来的发展带来了无穷的力量。如著名科学家胡秀英在晚年回忆时说："金陵给我健壮的身体，叫我一生可以过着出力出汗的生活。""金陵引我到自然界，教我学习钻进自然中心求知的方法，以致我终生在科学的领域里研究、分析、综合、创造新的成果，服务人群。""金陵教导我组织的技术、主持会场方法，使我由学生变为成人。""金陵深化我农村养成舍己为人的习性和中学为神而活的训练。"④

金女大第一任校长德本康夫人在1955年出版的《金陵女子大学》一书中说："没有人能够准确地预言未来，但是可以确信，为数1 000人

---

① 吴贻芳：《就职致辞》，《金陵女子大学校刊》第11期，1929年3月。

② 刘玉华：《难忘金女大的"新生训练"》，载金女大校友会编《永久的思念》。

③ 《金陵女子大学十周年纪念特刊》1925年12月，第8页。

④ 胡秀英手稿：《金陵予我》(2001)，转自朱峰著《基督教与近代中国女子高等教育——金女大与华南女大比较研究》，第389—390页。

以上的金陵毕业生正在中国国内及海外，在不同地区的众多领域，从事极有价值的建设性工作。金女大的理想、价值标准以及基督教的品格已深深植根在她们的生命里，这便是金女大的贡献。”[①]事隔 20 余年之后，金女大第二任校长吴贻芳在 1983 年回顾金女大的历史时也说：“金女大毕业生虽然不算多，但在当时大学女毕业生还不多的情况下，她们在我国妇女界高级知识分子中占有一定的比重，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在我国的教育工作、科技工作及其他领域中有一定的贡献。”[②]两任校长对自己的学生在社会上角色都充满了自信。

二、群星璀璨的金陵女儿

自信来自于实力。从金女大走出的女大学生确实没有辜负两任校长的期望，几乎每一位凡经历过金女大培养的学生，都在各自的行业中取得了令同行瞩目的成就。据统计，在《古今中外女名人辞典》和《华夏妇女名人辞典》所收录的教会大学出身的 223 位女界名人中，毕业于金女大的便占 34 位。[③] 纵观金陵女儿中，不乏国际著名学者、科学家和社会活动家，但是我们要特别强调的是每一位金陵女儿都具有极强的事业心责任感，敬岗敬业，自强不息，她们都有共同的“金陵精神”，她们在社会每一个领域都像一颗颗星星，光彩照人。在这里我们无法一一讲述她们每一个人的事业与成就，下面所介绍的只是她们中的代表，她们代表所有的金陵女儿，代表一种共同的“金陵精神”。

在教育领域中，金陵女儿所取得的成就最为骄人，这主要由于金女大毕业生中从事教育的人数最多。资料显示在 1947 年时，金女大的毕业生就有 38 位担任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的主管和校长。[④] 在这一群

---

① Maltilda C. Thurston and Ruth M. Chester, *Ginling College*, p. 146. New York: United Board for Chrisitian Colleges in China, 1955.

② 吴贻芳：《金女大四十年》，载《吴贻芳纪念集》，第 108—109 页。

③ 王奇生：《教会女子高等教育的历史演变》，《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6 年第 2 期。

④ 《私立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毕业学生名单及毕业调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六六八/150。

体中,吴贻芳校长的成就最为突出。吴贻芳(1893—1985),江苏泰兴人,中国近现代著名教育家、社会活动家。1919年金女大首届毕业生,1928年获美国密歇根大学生物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国后担任金女大校长,她是我国第一位大学女校长。在她执掌金女大的23年中,她以"厚生"校训,殚精竭虑培养了一批批女界精英。抗日战争爆发后,她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1945年4月,吴贻芳以无党派代表的身份,参加了在美国旧金山召开的联合国制宪大会,是中国代表团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的唯一女代表。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吴贻芳全身心投入到新的工作岗位,历任多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常委、民进中央副主席、全国妇联副主席、江苏省副省长、省教育厅厅长、南京师范大学名誉校长等职。1979年,美国密歇根大学授予她"智慧女神"奖,奖励她为人类进步与和平事业作出的杰出贡献。现在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任教的鲁洁教授,在1947—1949年曾就读金女大理学院,她是国内外著名的教育学专家,中国教育学会德育专业委员会主任,长期从事教育学原理、德育原理的教学与研究,著作甚丰,曾获国务院颁发的"全国先进工作者"称号。1951年毕业于社会系的史慧中,长期以来一直从事幼儿教育工作,曾担任《学前教育研究》的主编、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三届学科评议组成员。洪范也是很有成就的教育家,她在1947—1948年就读于金女大历史系,曾任西南师范大学副校长。另外,金女大毕业生中还有两位校友在国外给外国人教授中文,并取得显著成就。一位是1937年毕业的徐芝秀,她长期在维也纳大学教授中文,为促进中奥文化交流作出杰出贡献,被奥地利授共和国金质功绩勋章,同时她是一位为中美建交开凿秘密通道最为重要的幕后人。另一位是1940年毕业于金女



鲁　洁

大中文系的潘纫秋，她是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中文的第一人，在美国不少中国问题专家均为她的学生，她对推动中美关系的发展也作出了很大贡献，她的名字曾五次登上《美国名人录》。


史慧中


徐芝秀

长期以来，科技领域是基本上男性科学家的天下，但是金陵女儿凭借她们的勤奋拼搏，在高手如云的科技界也打开了一片新天地。沈韫芬，中国科学院院士，1949—1952 年在金女大生物系学习，后转到南京大学生物系完成学业。沈院士主要从事原生动物区系的调查工作，她推广的"水质——微型生物群落监测——PFU 法"，获 1992 年部级科技一等奖。鲁桂珍(1904—1991)，金女大生物系毕业，抗战爆发后，鲁桂珍赴英国剑桥大学霍普金斯实验室攻读营养学博士学位，并结识世界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后来李约瑟在鲁桂珍帮助下，开始研究中国科技史。两人最终合作完成了 7 卷 30 余册的《中国科技史》，震动了世界科技史学界。胡秀英，1933 届金陵毕业，哈佛大学生物系和香港中文系教授，国际著名植物学家，被誉为"会走路的植物百科全书"。胡秀英终身钻研植物，是世界冬青、金针、锦葵、泡桐、菊和兰的研究权威。世界 400 余种冬青植物，有 300 余种都是胡秀英命名的。自 1945 年以来，胡秀英发表超过了 150 份的植物原创研究、专题论文，并出版了许多专著。何怡贞 1930 年毕业于金女大理学院，曾留学美国，获物理学博士学位。解放后她是新中国第一批回

国的科学家。她在我国非晶态物理及金属玻璃的力学性质和结构稳定性方面有开拓性的研究。另外，还有最早在国内从事生物化学研究的女学者严彩韵。



何怡贞(左二)向巴尔金院士介绍光谱方面的研究工作情况，向国内外同行介绍科研成果



沈韫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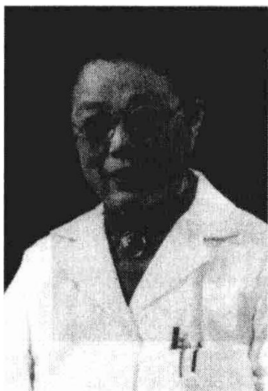
鲁桂珍和李约瑟



胡秀英

医学卫生领域也有金女大毕业生的身影。熊菊贞 1942 年毕业于金女大生物系，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生物学博士，她在美国耶鲁大学附

属医院开创了病毒实验诊断的新方法，她是美国病毒学会创始人。刘家琦1932年毕业于金女大医学预科，协和医学院博士。她是我国著名的眼科专家。我国著名的医学影像学专家李果珍博士在1935—1938年期间，就读于金女大医预科。皇甫玉珊在1946—1949年期间就读于金女大医学预科，她是国内外知名的传染病专家，曾成功诊治国内外传染病患者数万人次。另外，还有生物监测专家郑星泉和因创办“新运”弱智儿养育院而闻名的茅于燕等。



熊菊贞



皇甫玉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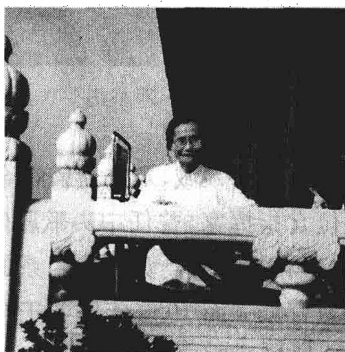
茅于燕



李果珍

在我国军政界，金女大有三位授予中将军衔的女将军。一位是钟玉征中将，她于1949—1950年在金女大化学系学习，她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防化问题专家，曾被中央军委记一等功。一位是彭洪福中将，她于1943年毕业于金女大化学系，1958年调人军事医学科学院，1960年正式参军，授中将军衔。她最重要的成绩是研制出医治高原反应的“复方党参片”。还有一位是刘恩兰中将，她于1926年从


钟玉征


彭洪福

金女大自然地理系毕业，1941年获牛津大学博士学位。她是第一位获得该校自然学博士学位的中国女性，也是中国第一位女海洋学家，中国地理学会的创建人之一。她在自然地理学、人文地理学和气象学方面著述甚丰。在政治界，也有很多人才。方非1939年毕业于金女大历史系，在抗战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担任无锡市副市长、江苏省教育厅副厅长等职。邓裕志1926年毕业于金女大，著名的政治活动家。1935年同史良等妇女界领袖成立上海妇女救国会，次年参与成立国难教育社，并创办女青年会女工夜校。1950年担任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干事、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副主席。她曾以中国妇女代表身份参加第三届世界妇女大会。另外，还有毕业于金女大化学系曾任全国政协第六、七届委员的沈谱，毕业于金女大社会学系曾长期在基督教青年会工作的崔亚汉等。



邓裕志



年轻时的方非

在艺术领域，郑小瑛曾在金女大生物系和音乐系学习，她是中国第一位女指挥家，曾任中央歌剧院首席指挥，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主任。1941年毕业于金女大音乐系的洪达琳是我国老一辈著名钢琴家和音乐教育家。而1950年毕业于金女大音乐系的孙家馨则是我国著名花腔女高音歌唱家。

金女大虽然只有短暂的36年，但是金女大毕业生中却涌现了如此众多的杰出校友，在民国教育史上实属罕见。1987年3月，“新金陵”——金陵女子学院诞生，并于当年开始招收第一届学生，新的金陵女儿又开始走上继承金陵精神之路。杰出校友胡秀英在得知“新金陵”诞生后，非常高兴。她写诗一首寄语金陵的接班人：

> 我仿佛看见草丛里有点着的灯，
> 照亮那里的生灵。
> 后生哟，厚生。
> 种下罢！用了出众的努力，必有收成。①

据了解，18年来，“新金陵”的毕业生已超过金女大毕业人数的总和，达到1 400余人。新金陵儿女在老校友精神的感召下，再添

① 胡秀英：《芥菜种子一粒》，载《金陵女儿》编写组编《金陵女儿》，第97页。

佳绩。

第三节　金女大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

一、金女大与中国教育的现代化

金女大作为中国最早的女子大学之一，对冲击中国传统教育体制、推动中国教育的现代化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近代以前，中国妇女受封建专制压迫，被完全排除在学校大门之外，传统女子教育大都受到"女子无才便是德"和"女子识字多诲淫"影响，一般都围绕《女戒》、《烈女传》、《女孝经》等宣扬"三从四德"封建礼教思想，以此教育规范女子言行。而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兴办女学之后，极大地冲击了中国传统女教的陈腐观点，启动了中国女子教育的先河。在教会女学的影响下，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清朝政府才开始正式承认女子接受学校教育的权利，而这时西方教会创办的女子大学又在中国诞生了。作为中国最重要的女子大学金女大的创立，又再次提升了中国女子接受教育的层次，为我国传统教育用比西方短得多的时间实现向近代大学教育的转变提供了示范和推动力，从而揭开了中国教育史上极其丰富多彩的新篇章。在金女大的示范推动下，1919年4月，国立第一所女子大学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终于正式面世，其后不久，一些教会大学和国立大学也相继招收女子入学接受高等教育。1929年的统计显示，全国34所大学中，兼收女生的已达29所。①

由于金女大是由美国教会创办，其大学运作模式基本全部引进西方现代教育制度，可以说在20世纪20年代，金女大在中国教育现代化过程中也起着某种示范与导向作用。首先在教育观念上，金女大一反我国重人文轻科技、重道德轻功利的传统，使学校教育与社会多方面的需要相适应；突破民族文化的界限，按近代学科的类别由浅入深地总结

① 俞庆棠：《35年来中国之女子教育》，载《最近35年之中国教育》，商务印书馆，1931。

和传授各国优秀的文化遗产；对学生进行综合性的通才教育，从根本上改变了旧教育体制空疏迂谬、陈腐狭窄的面貌。[①] 其次在师生关系模式上，金女大引进或独创了许多先进的教育管理模式，对中国高等教育制度的现代化产生了较深远的影响。如在师生关系方面，金女大创立了姐妹班、导师制等新制度，使得学生与学生之间、学生与老师之间、学生与学校领导之间，人际关系都比较融洽，并呈现出温馨的家庭生活氛围。"每一宿舍有交谊室及饭厅，教师于课余之暇，与学生相处如姊妹，师生之间，仿佛一家之人；同学之间，更有姐妹班之组织。"[②]高年级与低年级结成"姐妹班"的制度对培养学生间互助友爱精神，消除低年级与高年级学生之间的隔膜，颇见成效。金女大导师制的推行，也极大地密切了师生之间的关系，而这一制度直到三四十年代才在全国高校中比较普遍地推行。第三，在人才培养模式上面，实施学分制、绩点制，采用主修辅修制度，学生分文理招生，在老师的指导下，学生根据兴趣自由选择主修专业。另外，金女大特别强调通识教育，尤其重视英语、体育、教育学和音乐的教育。由于规定每个学生都要选修教育学，这对于她们毕业之后从事教育工作效用极大。体育课、音乐课的要求至今仍让金陵女儿们在身心、仪表和气质等方面获益匪浅。而金女大对社会服务和社会实践课程的重视，一方面有利于学生对社会的真切了解，另一方面培养了金女大学生的独立组织领导的能力。总之，金女大人才培养模式成功的经验至今仍值得我们认真总结学习。

金女大对中国教育现代化的贡献还在于她培养了一大批优秀教师人才。虽然总数并不多，但是金女大培养学生的质量却为时人称赞，当时每年毕业生中都有相当一部分前往中等和大专院校任教。据 1949 年的调查，在 772 名毕业生中有 295 人在教育战线工作，所占比例超过 38%。而且由于她们多数具有较强的职业意识，事业心强，勤业敬业，能发奋自励，担任校长和校级主管职务的人所占比例较高，这对于我国中等乃至高等教育的发展有极重要的影响。

---

① 郭卫东：《基督新教与中国近代女子教育》，《历史档案》，2001 年第 4 期。

②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 20 周年纪念特刊》，《申报》，1935 年 11 月 2 日。

当然，金女大因为是教会大学，不可避免带有自身的局限性，如由于其收取的学费较为高昂，许多贫困家庭的子女无法进入该校学习。又如由于受到传教士教育的影响，金女大毕业生晚婚和独身者多。据1928年统计金女大1919—1927年毕业的9届105人的婚姻情况，发现已结婚的仅占16%。[①] 这可能同金女大外籍教师多为单身的言传身教有关，因为这些外籍教师所表现出的独立活动能力与强烈事业心，对一些女大学生很有吸引力。不过，这从另一方面也可看出高等教育对女子独立性培养的力度。

二、金女大与社会进步

恩格斯说："在每一个社会中，妇女解放的程度，是一般解放的天然尺度。"作为最早建立的女子大学之一的金女大，在高等教育中率先培养现代妇女人才，这对解放妇女和推进中国社会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

民国年间，金女大计培养现代知识女性1 000人，如果将曾在金女大注册入学的人数都算上，则总数当在1万余人以上。自金女大建立之后，中国女子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飞跃增加。仅就教会大学而言，1920年时教会大学在校女生总计117人，1925年时达530人，1931年时已达到825人，而1934年时则增加到1 236人。[②] 而当年金女大注册的学生人数已达212人。除教会大学外，国立大学的女生人数在教会大学的推动下也日益增加。1922年时，中国共有大学生34 880人，其中女生887人，占到总数的2.54%。其后全国各大学就读的女生人数增长速度越来越快。如1928—1931年度，高校女生数平均以每年700—1 000人的速度递增，而1945—1947年度时平均每年以3 980人的速度增长。[③] 这些经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在社会上成为妇女解放运动的重要力量。她们自立于社会，不需要依赖男性而独立生存。同时

① 江君：《配偶问题的两点》，《金陵周刊》，1928年第24期。

② 王奇生：《教会女子高等教育的历史演变》，《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6年第2期。

③ 蔡锋：《近代女性高等教育特征刍议》，《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

她们也成为广大女性的榜样，在她们的示范下，中国传统社会禁锢妇女的许多恶习日益为社会抛弃。如到了民国时期缠足妇女已成为迂腐落后的标志。在新一代知识女性的示范下，传统社会妇女的父母包办婚姻也开始遭到抵制，婚姻自主成为社会女性追求自由的象征。

在“厚生”校训的精神指导下，金女大一直提倡和实践公益服务，虽然金女大学生家庭条件都较为优越，但是“厚生”校训告诫学生“人生的目的，不只是为了自己活着，而要用自己的智慧和能力来帮助他人和社会，这样不但有益于别人，自己的生命也因之而更丰满”。因此，金女大的学生都十分重视同社会底层百姓接触，热心社会公益活动。早在金女大创办伊始，就成立一所培幼小学，招集附近失学儿童来学校识字读书，其功课由金女大学生教授。为了帮助附近贫民与儿童医治疾病，学校专门成立医务室，由师生共同服务。在成都期间，也都设有幼儿园、妇女班，教以识字、唱歌、手工和卫生常识等，后来还专门成立儿童福利实验所，专门照顾 40 名 2—5 岁的儿童，并对她们施以最科学的体格和思考的训练，减轻当地农村妇女的生活负担。另外，在抗战期间，到处都有体现金陵女儿救济难民的壮举，如在抗战初期的上海，在金女大第一届毕业生徐亦蓁的带领下，金陵女儿是红十字会重要组成成员，她们一直工作在救护伤病人员、救济难民的第一线。南京沦陷期间，在南京校本部，魏特琳老师带领其余留守教工，将金女大开辟成南京专门收容年轻妇女的难民所，在日军的淫威下，保护了 10 000 多名妇孺难民。并在南京大屠杀之后又开设各种技能班，培训没有职业而且无家可归的妇女，抗战期间金陵女儿的社会服务精神至今仍在当地传颂。

金女大通过一系列社会服务实践活动，加强了学生对服务人生的信仰，并使学生从实践经验中体认到社会服务的意义和价值。“厚生”校训也在社会服务的实践活动中像春雨一般滋润和植根于每个学生的心田之中，并演化为一种人格力量，与她们终生相伴，乃至浸染到她们的后代和整个社会。①

① 王奇生：《教会女子高等教育的历史演变》，《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6 年第 2 期。

三、金女大与中西文化交流

近十余年来，中国教会大学史的研究方兴未艾，人们开始日益认识到近代教会大学在中西文化交流方面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著名教会大学史研究专家章开沅先生最近在《〈教会大学在中国〉丛书总序》中说：

> "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是一个双向对流的运动过程。中国教会大学既是基督教文化与近代西方文明的载体，同时它又处在东方传统文化环境与氛围之中，因而不可避免地要逐步走向本土化、世俗化。中国教会大学的发展，归根到底，还得取决于它对中国国情与社会需要的适应能力。许多长期在中国教会大学工作的西方教职员(包括一些传教士)，也不可避免地要受到中国文化的熏染，在不同层次与不同程度上吸收中国文化，并且将其带回西方故土。所以，对于有些西方人来说，教会大学又是一个观察、了解中国文化与中国社会的不大不小的窗口。"①

金陵女子大学是近代教会大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她无疑也是中国与外国之间架起的一座文化交流的桥梁，让东方和西方文化在这里相互交融和碰撞。作为教会大学许多共性的内容笔者不必再多赘言，而作为一所女子大学的金女大，其对中西文化交流所作的贡献还增添了许多自身特点。

金女大无疑是中国最早开放的一扇窗口，是中国输送海外留学生最早的培养基地之一，许多学生纷纷选择出国留学继续深造。这些金女大学子毕业生在异国他乡都不自觉地充当了传播中国文化的角色。有些校友在国外取得学位后一直在国外工作，充当着东西方文化之间

① 章开沅：《〈教会大学在中国〉丛书总序》，载孙海英著《金陵百屋房——金陵女子大学》，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

的使者。如在英国的鲁桂珍,她同丈夫李约瑟一起完成了多卷本巨著《中国科技史》,极大地改变了人们对中国古代科技的误解,大大提升了中国科技史在世界科技史中的地位。又如在奥地利工作的徐芝秀、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工作的潘纫秋都为当代中美、中奥关系的发展作出过十分重要的贡献。

就一所教会女子大学而言,在其 36 年的生涯中,曾聘请许多外籍教师特别是女教师来校任教,据统计,在 1915—1946 年中,共有 116 位外籍教师(其中男教师只有 5 位)执教金女大。这些外籍教师经过在中国生活一段时间后,大都会对中国产生相当浓厚的感情,把中国视为第二故乡。例如魏特琳教授将自己一生中的 28 年都献给了中国教育,她甚至希望自己的第二次生命也要为中国服务。另外,这些曾经在中国执教的外籍教师,回国后也通过不同方式宣传介绍中国文化,她们是真正推动中西文化友好交流的使者。

随着时间的推移,金女大作为一所教会大学、一所成效显著的教会女子大学,对中国社会各界的影响将会日益显现。

附　　录

附录一　金女大校歌和校园歌曲①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院歌

1 = G $\frac{4}{4}$, $\frac{2}{4}$

0 5 | 3 3 3 3 | 2 #1 2 3 4 V 4 | 6 5. 4 3 1 |
虎　踞　龙　蟠　兮，女　校　曰　金　陵，学　科　分　文　理
中　华　号　古　国，文　化　早　著　名，道　艺　与　方　技

3. 3 2. 6 2 0 5 | 3 3 3 3 | 2 #1 2 3 4 V 4 4 | 5 2 2
研　析　求　其　真。看　山　高　水　长　浩　荡　莫　与　京，国　家　民　族　待
学　海　浩　无　垠。化　民　务　成　俗　立　己　更　立　人，女　界　多　才　秀

5 3 | $\frac{2}{4}$ 5 4 | 3 V 1 | 1 1 | 2 2 | 3 4 |
兹　山　川　效　应，国　家　民　族　待　兹　山
莘　华　赖　栽　成，女　界　多　才　秀　莘　华

3 - | 2 - | 1. 1 - | 1 0 5 :‖ 2. 1 - | 1 0 ‖
川　效　应。
赖　栽　成。

① 金女大校友会提供。

We Are From Ginling
金陵的女儿欢聚一堂

1 = G 4/4

5 #4 5 6 5 | i 7 6 7 - |
We are from Gin - ling Gin - ling are we.
金 陵 的 女 儿 欢 聚 一 堂，
金 陵 的 女 儿 欢 聚 一 堂，

7 6 i 7 6 | 6 5 #4 5 ∨ 3 ♮4 #4 |
Sing - ing for glad - ness right mer - ri - ly, And now that
为 母 校 金 陵 同 声 歌 唱，同 声 唱
年 龄 和 专 业 互 不 一 样，都 有 着

5 5 5 6 5 | i 7 6 7 6 |
we are to - geth - er, hap - py are we,
金 陵 金 陵 金 陵，歌 声 嘹 亮，
建 设 伟 大 祖 国，共 同 理 想，

5 5 5 6 7 | i - - - ‖
Long life to our G. C.
传 向 四 面 八 方。
共 同 美 好 理 想。

注：中文是20世纪80年代初为校友联谊会成立而新填的词，曾经吴校长首肯并赞许。

我们都是金陵的儿女

方颖保　词
洪达琳　曲

1 =♭A 4/4

5 | 3· 2 1 7· 1 6· 1 | 5 - 3∨ 5 | 3· 2 1 7· 1
我们都是金陵的儿女，独立在伟大

6· 2 | 2 4 3 ♯2 | 3· 3 3 5 3 1 ♭7 | 6 4 - -
的时代高岗上。我们是紫金山的朝霞，

| 3· 5 5 5 2· 5 6 7 | 1 - - - | 3· 3♯ 2 3 4 3 |
我们是扬子江的波浪。不怕黑夜风雨

5 - 2 - | 2 3 2♯ 1 2 3 4 | 6 - 5 -
颠狂，金陵要做祖国灯光。

| 3· 3 3 5 3 1 ♭7 | 6 1 4 1 3 - | 4· 5 6 7 1
快乐而欢欣永不悲观与嗟叹。齐声高歌

2 5 | 1 - - ‖
志气扬。

注：方颖保即方非。

附录二 金女大教师名录[1]

1. 金女大中国教师名录 (1915—1951)

姓 名	性 别	到校时间	离校时间	在校时间	任教系别(科目)	备 注
Lee, Va-li 李玛琍	女	1915	1916	1	化学、数学	
Wang, Muh-djai	男	1915	1916	1	中 文	
Chen, Shah-ching	男	1916	1917	1	中 文	
Djang, Meng-ran	男	1917	1919	2	中 文	
Wu, Gia-gao	男	1917	1920	3	数 学	
Li, Tsah-ming	女	1919	1920	1	音 乐	
Djang, Dzi-tsi	男	1919	1923	4	中 文	
Wang, Beh-han	男	1920	1927	7	中 文	
		1947	1951	4		
Ma, Chen-kuen	男	1921	1923	2	中 文	

① 注：标有(※)者，表示为该校毕业生。备注栏括号内时间为该教师任系主任或其他工作年份。

资料来源：Lawrence Thurston and Ruth N. Chester, ***Ginling College***, pp. 161—163; Ginling Alumnae Association de. , ***Ginling College Record Book***, pp. 135—168. 转引自曾芳苗著，吴振汉指导的《民国教会女子教育——"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个案研究(1915—1951)》，第229—245页。原表有误，鲍惠荪校友已作多处订正。但由于资料所限，仍有许多在金女大任教老师的姓名未能收录。

续 表

姓 名	性 别	到校时间	离校时间	在校时间	任教系别（科目）	备 注
Hoh, Ying-tsing 郝映青(※)	女	1923	1927	4	中 文	乡村服务工作（1938—1945、1946—1948、1949—1951）
		1938	1945	7		
		1946	1948	2		
		1949	1951	2		
Dju, Ao 朱激(※)	女	1924	1925	1	实验中学、历 史	1931—1938
		1931	1938	7		
Ho, Chang-chi 何昌祺(※)	女	1924	1925	1	音 乐	
Hwang, Wen-yu 黄文玉	女	1924	1925	1	宗 教	
		1928	1929	1		
Wan, Chueh	女	1924	1925	1	体 育	
Chang, Hwei-lan 张汇兰	女	1924	1931	7	体 育	系主任（1947—1951）
		1947	1951	4		
Chu, Zia Ven-tsuiu 朱谢文秋(※)	女	1925	1926	1	体 育	系主任（1928—1934）
		1928	1934	6		
		1937	1938	1		
Djang, Chine-chi	男	1925	1926	1	中 文	
Hwang, T. Y. 黄道墉	男	1925	1926	1	数 学	
Yang, Jui-tien 杨瑞田	男	1925	1928	3	物 理	
Loh, Zung-nyi 陆慎仪(※)	女	1925	1931	6	数学、物理	代理教务主任（1946—1947）
		1946	1948	2		

续 表

姓　　名	性 别	到 校 时 间	离 校 时 间	在 校 时 间	任教系别（科目）	备　　注
Liu, En-lan 刘恩兰(※)	女	1925	1951	26	实验中学、地　理	系主任（1925—1931）
Ho, Chiu-ai	男	1926	1927	1	化　学	
Ni, Feng-gih 倪逢吉(※)	女	1926	1927	1	历史、社会	
Pan, Z. H.	女	1926	1935	9	化　学	
Koo, Ellen Y. T.	女	1926	1936	10	音　乐	
		1937	1938	1		
		1946	1947	1		
Li, Chi 李祈(※)	女	1927	1928	1	英　文	
Tsu, Li-o	男	1927	1929	2	中　文	
Djang, Siao-sung 张肖松(※)	女	1927	1930	3	历　史（1927—1930）、心 理 学（1935—1939）	训导主任（1939—1941）
		1939	1941	2		
		1947	1949	2		
Liu, Lindsay 刘麟生	男	1927	1930	3	中　文	系主任
Wu, Dzung-hsien 邬静娴	女	1927	1932	5	生　物	
		1935	1937	2		
Chu, Hai-yu	男	1927	1934	7	生　物	
Hsiung, David S. 熊子璥	男	1927	1936	9	物　理	系主任（1927—1936）
		1946	1951	5		
Chen, Hwang Li-ming 陈黄丽明(※)	女	1927	1938	11	体　育	系主任（1941—1942、1946—1947）
		1941	1942	1		
		1946	1947	1		

续　表

姓　名	性别	到校时间	离校时间	在校时间	任教系别(科目)	备　注
Sun, Wang Koh-sien 孙王国秀	女	1928	1930	2	历　史	
chen, Mei-yu 陈美瑜(※)	女	1928	1934	6	卫　生	
Wu, Mou-i 吴懋仪(※)	女	1928 1946	1937 1951	9 5	化　学	注册组(1932—1937)
Giang, Mei-sung	男	1929	1930	1	中　文	
Tung, Teh-fu 童德富	男	1929	1930	1	心理学	
Wang, Gia-wei 王家玮(※)	女	1929	1930	1	实验中学	
Lei, Hai-tsung 雷海宗	男	1929	1931	2	历　史	
Liu, Tang Lu-djen 刘唐绿蓁(※)	女	1929	1931	2	历　史	
Shen, Shau-yu 沈寿宇	女	1929	1931	2	政治、社会	
Shi, Kwoh-ying 施国英	女	1929	1931	2	体　育	
Yang, Ging-hsioh 杨竞学(※)	女	1929	1931	2	生　物	
Chen, Deh-djen 陈德贞(※)	女	1929	1934	5	数学、物理	

续 表

姓　　名	性 别	到 校 时 间	离 校 时 间	在 校 时 间	任教系别（科目）	备　　注
Yang, Hsiao-rang 杨效让(※)	女	1929	1934	5	体　育	
		1943	1945	2		
		1947	1950	3		
Tsui, Ya-lan 崔亚兰(※)	女	1929	1940	11	体　育	系主任
Hsu, Chang Ching-o 许张镜欧	女	1930	1931	1	家　事（家政）	
		1946	1947	1		
Pan, Shu	男	1930	1931	1	心 理 学	
Tseng, Hsu-beh 曾虚白	男	1930	1931	1	中　文	
Miao, Feng-ling 缪凤麟	男	1930	1932	2	历　史	
		1937	1938	1		
Swen, Shu-gin	女	1930	1933	3	实验中学	
Wen, Bu-i 温步颐	男	1930	1933	3	化　学	
Yu, Li Hsiang-cho	女	1930	1934	4	中　文	
Chen, Yu-djen 陈玉珍(※)	女	1930	1935	5	实验中学	
		1946	1951	5		
Chang, Sze-i	男	1931	1932	1	英　文	
Chen, Cheng En-tsi 陈诚恩慈	女	1931	1932	1	体　育	
		1934	1935	1		
		1938	1939	1		
		1942	1943	1		
Chiu, Yu-tsi 邱玉池	男	1931	1932	1	化　学	

续 表

姓　名	性别	到校时间	离校时间	在校时间	任教系别（科目）	备　注
Deng, Wau-pu	男	1931	1932	1	中文、哲学	
Dju, Chia-dji	男	1931	1932	1	图书馆学	
Ho, P. S.	女	1931	1932	1	音　乐	
Hsiao, H. H.	男	1931	1932	1	心理学	
Hsiao, Ta	男	1931	1932	1	中　文	
Lo, Chang Wei-djen 张维桢	女	1931	1932	1	政　治	
Lu, Yen-ying	男	1931	1932	1	政　治	
Peng, Ya-sui 彭亚粹	女	1931	1932	1	数学、物理	
Tseo, Yung-ho 钱用和	男	1931	1932	1	教　育	
Wei, I-djen	女	1931	1932	1	心理学	
Wool, Swain	男	1931	1932	1	经　济	
Yang, Ching	男	1931	1932	1	化　学	
Li, Kwoh-ding 李国鼎	男	1931	1934	3	数学、物理	
Chu, C. H.	男	1932	1933	1	经　济	
Dju, Yu-bao 朱钰宝(※)	女	1932	1933	1	社　会	
Yang, Stonelake	男	1932	1933	1	经　济	

续 表

姓　　名	性 别	到校时间	离校时间	在校时间	任教系别（科目）	备　　注
Chou, Rosie Nyi	女	1932	1934	2	心理学	
Lung, T. Y.	男	1932	1934	2	中　文	
Tsu, Kwoh-mou 徐国茂	男	1932	1934	2	政　治	
Hsieh, Daneil	男	1932	1935	3	历　史	
Lu, Shuh-ying 鲁淑音(※)	女	1932	1938	6	数学、物理	系主任
Miao, Ting-liang	男	1932	1938	6	中　文	
Wang, Ming-djen 王明贞(※)	女	1932	1938	6	数学、物理	
		1939	1940	1		
Chen, K. Y.	男	1933	1934	1	中文、哲学	
Chen, Kwai-en 陈快恩(※)	女	1933	1934	1	实验中学	
Cheng, Lin-chuang	男	1933	1934	1	经　济	
Shih, Gan-lin 石甘霖(※)	女	1933	1934	1	实验中学	
Tsai, Deh-sui 蔡德粹(※)	女	1933	1934	1	地　理	
		1946	1948	2		
Chang, Hung-chi	男	1934	1935	1	数　学	

续　表

姓　名	性别	到校时间	离校时间	在校时间	任教系别（科目）	备　注
Hu, Dwan-wu	女	1934	1935	1	卫　生	
Hwang, Hsiao-yun	女	1934	1935	1	化　学	
Li, Tung-wen	女	1934	1935	1	实验中学	
Lin, Wei 林尉	男	1934	1935	1	经　济	
Lin, Yin	男	1934	1935	1	中　文	
Mao, Feng-lin	男	1934	1935	1	中文、历史	
Swen, Shuh-kuen	男	1934	1935	1	体　育	
Shao, Siu-lin 邵秀麟	女	1934	1936	2	实验中学	
Yang, Bao-yu 杨宝瑜(※)	女	1934	1937	3	生物、卫生	教务主任(1947—1948)
		1947	1948	1		
Lin, Yu-wen 林玉文(※)	女	1934	1938	4	社　会	
Yen, En-wen 恩纹(※)	女	1934	1941	7	中　文	
Djang, Han-chiu 张汉秋(※)	女	1935	1936	1	数学、物理	
Djou, Han-ching	女	1935	1936	1	体　育	

续 表

姓 名	性 别	到校时间	离校时间	在校时间	任教系别（科目）	备 注
Chang, Tuh-wei 张德卫(※)	女	1935	1937	2	英 文	
Chang, Yu-ying	女	1935	1937	2	实验中学	
Chen, Chung-hao	男	1935	1937	2	历 史	
Dzo, Gin-ru 左敬如(※)	女	1935	1937	2	实验中学	
Sung, Ging-hsiung 宋竞雄(※)	女	1935	1937	2	实验中学	
Han, Chen Yueh-mei 杭陈越梅(※)	女	1935	1938	3	体 育	
		1943	1943	1		
		1947	1948	1		
Lan, Chien-bih 蓝乾碧(※)	女	1935	1938	3	体 育	
Shen, Nai-sheng	男	1935	1938	3	化 学	
Hwang, Dzun-mei 黄俊美	女	1935	1939	4	化 学	
Wang, Ren-tze 王仁慈(※)	女	1935	1939	4	地 理	儿童福利中心（1946—1948）
		1946	1948	2		
Chen, Pin-dji 陈品芝(※)	女	1935	1942	7	生 物	
Lung, Cheng-fu 龙程芙(冠海)	男	1935	1948	13	社 会	系主任

续 表

姓名	性别	到校时间	离校时间	在校时间	任教系别（科目）	备注
Chen, Chung-fan 陈中凡	男	1935	1951	16	中文	系主任
Hu, Fen	男	1936	1937	1	化学	
Sze, Swen Shu-gin	女	1936	1937	1	实验中学、英文	英文（1947—1948）
		1947	1948	1		
Tseng, Li Su-ying	女	1936	1937	1	实验中学	
Yeh, Li Su-ying	女	1936	1937	1	音乐	
Li, Hwei-lien 李惠廉（※）	女	1936	1938	2	物理	
Li, Dze-djen 李子真（※）	女	1936	1939	3	心理学	
Yuen, Peh-tsiao 袁柏樵	男	1936	1939	3	教育	
Hu, Shih-tsag 胡惜苍（※）	女	1936	1951	15	音乐	
Chu, S. M.	女	1937	1938	1	体育	
Djou, Yu-ing	女	1937	1938	1	体育	
Hwang, Siu-ching 黄秀清	女	1937	1938	1	地理	
Wu, Chig-yi 邬静仪	女	1937	1938	1	生物	
		1946	1948	2		
Djou, Li-chiu 周励秋	女	1937	1940	3	社会	

续　表

姓　名	性别	到校时间	离校时间	在校时间	任教系别（科目）	备　注
Lo, Hwel-lin 罗慧林（※）	女	1937	1940	3	体　育	
		1944	1944	1		
Sung, Hong-kong	男	1937	1941	4	化　学	
Dzo, Yu-lan 左犹麟（※）	女	1937	1944	7	社　会	
Yeh, Lucy Lung 叶泠竹琴	女	1937	1945	8	音　乐	
Chang, Tsung-yuen 张秀俊	男	1938	1939	1	?	
Wen, Hwang-chang 温欢畅（※）	女	1938	1942	4	生物、化学	
Yu, Kai-shih	男	1938	1944	6	数学、物理	
Wu, Mei-lin 吴美临（※）	女	1938	1945	7	生　物	
Chang, Liu-chien	男	1939	1940	1	教　育	
Chang, Wei-cheng	男	1939	1940	1	经　济	
Feng, Gia-wen 冯家雯（※）	女	1939	1940	1		乡村服务工作
Liu, Dzung-l	女	1939	1940	1	历　史	
Wen, Yun-kwen 文运坤（※）	女	1939	1940	1	音　乐	
		1944	1945	1		
		1946	1948	2		

续　表

姓　名	性 别	到校时间	离校时间	在校时间	任教系别（科目）	备　注
Kwan, Yu I-hsuan 管喻宣萱	女	1939	1941	2	音　乐	
Li, Hsu-wen	男	1939	1951	12	数学、物理	
Chen, Lan-ying 陈兰英(※)	女	1938	1939	1	经　济	注册组长(1938—1939)
		1940	1941	1		
Djang, Hsiang-lan 张芗兰(※)	女	1940	1947	7	教育、伦理学、心理学(1946—1947)	教育系主任、训导主任(1941—1946)
Hsiung, Dju-Iu 熊朱骊(※)	女	1940	1941	1	历　史	
Hu, Chun-lin	女	1940	1941	1	体　育	
Li, Hao	女	1940	1941	1		乡村服务工作
Liu, Su-gun 刘素君(※)	女	1940	1941	1	卫　生	
Ngai, Hsieh wen	女	1940	1941	1	体　育	
Wang, Shen-hui	女	1940	1941	1		乡村服务工作
Wang, Shih-yung	男	1940	1941	1	地　理	
Cheng, Liu Su-gun (Hazel)	女	1940	1942	2	卫　生	
Swen, Yz-lan	女	1940	1942	2	家　政	

续 表

姓 名	性 别	到校时间	离校时间	在校时间	任教系别（科目）	备 注
Tseng, Hsien Kai-chi	女	1940	1942	2	中 文	
Tsiu, Ko-shih 崔可石(※)	女	1940	1942	2	地 理	
Hsu, Hsieh Wen-mei 许谢文梅(※)	女	1940	1943	3	化学、卫生	
Chang, Bing-i 张彬仪	女	1940	1944	4	音 乐	
Yuang, Hsiao-yun	女	1940	1944	4	家 政	
Dju, En-djen 朱恩贞(※)	女	1940	1947	7	体 育	
Wang, Shih 王栻	男	1940	1951	11	历 史	
Dwan, Yu-ching	女	1941	1942	1	军训护理	
Gi, Deh-yung 计德容(※)	女	1941	1942	1	地 理	
Hwa, Dja Hwei-djung	女	1941	1942	1	体 育	
Liu, Shu-yuen 刘淑媛(※)	女	1940	1942	2	社 会	训导处助理(1940—1941)
Shao, Dzu-ping	男	1941	1942	1	中 文	

续　表

姓　名	性别	到校时间	离校时间	在校时间	任教系别（科目）	备　注
Chang，Ling-chao	女	1941	1943	2	生　物	
Dju，Chi-fang	男	1941	1943	2	地　理	
Tsai，Shuh-lan 蔡淑琊	女	1941	1943	2		乡村服务工作
Yang，Ging-djung 杨锦钟（※）	女	1941	1943	2	化　学	
Wei，Djen-dzi 魏贞子（※）	女	1941	1944	3	社　会	
Chang，Shih-wen	男	1941	1945	4	社　会	
Djou，To-fuh	女	1941	1945	4	体　育	
Hsiung，Ya-na 熊亚拿（※）	女	1941 1949	1945 1951	4 2		乡村服务工作（1949—1951）
Li，Shen-dong	男	1941	1945	4	经　济	
Shen，Dzu-ying 沈祖英	女	1941	1945	4	音　乐	
Chen，Yu-ching 陈玉清（※）	女	1941	1947	6	生　物	
Chang，Hsing-ching	女	1942	1943	1	体　育	
Chang，Shao-wei	男	1942	1943	1	社　会	

续 表

姓　　名	性 别	到 校 时 间	离 校 时 间	在 校 时 间	任教系别（科目）	备　　注
Chiao, Yuen-chun	男	1942	1943	1	化　学	
Dja, Shao-hwa	女	1942	1943	1	家　政	
Ging, Ho-swen 景荷荪(※)	女	1942	1943	1	化　学	
Gu, Wei-tseng 顾慰曾(※)	女	1940	1941	1	音　乐	代理注册主任（1940—1941）
		1942	1943	1		
Hwang, Su-fan	男	1942	1943	1	化　学	
Koo, Fu-ying	男	1942	1943	1	中　文	
Li, Beng-sen	男	1942	1943	1	体　育	
Lu, Ming-djang 卢敏章(※)	女	1942	1943	1	体　育	
Shao, Tang-taiu	男	1942	1943	1	中　文	
Shen, Geu-ming	女	1942	1944	2	英　文	指导顾问（1942—1943）、教务长助理（1943—1944）
Siao, Dji-mei	女	1942	1945	3		乡村服务工作、注册组助理（1943—1945）
Yeh, Hsieh-ching	女	1942	1943	1	理 则 学	
Yeh, I-yen	女	1942	1943	1	德　文	

续　表

姓　名	性别	到校时间	离校时间	在校时间	任教系别（科目）	备　注
Lin, Chi-wu	男	1942	1944	2	体　育	
Ning, Te-ming	男	1942	1944	2	地　理	
Hu, Ya-lan 胡亚兰	女	1942 1946	1945 1948	3 2	教育、中文	教务长（1946—1948）
Lu, Hwel-ching	女	1942	1945	3	体　育	
Tseo, Bing-i 邹秉彝（※）	女	1942	1945	3	数学、物理	
Yin, Gin-dju 尹金珠（※）	女	1942	1945	3	体　育	
Swen, Tzu-djo	男	1942	1947	5	中　文	
Hwang, Yen-hwa 黄燕华（※）	女	1942	1948	6	家　政	
Pan, Yao-tauen 潘耀瑔（※）	女	1941	1951	10	英　文	训导处助理（1941—1942）
Tsu, Yu-dj 徐幼芝（※）	女	1942	1951	9		乡村服务工作
Li, Shui-mei 李瑞玫（※）	女	1943	1944	1	英　文	
Liu, Kal-yung 刘开荣（※）	女	1943 1948	1944 1951	1 3	英　文	
Pu, Shi-tseh	女	1943	1944	1	教　育	

续 表

姓　　名	性 别	到 校 时 间	离 校 时 间	在 校 时 间	任教系别（科目）	备　　注
Wang, Ying-an 王应安(※)	女	1943	1944	1	社　会	乡村服务工作（1942—1944）
Chen, Tsing	男	1943	1945	2	地　理	
Nyi, Tsing-yuen 倪清源	男	1943	1945	2	理 则 学	
Wang, Chiu-ling	女	1943	1945	2		儿童福利中心
Chen, Shih-dzung 陈世琮(※)	女	1943	1946	3	化　学	代理总务主任（1946—1947）
Wu, Kao chun-che	女	1943	1946	3	社　会	
Hsueh, Tang Ming-sin 薛汤铭新(※)	女	1943	1948	5	社　会	儿童福利中心（1949—1951）
		1949	1951	2		
Peng, Hung-fu 彭洪福	女	1943	1948	5	化　学	
Lin, Pei-fen 凌佩芬(※)	女	1943	1949	6	体　育	
Hsiung, Man-djen 熊满贞(※)	女	1944	1945	1		乡村服务
Lin, Ting-yu	女	1944	1945	1	音　乐	
Lo, Yu-chin	女	1944	1945	1	社　会	
Miao, Te-ming	男	1944	1945	1	地　理	

续 表

姓　名	性 别	到校时间	离校时间	在校时间	任教系别(科目)	备　注
Siao, Ding-ying 萧鼎英(※)	女	1944	1945	1		儿童福利中心
Siao, Su-hwel	女	1944	1945	1		乡村服务工作
Sie, Hsien-gie 谢咸杰(※)	女	1944	1945	1	化　学	
Chen, Pei-lan	女	1944	1946	2	家　政	
Hsun-yu, Min-I 鲜于明义(※)	女	1944	1946	2		儿童福利中心
Gwoh, Dao-ping 郭兆平(※)	女	1944	1947	3	家　政	儿童福利中心
Lin, Dji-yu 林志玉(※)	女	1944	1948	4		儿童福利中心
Shen, Gien 沈鑑	男	1944	1948	4	历　史	
Li, Gi-mou 李季谋(※)	女	1943	1951	8	社　会	助理中文秘书(1943—1944)
Sun, Tseng-ming 孙增敏	女	1944	1951	7	家　政	
Djang, Gin	男	1945	1946	1	中　文	
Ho, Gwan-hwa	女	1945	1946	1	家　政	
Hsu, Hsing-sin	女	1945	1946	1		乡村服务工作
Hsu, Saura	女	1945	1946	1	音　乐	

续 表

姓　　名	性 别	到 校 时 间	离 校 时 间	在 校 时 间	任教系别（科目）	备　　注
Hwang, Tsung-hsun	女	1945	1946	1		儿童福利中心
Liu, Chao-sin	女	1945	1946	1	家　政	
Liu, Nelson	男	1945	1946	1	英　文	
Wang, Hwai-yu	女	1945	1946	1	英　文	
Wang, Sueh-tso	女	1945	1946	1	家　政	
Liu, Hsi-meng 刘希孟(※)	女	1945	1951	6	社　会	宿舍管理员（1948—1949）
Chang, Shi Lu-sha	女	1946	1947	1		乡村服务工作
Chen, Hsiang Hsu-ren 陈向恕人(※)	女	1946	1947	1		儿童福利中心
Chung, Li-hwa	女	1946	1947	1		乡村服务工作
Djou, Swen Shu-tsuen 周孙淑铨(※)	女	1946	1947	1	体　育	
Duan, Hsioh-chien 段学谦(※)	女	1946	1947	1	音　乐	
Dziang, Sin-bao 蒋新宝(※)	女	1946	1947	1	化　学	
Dziang, Yuh-wen 蒋郁文(※)	女	1946	1947	1		乡村服务工作

续　表

姓　名	性别	到校时间	离校时间	在校时间	任教系别（科目）	备　注
Fu, Ling 傅玲(※)	女	1946	1947	1		儿童福利中心
Ho, Liu Yu-chien	女	1946	1947	1		儿童福利中心
Hoh, You-t'ang	女	1946	1947	1	地　理	
Hsi, Shuen	女	1946	1947	1	体　育	
Hu, Chang-chih	男	1946	1947	1	家　政	
Hwang, Bing-wei	男	1946	1947	1	地　理	
Kao, Yung-yuan	男	1946	1947	1	地　理	
Lin, chao	女	1946	1947	1	地　理	
Liu, Shu-chun	男	1946	1947	1		儿童福利中心
Lu, Gwel-djen 鲁桂珍(※)	女	1946	1947	1	家　政	
Ma, Teh-ying 马德音(※)	女	1946	1947	1	社　会	
Siao, Yang chao-chen	女	1946	1947	1		儿童福利中心
Sung, Tzu-chow	男	1946	1947	1	中　文	
Tang, Sin-mei 汤洵美(※)	女	1946	1947	1		儿童福利中心

续 表

姓　　名	性 别	到 校 时 间	离 校 时 间	在 校 时 间	任教系别（科目）	备　　注
Tu，Chang-wan	男	1946	1947	1	地　理	
Tung，Mei-kang	女	1946	1947	1	中　文	
Wang，Lung	男	1946	1947	1	社　会	
Wang，Pei-chen	男	1946	1947	1	经　济	
Wu，Hung Da-ling 吴洪达琳（※）	女	1946	1947	1	音　乐	
Wu，Ping-heng 吴秉亨（※）	女	1946	1947	1		儿童福利中心
Yang，Hwei-ru 杨慧如	女	1946	1947	1	音　乐	
Yu，Tsao chien-yu 于曹简禹	女	1946	1947	1	化　学	
Chai，Cin-fu 翟靖夫	女	1946	1948	2	政　治	
Chen，Chen-ping 陈正平	男	1946	1948	2	音　乐	
Chen，Fu-ho 陈复和（※）	女	1946	1948	2	化　学	
Djang，Wei-chiao	男	1946	1948	2	地　理	
Djao，Yun-hsiang 赵韵香（※）	女	1946	1948	2	生　物	

续　表

姓　　名	性 别	到 校 时 间	离 校 时 间	在 校 时 间	任教系别（科目）	备　　注
Feng, Bi-roh	女	1944	1948	4		儿童福利中心、注册组助理（1944—1946）
Liang, Lsai-yu	女	1946	1948	2		儿童福利中心
Lin, Hwa-yen 林华颖（※）	女	1946	1948	2	地　理	
Ling, Sie Wen-shih 凌谢文息	女	1946	1948	2	体　育	
Mao, Chi-chun	男	1946	1948	2	社　会	
Wang, Shuen-shan	男	1946	1948	2	英　文、（1946—1948）教　育（1947—1948）	
Chang, Wu Yu-djen 张吴玉珍	女	1946	1949	3	社　会	
Chen, Chia 陈嘉	男	1946	1951	5	英　文	
Chen, Hsin-kuo	男	1946	1951	5	生　物	
Sung, Hung-tan 宋鸿坦	男	1946	1951	5	体　育	
Chang, Li-hwa 常丽华（※）	女	1947	1948	1	政　治	
Chao, Shu-wen	男	1947	1948	1	地　理	

续 表

姓 名	性 别	到 校 时 间	离 校 时 间	在 校 时 间	任教系别（科目）	备 注
Chao, Ting-pin	男	1947	1948	1	化 学	
Chen, Eva Hwang	女	1947	1948	1	音 乐	
Chen, Wan-djen	女	1947	1948	1	数学、物理	
Fang, Roh-ping	女	1947	1948	1		儿童福利中心
Feng, Hsieh Pei-djen 冯谢佩贞	女	1947	1948	1	音 乐	
Feng, Paul	男	1947	1948	1	英 文	
Geh, Lih	男	1947	1948	1	哲 学	
Gien, I-di 简宜棣(※)	女	1947	1948	1	化 学	
Hsu, I-tang	男	1947	1948	1	历 史	
Hsu, Wen-yu	男	1947	1948	1	中 文	
Kwoh, Beulah Deng 郭邓如蠢	女	1947	1948	1	社 会	学生活动辅导员
Kwoh, Edwin Sih-ung 郭锡恩	男	1946	1948	2	教 育	主计员（1946—1948）
Lai, Shu-yin 赖淑颖(※)	女	1947	1948	1		儿童福利中心
Li, Cheng-lan 李正兰(※)	女	1947	1948	1		儿童福利中心
Li, Eran	女	1947	1948	1	英 文	

续 表

姓 名	性别	到校时间	离校时间	在校时间	任教系别(科目)	备 注
Li, Ming-chi	女	1947	1948	1	生 物	
Li, Shu-wen	男	1947	1948	1	数 学、物 理	
Li, Yang-l	男	1947	1948	1	体 育	
Lin, Chung-ying 淩崇英(※)	女	1947	1948	1	音 乐	
Liu, Gleh-yu	女	1947	1948	1		儿童福利中心
Ma, Cheng Kuo-chi 马郑国齐(※)	女	1947	1948	1	家 政	
Miao, Cheng-fan 缪镇藩	男	1947	1948	1	中 文	
Shih, Sun Shui-chin	女	1947	1948	1	英 文	
Sze, Lu-shs	女	1947	1948	1		乡村服务工作
Tang, Hsiao-djuh	男	1947	1948	1	中 文	
Wang, Tung	男	1947	1948	1	地 理	
Wu, Lucy Shen	女	1947	1948	1	家 政	
Wu, Shui-hsia 吴瑞霞(※)	女	1947	1948	1	教育、心理学	宿舍管理员
Wu, Shui-hsueh 吴瑞雪(※)	女	1947	1949	2	生 物	教务主任(1947—1948)、宿舍管理员(1948—1949)

续 表

姓 名	性 别	到校时间	离校时间	在校时间	任教系别(科目)	备 注
Yeh, Chin-wan 叶静宛(※)	女	1947	1948	1		儿童福利中心
Yuen, Yen-ho 袁砚和(※)	女	1947	1948	1		乡村服务工作
Wu, Chu-hsiang 吴祖缃	女	1947	1949	2	中 文	
Keh, Yun-i 葛允仪	女	1947	1950	3	英 文	
Li, Ding-hwa	女	1947	1950	3	化 学	
Chu, Kwoh-chang	男	1947	1951	4	体 育	
Wang, Rhu-ming 王汝珉	女	1947	1951	4	体 育	
Wu, Hao-chin	女	1947	1951	4	体 育	
Wu, Suen-i 吴璇仪(※)	女	1938 1947	1939 1951	1 4	家 政	乡村服务工作(1938—1939)
Meng, Chi-ming	男	1948	1948	0	中 文	
Lee, Sophia Lo	女	1948	1949	1	地 理	
Mei, Gwan-yao 梅光耀(※)	女	1948	1949	1	化 学	
Mei, Yoh-lan 梅若兰(※)	女	1948	1951	3	化 学	

续　表

姓　名	性别	到校时间	离校时间	在校时间	任教系别（科目）	备　注
Yu, Ching-mei 俞靖梅	女	1948	1951	3	体　育	
Yuan, Chwen-gi	女	1948	1951	3	生　物	
Chan, Shih-ying	女	1949	1950	1		乡村服务工作
Chao, Sung-chiao	女	1949	1950	1	地　理	
Chen, Gin-hwa	女	1949	1950	1		儿童福利中心
Chen, Nelson	女	1949	1950	1	音　乐	
Chu, Ning-hsu	女	1949	1950	1	地　理	
Gi, Cheng-hwa	女	1949	1950	1		乡村服务工作
Gung, Chi-chang	男	1949	1950	1	教　育	
Hsieh, Si-en 谢锡恩	男	1949	1950	1	音　乐	
Tsao, An-Ho 曹安和	女	1949	1950	1	音　乐	
Yang, Ling-liu 杨荫浏	男	1949	1950	1	音　乐	
Chen, Min-dji	男	1949	1951	2	哲　学	
Chen, Yuh-ren	女	1949	1951	2	中　文	儿童福利中心

续　表

姓　　名	性 别	到 校 时 间	离 校 时 间	在 校 时 间	任教系别（科目）	备　　注
Chien, Chieh-hua	女	1949	1951	2	社　会	
Fan, Ting-chiu	男	1949	1951	2	社　会	
Ho, Ru	男	1949	1951	2	英　文	
Ho, Yung-djen	女	1949	1951	2	家　政	
Hung, Yuh-fang	女	1949	1951	2		儿童福利中心
Hwang, Wen-hao	女	1949	1951	2	家　政	
Hwang, You-kwei 黄友葵(※)	女	1949	1951	2	音　乐	
Liu, Ai-lien	女	1949	1951	2		儿童福利中心
Lu, Shwang	女	1949	1951	2	体　育	
Tang, Dzo-djang	女	1949	1951	2		乡村服务工作
Wang, Ai-li 汪爱丽(※)	女	1949	1951	2		儿童福利中心
Wang, Ming-seng 王明生(※)	女	1949	1951	2		儿童福利中心
Yang, Sih-chwen	女	1949	1951	2		乡村服务工作
Yin, Yun-hwa	女	1949	1951	2		儿童福利中心

续　表

姓　　名	性 别	到 校 时 间	离 校 时 间	在 校 时 间	任教系别（科目）	备　　注
Chang，Shi-luh	男	1950	1951	1	中　文	
Chien，An-chi 钱安琪(※)	女	1950	1951	1	英　文	
Chu，You-an	男	1950	1951	1	社　会	
Djang，Djeng-bao	女	1950	1951	1	化　学	
Djou，Deh-san 邹德珊(※)	女	1950	1951	1	中　文	儿童福利中心
Hung，Hwan-chwen	男	1950	1951	1	历　史	
Hwang，Shui-lung 黄瑞农(※)	女	1950	1951	1	地　理	
Kao，Wen-yuen 高文源	男	1950	1951	1	英　文	
Ko，Yuin-san	女	1950	1951	1	化　学	
Ku，Tien-tsu	女	1950	1951	1	音　乐	
Li，Chia-lua 李嘉禄	男	1950	1951	1	音　乐	
LYing，Teh-shan	男	1950	1951	1	英　文	
Mao，Ming-dju 毛敏诸(※)	女	1950	1951	1	家　政	
Peng，Shi-ko 彭世珂(※)	女	1950	1951	1	化　学	

续　表

姓　名	性别	到校时间	离校时间	在校时间	任教系别（科目）	备　注
Shih, Hsi-ming 石西民	男	1950	1951	1	哲　学	
Siao, Gia-ling 萧喜玲	女	1950	1951	1	体　育	
Tang, Ding-yu	男	1950	1951	1	历　史	
Wang, Bing-yang	男	1950	1951	1	中　文	
Wen, Ko-cheng 温可铮	男	1950	1951	1	音　乐	
Wu, Hung-sen	男	1950	1951	1	英　文	

2. 金女大外国教师名录 （1915—1951）

姓　名	到校时间	离校时间	在校时间	任教科目	备　注
Goucher, Elizabeth E.	1914	1920	6	英　文	图书馆
	1930	1932	2		（1930—1932）
Mead, Frederica R.	1914	1923	9	英　文	系主任
Nourse, Mary A.	1915	1919	4	历史、心理	
Nicolls, Lottie Lee	1916	1917	1	化学、经济	
Rivenburg, Narola E. 芮伯格	1916	1921	5	宗　教	
Shipley, Mary 薛浦来	1917	1919	2	英文、历史	
Brown, Lydia B. 菲蒂亚·布朗	1917	1920	3	音　乐	
Reeves, Cora D. 黎富思	1917	1941	24	生　物	系主任
Chester, Ruth M. 蔡路得	1917	1951	34	化　学	系主任教务长（1939—1949）
Griest, Rebecca W.	1919	1927	8	英文、历史	历史系主任
Vautrin, Minnie 华群	1919	1941	22	教　育	系主任
Robbins, Lilliath M. 饶品思	1920	1923	3	英　文	
Butler, Alice L. 爱丽斯·布特勒	1920	1925	5	心　理	系主任
McCoy, Helen Y. M. 海伦·麦克科伊	1920	1925	5	物　理	系主任
Wilson, Helen	1921	1922	1	音　乐	

续 表

<table>
<tr><th>姓　　名</th><th>到校时间</th><th>离校时间</th><th>在校时间</th><th>任教科目</th><th>备　　注</th></tr>
<tr><td>Rawles, Katharine</td><td>1921</td><td>1923</td><td>2</td><td>体育、卫生</td><td></td></tr>
<tr><td>Watkins, Janie H.</td><td>1921</td><td>1923</td><td>2</td><td>历　史</td><td>系主任</td></tr>
<tr><td>Hanawalt, Ella M.</td><td>1921</td><td>1928</td><td>7</td><td>教　育</td><td>系主任</td></tr>
<tr><td>Ewing, Marian</td><td>1922</td><td>1923</td><td>1</td><td>英　文</td><td>图书馆</td></tr>
<tr><td>Stendel, Dorothy</td><td>1922</td><td>1923</td><td>1</td><td>英　文</td><td></td></tr>
<tr><td>Grabill, Ada A.</td><td>1922</td><td>1928</td><td>6</td><td>音　乐</td><td>短期系主任</td></tr>
<tr><td>Cook, Ellen P.</td><td>1923</td><td>1924</td><td>1</td><td>化　学</td><td></td></tr>
<tr><td>Corbett, Virhinia M.</td><td>1923</td><td>1924</td><td>1</td><td>英文、历史</td><td></td></tr>
<tr><td>Wild, Laura H.</td><td>1923</td><td>1924</td><td>1</td><td>宗　教</td><td></td></tr>
<tr><td>Wood, Norman A.【男】</td><td>1923</td><td>1924</td><td>1</td><td>生　物</td><td></td></tr>
<tr><td>Carncross, Flora M.</td><td>1923</td><td>1925</td><td>2</td><td>英　文</td><td></td></tr>
<tr><td>Clark, Anna R.</td><td>1923</td><td>1925</td><td>2</td><td>数　学</td><td></td></tr>
<tr><td>Tayer, Mary V.</td><td>1923</td><td>1925</td><td>2</td><td>生　物</td><td></td></tr>
<tr><td>Wood, Edna</td><td>1923</td><td>1926</td><td>3</td><td>英　文</td><td></td></tr>
<tr><td rowspan="2">Case, Emily I.</td><td>1923</td><td>1927</td><td>4</td><td rowspan="2">体　育</td><td rowspan="2">系主任
(1929—1932)</td></tr>
<tr><td>1929</td><td>1932</td><td>3</td></tr>
<tr><td rowspan="2">Treudley, Mary B.</td><td>1923</td><td>1928</td><td>5</td><td rowspan="2">社会、经济</td><td rowspan="2">社会系主任
(1946—1947)</td></tr>
<tr><td>1946</td><td>1947</td><td>1</td></tr>
<tr><td>Spicer, Eva D.
师以法</td><td>1923</td><td>1951</td><td>28</td><td>历史、宗教</td><td>系主任</td></tr>
</table>

续　表

姓　　名	到校时间	离校时间	在校时间	任教科目	备　　注
Downes, Helen R.	1924	1924	0	化　学	
Black, Ethel M.	1924	1925	1	教育、心理学	
Chapin, Mrs. Robert C.	1924	1925	1	英　文	
Gibson, Deborah M.	1924	1925	1	化　学	
Jervis, Norah Pankes	1924	1925	1	体　育	
Wood, Irving【男】	1924	1925	1	宗　教	
Whitmer, Harriet E. 惠迪曼	1924	1948	24	生　物	一年系主任
Cook, Mary M.	1925	1926	1	英　文	
Darrow, Alice C.	1925	1926	1	心理学	
Sprague, Florence	1925	1926	1	历　史	
Loos, Esther M.	1925	1927	2	英文、历史	
Hackett, Martha N.	1925	1928	3	卫生学、体育	校医
Buse, Alpha B.	1925	1929	4	英　文	短期系主任
Barber, J. Minnette	1926	1927	1	英　文	
Griffing, Burgoyne	1926	1927	1	物　理	

续 表

姓　　名	到校时间	离校时间	在校时间	任教科目	备　　注
Jones, Ernest V.【男】	1926	1927	1	化　学	
Andrews, Margaret	1926	1929	3	体　育	
Cogswell, Harriet M.	1926	1932	6	英　文	
Koo, Ellen Y. T.	1926	1938	12	音　乐	
	1946	1947	1		
Sutherland, Catharine E. 苏德兰	1926	1945	19	音　乐	系主任
Fosdick, Edith W.	1928	1929	1	历史、社会	
Walmsley, Evelyn M.	1928	1929	1	英　文	
	1945	1948	3		
Warren, Julia G.	1928	1931	3	英　文	
Ma, Madame Yu-guin	1929	1932	3	法　文	
Tappert, Eather E.	1929	1937	8	英　文	
Tappert, Esther E. 戴爱士	1929	1937	8	英　文	系主任
Zimmermann, Frau	1930	1932	2	德　文	
Mossman, Mereb E.	1930	1937	7	社　会	系主任
Scharle, Margaret E.	1931	1932	1	音　乐	

续 表

姓　名	到校时间	离校时间	在校时间	任教科目	备　注
Wool, Swain【男】	1931	1932	1	经　济	
Carl, Catherine C.	1931	1935	4	音　乐	
Bond, Kathleen L.	1931	1936	5	音　乐	
Hoffsommer, Abigail	1931	1936	5	英　文	
MacKensie, Rachel M.	1932	1933	1	英　文	
Rueff, Ilse, Frau	1932	1935	3	德　文	
Kirk, Florence A. 克馥兰	1932	1950	18	英　文	
Werner, Emily J.	1933	1935	2	宗教、教育	
Gale, Aili S.	1933	1937	4	体　育	
Haight, Edith C.	1933	1937	4	体　育	
	1947	1948	1		
Hall, Chrristine	1934	1935	1	英　文	
Graves, Stella Marie 葛星丽	1934	1948	14	音　乐	
Thompson, Margaret C.	1935	1936	1	英　文	
Huseman, Mrs. Katrin	1935	1937	2	人类学	
Rhead, Mabel Rose	1936	1937	1	音　乐	

续 表

姓 名	到校时间	离校时间	在校时间	任教科目	备 注
Shoup, Louise	1936	1937	1	英 文	
Schutze, Katherine	1938	1940	2	英 文	
Chong, Alice	1938	1943	5	英 文	
Highbaugh, Iram M.	1939	1941	2	乡村服务	
Rhodes, Esther	1940	1941	1	音 乐	
Settemeyer, Alice	1940	1943	3	英 文	
Okes, Imogene	1940	1947	7	家 政	
Myer, Mrs. Paul	1941	1942	1	英 文	
Longman, Perle	1941	1943	2	英 文	
Lambertn, Mary	1941	1945	4	英 文	
Graham, David	1942	1943	1	地理、社会	
Van Kirk, Ruth	1942	1943	1	英 文	
Shannon, Winifred	1942	1944	2	家 政	
Whittington, Harry B.	1942	1945	3	地 理	
Whittington, Dorothy A.	1942	1945	3	自然科学	校长秘书
Causer, Marjory 柯曼寿	1942	1951	9	英文、生物	生物系主任
Montel, Pere	1944	1944	0	法 文	

续 表

姓　名	到校时间	离校时间	在校时间	任教科目	备　注
Dow，Margaret	1944	1945	1	音　乐	
Porter，Mrs. Robert	1944	1945	1	英　文	
Adler，Mrs. Dorothy R.	1946	1948	2	英文、经济学	
Fitzgerald，Mrs. C. P.	1946	1948	2	英　文	
Powell，Mrs. Ralph L.	1946	1948	2	英　文	
Galpin，Audsey	1947	1948	1	英　文	
Gridley，Mrs.	1947	1948	1	英　文	
Kruse，Mrs. Auguste	1947	1948	1	英　文	
Livingston，Mrs. Chancellor	1947	1948	1	音　乐	
Shipley，Mary B.	1947	1949	2	英文、历史	
Reed，Mary Frances 芮玉德	1947	1950	3	家　政	系主任
Feng Paul【男】	1947	1948	1	英　文	
Butler，Rosa M. 白露梅	1948	1950	2	音　乐	系主任
McCurdy，Eleanor W.	1948	1950	2	英　文	秘　书
Ferris，Helen	1948	1951	3	社　会	
Roy，Andrew T.	1949	1951	2	宗　教	

续 表

姓　名	到校时间	离校时间	在校时间	任教科目	备　注
Russel, Mary K.	1949	1951	2	家政	
Angell, Floorence A.					
Bennett, Nancy					
McElwain, Mary B.					
Sullivan, Michael					
Sweeny, Mary					
Wright, Harriet B.					

附录三　金女大历届毕业学生名单 (1919—1951届)

本　科

1919 刘剑秋
任　倬
汤蕙菁
徐亦蓁
吴贻芳
1920 金桂琴
林德志
陈美愉(美玉)
冯贤贞
郝映青
胡美丽
李　潽
倪雪梅
1921 陈美愉
周瑜瀛
居　芳
刘儒珍
刘文庄
聂纯瑜
吴懋诚
杨竞学
严彩韵
喻昌凤
1922 彭亚粹
贝馥如
朱　骊
范承杰
姜德余
黄孟姒
黄友黻
廖翠娇
汤汉志
陶善敏
1923 阮宜贞
常恩崇
陈竹君
江若昭
何昌琪
黄文玉
孙芝淑
魏修徵
邬静怡
邬明英
1924 包志立
陈德光
陈锦娥
陈美珍
程维德
朱钰宝
钟贤英
夏淑贞

王梅娥
严莲韵
1925 李寇芳
梁奋修
刘艾贞(珍)
鲍富年
陈　慧
邓裕志
朱　激
江珊英
刘碧如
刘恩兰
刘颖宝
刘蓉士
毛彦文
杨宝瑜
叶德和
1926 陈正融
袁慎言
宋玉德
陈菊芗
邓裕芝
张佩箴
张肖梅
张肖松
赵铁枚
周富黎
朱懿珠
朱穆慈
金文瑞
李泽珍
鲁桂珍
田璀宝
徐多嘉
王淑禧
吴贻荃
喻(俞)恩梅
1927 茅纯玉
陈德贞
陈　式
邱丽英
张才茂
朱慧珍
孔贝玺
黄友葵
谢文莲
黄丽明
蔡　葵
钱逸云
徐亚英
徐绍德
王家玮
王秀兰
王耀云
杨效让
1928 陈品芝
汤洵美
陈玉珍
陈永光
程亦明
程　陶
张芗兰
范　琯
顾味真
何昌麟
李佩兰

鲁淑英
马德英
毛韵南
沈文玉
宋竞英
孙恩莲
汤铭新
徐德华
吴懋仪
杨清心
1929　李子诚
陈信美(杏梅)
陈世英
丁彩莲
钟鉴耀
房精粹
高仁英
黄宝玉
李郁文
林福美
刘宝珠
刘葆英
刘忠信
刘美丽
刘玉霞
邵秀林
沈祖英
孙宝华
司徒惠常
曾　肃
邬亚玉
崔亚兰
吴学勤
杨璿熙
姚颖秀
虞舜华
1930　陈　铎
陈越梅
陈韵兰
周淑媛
朱美玉
江淑英
顾家灏
何怡贞
何荣贞
许兆椵
蓝乾蔚
李卓婖
廖宝和
潘学玲
邵锦绣
谢纬鹏
徐寿珍
徐秀英
杨爱德
1931　陈梅卿
陈琬贞
陈文耀
诚恩兹
张全平
杜宇飞
李　祁
李冠媛
李美云
林先和
聂重恩

谢文梅
吴秀英
杨爱梅
杨寿徵
余琼芝
喻德甄
1932 陈维暄
毕镐英
陈简卿
陈秀贞
程爱德
张闺齐
朱悱初
朱诔贤
钟励端
左敬如
葛益娟
黄世明
黄俊美
黄续汉
李惠源
刘家琦
罗爱珍
陆　琮
施葆真
帅滇贞
孙家琳
谭　蘩
吴爱娟
尹德邻
余秀平
郁采蘩
1933 周　铭

陈快恩
石甘霖
陈岭梅
陈素贞
张蔼臻
张汉秋
周宜一
朱玉凤
杜丽云
顾培恰
胡秀英
黄宝璇
黄振庄
黄琼琚
黄立民
蓝乾碧
李子真
梁菊英
梁韵秋
柳慎耳
廖奉洁
雷幼玑
梅江兰
宁世德
潘粹英
司徒美媛
蔡德粹
王仁慈
吴柳琪
吴淑琴
姚艾樱
叶雅珍
尤好德

　　余和鸾
1934　贾金华
　　杨玉华
　　章德卫
　　陈　志
　　张琼英
　　章曼钰
　　章秀杰
　　周　易
　　朱觉方
　　蒋秀珠
　　郭恩锡
　　何秀俊
　　何无瑕
　　胡志珍
　　胡惜苍
　　洪达瑛
　　李明珍
　　林玉文
　　刘美珠
　　卢育宝
　　翁闺秀
　　萧　肃
　　孙如砥
　　蔡秀凤
　　徐幼芝
　　吴惠士
　　叶同璋
　　游　戬
1935　唐圣英
　　文丽英
　　陈国瑜
　　陈兰英
　　陈品菱
　　成　锦
　　张琇珍
　　查月巧
　　蒋新宝
　　许兆标
　　黄德馨
　　黄智伟
　　黄红庆
　　李英华
　　李闺贞
　　李季明
　　梁清颜
　　刘子毅
　　刘祖佳
　　刘淑元
　　马　骏
　　翁辉兰
　　沈季玉
　　宋竞雄
　　孙大焞
　　司徒珠
　　汤一雯
　　钱　霖
　　王应安
　　王鸿珠
　　吴瑞霞
　　虞克由
　　俞霭凤
1936　陈世棕
　　赵式群
　　朱巧贞
　　朱漱梅

	左犹麟	詹宝球
	左景福	张自厚
	傅华卿	章映芬
	富顺寿	张钰堂
	高　棪	郑美瑛
	姜秀芳	周建华
	韩效成	朱梅先
	胡亚兰	朱月珊
	黄秀清	杜荣三
	李葆贞	冯美齐
	李惠廉	高季容
	凌宝珩	何玉贞
	刘静和	胡秀梅
	刘自静	黄　杼
	刘廷仪	黄敏婵
	林弥励	黄　楠
	骆美芝	柯俊杰
	吕锦瑗	李明珠
	慕淑琴	廖家仪
	宋宝爱	刘葆华
	宋竞奇	刘宗芳
	岑礼明	刘佩金
	徐洽方	罗慧珠
	王镜清	钮幼华
	王瀛因	潘孝明
	吴秉文	余馥绵
	吴惠英	沈维瑜
	吴敏卿	谢文息
	吴璇仪	谢云英
	杨芰芗	须毓筹
1937	迟尚德	孙淑铨
	邓翠琳	徐芝秀
	瞿宗沛	崔可石

崔亚汉
杨 怨
杨丽林
1938 葛西祯
郭 霞
陈 娴
陈洪济
陈素馨
陈霞影
陈元贞
陈玉文
程美德
张秀芝
朱恩贞
杜端淑
段蓉贞
奚慕权
夏芝蓉
侯婉如
林小华
力伯师
刘葆德
陆时勤
彭大惠
徐远辉
谢芳蓉
钱淞英
魏定宜
温欢畅
姚云仙
尹金珠
俞志英
吴 宁

1939 安仁慈
陈复和
陈 敏
陈元之
张莹华
周纪馨
朱 绮
朱瑞珠
方颖保
冯家雯
冯百齐
计德容
顾 华
邢漪珍
孔宝定
李秉真
刘臻瑞
刘华屏
刘寿珍
刘湘秀
骆佩芬
卢宝媛
马必宁
潘蒲迁
蒲淑珍
沈 谱
萧鼎瑛
宋 彬
陶 庸
蔡子固
蔡淑美
崔德贞
汪 镇

	魏贞梓
	文运坤
	杨二娟
	金仪瀛
1940	张涵芬
	朱惠华
	黄凤秋
	金丽华
	康　彤
	卢敏章
	潘纫秋
	蔡淑娜
	王镇英
	王海澄
	王民英
	温同庚
	杨爱莲
	殷德徽
1941	陈懿贞
	陈玉清
	程卓如
	张瑞基
	张素芳
	赵秀琴
	赵荣恩
	方文娟
	方荣渠
	景荷荪
	熊亚拿
	洪达琳
	刘志新
	刘楚兰
	刘开荣
	马幼美
	潘耀瑔
	邵士慧
	束延男
	杨锦锺
	杨瑞如
	殷恭敏
	殷姗姑
1942	吕启芬
	车淑凤
	程渊如
	乔玉润
	张学贞
	张才义
	章　珏
	邓秉彝
	周桂丽
	贺仁怀
	向恕人
	熊菊贞
	黄敏芝
	黄宜君
	黄维瑾
	黄燕华
	刘兆果
	陆承和
	吕慰庭
	龙襄文
	沈佩兰
	孙恩兰
	谭翠荣
	王碧霞
	王　劭

吴吉临
严筱湄
1943 张丽锦
张雪瑛
张淑疆
张淑懿
段学谦
高玉华
江昌运
金淑妹
桂琼英
郭兆平
何洁玉
熊满真
黄芝秀
邝永平
李保真
李福生
李季谋
李杰灵
李慧明
凌佩芬
刘闲秋
雷君嫦
莫瑞兰
潘其容
彭洪福
束喜多
谢文英
田清心
曾璧华
曾淑昭
钱　瑛
伍重华
吴丽云
阎伯筠
1944 陈　栖
但功洁
但功泰
邓振美
张华徽
张弈美
张敏华
张先梅
张咏雩
赵韵香
朱仲英
朱凤俦
方淑梅
傅慧英
夏郑安
胡光荣
鲜于明义
黄慕龄
黄问孟
李显宜
李彦如
林崇正
林志玉
刘洁宇
刘希孟
刘沐兰
刘瑞芝
欧阳清
彭启结
沈　积

沈　檠
谢咸杰
谭美玉
唐心芝
王怀瑜
文忠英
杨知行
姚永华
喻娴才
周寿敏
1945 陈馥英
陈家蕙
陈少芳
程淑雪
张之芬
张坤元
张秋衡
周季南
祝爱莲
方巍英
江国英
金舜华
许文琰
胡兰芳
胡良成
黄瑜昌
梁影霞
陆景卫
聂　宛
沈韫珍
孙德芳
徐志英
魏经淑
魏厚农
吴德华
吴慎娴
杨蕙英
严少仪
1946 陈书樵
成嘉祜
丁泽馨
张碧渠
张瑞祥
张玉如
张秀蓉
朱婉坚
祝引璇
蒋仲蘅
蒋郁文
董逸然
计瑞兰
简宜第
黄巧瑜
黄吟诗
黎昭琪
李锺英
利翰芬
李淑莹
郑咏梅
凌佩馨
陆秀清
孟海雄
彭守权
冉隆淑
任佩玉
胥恪修

孙雁征
唐安贞
唐岱娣
徐元明
万　芬
王安珍
王治群
吴秉亨
叶至美
俞连珠
1947 常丽华
陈　诒
张凤雅
张秀蓉
张继平
张妙绘
张树英
张婉琼
赵稚英
朱继玉
祝友莲
杜永芳
冯谨芳
傅　玲
高思聪
简玉蘅
金王璠
关颖谦
炎云凤
郭栉恩
郭开菊
霍群英
夏慧安
胡也惠
黄芝聪
黄淑华
黄友莲
邝耀文
赖淑颖
李德祥
李德麟
李正兰
李筱燕
李丽莲
李淑玢
李谆兰
林崇直
林静好
林月端
凌崇英
刘爱莲
刘长兰
刘义馨
吕文镜
雷安美
欧淑娴
庞静华
邵一德
沈颂蔚
舒玉仙
苏先勗
薛德裕
蔡慧灵
蔡秀灵
曹桂芝
邓德珊

钱琴官
秦志俊
王侠飞
王淑静
邬鹤琴
王淑蕴
杨文元
叶静苑
晏章沅
余庆民
袁硕禾
衣复新
罗爱梅
1948 包兰梅
陈恩明
陈岭梅
陈伟真
邱复淑
张敏言
张尚琼
张筱燕
郑锦先
朱尊华
董车真
龚达文
何庆华
焦美琏
胡翠花
黄瑞农
劳淑德
李德懿
李念富
李美生

黎世清
李文郁
林建义
刘德芳
刘翼文
刘　琳
刘湘婉
罗怀玉
吕彩锦
马雪如
茅於冬
梅光耀
梅若兰
梅远宏
谢迎娟
孙书蓉
唐冠敏
曹婉如
钱安琪
戚继兰
徐宝芬
童志凤
王长春
王金荣
王开云
汪　宓
王晴华
吴玉清
杨传冰
尹道英
杨清玉
余海兴
袁爱莲

源世玑
郁　桦
荣蕊华
1949　陈安全
张孝景
周本莹
左德芬
范桂兰
熊振坤
洪有纨
黄龙西
黄文奥
李家玉
李松龄
骆明仁
庞屏阁
薛民澂
曾训美
徐曜萱
仝月澳
蔡翠英
汪爱丽
王明生
王月芬
杨民革
1950　鲍蕙荪
白秀珍
陈芷华
陈尚璆
陈士菊
邱景华
周淑芬
董君逸
段淑贞
冯灼华
皇甫玉珊
李敏芬
林景华
刘增康
楼雪明
马霭如
毛敏诸
倪振家
彭世珂
沈月娥
盛昆岚
盛明珠
萧嘉玲
孙家馨
孙荷居
陶　津
唐美德
钱崇澈
徐克之
佟树珍
汪安琳
王其曼
吴祖畦
严　复
严乐善
俞人佳
1951　陈永(冰)
达苑华
张琼芳
张国英
张慧中

张文潜
张玉芳
郑馨泉
郑　璞
朱清华
朱文曼
冯明玉
许水清
须沁华
华　平
李宝云
李绮菱
李振坤
李文辉
凌畹君
刘蕙英
刘佩兰
刘幼兰
陆　源
马逢宣
马光玮
马绮琦
欧阳珍
彭世理
史慧中
陶其媺
曹　怡
汪寿宝
温　端
吴保珑
叶韵文

体育简易科

1930 乔明绪
张珍宝
张平令
赵兰珍
郑纯洁
周晋逵
朱永芳
何运华
许安珍
胡美德
洪佩铭
黄郁英
洪彩娇
李俊秀
李　灏
李铭卿
林茂修
林雅琴
骆美德
翁无瑕
谢美鹃
宋毓荣
曹德智
王莲香
王美英
王韵琴
吴有榕
杨福德
杨尉芳
余淑琪

体育专修科

1932　金文观
　　　李怀荣
　　　刘福同
　　　孙淑铨
　　　陶立华
　　　温豫仙
　　　叶兴挺
　　　虞克由
1934　章映芬
　　　谭翠荣
　　　杨丽蓉
1935　赵蕴华
　　　范家敏
　　　黄宝莲
　　　黄振折
　　　李秀兰
　　　萧美英
　　　沈韫珍
　　　谭声靖
　　　曹紫云
　　　丘楚卿
　　　王俊卿
　　　叶剑中
　　　于凤章
　　　袁成森
1937　陆吕衡
　　　陈思行
　　　朱宝华
　　　周载芬
　　　金绍庭
　　　李志清
1940　萧琏辉
　　　钱淑华
1941　丁宝翠
　　　蒋美珍
　　　冯秀华
　　　冷松琴
1943　易遵卉
　　　林月蓉
　　　沈菁莹
1944　黄可蓉
　　　王月湘
　　　于素琴
1945　李恩生
　　　唐明珍
　　　王小慧
1946　程乃立
　　　张灿君
　　　胡　珉
　　　潘婉廉
1948　陈庆怀
　　　张素央
　　　刘　惠
　　　乐莲琴
　　　刘寿瑛
　　　舒兴达
　　　王湘贞
1949　曲超云
　　　赵宗冀
　　　顾　海
　　　靳荣裕
　　　鲜继平
　　　唐作璋
　　　王兆敏
1951　陈德龄

周慧珍
周人理
符孟雄
何宗贻
晏尔琦
晏尔坤
阮金凤
邵平心

托儿工作专修科

1951 鲍贤琨
张济贞
章光瑜
郭鸿英
林敏梅

龙叔缇
沙孝惠
邹德珠
王丽纯
叶艾生

其　他

禤丽慈
杜隆元
吕秀珍
朱玉兰
陈菊如
林华颜
姚曼云
吕迺英

注：原件藏南京师范大学档案馆，该名单计有995人。

附录四　金女大毕业生系科人数统计表(1919—1951)

系科 级别	本科																					专修科		合计
	文科	理科	中文	英文	历史	社会	经济	政治	哲学	宗教	音乐	体育	数理	数学	物理	化学	生物	地理	家政	医预科	护预科	小计	体育	托儿工作	
1919	2	3																				5			5
1920	3	5																				8			8
1921	4	6																				10			10
1922	4	6																				10			10
1923	4	6																				10			10
1924	5	5																				10			10
1925	10	5																				15			15
1926	13	7																				20			20
1927				2	1	2						3	3			1	4			2		18			18
1928					3	5					1	2	3			1	6					21			21
1929				2	1	6				1	1	5	2			1	5			2		26			26
1930			3		1	3						2	2			1	5			2		19	30		49
1931				2	2	2	1		1			4	1			1	3			1		18			18
1932			2		3	5			4		1	3	2				2			2		26 (24)	8		34
1933			1	2	3	8	5	1	2		1	2		2			5			2		36 (34)			36
1934			1	5	1	5	4	1			2	2		4		2	4					29 (30)	3		32
1935			2	3	2	8	3	1	1		1	1		2		4	2			2	3	33 (35)	14		47
1936			4	2	2	6	1		1		1	3	1			4	5	2			1	34 +1			35
1937			5	4	4	6			1			7			2	6	2	1		2	2	42	6		48
1938			3	2	1	5					1	2				6	5	4			6	35			35
1939			2		2	12					3	3		1	1	4	6	3				37			37
1940			2	1		3			2		1	2				2	2					15	2		17
1941			2	7		2					3	1				5	3					23	4		27

续 表

系科 / 级别	本科																						专修科		合计
	文科	理科	中文	英文	历史	社会	经济	政治	哲学	宗教	音乐	体育	数理	数学	物理	化学	生物	地理	家政	医预科	护预科	小计	体育	托儿工作	
1942			1	3	1	3					4	3	2			1	3	1	4		1	27			27
1943			3	4	2	8					3	1				2	2		7		2	34	3		37
1944			2	8	5	11					1	1	2			3	4		2			39	3		42
1945				1	2	10					3	1				6		2	6			31	3		34
1946			4	1	4	19					3					2			4			37	4		41
1947			2	3	9	23					6	1				7	3	1	12		1	68			68
1948			5	5	7	19					4	1				2	2	4	7			56	7		63
1949				1	3	8					2					3		1	4			22	7		29
1950			1	5	2	10					5	2				3	2	1	3	1	1	36			36
1951			2	7	2	14				·	3					4			5			37	9	10	56
合计	45	43	47	70	63	203	14	3	12	1	50	52	18	9	3	71	75	20	54	16	17	887	103		1 000

说明：1930 年上海体育学校合并到金女大，有 30 名体育学生为简易科。社会学含社会工作专业（1951—1952 年社会工作专业代替了社会学专业）。英文为“英国语文”简称，其中也包含了外国语文专业。另，1936 年有一学生毕业时没有专业。

材料来源：吴贻芳著《金女大四十年》，载《吴贻芳纪念集》，第 109 页，江苏教育出版社，1987 年。

附录五 金女大大事记①

1912 年

1911 年冬至 1912 年初，因江浙沪一带英美教会因创办的女子中学日臻发达，但请不到中国籍女教师，而且女中毕业生无升学场所，为此美国八个传教会——南美的长老会、北美的长老会，南美的卫理公会、北美的卫理公会、南美的浸礼会、北美的浸礼会、基督门徒会、圣公会的女子中学校长在上海集会商讨解决办法。会议通过在长江流域组建一所女子联合大学的计划，并向正在这个地区工作的传教士们发出倡议。

1913 年

夏，美国北长老会、南卫理公会、北卫理公会、北浸礼会、基督会等教会组织对上述倡议作出积极响应，每个教会选派三人组成校董会。德本康夫人（Mrs. Lawrence Thurston)是北长老会在新大学的代表。

11 月 13 日，校董会根据临时章程，推举德本康夫人为新大学的首任校长。校董会还决定新大学的校址选在南京。

1914 年

4 月 17 日，教会行政委员会会议报告中，以金陵女子大学的名称，取代扬子江流域女子联合大学的名称。

11 月，学校的管理委员会成立。管理委员会正式通过金陵女子大学的校名，并任命 3 名女士与德本康夫人一起筹建女子大学。管委会批准金女大固定资产预算 3 930 元(2 元兑换 1 美元)、流动资金 14 427 元、学费确定 100 元。5 个教会提供 5 位教师的薪金及 6 000 元的日常费用，两项预算合计约 9 000 元。管委会明确学生入学条件：必须修完高中语文、英语、数学、科学、历史和宗教的全部课程。与管委会同时成立的还有临时的校舍委员会、土地委员会、建筑委员会、公共设施

① 本大事记由孙海英教授提供，有改动。

委员会等。

1915 年

春，租赁南京城南绣花巷李鸿章小儿子的住宅为临时学校所在地。

4 月，维修绣花巷的李氏住宅，将其改造成校舍。

9 月 17 日，学校正式开学，招收新生 11 名。教职员工 9 人，其中专任 7 人，兼任 2 人。6 名教师中，美国籍教师 4 名，中国籍教师 2 名。教学设备有普通化学实验室 1 间，钢琴 2 架。图书室藏书主要是《大英百科全书》，约 40 册，教科书全部采用英美大学的课本。

1916 年

春，金女大的永久校址选在南京陶谷，位于金陵大学的东南面。

3 月，学校成立基督教女青年会，有正、副会长和秘书。

9 月，招收新生不满 20 人。学校实行导师制。

11 月，芮伯格小姐到校任宗教课教师。曹丽韫到校任医生负责学生健康，并讲授卫生课。

同年，美国马萨诸塞州施密斯女子大学与金女大结为姐妹学校，该校学生及同学会捐献一部分经费给金女大。

1917 年

2 月，基督教女青年会创办半日制学校。

9 月，招收新生 17 人。秋，蔡路得小姐到校任化学课教师，黎富恩小姐到校任生物课教师。薛浦来小姐到校任历史课教师。莉蒂亚・布朗小姐到校任音乐课教师和合唱团指挥。

11 月 17 日，德本康夫人在“创始人节”上宣布金女大的校色为紫色和白色。

1918 年

9 月，招收新生 21 人。全校共计拥有 4 个年级学生，人数达 52 人。

秋，宫特拉赫小姐（Miss Adelaide Guandlach）到校，专职管理教务和注册工作。L. W. 米娜小姐到校，负责学院的身体健康指导和内科医生工作。

1919 年

3 月 14 日，经学校批准，成立学生自治会。

6 月 2 日，北京的五四运动波及到南京，学校学生自治会负责人吴贻芳、徐亦蓁带领全校 50 余名学生，走上街头，参加反对北洋军阀政府卖国投降的斗争。金女大的教员也积极写文章，写通讯，向国外宣传中国学生的爱国运动。

6 月 25 日举行首届学生毕业典礼。首届毕业生共 5 人，其中文科 2 人，理科 3 人，吴贻芳、徐亦蓁均为首届毕业生。

6 月，在陶谷校址，校长德本康夫人和建筑师享利・K. 茂斐先生(Mr. Henry Killam Murphy)为新建筑打桩，划定楼群的四方界址。

6 月，金女大确定校训、校歌、校徽、校色。

校训——厚生。

校歌——据美国一首歌改编，内容为对金女大的歌颂。

校色——第一届第一班的班色——紫色。

7 月，校长德本康夫人赴美国为新校舍筹集经费，直到 1921 年 2 月回校。

夏，华群小姐(Miss Minnie Vautrin)任代理校长。

9 月，招收新生 70 人。

10 月，尼比卡・格里斯特(Rebecca Griest)到校任英语课和历史课教师。

同年，美国纽约州大学委员会认为金女大学生成绩优良，所受教育程度与美国各大学相符，核准立案，授予学位。同时，设在美国纽约的金陵大学托事部内的金陵女子大学托事部，获得美国纽约州大学对金女大学士学位的认可，在金女大获得学士学位的毕业生可以不经考试直接进入美国大学的研究院深造，攻读硕士学位。

1920 年

6 月，第二届(1916 级)学生毕业。毕业生共 8 人，其中文科 3 人，理科 5 人。

9 月，招收新生 52 人。

同年，爱丽斯・布特勒小姐(Alice Butler)到校任心理学课教师，海伦・麦克科伊小姐(Helen Mccoy)到校任物理课教师，丽莉亚・诺宾斯(Lilliath Robbins)小姐到校任英语课教师。教职员达 16 人，中国籍教师 5 人，负责中文、音乐、体育教学工作；美国籍教师 6 人，负责生物、教育、英语、历史、物理、数学、心理学、宗教课程。

1921 年

2 月，校长德本康夫人由美国返回学校。她在皮波迪夫人发动的为亚洲七所女子大学捐款的运动中，获得 60 万美元。

6 月，第三届（1917 级）学生毕业。毕业生共 10 人，其中文科 4 人，理科 6 人。

7 月 4 日，新校舍的施工合同正式签署。建筑材料运到工地。工程督造开始。这是中国基督教大学历史上最大的校园楼群之一。

9 月，招收新生 70 人。校长德本康夫人参加中国基督教大学联合会对中国基督教高等教育状况的调查。调查内容包括教职员、学生、课程及经费等方面，历时 4 个多月，调查了中国 36 所城市近 500 所学校。

同年，2 名美国人加入教师行列：一人任教育学课教师，一人任体育课教师。

1922 年

6 月，第四届（1918 级）学生毕业。毕业生共 10 人，其中文科 4 人，理科 6 人。

8 月，金女大对毕业生的去向作了统计。1919—1922 年的 4 届毕业生共 33 人，其中赴美深造，获硕士、博士，医学博士学位者达 20 人。

同年，为陶谷新校园建设运送物资进出的方便，金女大自己花钱修筑了一条马路。这条马路直至 1929 年在南京城内仍是最好的公路之一。在宁海路建成北院一、二、三号楼，面积为 344 平方米。阿达·戈拉比尔小姐（Ada Grabill）到校，任音乐课教师。简涅·H. 瓦特金（Janie Herring Watkins）到校任历史课教师。另有两位小姐来金女大分别担任图书馆馆员和秘书。

1923 年

6 月，第五届（1919 级）学生毕业，毕业生共 10 人，其中文科 4 人，理科 6 人。

7 月，在陶谷自建的校舍大部分落成，金女大从租赁的绣花巷搬迁至陶谷新校园。

9 月 20 日，新学期开学。优美的中国宫殿式、园林风格的校园建筑落成。共有 6 座楼房呈四合院型，其中 3 幢是教学楼，3 幢是宿舍。校方邀请到一批访问教授，包括密歇根大学的诺曼·伍德夫妇（Mr. and Mrs. Nomman Wood）、施密斯学院的艾尔文·F. 乌德（Lrving F. Wood）教授和夫人、嘉宾女士（Chapin）、在科诺拉多州立大学工作 8 年的弗金尼亚·H. 科比特（Virginia H. Corbett）等。

10 月 31 日至 11 月 3 日为学校的“奉献周”，专为校园建筑的落成举行庆贺活动。

省长光临,市政达官贵人到校祝贺,全市大中学生到校参观。

11月,在华群小姐的指导下,全校师生分成若干小组,到学校附近的居民家中拜访,与居民家中的妇女、孩子交朋友。

12月25日学校举行圣诞庆典,住在学校周围的居民来了400多人,参观了校园、校舍。

同年,美国施密斯女子大学成立“支援金陵女子大学校友会”,每年捐赠经费。

1924年

2月5—7日,全中国基督教大学教育会议在金女大召开。会期3天。

6月,第六届(1920级)学生毕业,毕业生共10人,其中文理科各5人。

8月,校内分设系科,有英文、历史、社会学、数理、化学、生物、音乐、体育、医预科等。

9月,增设附属实验中学,内设高三一个班,作为本校毕业生实习教学场所。

9月20日,因江浙军阀战争爆发,新学期开学时间由11日推迟到20日,绝大部分学生按时报到,注册生有133人。

11月,《金陵学刊》(*Ginling College Magazine*)创办,每季度一册,以中英两种文字出版发行。

本年支撑金陵女子大学办学的宗教团体和社会团体增加了,达到10个。其中8个差会团体、1个中国医学会、1个施密斯学院基督教工作及女校友协会,差会团体承担了1位教员工资,施密斯学院承担2位教员的工资。

全校教员总数为28人,其中金女大1920级学生郝映青小姐加入教员的行列。埃米丽・Z.凯斯(Emily Z. Case)到校负责体育教学。本年又一幢学生宿舍建成,面积为1 150.8平方米。

1925年

2月,新学期注册学生124人。

6月3—7日,上海五卅惨案发生。金女大学生自治会通过决议,参加南京市21所大中学校组织的学生联合会,和大家一致行动,到英国大使馆门前游行示威。

8月,基督教女青年会上海体育师范学校并入金陵女子大学。该校的4名教师和16名学生及设备都从上海迁来。女青年会提供五年体育教育经费,每年支付5 000美元。

9月,校内设主修、辅修系科。辅修系科增设教育学、心理学、卫生等课程,增

设音乐系。新增教职员，乔治·鲁斯先生受聘到金女大任总务长和会计，苏德兰任音乐系主任，阿尔法·B. 布什(Alpha Beatrice Bues)小姐任英文系教员，玛莎·哈齐特担任校医并在卫生和体育系教学。另新增中国教职员7人，其中金女大毕业生3人，1925级的刘恩兰管理实验中学。

11月，金女大十周年校庆。《金陵学刊》发行特别报道。

1926年

3月18日，北京发生"三一八"惨案。金女大的学生没有参加示威游行，但制订了一个爱国纲领。其具体目标为第一，对南京各学校的行动表示支持；第二，在可能的情况下，使用国货替代进口货；第三，阅读报纸，了解时势，不落伍于形势；第四，每两个星期举行一次爱国的教堂服务活动，邀请一些具有爱国主义思想和宗教情怀的人前来为学生讲演。

6月，第八届(1922级)毕业生共20人，其中文科13人，理科7人。

9月，152名学生注册。各年级学生的注册人数分别为四年级17人，三年级29人，二年级47人，一年级47人。特殊的未分班级的学生12人，实验中学高三学生20人。

本年新增教职员6人，其中爱利斯·达诺小姐(Alice Darrow)担任心理学课教师，玛利·库克小姐(Marny Cook)担任英语课教师，她毕业于施密斯学院。

1927年

3月21日，因国民革命军北伐，教会要求所有外国妇女和儿童都于当晚或次日清晨作好撤离准备。但所有的教职工都表示与金陵女子大学、与学生们一起留守。学校体育馆内安置了100多名妇女和儿童，她们是附近的居民。所有学生都集中在科学楼第二层的物理实验室内休息。

3月底，校长德本康夫人和外籍教职工接到疏散到上海的通知，并乘美国军舰依莎贝尔号到达上海。

4月，由校友、教职工和学生组成特别行政委员会承担学校的行政责任。

5月，由于中国20年代中期广泛开展"收回教育权"运动，受其影响，政府提出"外国教会在中国办的大学，要建立中国人为多数的校董会，并由中国人担任校长"。为此，金女大校董会和执行委员会在上海开会，选择新的执行委员会。德本康夫人提出辞职，新委员会推举徐亦蓁为主席(徐乃金女大首届毕业生)。执行委员会投票通过决定请吴贻芳担任金陵女子大学的校长。由于吴贻芳于1928年方

能在密歇根大学完成昆虫学博士学位。德本康夫人在这期间继续担任校长。

6月,第九届(1923级)毕业生共18人,其中英文系2人,社会学系2人,历史系1人。化学系1人,数理系3人,生物系4人,体育系3人,医预科2人。德本康夫人出席了毕业典礼,并向学生颁发毕业证书。

9月23日,由1位中国教师,1位校友及1位学生组成的代表团从国民政府处获准秋季开学。注册学生95人。

同年增设中国语文系,缪镇藩先生为系主任,张汇兰博士任体育系主任。

1928年

1月13日,校董事会提名吴贻芳担任校长的建议得到了金陵学院委员会的同意。

6月8日,全校师生在校图书馆前欢迎新校长吴贻芳女士。以后吴贻芳去美国纽约接洽,并参观东方著名女子大学,时间2个月。

6月27日,毕业典礼。第十届(1924级)毕业生共21人。

9月,增设经济系、哲学系。

11月3日,吴贻芳在美国密歇根大学获生物学博士学位后,回国任职。学校举行隆重的吴贻芳博士就职典礼。新、老校长,校董事会成员,全体教职员都参加了典礼。金女大执行委员会主席徐亦蓁首先致辞。金女大校印交接仪式后,吴贻芳博士发表就职演讲。宋美龄女士、教育部部长代表、中央大学代表等分别致词。

11月16日,国民政府教育部在南京颁布《关于外国人在中国办学登记注册的规定》,规定学校要有中国人任校长;学校管理委员会中中国委员要占半数以上;学校不得带有宗教宣传性质的目的;学校的课程必须符合教育部颁布的标准,必修课不包括神学课等。金女大提出哲学与神学合为一系的建议未被接受,只允许在哲学系中开设宗教选修课。同时宗教课不得成为主修课。德本康夫人任学校顾问兼教师,离校回国休假。

同年,中国籍教师已占教师总数的百分之七十,并聘请金陵大学、中央大学的教师来校讲课,使所开课程范围更广。此外,还邀请外国教授来华度假兼讲学。

1929年

1月14日,吴贻芳校长向全校报告立案筹备情况。金陵女大如不注册,就将不能享受某种特权,例如进口仪器和设备的关税减免权,毕业生享受政府助学金到国外留学的特权,在任何已经注册的学校找到工作的权利。这些都会影响招

生。金女大决定必须尽快注册。

5 月，为体育简易科在宁海路建四合式平房即东院宿舍，面积为 450 平方米。

6 月，第 11 届(1925 级)毕业生共 26 人，其中英文系 2 人，社会学系 6 人，历史系 1 人，宗教系 1 人，音乐系 1 人，数理系 2 人，化学系 1 人，生物系 5 人，体育系 5 人，医预科 2 人。

9 月，增设体育简易科，修业 1 年，以培养中小学体育师资。另增设数学系，取消宗教系。

本年全校教职员 43 人。

1930 年

6 月，第 12 届(1926 级)毕业生共 19 人。体育简易科 30 人。

秋，体育简易科改为专修科。学制 2 年。增设政治系。

12 月，金女大的章程按照国民政府教育部的要求作了改变。学校的教育目的改为女子高等学校依照最高的教育效率来促进社会福利及公民的崇高理想，培养高尚人格，以期符合创办人的宗旨。金女大经教育部核准立案，完成注册。学校定名为“金陵女子文理学院”。

本年在宁海路东建教职员住宅 2 幢。

本年金女大教职员工 47 人，教员 36 人，其中兼任者 10 人；职员 12 人，其中兼任者 4 人。教职员工中，中国籍成员 30 人，美国籍成员 14 人，英国籍成员 1 人，法国籍成员 1 人，德国籍成员 1 人。

1931 年

6 月，第 13 届(1927 级)毕业生共 18 人。

7—8 月，中国大运河以东发生洪水灾害。金女大师生给予极大的关注和同情，校内设立一项专门的金陵基金。师生捐款总数为2 068.26美元。

9—11 月，九一八事变爆发。金女大组织全国抗日救援会分会，同时校内开设一学期的急救课。

9 月，金女大对毕业生就业情况作了统计。188 名毕业生中有 106 人从事教育工作，其中 15 人担任女子学校校长，8 人担任教务长或校务监督。31 人在国内或国外的学校攻读研究生。以往攻读研究生的已有 30 人获文学硕士学位，5 人获医学博士学位，3 人获哲学或科学博士学位。

11 月，太平洋国际关系学会的客人拉德克利夫学院的校长阿达·L. 孔斯多

克(Ada L. Comstock)等拜访金女大。澳大利亚工业部顾问陶尼(R. H. Tawney)教授,总理大臣顾问吉普先生和他的女儿安得森(D. A. Anderson)来校访问。

12月25日,纽约师范学院的埃狄思·阿波特(Edith Abbott)小姐等,谢伍德·埃笛(SherwoodEddy)博士和夫人来校访问。

本年,金女大附属中学扩充为完全高级中学。德本康夫人休假结束,返校任教授顾问及校舍建筑的监督人。

1932年

1月底,上海一·二八事件发生后,女大寒假留校的学生每天自动去医院做些力所能及的护理工作。

2月15日,学校推迟2周开学。学生报到人数达108人,其中包括25名其他学院的借读生,学校迫于美国驻华领事的劝告,送走4名西方教员。

6月,南京附近疟疾、霍乱流行,学校与卫生局在地区性的灭疫战役中合作。

6月29日,学校举行毕业典礼。第14届(1928级)毕业生共26人,体育专修科8人。

6月,图书馆行政楼和教堂音乐楼破土动工,这是1919年已计划建筑的学院建筑群体。

秋,学生注册人数为174人。

1933年

4月27日,吴贻芳校长应邀参加九江Rulison学校16周年校庆活动。该校从第一年起便送大批学生到金女大学习。

4月,宋庆龄、宋美龄、宋霭龄三姐妹捐赠的实验中学宿舍破土动工,地点在校园东南角。这个宿舍可容纳60—72名学生住宿。这是中国捐赠人送给金女大最大的礼物。

6月,第15届(1929级)毕业生共36人。

夏,金女大附属高中经南京市社会局核准立案。

7月16—18日,吴贻芳校长应邀出席在美国芝加哥召开的为期一周的国际妇女会议,会后赶赴班夫出席太平洋国际关系学会召开的会议。

8月,增设地理系。

秋,报考金女大的有219人,实录取68人。学生注册人数达到212人。

10月16日,《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校刊》创刊号出版。该刊每半月出一期,直至

1937年6月。

10月，社会各界到金女大招聘毕业生87人，但金女大只有30名毕业生可应聘。本校黄丽明女士被聘为全国运动大会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金女大体育系毕业生为各方争相聘用。

11月3日，校董会的执行委员会与财务委员会举行联席会，讨论年度预算问题。因收支不敷差1 700元。

11月4日，本校举行建校18周年纪念典礼。武昌华中大学校长韦卓民博士来校致词：希望学生"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以求"创作"，贡献于社会。英国佛莱博士受中英庚款董事会伦敦中国大学委员会派遣来校，向金女大一年级成绩优秀者颁奖及奖学金。

11月10日，本校数理系李国鼎先生发表题为《从时间说到超人的宇宙》的演讲，介绍爱因斯坦相对论时间观。

11月，女青年会举办的星期妇女半日学校开学，有52人报名。

1934年

4月，校园内又有两座校舍落成。一座为图书馆兼院行政办公室，一座为大礼堂兼音乐系。

5月2日，吴贻芳校长离校外出访问厦门、广州、香港、雅加达、马尼拉等地的学校与金女大校友。每到一地，她发表演讲，接受采访，宣传金女大。

5月12日，金女大及附中组队参加南京市第五届排球赛，两队均获冠军。

6月26日，在新礼堂举行毕业典礼。第16届(1930级)毕业生共29人，体育专修科3人。蒋介石夫妇接受吴校长的邀请出席毕业典礼。

6月，生物系教授黎富思博士的著作《中国之脊椎动物》由中华书局出版。英文内容有徐国懋先生的《租界之简史》，刘恩兰先生的《中国之农村问题》等。

6月10日，社会学系以改良社会、复兴农村为宗旨，筹资建立的社会活动中心馆落成，款项来自学生捐款和文艺演出的募集。

8月，报考金女大的考生有226人，录取新生75人(其中美国学生3人)。

9月3—15日，新生入学周。新生教育活动包括：德本康夫人讲演办学目的和校史、学校组织介绍、课程安排、图书馆使用法、学生组织介绍、本校毕业学生就职概况，新生参观培幼小学及社会活动中心，观看金陵生活电影等。

9月，1935级学生的退修会，由毕范宇等先生演讲《如何发展健全人格》等。

9月15日，本学期注册学生213人，来自12个省，68所中学。

9月，本校学生自治会组织附设平民教育股即工人夜校，本学期继续开办，学员系本校校工，邻近工友共30人。

9—12月，本校社会学系及青年会组织乐群社，欲改进附近农民生活，成立藤工会组织等小组。

10月，本校职业委员会报告，社会各方需要聘请毕业生数达113名，而本届毕业生只有29名。

10月，本校体育运动队代表南京市出席全国运动会，参加项目有篮球、排球、垒球、田径。

11月5日，本校举行建校19周年纪念活动。在校庆典礼上，吴贻芳校长致词。

12月3—15日，本校举行国语演讲竞赛，竞赛结束推出2名学生赴上海沪江大学参加华东各大学演讲比赛，结果金女大取得团体第二名，个人第一、第六名的好成绩。

12月，美国纽约州立大学之大学院特颁毕业学位之永久认可公文，宣布此后金女大无需介绍手续，可直接被授予国际认可的证书或学位。

1935年

5月，学校规定毕业生要撰写毕业论文。

6月，第17届(1931级)毕业生共33人，体育专修科14人。统计校舍内图书资料，中文资料29 394册，外文资料27 556册，价值69 476元。

8月，报考金女大的有325人，录取新生98人。

9月，取消政治系。

11月2—4日，本校举行20周年纪念典礼。呈现庆祝盛况。《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院刊》第三十四期为校庆20周年专刊。

11月，为救济遭受洪灾的难民，金女大举办音乐会和菊花展览，成千上万的人参观了金陵校园，获1 000多元的捐款。调查统计1—17届毕业生状况：专修科55人，本科毕业314人，继续深造获哲学科学博士学位7人，医学博士学位11人，硕士学位49人，国外留学10人。从事社会职业：大学校长或教授18人，中学校长或主任29人，中学教员126人，社会服务事业26人，医师11人，护士3人，政府公务员7人，编辑6人，银行职员1人，继续研究19人，家庭服务89人，其他8人。

11月16日，吴贻芳校长赴沪出席中华基督教全国协会执行委员会会议。吴校长为该会会长。

12月7日，地理系学习地理环境与人生之关系时，去南京上新河考察。考察该地的村民生活状况、社会情形及人口分布，职业状况与该地地理环境的关系。

12月8日，吴贻芳校长宴请前菲律宾副总督里顿氏。中央大学罗家伦校长、徐国懋教授陪同。

12月28日，学生会在校大礼堂举行水灾募捐游艺会，募捐9 080元。

12月，本校教员学历统计：专职教员34人，兼任10人。其中获博士学位8人，硕士16人，本科毕业20人。

冬，社会学系及青年会建立平民诊疗所。

1936年

3月30日，本校举行户内运动会。

4月，本校心理学系学生到全市各中学进行中学生心理测验。

4月，中华基督教育会规定，凡大学生修毕12学分教育课程或职业训练者，教育会经审核将颁发中学教师之资格证书，12学分包括普通中学教授法(4学分)、试教(4学分)。心理教育或特别教育课程(4学分)，本校四年级学生中有百分之四十已修毕。

5月3日至11月6日，吴贻芳校长应邀赴英国伦敦出席国际基督教协进会常务委员会议。会后赴美参加哈佛大学300周年纪念典礼。吴校长离校期间由张肖松代理。

6月，第18届(1932级)毕业生共34人。

8月，取消经济系。

9月，在校生为259人，其中包括19名体育专修科学生。

10月7日，南京市开辟第四住宅区。同时建在700号楼西后侧的小医院落成。

10月12日，体育系主任黄丽明(金女大1927级毕业生)作赴德参观世界运动会的报告。

11月8日，本校举行21周年校庆纪念，邀请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先生到校演讲《女子高等教育》。

12月11日，学生自治会组织全校三、四年级学生接受军事看护训练三个月。

本年度经费收入中教育部补助费12 000元，基金利息15 346元，美国各教会及施密斯大学常年捐款63 190元，临时捐款23 443元，学费实验费33 600元，膳宿医杂费25 000元。校舍地基图书仪器仪具等共150万元。

1937 年

2 月 16 日，懿范家政学校开学。学生约 40 人。

2 月 25 日，本校招生委员会会议决定，招生分 5 月、8 月两次考试，5 月份的考试由各地代考。

2 月，徐亦蓁女士赠金 5 000 元作为社会中心馆的基金。

2 月，社会学系主任龙冠海教授、穆思曼教授出席中国社会学社第六届年会，并分别宣读论文《中国各大学社会学课程调查》、《介绍促进中国社会工作之训练》，同时龙教授被推举为下届年会的论文委员会主席。

2—6 月，本校四年级退行会讨论题："对于社会需要之认识及怎样应付这需要"、"人生之价值及意义"、"对于基督教的认识"、"离校前应有的准备"、"怎样可以支配环境而不为环境所支配"、"怎样服务才可表现金陵的精神"等。

3 月 6 日，本校体育系主持南京市大学室内运动会。春校内南山教职员宿舍两幢落成。

4 月，本校四年级学生举行募捐游艺会，所得款捐作校旗杆和校大门。

5 月 19 日，出席世界教育会议的印度女子代表到校参观。

6 月，第 19 届(1933 级)学生毕业，共 48 人。

7 月，在校生为 350 人，其中一年级学生达 151 人。学校设备：图书资料约 10 万册，中外文各半。教学仪器、模型等，可供 400 名学生学习之用。钢琴有 20 多架。

9 月，金女大决定在三个城市形成办学中心，分别为上海中心、武昌中心和成都中心。

12 月 3 日，吴贻芳校长离校，乘船赴武昌，校内成立驻校维持委员会，主任为华群小姐，委员是宿舍管理员程瑞芳、助理会计陈斐然，任务是保护学校的财产、设备，同时也便于在紧急时刻为邻居们服务。

12 月 8 日，第一批约 300 名妇女和儿童获准进入金陵校园。学校设立妇孺收容所。

12 月 13 日，日本侵略军占领南京城，开始大屠杀和抢劫。校园内难民数达到 4 000 人。

1938 年

1 月，因南京沦陷，武汉吃紧，武昌办学中心迁往成都。吴贻芳校长赴成都，学生及女教职员借住华西大学女子学院，办公处借华西大学万德门纪念楼。教职员

13人,学生25人。

3月中旬,仍有3 310名难民滞留在校园。

3月28日,吴贻芳校长到上海,与董事会协商学校的未来发展计划,学校决定关闭上海的办学中心,集中于成都办学。

6月,金陵女子大学与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及逃到上海来的杭州浙江大学、苏州东吴大学和上海基督教女子医学院在上海一家剧院联合举行毕业典礼。本校第20届(1934级)毕业学生共35人,其中上海中心毕业17人,成都中心毕业5人,武昌中心毕业1人,其他在燕京大学等其他学校借读毕业。

6月,华群小姐带领留守人员为南京校园内无家可归的贫苦妇女开办职业训练班,大约有70名妇女参加。

9月,南京校园内增设女子中学,为无处读书的女青年讲授初高中文化知识。教师由本校毕业生担任。招生数为149人。

9月,金女大在成都华西大借地自建的学生宿舍、音乐室、健身房落成,男教员宿舍也竣工。当时四川省政府补助25 000元,教育部补助5 000元。金女大在成都招收新生,成为独立学院。课程方面,按照教育部规定,取消辅修学系。主修学分三类:一为公共必修科目,二为主系必修科目,三为主系选修科目。另外,当时华西坝有华西大学、金女大、金陵大学、齐鲁大学及燕京大学的一部分共五所大学,各校所开课程允许五大学学生互相选读,各校承认学生读得的学分。

10月,本校11月1日才开学,学校决定开展"新生月"活动。一周听国内、国际形势的报告。两周分小组到成都及周围地区教育机构参观访问,在农村住宿考察农村家庭和学校,最后一周讨论、总结,自己写体会报告。

同年,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加入了由金陵大学、齐鲁大学、燕京大学、中央大学医学院等在成都华西坝成立的五大学学生战时服务团。金女大少数进步学生加入抗日救亡活动的行列。

1939年

春,为适应抗战需要,学校在四川仁寿县筹设规模较大的乡村服务处,组织训练农村妇女,提高其知识水平,增加生产技能。筹备组仅有成员三人,均为本校毕业生。肖鼎瑛(1937届毕业生)为筹备组成员之一。

4月中旬,全国基督教各大学校长在香港集会,拟联合筹设体育系。会议决定由金女大在上海设体育系。女学生由金女大体育系主任黄丽明授课,男学生则由圣约翰大学副校长沈嗣良指导。

4月,德本康夫人回到学校,担任学校内各项事务的会计工作。

6月11日,敌机疯狂轰炸成都,有六颗炸弹落到华西校园。五大学学生战时服务团倡议组织救护队,华西大学礼堂变成急救医院,大约有80名伤员被抬进,金女大的师生帮助华西协和医院的大夫看护伤员,吴贻芳校长和几位教师彻夜未眠,看望伤员,逐一问候。两天后学校才重新复课。

6月,第21届(1935级)学生毕业共37人。

7月,英国语文系改为外国语文系。停设数学系、物理系。

夏,校行政机构,依教育部所颁专科以上学校行政组织划一办法进行调整,且为节约付开支,全部行政人员只有十几人。

9月10—16日,学校举行新生教育周。内容为演讲《今日的中国》、《今日的时局》,介绍学校内各种组织,讲解怎样看书和笔记,练习运用图书馆方法等。报到新生共89人,全校在校生为115人。

9月,南京校园内留任教职员约10人,又新聘数位,继续开办职业科、实验科。校舍与教学设备均无大损失。

10月2日,吴贻芳校长讲演《如何振作精神》。会后共募捐到学生捐款119元,教职员捐款326元,加上9月节余,合并捐给前线战士做寒衣。

10月21日,《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校刊》复刊。因印刷困难,由半月刊改为月刊。

10月,教育部批准金女大与华西大学女子学院合设家政系,课程分两类:一类注重家庭管理与家庭经济,一类注重食物营养与卫生。

秋,学校设在仁寿县的乡村服务处正式开展工作。

11月4日,学校规定:每年11月的第一个星期六举行建校纪念,故本日举行建校24周年纪念活动。

12月,社会学系编辑出版《社会调查集刊》上、下两册。

1940年

6月,第22届(1936级)毕业生共7人。

7月,哲学系停设。

9月,金女大颁布《学生手册》,内容包括注册、转学及休学,每学期学分的规定,成绩标准,分级,学位与毕业规定,主修学系,毕业论文等。

秋,金女大统计办学25年来学生情况:毕业生22届,本科生469人,其中10人去世,剩459人。体育专修科毕业58人。459人毕业后攻读学位情况:获哲学

博士学位 10 人，医学博士学位 22 人，硕士学位 53 人，护士学位 10 人，仍在国外留学 12 人，国内继续研究 6 人，升学未获学位 13 人。从事职业情况：大学校长或教授 42 人，大学职员 12 人，中学校长或主任 24 人，中学教员 131 人。在教育界任职计 12 人，占总数的 46%强。秋，本校建立家政系。设置的主要科目是营养学。

11 月，在校生为 206 人。

12 月 7 日，成都校园举办建校 25 周年校庆晚会，晚会上演出名为《历代妇女》的历史剧。与纪念活动相联系，美国的创始人委员会发起增加 25 周年纪念基金的运动。这一运动持续到春季，筹集到30 000美元基金。

本年陈品芝博士任生物系主任，原生物系主任黎富思退休归国。

1941 年

2 月，本校各系先后成立学会，以利增加学术研究的兴趣。

3 月，金女大按教育部令，中等以上学校体育改进要点。要点指出：体育教材选择应以培养青年耐久力与应用技能的锻炼方法为准。体育课每周至少两小时，不得任意缩减，体育成绩列入学生总成绩。早操及课外运动，全体学生除经校核定准免外，均须参加。

4 月，本校收到国民政府教育部补助费 18 000 元。国民政府教育部给大专院校专任教员颁发奖状，以资奖励。金女大受奖教授共 11 位。德本康夫人、蔡路得博士、黎富思博士、华群先生是一等奖（20 年以上教龄）；师以法先生、惠迪穆先生获二等奖（15 年以上教龄），吴贻芳博士、苏爱兰先生、刘恩兰博士、顾天琢先生、黄丽明先生获三等奖（10 年以上教龄）。

5 月 14 日，华群教授不幸在美国病逝。学校举行隆重的悼念仪式，并建立华群纪念基金。

6 月 23 日，金女大与其他教会大学在华西大学体育馆联合举行毕业典礼。典礼仪式在空袭警报的干扰下，匆忙结束，第 23 届（1937 级）毕业生共 27 人，是成都华西坝的第一个毕业班。

12 月 7 日，日本袭击珍珠港。南京校园里，闯入 20 多名日本搜索队员，他们检查了所有楼房，抢走一批中文书籍，并软禁了德本康夫人，不准她进礼拜堂向听众致词，不准离开房间。

1942 年

1 月，金女大接国民政府教育部通知：为使全国学生各尽所学，各尽所长，为

社会服务，舍己利群，修身达人，特定本年为全国各级学生社会服务年。金女大学生积极参与各项活动。

6月19日，美国对日本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南京校园被日军强占作防卫司令部。德本康夫人等被遣散离开南京，前往上海。中外教职员无法保护南京校中一切了。

6月，第24届(1938级)毕业生共27人。

7—8月，成都学校组织学生边疆服务团家事组，调查边区羌胞的膳食营养，并帮助他们在可能范围内调整营养。另外在成都举办暑期儿童学校，学生20名。

9月初，本学期成都校园新聘教职员15位，另有2位兼任教授改为专任，同时离校教职员有9人。

9月9—10日，学校组织1939级学生讨论“人生哲学：职业问题”。

9月14—17日，举行新生教育周活动。主要内容有：除了体育及体格检查外，由教职员分别演讲《金陵校史》、《金陵的读书生活》、《金陵的家庭生活》、《金陵的资金与资金》、《三民主义厚生团》、《世界形势》、《如何利用图书馆》、《五大学及其他学生活动》。最后由学生写作新生周之印象。

11月21日，本校举行建校27周年庆祝活动，庆祝活动以宣扬金陵精神为中心。

12月，本校社会教育委员会办理民众学校。另有儿童学校，半日读书学费全免。

本年生物系主任由张令昭先生担任。

1943年

2月5—7日，金女大在成都少城公园民教馆举办儿童教育展览会。三天中观众达30 000人以上。

2月15日，举行本学期第一次民国诞生纪念周。吴贻芳校长亲自演讲。

2月，寒假招生，录取新生20多人。新聘专任教授4人，兼任教授2人。

3月1日，《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校刊》月刊改为半月刊，每月1日及16日出版。

3月6日，吴贻芳校长以国民资格接受邀请加入“战后问题中国研究小组”赴美宣传中国抗战，同时与美国教会大学联合托事部商洽金女大发展事项。全校师生欢送吴贻芳校长离校赴美。吴贻芳在美国逗留时间长达一年。

3月，为了发展儿童福利事业，本校社会学系、家政系分别增设儿童福利专业。

3月，国民政府认为教育事业、不仅培植人才，且有关国家文化，故须教育界服

务人士能继续不断努力,如能收效。为奖励教员能久任,行政院拨奖金 200 万元,分给专科以上学校教员。金女大蔡路得、陈觉玄获3 000元奖金(20 年以上教龄),吴贻芳、余竹平、师以法、苏爱兰、黄丽明、刘恩兰、闵侠卿、张少微获 1 500 元奖金(10 年以上至 20 年内教龄)。

春,成都的金女大与金大、燕京、齐鲁、华西等大学获美国援华会的经济资助,共同设立"成都五大学儿童福利人才训练委员会",吴贻芳校长任主席,委员会由各校有关部门委派的两人组成,课程训练计划包括儿童发展、儿童心理、儿童健康、儿童营养及儿童福利机构的管理等,实际训练在托儿所完成。该委员会设立奖学金以奖励五大学社会学系和家政系主修儿童工作专业而成绩优良的学生。

4 月,本校筹募经费,建筑房屋,开办儿童福利实验所。该所建成后,作为本校学生实习场所,并为邻近儿童和妇女服务。

5 月,本校获国民政府教育部补助费 90 000 元,本校家政系获四川省教育厅为奖励提倡家政教育而补助 3 000 元。

5 月,美国史密斯学院授予吴贻芳校长荣誉法学博士的称号。

6 月 14 日,联合国纪念日,全世界 32 个联合成员国在华盛顿宪政大厅热烈庆祝。吴贻芳校长在庆祝会上发表演说。

6 月 25 日,全校教职员为 1939 级毕业同学举办欢送会。第 25 届(1939 级)毕业生共 37 人。

7 月 13 日,本校暑期招生工作开始,招生地点分设在成都、重庆、陕西、昆明、湖南、广东等 6 处。

7 月 27 日,本校华阳中和场乡村服务处正式开展工作。该处举办练习班,培养地方保育人才。

8 月,德本康夫人获得自由,由上海,经非洲、南美返回美国。

9 月初,新聘教职员 10 人,生物系主任由柯曼寿先生担任。

10 月 1 日,学校成立托儿所,名称为"小乐园",免费招收父母均工作且家境困难,无人照顾的 3—5 岁儿童 20 人。10 月 11 日至 1944 年 1 月 11 日,学校与四川省政府社会处合办乡村实验托儿所。另特设训练班,招收当地具有初小至初中文化程度的妇女为练习生。

10 月,为帮助出征军人家属子弟求学,尤其是品学兼优且无力升学者,本校厚生团决定酌予奖学金。奖学金来源以往募捐得千余元,以此款为基金组织合作社。合作社可便利同学,另赢利可帮助军人子弟。12 月 1 日合作社正式营业。

11 月 12—15 日,本校 24 名学生组成代表队,参加四川省大中学生运动大会,获女子组田径冠军,同时获得篮球赛冠军。

12 月初，小乐园的新建筑在成都华西坝小天竺街落成。

12 月，理科集刊第二期出版，刊登 8 篇文章。

同年，地理系主任为刘恩兰博士，社会学系主任为龙冠海博士。本校与成都华西大学医学院附设医院合作，在神经科程玉麟教授指导下，举办儿童行为指导所。

1944 年

春节，本校中和场乡村服务处举办春季农家大会展览。

2 月初，本学期新聘教职员 8 人。

2 月 14 日，本校进行寒假入学的新生教育。

2 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发放久任教员奖金。

3 月 1 日，全校师生热烈欢迎从美国归来的吴贻芳校长。之后一月中吴校长应邀演讲达 26 次。

6 月 4 日，本校为生物系前主任黎富思博士创立奖学基金。由吴贻芳、郝映青、胡秀英、刘华屏、吴美临、陈玉清等先生筹赠约 18 000 元，下半年用于奖励生物系成绩优良的学生。

6 月 26 日，金女大与其他四所教会大学联合举行毕业典礼。第 26 届（1940 级）学生入学时约有 90 余人，毕业时为 42 人。

7 月 21 日，暑期招生工作开始。招生地点分十处：成都，重庆，桂林，沅陵，万县，曲江，梅县，西安，昆明，贵阳。

8 月，新聘教职员 13 人，其中有外文系主任克馥兰博士，家政系代主任孙增敏，体育系代主任诚恩慈女士。

9 月初，社会学系教授高君哲先生与乡村服务处熊亚拿女士出席全国儿童福利会议。会后设立急救难童联合办事处。

9 月初，学校进行学生体格检查及姿势检查。

9 月初，本校在校生达 320 人，学生中设有级会。

9 月 5 日，吴贻芳校长出席国民参政会，且任会议主席团主席。

9 月 13 日，本校家政系培幼实验托儿所开学，招收教会五大学教职员子弟和校外附近儿童。

9 月 25 日，本校儿童福利实验所开学。所主任、总干事及干事均为本校毕业生。

9 月，本校对 1940 级学生进行职业调查。被调查的 37 人中，结果在大中学校

任职的有21人,职业不详的9人,其他职业的7人。另外对已毕业的26届学生的职业作了调查,结果为本科毕业生588人,体育专修科39人,体育简易科30人。经国内外再深造的占30%,服务于教育界的占40%以上。

9月,本校设立的各种委员会有:校务会议常务委员会(7人)、教务会议常务委员会(7人)、贷金奖金委员会(8人)、毕业论文委员会(3人)、职业介绍委员会(3人)、招生委员会(6人)、社会服务委员会(6人)、城市服务委员会(4人)、乡村服务委员会(4人)、卫生委员会(5人)、交谊委员会(7人)、家教委员会(5人)、训导会议常务委员会等。

10—11月,学校成立知识青年从军运动征集委员会。会长为吴贻芳校长。报名人数达40余人,以三、四年级学生为多。

秋,教育部制订并宣布一项将学生培养训练成翻译、护士及通讯官员等专业人员的计划。金女大许多学生自愿参加。同期,刘恩兰与另6名教师、70名学生自愿参加救助从贵州前线撤离出来的儿童工作。

11月,沈次量先生捐赠奖学金基金10万元。凡本校主修国文、历史、化学、地理学的成绩最佳者皆可申请该项资金。

12月至次年1月,学校根据教育部要求,开设急救课、护理课。全校有100名学生参加学习,每天早上7点学习,持续2个月。

同年,数理系停课。

1945年

3月29日,吴贻芳校长随中国代表团前往美国旧金山,出席联合国宪章起草会议。原订时间4—6月,后因健康原因,吴校长直至1946年1月才返回中国。

4月,学校接收在成都盟军红十字会服务的邓肯女士慨赠的10 000元,将其作为奖学金。

4月,在校生有307人,教职员总数为86人。

5月4日,吴贻芳校长作为中国出席代表在旧金山举行首次记者招待会。

5月29日,全校师生在校广场收听吴贻芳校长在旧金山向国内的广播。

7月2日,举行第27届(1941级)学生毕业典礼。1941级毕业时34人。

7月2—5日,本校进行暑期招生工作,地点分设成都、重庆两处。

7月10日至8月25日,本校儿童福利实验所举办暑期托儿班2个,实习班1个,招聘22位学生参加服务。

8月,日本宣告投降,抗日战争胜利,成都的金陵师生纷纷走出校门,手持火

炬,呼喊胜利口号,高唱爱国歌曲,在成都市内游行。

9月初,本学期到校报到注册者为348人,其中文学院222人,理学院114人,体育专修科12人。

9月,本校社会学系2名学生获本年度精诚公司奖学金各得15 000元。

9—10月,儿童福利实验所成为本校及其他教会大学的实验室。本校和华西大学儿童福利专业班学生、燕京大学托儿工作专业学生来所参观,研究其行政组织、经费、工作计划、工作方法等问题。本校儿童发展班以该所儿童为示范,金大心理测验班以该所儿童为示范测验对象。本校个案工作班来所实习。

9月底,南京校园由金女大留守负责人之一的程瑞芳收回。学校损失惨重。

10月,因吴贻芳校长在海外,校执行委员会决定请蔡路得教授到南京,了解南京校园的真实情况。

11月24—25日,全校举行庆祝金女大成立30周年纪念活动,同时特发起募捐复校基金运动。

12月,美国援华会顾问,教育家冉凯生博士及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儿童福利组主任路易斯女士到本校儿童福利实验所参观,并对该所工作设施感兴趣,表示今后愿对该所设施加以赞助。

1946年

1月10—12日,新学期开始。寒假没有招新生。到校注册者共308人。其中文学院196人,理学院99人,体育专修科11人。本学期新聘教职员10人,其中3人为兼任。

2月12日,吴贻芳校长由美返校。全校师生热烈欢迎校长归来。

2月,儿童福利实验所托儿所招收儿童达70人,另保育组、幼稚组招生人数也超过原定额的两倍。

2月,国民政府教育部会议,议定因抗战胜利,各校离川程序,搭船东下者以重庆区学校先行迁运,成都区各校须等至9月才迁。金女大为赶在秋季开学,决定包汽车由西北转南京,并拟定4月中旬至5月中旬分三批离川。

3—4月,本校中和场乡村服务处与四川省社会处合办的乡村实验托儿所,交四川英美教会接办。儿童福利实验所赠与华西大学社会学系继续承办。在华西坝的学校建筑,全部赠与华西大学。

春,吴贻芳校长回到南京校园,组织复校工作。

4月初,地理系主任刘恩兰博士应美国国务院邀请赴美讲学。

4月15日，学校因搬迁，提前举行毕业典礼。第28届（1942级）毕业生共41人。

4月16日至5月15日，本校返迁工作开始，第一辆复员车开出。全校三分之一学生随家自行返回南京，两广、云贵的学生先返原籍，待开学再返南京。4月22日，两辆车出发。又有4月29日，两辆车出发。

5月15日，本校第六号复员车开出，共四辆卡车至6月5日到达南京。

8月底，本校三四十人从重庆乘船返南京。

9月初，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校牌重新在南京陶谷挂出。

9月14—15日，本校举行教职员进修会，吴贻芳校长主讲。题为“对金陵的展望和能力的来源”。

9月23日，金女大在南京原校址复课，是西迁学校中第一个在南京复课的学校，在校生达332人。新聘教职员53人，其中陆慎仪教授数理学兼教务主任，熊子敬教授数理学兼代总务主任。

9月24日，学校在江宁县淳化镇建立乡村服务处。

10月3日，金女大社会学系和家政系在宁海路校门对面，恢复儿童福利实验所，所内职员10人。

10月20日，在成都办学时所使用的图书及教学仪器，径拖驳运输到达南京。

10月，校友会为本校30周年纪念筹募基金汇总。共计4 905 240元。

11月9—10日，本校举行建校31周年纪念活动。郝映青先生捐赠100万元，全体同学捐款70万元，以助学校添置设备。

11月10日，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参加校庆纪念活动并作演讲。下午本校隆重举行华群教授追思会。吴贻芳校长讲述华群教授史略。

11月15日，吴贻芳校长以社会贤达资格被选为国民大会代表，并选人主席团。吴校长一贯主张兼职不兼薪，故将代表的公费，全部捐作本校家境清寒的优秀学生的奖学金。她当协民参政人会政员及主席团成员以来，将会所送公费，全部缴入学校。

11月底，吴贻芳校长作为主席团的成员出席在上海举行的全国儿童福利工作会议。11月，学校设奖学金与贷金，以协助清寒优秀学生，完成学业。奖金无须归还，贷金则于毕业后，分期无息归偿。这一举措施行以来收效颇宏。本学期申请40名，批准27名。

11月，学校江宁县淳化镇乡村服务处，开办一个妇女班，每天下午授课，教以家事、国语、写信、手工、公民训练。

12月23日至1947年1月29日，本校学生陈诒作为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奉

派出席在印度新德里举办的亚洲学生会首次预备会。

12月，为响应母校筹募复校基金，广州校友会举办独唱音乐会，校友会将全部所得200万元汇至母校。

12月，郭锡恩博士任本校总务主任。

1947年

1月，本校学生组织，取校训"厚生"之意，原称"厚生团"，自本届起，为顾及外界人士听闻便利，决定更名为"学生自治会"，并公布学生自治会章程。本校寒假毕业生共17人。

2月，厦门校友会捐赠52万元作为母校复校基金。

2月，本校组织机构各委员会先后成立，开展工作。各委员会名称及人数如下：校务委员会7人，招生委员会5人，图书馆委员会6人，奖助金委员会8人，健康委员会7人，交际委员会6人，校舍委员会5人，校具委员会3人，教职员宿舍委员会4人。儿童福利委员会7人，宗教活动委员会2人。

3月16日至5月10日，吴贻芳校长离校赴沪，参加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中国分署和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联合在沪召集的社会福利工作会议，之后又参加中华基督教高等教育会议、美国援华会举行的会议。

4月，金女大1924届校友苏州私立慧灵女中校长王梅娥捐赠20万元，为母校复校基金。

5月4日，金女大与金大、中大、音乐学院系剧专学生在中大礼堂举行纪念"五四"大会。大会发表宣言，内容为反对内战，要求和平、民主，反对非法逮捕，实行独立外交等。5月22日，本校学生自治会召开临时全体大会，决定罢课一天，表达对参加南京市五二〇学生游行事件的同情，同时发表正式宣言书，出五二〇惨案专刊壁报。5月29日，为慰问惨案中受伤同学，校学生自治会特请金陵大学、中央大学、戏剧专科、药科专科、国立音乐学院同学在本校大礼堂联合举行仲夏晚会。

5月，金女大各校友会为母校30周年纪念筹募基金共计国币53 919 817元，美金25 000元。募款校友分布于成都、重庆、上海、南京、北平、天津、广州、福建、美国、菲律宾等地。

6月13日，本校举行盛大茶会，欢送历史系主任师以法女士返回英国、社会学系主任涂德仪博士返回美国。

6月30日，本校举行第29届（1943级）毕业典礼。1943级学生入学时有100

余人，毕业时达68人，为历年之首。

7月3日，本校家政系教授鲁桂珍女士应邀赴伦敦，出席第十七届国际生理学会；8月应世界文教科学组邀请，赴巴黎出席商讨远东科学发展问题会议，讨论主题为营养；10月由美国返回。

7月中旬，应联合国教育科学文化组织要求，中国教育科学文化委员会开始筹备，本校吴贻芳校长被聘为筹备委员。

7月，本校招生中应考者超过1 500人。附中原设高中3个班，1946年夏增设初中部，计6个班。暑期招生又增加3个班。7—8月，本校淳化镇乡村服务处举办夏令托儿所，招收2—12岁儿童130余人。

8月中旬，中国教育科学文化委员会成立，委员120人，均为全国知名人士。本校吴贻芳校长被推为执行委员。

8—9月初，张芗兰博士应邀赴美讲学，另有3名教员休假。本学期新聘教职员37人，其中兼任教员10人。

9月初，蔡路得博士任教务主任，张肖松博士任训导主任，张汇兰博士任体育系主任，柯曼寿先生任生物系主任，毕律斯任会计主任。

9月3—13日，联合国教育科学文化组织在我国南京召开远东区基教会议。出席会议的有8个国家，本校吴贻芳校长作为中国的副代表出席会议。为配合远东区基教会议，教育部举办教育展览会。金女大送的展览品除在国内展出外，还送一份至墨西哥，供联教组织第二次大会展览。

9月10日，本学期开学。在校生达440余人，比抗战前增加180余人。金女大与附中的学生数之和为800人。

9月，淳化镇乡村服务处开办两个妇女班，招收14—28岁的妇女73人。

10月下旬，在本校疗养院西南处兴建附中学生宿舍一座，可容80多人。另外又建教职员住宅。

10月31日，金女大校友会从1945年10月起，至1947年10月止，为母校30周年纪念筹募基金总收入国币79亿多元，美金1 500元。

10月，本校首届毕业生徐亦蓁女士，在美国任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中国代表。今秋回国，校董会特组织咨询委员会推徐亦蓁为主席，常驻校，便于校董会与学校联系。

10月，全国13所教会大学学生数超过15 000人。由于在抗战中损失严重，战后物价高涨，复校困难，为此教会大学联合托事部决定在国外长期捐募，同时组织中国基督教大学联合募捐会。各校推金女大吴贻芳校长为主席，以捐募200亿元为目标。当时国民政府教育部拨60亿元，余下的由募捐会努力。

11月4日，全国国货展览会举办大中小学演讲比赛。大学组讲题为《国货展览与生产建国》。金女大荣获团体第一，包揽个人第一、第二名。

11月8—9日，金女大举行建校32周年纪念活动。全校师生与校友全力担任校庆演出剧目。

本校对32年来毕业生情况作了统计：一、毕业学生共29届，本科生732人，除去世的29人，现存703人。体专科76人。二、703人中毕业后再深造者计191人。获学位情况：获哲学科学博士学位者16人，获医学博士学位者22人，获硕士学位者73人，获护士学位者12人，继续研究者2人，国外留学者66人。三、从事职业情况：703人中有200多人服务于教育界。其中大学校长1人，大学教授、行政人员60人，中学校长或主任29人，中学教员152人。从事社会服务事业89人，公务员66人，医师护士33人，写作与编辑8人，从事研究68人，家庭服务142人，宗教工作11人，其他24人，不详20人。

11月12—13日，南京市在公园路体育场举行第八届全运会，参加单位143个，运动员有2 100余人。本校组队参加。

11月13日，本校为抗议国民党政府秘密杀害浙江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于子三事件罢课一天。

12月25日，本校师生顾念苏北、皖北流亡来南京的难民，严冬无寒衣，特于对圣诞节日发起圣诞乐捐，以所得款项捐助。

12月，本校1929年毕业的吴懋仪后在英国拉德克得夫大学获博士学位，回金女大任化学系主任。美籍人费睿思任社会学系主任，本校社会学系改为社会学及社工作系。

同年，本校儿童行为指导所与南京神经精神病防治医院合作，成立儿童行为指导门诊，与南京中央医院儿童保健科合作，成立儿童行为咨询室；与中央大学师范学院附属小学和琅岈路小学班主任联系，研究有关儿童行为异常问题。

1948年

1月3—4日，中国教育学会第九届年会在金女大举行。

1月24日，本校教职员集会欢送寒假毕业生，毕业生共22人。

2月19日，新学期开学。本校在抗战期间西迁成都办学，因四川春季招生，故本校在春、秋季各招生一次。春天，学校决定恢复战前办法，寒假不再招生。

3月10日，中华全国大学妇女会南京分会在金女大大礼堂召开成立大会。大会由金女大吴贻芳校长报告本会成立之意义。大会选举理监事，金女大有多人被

选为理事、候补理事、监事等。

4 月 19 日，大学周报举办大学校长座谈会。会议由本校吴贻芳校长主持。会议论题为如何改进大学教育及当前时局之出路。出席的大学有北大、武大、北平师院、同济大学、上海法学院、金大、政大、音乐院、建国法商学院、东方语专、金女大等。

4 月 23 日，中国基督教大学联合募捐会在上海举行结束会议。结果募得国币 93 亿元。本校吴贻芳校长作为募捐会主席决定了分配捐款原则。根据分配原则，金女大分到捐款 762 044 元。

5 月 1 日，校训导委员会作出一项决议：个人参加组织自不干涉，但绝不可借用学校学生会名义参加任何校外组织。

5 月 3 日，本校有 12 名学生被选入南京市体育代表队，赴沪出席第七届全国运动会，并为南京市争了荣誉。

5 月 21 日，南京市举行纪念五二〇惨案一周年的演出活动。国民党特务抓捕 4 名金陵大学和中央大学参加“五二〇”周年纪念大会的学生。本校召开全体学生会议，通过罢课决议，组织抗议队伍。当天通过谈判与斗争，迫使当局交出被捕学生。

5 月底，吴贻芳校长前往教育部声明：从大革命以来，军警就没进入过学校，为了学校的尊严，女子大学的声誉，军警、特宪不得进入金女大，不得到校内秘密捕人。

5 月，本校师生为南京市捐学生助学金 2 500 万元。同时教职员又为联合国儿童急救金劝募委员会中国委员会南京分会捐助 5 000 万元。

6 月 28 日，本校举行第 30 届（1944 级）毕业典礼。1944 级学生入学时有 72 人，毕业时有 41 人。

7 月下旬，本校招生报考者达千余人。考试结果约有十分之一被录取。

8—9 月，本学期新聘教职员 30 人左右，美籍人白露梅任音乐系主任，返校教员有历史系主任师以法，社会学系主任龙冠海博士，外文系教师潘耀泉，音乐系教师胡惜苍。获得奖学金出国进修的教职员 9 人，国内研究院 2 人。本校毕业生出国深造者有 16 人。另有陆慎仪先生应邀威尔斯理大学讲学，汤铭新，孙增敏先生出国考察。

9 月，本校图书馆经过收集、整理、中文书籍达 20 000 册，英文书籍达 20 400 余册。中、英文杂志 200 余种。上半年新购及赠送的外文书 1 000 余册，中文书约 2 000 册。

9 月，本校附中新建教学楼落成。附中办公室、高中 6 个班全部迁入新楼。附

中学生高中 252 人，初中 230 人。教职员 34 人。

9 月，金女大训导委员会改为学生生活辅导委员会，设立生活辅导处，代替训导处。学校颁布《辅导处规则》，内有课外活动规则 27 条、宿舍规则 39 条、医务室就诊须知、奖惩条例等。

9 月，本校编印《私立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要览》，内容有校训、校歌、校徽，学生通则。学生通则中规定：全体学生必修科目为国文（6 学分）、英文（14 学分）、中国通史（6 学分）、社会科学（6 学分）、自然科学（8 学分）、伦理学（3 学分）、体育（6 学分）、三民主义（4 学分）、音乐通论（0 学分），主修文科的必修科目为世界通史（6 学分）、哲学概论（4 学分）、理则学（3 学分），主修理科的必修科目为数学（8 学分）、第二自然科学（8 学分）。

10 月，本校正式建立中共地下党支部，1947 级王粹珍任书记。

11 月，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校刊停刊。

11 月 5 日，本校举行建校 33 周年纪念活动暨吴贻芳博士任校长 20 周年庆祝活动。

11 月 12 日，因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共产党军队随时可能打到南京。开学时注册人数达 480 人，至此只有八九十人，学校工作近于瘫痪。

12 月，淮海战役时，本校部分学生渡江北上，加入革命队伍。

12 月底，本校召开本年度的校董会，部分董事提出，考虑学校前途，建议学校迁往台湾。吴贻芳校长断然拒绝，并以齐鲁大学、燕京大学为依据说服董事。

1949 年

2 月，学校照常开学。

3 月 10 日，蒋介石“引退”，李宗仁主政，何应钦、张治中乘车到金女大，与吴贻芳商谈出任教育部部长事宜，吴贻芳以离不开金女大为由拒绝了。

4 月 1 日，国共双方在北平举行和平谈判。本校百分之六十的学生与金大、中大、政大、剧专等 10 所大专院校的师生一起举行“争自由，争民主，争和平”的示威游行，游行结束后，剧专、政大、中大的学生遭到暴徒毒打，发生南京“四一”惨案。

4 月 2 日，吴贻芳校长获悉情况后，到鼓楼医院慰问受伤的学生。

4 月上旬，本校建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地下组织，约 40 人。

4 月 22 日，宋美龄派人送机票到吴贻芳住所。但吴贻芳退还了机票，留守在南京。

4 月 24 日，全校师生员工上街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解放后，本校有 10

多名学生参加解放军二野、三野文工团。

5月，本校教职员组织教职员会、工友组织工友会，一部分师生组织政治学习小组。

5月，校方研商革新办法。经几次师生座谈会协商，决定组织校务改制委员会，内分行政、教务、生活指导三组。委员人选中教职员人数占三分之二，学生占三分之一。改制委员会任务是修改本校组织大纲。本校废除总务、训导两处，设事务委员会及生活指导委员会。

6月，学生数由483人降至百人。教职员约有20人离校。

7月25—30日，本校秋季招考录取新生，文学院60人，理学院60人，体育专修科20人。另有二、三年级转学生，文理院各10人。

7月，第31届(1945级)毕业生共29人。

9月初，吴贻芳校长应邀赴京出席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之后又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盛典。

9月，蔡路得博士辞去代理教务主任职务，专任化学教授。1924级校友包志立博士继任教务主任。师以法女士辞去历史系主任职务，专任教授；王栻先生继任历史系主任，范定九先生担任社工学系主任。系科方面：恢复教育系；添设托儿工作专修科，学制二年；社工学系内设儿童福利组、统计调查组、理论组。附设机构：附中、儿童福利实验所、儿童行为指导所、乡村服务处均继续存在。

9月，本校接南京市军管会高教处通知，开设“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课程，时间从1949年9月至1950年1月。

11月29日，本校召开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教务会议。

12月，吴贻芳校长、陈中凡先生、刘开荣先生和佟树珍同学参加南京市各界代表大会。

1950年

1月20日，本校寒假毕业生10人。

2月21日，本校接华东军政委员会教育部通知《关于华东区大专院校政治课程暂行办法》。

2月，本学期在校生为176人。教职员(附设机构15人在内)专任的79人，兼任的14人。

2—3月，金女大依据南京市各大学政治教学委员会协定，本学期开学的第一个月停课，用于政治学习。开学后，全校师生混合编组，共同学习唯物史观，时间

达5个星期。

5月，自《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校刊》于1948年11月停刊后，本校又出版《金女大校友通讯》第一号。

5月，中央人民政府决定对大专院校的毕业生，不论公立、私立，一律统筹分配工作，全校师生深感欣慰。

5月28日至6月17日，吴贻芳校长离校赴京，出席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8月14日，中央教育部公布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决议，题为《关于实施高校课程改革的决定》。

6月1日，南京军管会高教处于5月底撤销。金女大划归华东军政委员会教育部领导。

6月，《金女大校友通讯》第二号出版。

7月3日，本校举行第32届(1946级)毕业典礼。毕业生共26人。

7月17日，本校教育工作者工会召开成立大会。

7月，《金女大校友通讯》第三号出版。

8月，本校招考录取新生129人，转学生3人，特别生1人。但报到注册人数为83人。

9月1日，本学期开学，在校生达223人。

9月初，本校贯彻中央教育部关于今年高校暑期招生向工农开门的规定，按华东教育部通知精神，为已招收入学的三年以上工龄的产业工人、革命干部、革命军人，指定专人给予集中补习。

9月27日，本校改组后的校务委员会成立。根据中央教育部新颁《高校暂行规程》及《管理私立高校暂行办法》中有关规定，本校工会选代表4人，学生会代表2人，参加校务委员会。

9—12月，本校根据中央教育部关于高校课程改革决定的精神，进行课程改革，每周学习时数为44小时，每学期所学课程以15—17学分为界。

10月1日，全校师生员工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活动。

10月，《金女大校友通讯》第四号出版。

10月，本校吴贻芳校长、陈中凡先生、刘开荣先生、曹琬出席第四届南京市各界代表会议。

11月14—18日，金女大医预科学生李芸本，社工系学生李振坤、朱文曼分别写信给校学生会执委会，指出美籍教授费睿思在讲授《英文》、《社会制度》、《现代社会学说》课时，散布攻击“抗美援朝”的错误言论。学生会公布了这些信，之后，各级各科纷纷展开讨论。

11月27日至12月31日，根据华东军政委员会教育部通知，全校工作以时事学习为中心。在学习的基础上开展“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运动。

12月2日，因《新华日报》发表文章，揭露费睿思的错误言行，因而激起全市学生的愤怒。南京市各校代表700余人参加金女大举行的“反侮辱、反诽谤控诉大会”。

12月3日，南京市60余所大专、中学全力声援金女大。

12月12日，金女大举行参加军校动员大会。

12月15日，金女大隆重举行参加军校报名大会。全校有30余人决心参加军校。

12月26日，金女大根据中央教育部有关规定，将毕业生在解放前所学的《三民主义》、《伦理学》、《公民课》等课目的成绩及学分，不列入毕业成绩。

12月30日，美国政府宣布冻结中国在美国的资金，并停止美元汇来中国。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面临经济来源断绝的危机。

1951年

1月，中央人民政府发出指示教会大学如果由中国的教会供给自筹的经费，可以继续办下去，否则中央人民政府提供经费改为公办。各教会大学校长在教育部开会，决定接受中央人民政府经费，改为公办。

2月5日，本校家政系改为儿童福利系，社工系中儿童福利组并入该系。

春，在校生为183人。外籍教职员先后离校回国。

5月5日，中央教育部批准金女大与金陵大学合并筹委会名单。

5月21日，金女大与金陵大学联合召开两校合并动员大会。

6月，第33届(1947级)毕业生共56人。

8月，金女大图书报刊资料计97 000册。

9月，金女大教职员工计129人，兼任教员19人。教师中教授27人，副教授12人，讲师8人，助教10人。

10月，金女大与金陵大学合并为公立金陵大学，设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为李方训，副主任委员为吴贻芳。校内设文、理、农三学院。理、农学院设在金大原址，文学院设在金女大原址。金女大教授陈中凡、潘耀泉、张少微、张芗兰、王栻、钱旦华、李嘉禄、张汇兰分别为文学院中文系、外文系、社会学系、教育系、历史系、儿童福利系、音乐系、体育系的临时负责人之一。吴懋仪、陈新国分别为理学院化学系、生物系的临时负责人之一。

10 月，金女大并入公立金陵大学的教职员有 80 人左右。合并后，公立金陵大学有专任教授 86 人，兼任教授 27 人，副教授 29 人，兼任副教授 8 人，讲师 20 人，兼任讲师 4 人，助教 49 人，职员 38 人，工人 136 人。全校教职员工 397 人。

金女大办学 38 年，累计毕业生达 958 人。

1952 年

7 月，全国高等院校进行院系调整。由南京大学师范学院，公立金陵大学教育系、幼教系（即儿童福利系），上海私立震旦大学托儿专修科，广州私立岭南大学社会福利系儿童福利组和南京师专数理班合并，建立南京师范学院，校址设在公立金陵大学宁部即原金陵女子文理学院。

南京师范学院建成时教职员有 150 人，教员 96 人，职员 54 人，其中原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教职员占南京师院教职员总数的三分之一。

主要参考文献

一、档案资料

1.《私立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全宗号六六八。

2.《教育部档》,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全宗号五。

3.《金陵女子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

4.《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

5.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

6. "Archives of the 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Asia",美国耶鲁神学院图书馆。

二、校刊、回忆

1.《金陵女子大学校刊》,南京师范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

2.《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校刊》,南京师范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

3.《吴贻芳纪念集》编辑委员会编:《吴贻芳纪念集》,江苏教育出版社,1987。

4. 金女大校友会编:《永久的思念》,金女大校友会,1993。

5.《金陵女儿》编写组编:《金陵女儿》,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

6. 金女大南京校友会《金陵女儿》(续集)编写组编:《金陵女儿》(续集),南京师范大学金陵女子学院,2000。

7. 金女大南京校友会编写组编:《金陵女儿》(第三集),金女大校友会,2005。

8. Liu Gien-chiu, Ren En-dzi, Tang Hwei-dzin, Wu I-fang, Zee Yuh-tsung (the Class of 1919 Ginling College), *The Pioneer*, Shanghai: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919.

三、论著

陈学恂:《中国近代教育大事记》,上海教育出版社,1981。

曾芳苗著，吴振汉指导：《民国教会女子教育——“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个案研究(1915—1951)》，“国立中央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未刊稿)，1986。

中国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编：《中华归主——1901—1920中国基督教事业统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1987。

惠世如主编：《抗战时期内迁西南的高等院校》，贵州民族出版社，1988。

卢茨：《中国教会大学史(1850—1950)》，曾钜生译，浙江教育出版社，1988。

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南京师范大学校史编写组：《南京师范大学大事记》(1902—1990)，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

孙海英编：《金女大大事记》，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校友会，1992。

雷良波、陈阳凤、熊贤军：《中国女子教育史》，武汉出版社，1993。

朱学波：《吴贻芳》，《江苏文史资料》编辑部，1993。

李小江等主编：《性别与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

顾卫民：《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黄新宪：《基督教教育与中国社会变迁》，福建教育出版社，1996。

周淑真：《三青团始末》，江西人民出版社，1996。

史静寰、王立新：《基督教教育与中国知识分子》，福建教育出版社，1998。

黄洁珍著，吴梓明指导：《从吴贻芳与金陵女子大学看基督教教育理念的实践》，香港中文大学宗教哲学硕士论文(未刊稿)，1996。

约翰·拉贝：《拉贝日记》，江苏人民出版社、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

德本康夫人、蔡路得：《金陵女子大学》，杨天宏译，珠海出版社，1999。

章开沅编译：《天理难容——美国传教士眼中的南京大屠杀》，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

王忠欣：《基督教与中国近现代教育》，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

明妮·魏特琳：《魏特琳日记》，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

胡华玲：《金陵永生——魏特琳女士传》，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尚智丛：《传教士与西学东渐》，山西教育出版社，2000。

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主编：《魏特琳传》，南京出版社，2001。

朱峰：《基督教与近代中国女子高等教育——金陵女大与华南女大比较研究》，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

张宪文主编：《金陵大学史》，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

刘家峰、刘天路：《抗日战争时期的基督教大学》，福建教育出版社，2003。

程斯辉，孙海英：《厚生务实 巾帼楷模——金陵女子大学校长吴贻芳》，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

孙海英：《金陵百屋房——金陵女子大学》，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

后　记

有幸承担编撰《金陵女子大学校史》的任务，是人生中一次难得的机缘。1999年，我们在翻译出版明妮·魏特琳女士(Minnie Vautrin，即金女大美籍教授华群)在南京大屠杀期间的日记时，为了要查对日记中出现的金女大师生人名，曾到校档案部门查阅金女大的老档案；2000年在撰写《魏特琳传》时，又到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查阅了大量金女大档案。在此过程中，我们对金女大的历史有了相当了解，并产生了一种特别深厚的金女大情结。在后来以明妮·魏特琳为主题所举办的几次学术活动中，我们同金女院于忠喜院长的合作日益频繁。去年6月份左右，于教授告诉我们，2005年是金女大校庆90周年，老校友们特别希望组织人员写一本属于他们自己的校史来庆祝母校的生日，他希望我们能帮助完成这一任务。作为本校历史系的教师，面对校友会的期望和自己对金女大的特殊感情，不需要也没有任何托词。

此前我们对金女大"厚生"精神的理解，只是从档案资料和吴贻芳校长的传记中感悟到的，但这次在撰写本书的过程中，才真正体会到"厚生"精神的真谛，它几乎无时不在、无处不在。本项目启动后，一直得到了金女大南京校友会各位校友的大力支持，可以说没有她们倾心无私的支持，本书是很难顺利完成的。记得去年8月11日，在南京贻芳园，已近耄耋之年的梅若兰、李振坤、王韵芳、郑泳梅等金女大老校友和金女院袁金妹、余文娟老师冒着酷暑炎热，对校史大纲进行了十分认真的讨论，提供了许多宝贵意见。甘克超校友因事未能前来参加，但她却通过电子邮件送来一份很长的意见书。今年8月12日，整整一年之后，老校友王韵芳、梅若兰、李振坤、汪安琳和金女院于忠喜院长再次相聚贻芳园，在事先都对初稿进行了认真审读的基础上，各位与会代表提

出了许多很好的修改意见。鲍惠荪校友因路途遥远未能前来参加，但她对每一章都进行了认真的阅读，并以书面形式写了近一万字的修改建议。汪安琳校友对我们说，前三章她连续看了三遍，她还对相关章节的词句作了十分认真的润饰。作为金陵女儿，梅若兰老师还代表金女大校友会和金女院，为本书撰写了十分精彩的前言。

校友会不仅一直关心本书撰写、为本书出谋划策，同时还提供了许多宝贵资料，本书许多鲜为人知的照片都同校友会余文娟老师的功劳分不开，十分遗憾的是因缺少部分杰出校友的照片而使本书未能一一收录。我校孙海英教授是国内较早研究金女大的专家之一，她慷慨惠允本书使用其编写的《金女大大事记》，并向我们提供了她珍藏的部分精彩的校史照片。武汉华中师大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中心章开沅教授一直关注着这项研究工作，中心成员刘家峰教授还亲自复印了部分亚联董收藏的金女大文献送给我们。台湾大仁技术学院的冯启宏教授特意寄来台湾学者有关金女大的研究成果。

参加撰写本书的成员大多曾是《魏特琳传》(南京出版社 2001 年版)一书的作者。具体分工如下：虞亚梅负责撰写第一章；沈岚负责撰写第二章；王卫星负责撰写第三章；经盛鸿、管尔东负责撰写第四章；严海建负责撰写第五章；张连红负责拟定全书提纲和最后统稿工作，同时还撰写第六章、修订附录。

由于各人的感受与视角不尽相同，每位校友对母校的回忆一定都非常美好、深情，但美好和深情之处可能各不相同，因此，要写出一本让所有校友都感满意的校史，对于研究历史的人来说无疑是一项巨大的挑战！从去年 6 月份在于忠喜院长办公室接手这一任务至今，心中惶恐与压力一直未减。在本书写作过程中，我们自始至终得到了上述诸多校友和专家的热心指导和帮助，可以说这本书也是同上述诸位校友共同合作的结晶。由于时间仓促和水平所限，本书肯定还有许多不足之处，敬请诸位校友和各路贤明不吝赐教，俾日后有机会再版时修订。

本书在写作的过程中，吸取了德本康夫人、蔡路得、孙海英、朱峰、曾芳苗和黄洁珍等人许多优秀成果，如不参考他们对金女大的研究论著，很难想像本书的写作难度会有多大。在此，谨代表本书各位作者向

他们致谢。另外，这本金女大校史实际上也是研究南京大屠杀期间"活菩萨"明妮·魏特琳女士项目的延续。作为南京师范大学"211 项目"——"日本侵华与南京大屠杀研究"的组成部分，在此对校"211"办公室的长期支持深表感谢！

最后，特别感谢江苏人民出版社吴源社长、王保顶主任和责任编辑戴宁宁女士，他们的大力支持和辛勤编辑，给本书增色不少。

张连红

2005 年 9 月 9 日于仙林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金陵女子大学校史
作者=张连红主编
页数=369
SS号=11997128
DX号=
出版日期=2005.10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